

上 编
回忆个人经历

在接受第三次福冈亚洲 文化奖时的讲演

此次承蒙福冈各位的厚爱，授予我如此洋溢着美好情意的奖赏，自己实出意外。这确属过誉，当然也使我感到荣幸。

在接受奖赏的时候，按理应该讲点什么。就请允许我说一说连同自己的经历在内的一些思考，来作为答谢。

小时候在中国的家

我出生在中国山东省的农村，在那里长到 11 岁。直到战后的 1955 年，即昭和 30 年，我初次去上海和北京，才知道中国竟也有那么大的城市，觉得很吃惊。

我的父亲曾经在那里经营旅馆。按今天的标准看，那旅馆自然算不上太大。但我想，在当时，的确称得上是一个漂亮的日本式旅馆。

旅馆的大门有书院之风，迎面装饰有鲜花，里边的走廊连着两个铺着“榻榻密”的房间。房间里除了席子，还有壁龛，此外如厚厚的坐垫、靠椅、带围沿的盘子、铜制的火钵、棉袍等，一应俱全。吃饭则是用带腿的方盘送上去。

那里有一位中国人厨师，生鱼片、烤鱼、烧蛋等做得都很好。鱼是从青岛用木箱运来的，很新鲜。螃蟹的嘴里总是咕噜咕噜冒着白泡。

也有素烧。牛肉是青岛出产的。当时，青岛的牛肉和神户不相上下。肉肠也很好吃。我不常吃零食，并不偷嘴。不过有一次我忽然觉得肚子饿了，便从吊放在仓库里的肉肠中拿出来一根，自己用小刀一片片地切着吃了起来。开始只是想吃一点点，可连自己也没想到，后来不知不觉地竟把整根全吃光了。我记得那是一根香肠。直到现在，我再也没能在肉铺或商店里找到那么香的东西。

在青岛住有德国人，那里的牛肉和肉肠都很好吃。

旅馆里的房子和大门不太一样。那房子的外墙是用中国式的土坯垒起来的。这种土坯，是从地里掘出粘土，里面掺上麦草，用水调和起来，再把这样的湿草泥挑进长方形的坯框里，脱成坯子，在太阳下晒干制成的。

屋脊是草苫的样式，但没有茅草，而是用麦秸。

和大门连在一起的房子，建得又高又大，一阶比一阶高。不过样子也是中国式的，即从外面一进去，屋里是用土夯实的地面。

一进大门便是院子，因为有外墙围着，从墙外看不见里面。而在铺着‘榻榻密’席子的屋子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庭院。在它周围是客人们的房间。其中一个房间有宴会厅那么开阔，在孩子的眼里显得相当大，想来大约有 10 到 12 铺席的样子。那里的客人只有日本人。他们在旅馆可以住宿、吃饭和洗澡，全都是日本方式。那时是把日本称作‘内地’。经办这个旅馆的好处，大概是因为它能使来往的日本客人有一种回到‘内地’的感觉。

山东土匪和山东苦力

有一次，发生过这样的事：

我刚从小学校回来，母亲告诉说：“土匪头子住在这儿，看看罢。”我移身向旁边的客房，推开房门进去，望见在“榻榻密”上，有一个土匪头子在囫囵躺着，大口吸着烟。以后想来，他是在吸鸦片，点着一盏小油灯。

多年之后，我从母亲那里知道，这个土匪连地主、警察局长都接待，打麻将。在赌麻将时，地主中国人得故意输牌，他则接受那作为礼物的赌金。要是不这样做，那土匪就会攻打城镇，抢掠烧杀。

当地也有中国人开的旅馆，不过，因为引人注目，还是住日本旅馆的人多。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生出了疑惑：建成这个旅馆，得花不少的钱，我家里是从哪里弄来资金的呢？

父亲出身于爱知县的贫苦农家，兄弟又很多，据说很早便到了外地谋生。因为性格认真，也许多少积攒了点钱。

可是，新建或改造那些房子，必须借用中国木瓦匠的力量。而凭父亲那样的中国话，显然不行。他怎么能雇佣木瓦匠呢？

我在五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也在十几年前病故，至今我也没有确切弄清楚这些事。

只是母亲偶而透露过一点。听说是父亲救过一个地主的命。所说的地主，便是建了旅馆的那块地的主人。

前边曾提到过土匪，在当时，山东有两种人最有名：

山东土匪；

山东苦力。

土匪就是离开众人 在山的深处安营扎寨 时而下山到村镇里抢劫。大约因为经常骑着马，日本话叫“马贼”也就是强盗。

然而他们也是人 并非自己愿意去杀人越货 只是因为生活太穷。所以 土匪头子也一个人出来赌麻将 赢了就回去。警察局长并不开枪打他，还情愿输钱给他。

另外 土匪也抓人质 逼着有钱的家属交赎金。那样可得到大笔的钱。

听说地主就让土匪绑去过，被逼着交赎金。我父亲作为交涉人 不知道交没交钱 总之是把地主领回来了。大约土匪不太敢惹日本人 因为如果惹了麻烦 便会成为国际性问题 军队会出动讨伐他们。

我家的旅馆紧靠着地主的房子。小孩子喜欢模仿探险。那时候，我和妹妹两个人曾进过地主的宅院。见那里有一个很大的猪圈 里边杀了猪 正在冲洗猪肠子。

地主一家住的那栋房子也有大门，进门后地上铺着石头。面对着庭院的房子很漂亮。房门开着，静静的，一点声音也没有。我们就赶紧跑回去了。

旅馆里的人总是很多。

在前面提到的那个可举办宴会的房间对面，还有一个地主家的学校或是私塾。孩子们集中在那里，哇哇地一齐读着课本。教师是雇来的。

旅馆的一个大庭院中有一棵桃树。每到夏天，母亲就用浸着桃树叶的水给我们冲澡，那是为了防止痱子。

记得妹妹说过 每到桃花开了 地主夫人就要过来赏花。那时 母亲总要准备凳子什么的 来欢迎她们。到那时候 旅馆里的一栋房子，便成了地主夫妇生活的地方。

不知道父亲究竟是出于什么想法，去救出那个地主的。也

许是因为年轻和见义勇为。

我猜想 毕竟父亲是救命的恩人 地主才肯让给他房子 并且帮他雇佣木瓦匠 而且连房租也不要。

父亲去世以后，成了未亡人的母亲也仍然受到他们的照顾。

再顺便说说“山东苦力”这与下边的话题有些关系。

山东省山多 因此 据说土匪也多。山多则耕地少，一到冬天 人们便到‘满洲’（现在叫东北）去挣钱。孤身一人出门 去打零工。

把体力劳动者叫作‘苦力’ 英语中也有这个词汇 英语辞典里就有载录。

“满洲”的冬天非常冷 当时市内的交通工具是马车。人力车也有过 可因为道路结冻 很难走。

在我长到 11 岁的时候 全家移居到了现在的长春 也就是当时伪‘满洲国’的首都新京。

我母亲的中国话说得并不太好 然而有一天坐马车 她跟赶车的聊天 知道那个男人是从山东来的。一个‘山东苦力’到当地 赶马车是他的擅长。可那时由于经济管制 伪‘满洲国’和中国的货币之间不能自由兑换。那个男人费力挣钱，却不能寄回山东。我母亲是一位乐于助人的热心人，她便与青岛的日本人联系 把钱送走。等到那赶车人的村里有人去青岛 再把钱带回家去。

学习中国语

再回过来说说山东。

我出生的山东那个乡镇上 连家族在内 总共有六、七十个日本人。日本人并不都住在同一条街上，而是零散地与中国人

混杂着住。那里有日本人办的缫丝厂，以及将棉花纺成线的工厂等。因此也有被公司派来出差或是经营工厂的日本人住在那里。后来又有药店、和服店和文具店之类。旅馆就只有我父亲经营的那一个，偶而也有日本人在那里举行宴会。

那里的日本人一般并不和中国人打交道，只是与日本人有来往。不过因为我家是旅馆就有中国人的厨师、保姆和佣人，也常有农民来送蔬菜和瓜果。这时，母亲使用中国话同他们交往指派厨师或佣人。

上到小学 3 年级时母亲为我找了一位中国家庭教师每天到家里来教我中国话可我觉得挺别扭受不了。教材本是很简单的始终只是死背硬记。其中的意思我大体明白不过那本中国话教科书里有许多汉字，是在日本小学的国语课本里没有学过的。

那里也有专收日本孩子的小学校。全校共有从周围来的 60 名学生，规模很小。但被称为森先生的老师，夫妻俩对教育很热心。

那位中国老师叫萧国栋虽然不是北京人可是用北京话讲课。他对我发音上的错误校正得很严格，在这方面一点也不让步。

我至今仍很感激那位老师。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以上，罗嗦完了我少年时代的故事。接下来，我想谈谈在荣获这一崇高的奖赏，且身处于这样的场合，自己领悟到的一些启不。

在那个时代我周围的人们并没有学者也没有人特意给

我讲授过什么道理。

现在回想起来 我觉得在当时当地的见闻 对自己的思想认识 以及对我后来的研究 确实打下了基础。

正是在那时候 我知道了孔子 还有伟大的思想家孟子这些人。孟子说 人皆有恻隐之心。比如 蹒跚学步的孩子 要是掉到了井里 不管是谁 都会慌不择步地去搭救。

人们这样做 当然并非是要图那孩子家长报恩 或者一定要与孩子的父亲有什么交情。救人性命不是想得到别人的好评，也不会因为怕指责便不去抢救。这就是孟子所讲的恻隐之心。

恻隐之心 仁之端也。羞恶之心 义之端也。遇事谦恭的辞让之心 礼之端也。区别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的是非之心 乃智之端也。凡为人 谁都有这“四端”。

孟子这样断言：“无恻隐之心 非人也。”

我的弟弟至今还不能忘记，小时候在山东，看到人们吵架时 常嚷的一句话是：“你不是人！”

吵起架来 谁都觉得对方不对。至少在一方看来 大约对方就是缺少“恻隐之心”。

由此可见，孟子的教诲已不知不觉地渗透到了那些不太懂得读书的平民百姓之中。

日本与中国相比 有着较高的国民生产总值。然而 经济统计也有忽略人的心灵方面的缺欠。

我愿意用“中华世界”这样的说法。而中华世界文化的特点 并非是仅仅积累知识 或对概念条分缕析 而是以人性为根基。我觉得 这种文化是用谁都能理解的浅显话语 来传播先人领悟的智慧。

看融合重于对立 对人对己都设身处地待以温情 这无疑就是中华世界，也可以说是广大亚洲世界的精神。

我的回顾暂到这里。今后，我将更加努力学习，以答谢各位的厚爱与鼓励。

多谢静听我的发言。

程麻译自《获得福冈亚洲文化奖的人们》，
联合出版社，1999年9月30日

我心目中的红卫兵

这一阵子，读了北京的红卫兵任意造反的报道，竟莫名其妙地一下子觉得仿佛中国就近在咫尺似的。没有什么故意的思考，便有这样近乎本能的反应，连自己也感到有些意外。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这大约是因为，又使我想起了自己那些将要被忘怀了的记忆。很可能就是它们，唤起了我的这种亲切感受。

说得确切一些，这使我想起了一个城镇，就是自己在幼年时住过的那个中国小镇上的记忆。

我有生以来的最初记忆，是自己在军用帐篷里裹着黄毛毯，很是暖和，并在里边睡觉，而不知不觉地却尿了床，热乎乎的。当时，大概日本军队正在中国打仗，驻扎在帐篷里。查找年表后知道，那是发生“出兵山东”事件那一年里的事情。好象在野外看见转动着螺旋桨的飞机，把邮政信筒吊起来，也就是那时候的事。^{〔1〕}

〔1〕 这是 1927 年夏天，日本出兵山东时，在中国境内使用的一种以军用飞机与各地日本军队或日本居民通信的方法，即用带螺旋桨的双引擎飞机吊下铁钩，放下信件；然后再勾起地上日本军队或日本居民要寄出的信件。——译注

不过我回想起来的那些记忆却不是指那些而是并配上称作什么“事件”的一些事件。当时我还没有上小学。

记得在那个小镇的正中有一条南北笔直的街道大家都叫它“马路”。那确实也是一条马车走的路因为路上有石板有点像铁路的道轨似的两条并排铺着。即使是下大雨土路上泥泞不堪马车在这条路上只要车辙不跑到那“道轨”外边去便能走得很隐当。这条路，是那个镇子上的主要街道。我们家并不对着它但有很多日本人住在那条街上。当然那里也有中国人开的商店。

有一天在那条“马路”的一个街角上四、五个日本小孩正凑在一起玩耍。不知什么时候，一些年龄差不多的中国小孩子，也闹闹嚷嚷地聚拢了过来，嘴里还好像在一起骂着什么。突然，一块小石头从他们中间飞出来，正好打在一个日本小孩的肚子上。那劲儿大得“嘭”地一声石头竟被弹了起来。中国小孩们看见这情景都现出了如中国话所说的“吃惊”的样子慌张地四处逃散了。而那个日本小孩——也就是我 是因为当时得病，腰上正绷着石膏。中国小孩见石头打在我的肚子上，还以为打伤了。而我并没有觉出疼来，倒是觉得中国小孩们看见那蹦走的石头而露出的善意、惊慌的脸色有点可怜禁不住有些苦笑。他们那飞快逃走的样子，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过了不久也就是两、三年以后镇子上的一些地方出现了排日的传单。我曾看到上面画着，一些中国人被夹在用铁环箍着的木桶板条中间，有的被夹得流着血。不必说，那意思是说，日本人在欺压中国人。

这时我已经入了小学。在上学放学的路上经常能远远地看见一幅广告。偶而要是在那幅广告前面与中国军阀的队伍交错而过，也许会有唾沫吐到我的头上。这时，我恍然明白了，

那究竟是什么意思。

那小学校，是日本人在镇上设立的。从初小一年级到高小二年级都有 共有 60 多名学生。一般是两个年级合在一间教室里上课。在那里，我们知道了“日本”，但当时的用语，是说“内地”。“小学唱歌”的情景，也至今深印在脑海里。那歌曲有《菜花田》、《樱花》、《广濑中校》还有《天皇陛下》当然都是日本歌。

再到后来，在我家的外墙上，有人用白粉和铅笔画了一把青龙刀，那刀身上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但或许也许并没有“主义”两个字。而我，却很快便模仿了起来。当给“内地”的伯父寄信时，在收信人的名字前面，先学着写上“大日本帝国”的字样。

有一段时间，尽管并不总是那样，可从家里一上大街，大都能感受到排日的浪潮逐渐高涨起来，常被可怕的敌对情绪包围着。当时，一群群的中国孩子们，像驱赶着猎物似地追打我。即使逃回到家里，我还在心有余悸。于是，我便从藏物中找出了猎枪的空弹夹，并且像中国人在旧历正月放爆竹似的，把爆竹装在那弹夹里，放过三、四个。当时，我家的大门是中国式的，两扇厚厚的门板，可以象观音龕那样地开合。我用黄磷火柴，把弹夹里爆竹的导火索点着，然后将这装着爆竹的弹夹插在门缝里，只听“轰”地一声，爆竹便像放火箭似地飞了出去。

这时，周围的中国孩子们便全都四处逃散了。我想，家里不会再有人来捣乱了，害怕的心情才渐渐消失。

当然，这其实并没有真正伤着他们。排日的骚动，不久也平息了下来，我再没有体会过像那样害怕的滋味。

不过说到伤害，也并非一点都没有。例如，与我家隔两、三栋房子，有一个中国人开的理发店。那时，还没有树起什么像糖

棍那样转动的幌子。^{〔1〕}到了夏天 那里的窗户卸下了玻璃 里边看得很清楚。我看见，那店里的天棚上，吊着一扇小门板样的东西，下面系着一根绳子。那绳子被拽在另一间屋子里，向下答拉着。当小伙计在那儿一紧一松地拉动绳子时，天棚上的小门板动起来，就会煽起风。那是一个能使正在下边被剃头的人感到凉快的装置。

理发店里的师付，像大多数过了中年的中国人那样，头剃得溜光。

我家和理发店的前面一带，是一片空地。那空地是用来当作停车场，连着前边说的那条“马路”。从偏僻的农村运货来的马车，就停放在空地上，但是大部分时间都比较冷清。忘了是在哪一年，曾有过马车和骡车把空地塞得满满的时候。在那时，拴骡马的树的树皮，常被牲口啃下来，露出了里面白花花的木头。

从我家经过理发店的前面，再走过同学足立正君的家门，有一个中国人的饭摊，就设在“马路”边上。总有人在叫卖着热烘烘的肉包子。

——热包子啊 热、热、热包子啊！

其中的卷舌音“RE”(热)字，真能勾起我的食欲。在那油黑的小棉被里，裹着圆圆的蒸笼，摆在摊子上。肉包子满里热乎乎的肉汁，等着客人们来买。

我家和理发店的另一面，大概是一个地主的“团练营”。我家门前的空地，也就成了练兵场。我觉得那些团丁，总像是在到处游荡似的。我家里在大白天也插着门栓，还用支棍固定住。

〔1〕 以前儿童常吃一种棍状糖果，那糖以红绿两色相间，螺旋状地裹在一根棒上。后来 理发店外的旋转灯柱 则像那糖果似的，有红、蓝、白三色螺旋状。——译注

因为谁都不能担保，在混乱中会不会被抢劫。

有一次，像是一个全副武装的警察，走到我家的门前站住了，这是执行死刑的先兆。当对边铁路路基下的犯人站成一排时，已经到处站满了观看的人，我家连门也推不开了。等准备好了，我从家里面朝空地的窗户，越过站着射击的人的军帽望过去，看见犯人仿佛都是男的，跪成了一条直线。一阵像是炸裂的震耳枪声响过之后，跪着的男人们一个个像破布袋似地摊倒在了地上。观看的人如黑色的波浪轰然散开，则连破布袋也看不见了。再一会儿，等人们走光了，地上只剩下了残留的尸体。

在当时，因吸吗啡或海洛因而中毒的人已不少见。在偏僻的村镇上，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进逼，若干日本人能够在那里生存下来，大都与毒品贩卖有些关系。在看见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1〕}的传单以后，日本孩子们都相信，并在暗地里议论说，如果讨饭的人让警察抓住，就会被卷起袖子，看看要是注射过，都要被那样枪毙。在有一段时间里，好象枪毙每天都有。而注射后的人，脏兮兮地躺倒在地上，塞满狭窄的小路的情景，我也见过。当时，枪毙就如同是一种清扫的行动。

不久，到了夏天。似乎那时理发店前的街道和空地之间，已经有了明确的界限：那里栽着两、三棵杨柳树。有一天傍晚时分，附近的中国人全家都坐在树荫下，享受着入夜前的宁静。停车场的上空，被火烧云映得通红。

至今我还能记得那天空的颜色，是因为那时我曾向烧红的空中扔过一块小石头。当时为什么要那样扔，现在我也没弄明白。好像是看见那红得近乎发紫的晚霞，有点着魔似的。运动

〔1〕 此处作者的记忆似有误。蒋介石提出“新生活运动”是在三十年代，而并非是二十年代后半期。——译注

神经一点也不发达，在运动会上总是落后的我，却将投出的那个小石头，高高地画出了一道漂亮的抛物线，最后，恰巧落在理发店师付那光溜溜的头上。于是，血滴答滴答地流了出来。那师付一边大声责骂着，一边朝着我追来。我可以向神发誓，当时扔石头，决不是想打着他，而且以前我也从未向别人投过石头。可是在眼下，如何才能向气得满脸通红的师付申辩清楚呢？

我便慌忙跑回了家。在师付的身后，跟来了很多看热闹的中国人。那师付进了门，当然要在院子里大骂日本帝国主义“小孩儿”的恶行了。当时的情形已记不太清楚，好像后来是大人出面道了歉，而我一定在屋子里吓得要命。

以上是我关于“排日风潮”的记忆。可能细节不太完全，但大体确是这样。后来又过了一、二年，我则在那个理发店里剪掉了头发，剃了个“台湾光头”。〔1〕那已是题外的话了。

不知道与关于红卫兵的报道到底有些什么联系或是类似，我竟想起了以上这些事情。也许是他们那远在天边的诱惑力，使我回忆起了自己当人生开始之时，在中国发生过的这些故事。

当迎头的中国军队吐来唾沫，我作为日本孩子，只是觉得害怕。虽然也相信，会有日本“国威”可以做我的后盾，不过在当时，要想保护个人的生命，只能靠自己。也许与日本人有些不一样，我觉得大多数中国人，如同是靠触觉来生活的昆虫那样，对周围社会的反应比较敏感。虽说也并非总是如此，但就像愿把财产，首先是贵重金属带在身上的习惯一样，他们的社会感受，是直接来自于对法律，甚至是对国家安全的感觉。这，便是中国人的生活态度。

〔1〕 据问原作者，并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把男人剃的光头称为“台湾光头”。大约头看来光光、圆圆的，有些象地图上台湾岛的样子。——译注

在北京 现在个人的店铺即使是公私合营了 大约有的人仍会觉得 它们还是自己的。这样 当旧资本家眼看着店铺的旧招牌被砸坏了，恐怕也会像人们一样，回想起那些旧事。也就是说 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人们大都已经相信 并且习惯了现有的法律、国家和体制等现实的生活。然而 在突然之间 面对着群众的直接冲击 作为个人 便很容易引起对已经过去的时代的回忆。对于威胁 人们会像用触须去试探外界的昆虫一样 尽力运用自己的能力 如老猎人似地转动着手腕 树立自信心 并且设法避免如过去那样重遭灾难。当我知道红卫兵在街头贴的大字报上 骂他们是“王八蛋（龟卵）”的时候 连自己也对使用这种旧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口头语 而在新中国毫无必要的词汇 感到惊讶。在我心里 不由得浮现出的感觉 便是“真没法子”。

我是超越善恶的标准，来回顾中国的事情的。在作为群众的红卫兵的形象中，便可以看出以往中国人那超越善恶的形象。而他们 就是中国人。

正如过去那样 现在的中国人 仍然在以中国为舞台 在他们自己的‘戏剧’里 扮演着主角 也在扮演着观众。

这 确实让人觉得倍感亲切。

程麻译自《新日本文学》第 21 卷 11 号，1966 年 11 月 1 日

致中文读者

——《解剖中国的思想——传统
与现代》中文版序

我出生在中国山东省一个偏僻的村镇上。镇上的日本人虽然与中国人混杂而居，却不与之往来。即使同是日本人，也不太做亲近的攀谈和交往。在当地，设有日本领事馆的分馆，日本人每年在那里聚会一次。现在想起来，那天大概是天皇的诞辰。日本人就读的小学，也是每年举办一次运动会，还举行游园会，唱歌演戏，学童的家长会带着便当〔1〕来，齐聚一堂，渡过快乐的一天。

镇上有一个由日本人出资办的纺织工厂，厂长也是从日本派来的。他住在厂里，甚少与当地的日本人打交道。还有一家从农村收购棉花并制棉的工厂，他们的房舍邻近我家，那家人也有几个读小学的孩子。所以，我有时会上他们家去玩，但也仅止于这样的往访。

小学主持“日本人居留民会”这种自治组织的运作，除了校长和他太太俩人之外，还有一、两个年轻教师负责授课。一间教

〔1〕 指日本式盒饭。——译注

室容置两个学级 采用一边学习书法 一边教授国语 日语 的方式。教科书全是日本教育部制定的国家指定教科书，并没有中文课程。

在读小学三年级时，我的母亲突然想让我学习中文。镇上三、四个日本青年正好刚在学习中文，我便加入他们的行列。但过了一、两个月，他们全打了退堂鼓，只剩下我一个人。在这之前，我们一直是在其中一位青年的家中学习，后来，则变成了老师到我家来上课。

我从教科书《急就篇》中学习简单的会话。老师出声朗读，我随后大声仿念，反复诵读，自然深印在脑海里。至今我还能背诵：

“来了么（不是“吗”而是“么”）”“来了”“去了么”
“去了”“走了么”“走了”“行不行”“行”“好不好”“好”
……。

只记得这《急就篇》从头至尾读过两遍 之后还学了什么，已记不得了。但我读过一册中文教科书 附录有《百家姓》（“赵钱孙李 周吴郑王”）还念完了一本《官话指南》 记得上面有一个单词 是“万岁爷”。

这样的课程学了两年。后来，我们一家搬到了东北的长春，便不得不与老师告别。上课时 那老师不厌其烦、仔细地纠正我的发音。有时 我急得哭起来 板着脸孔不说一句话

至今 我每想起当时的老师 总是心生感谢之情。老师好像不是山东人 教我的是“北京官话”。

有人知道我在中国大陆出生 就说：“所以 你会中国话嘛！”其实，当时的中日关系并非如此。日本人并没有积极地与中国 人接触，有事只是以语意不清的中国话含混带过。自那以后，我

又在长春待了 7 年，19 岁返回了日本。仔细想想，这 19 年的时光，自己仿佛是在外国留学一般。

在 19 岁之前 我曾回访过日本两、三次 所以 还知道昭和初期日本的风俗。但 19 岁回到日本时 则犹如来到外国一般地难以融入。对我来说，中国是自己怀念的故乡。我曾在内心深处，考虑到返回中国去，这大概也是因为母亲和弟弟还待在长春的缘故吧。

或许是那种对于中国的眷恋，一种望乡的情愁，牵引着我从事中国的研究。确切地说，除了研究中国，自己也别无出路。换句话说，为了填平无尽的乡愁，我渴读有关中国的书籍，撰写有关中国的论文。对我而言，历来的学说如何论述中国的种种，并不重要。而自己如何看待中国，透过各种资料的描述，厘清那些模糊点，并加以援引，使自己的思想得以明确下来，这才是最重要的。

本书也正是这种工作的一个成果。我依稀记得，以研究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优秀著作享誉学界的 B. 舒尔茨〔1〕先生莅临东京时，他想见我一面，所以我就去国际交流会馆与他会晤。他已读过这本书，对这书里关于中国天空的描写，予以赞赏（参见第 8 章《天的思想》）在执笔当中 我曾觉得自己在好些地方涌生出与中国的天空融合为一种神秘之感。因此，他的美言，使我感到很欣慰。

此外，他还指出本书在儒教、道教的各种流派、学说方面缺乏系统的阐述。这并不是指责我，而是客观的指正，我并没有微

〔1〕舒尔茨（1923—）美国的 中国 研究 家。1947 年 毕业 于 华 盛 顿 大 学。美 国 亚 里 桑 那 大 学 教 授。著 有 《中 国 的 片 断》、《民 国 时 期 中 国 人 物 传 记 辞 典》等。——译注

词。也许阅读中文译本的读者们，会有同样的感想吧。写作的因由我已经表明了，而那也正是本书执笔的动机。内容若有不足之处，请参阅其他的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

本书的翻译出版，劳烦黄英哲君之处甚多。他流畅的译笔，使原文变成了使读者更为易读的读物。从出版到校正，他尽心尽力，我铭感五内。继而，我也要向完成本书最初译稿的郭兴工先生，表示感谢。其实，郭氏的译稿已于十几年前完成，并为出版事宜多方奔走，但因种种原因，直到现在还未能实现，其中我也应负起部分责任。在此藉本书获得出版的机会，特向郭氏的辛劳铭心志谢。

以前我就认为，出版中文著作比出版日文读物更具有国际性。我衷心期盼，本书通过中文译本的发行，能得到世界各地广大读者的良益批评，并向慷慨允诺出版的前卫出版社深表敬意。

竹内实一九九五年六月十三日于北京日本研究中心
郭兴工、黄英哲译，《解剖中国的思想——
传统与现代》 前卫出版社，1996年7月

我的故乡在中国

拉依夏瓦〔1〕在其自传里曾说：

“我是在日本出生、长大的。”

如果模仿他的说法，我则可以说：

“我是在中国出生、长大的。”

拉依夏瓦生长在美国传教士家庭，曾在日本的美国人学校里读书，后来成了日本历史研究者，还担任过美国驻日大使，业绩卓著而我，是出生在中国山东省农村的一个小镇上，父亲曾在那里经营接待日本人的旅馆。我 5 岁时，父亲去世。后由母亲扶养我、妹妹和弟弟们长大成人。

那个小镇上有一所日本人小学校，由一对夫妇担任教师。有时还有一位年轻的先生，同那对夫妇共同教授着全校 60 多名学生。一间教室分成两部分，或者只有一个年级，一部分人写字，另一部分学习日语。在小学 4 年级结束以后，我同母亲、妹妹和弟弟，移居到了旧“满洲”的长春。长春当时称为“新京”。

〔1〕 拉依夏瓦(Edwin Reischauer)(1910-)现代美国历史学家、日本研究家。生于在东京的美国传教士家庭。先后在巴黎、东京和京都求学，专攻日本历史。后为哈佛大学教授。著有《日本——其过去与现在》等。——译注

前些日子，我去寻找过自己的出生地。它与附近的地区已合并为“淄博”市，我生活过的“张店”只是该市的一个“区”。当时的“张店站”很小，站前有一个广场（空地），在空地稍微向东的地方，便是我父亲的旅馆所在地。而现在，“淄博站”的规模已扩展了几十倍，广场也铺装了。当初的旅馆，大约便在如今的站前广场上。

令人高兴的是，有个旧天主教堂还保留着。经允许进入教堂参观，看见有 5、6 个信徒在唱赞美诗。有一个老医院也还在，原名叫“同仁会医院”，西洋式的建筑很引人注目。但觉得意外的是，在我的印象里，自己“出生的地方”应该更大一些。教会和医院也都不是在老地方，它们似乎离车站还要近一点，而现在，这里已经成了淄博市的中心部位。

我承蒙获赠了一本 16 开本、厚 700 多页的《张店区志》。看其中的年表，有关于铃木格三郎建立“铃木丝厂”的记载。据说，当时工厂里装有发电设备，其电力供给张店、周村等地方。小的时候，我也曾到那家工厂去“探险”过，但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家的电灯用的，就是铃木丝厂的电力。那个工厂建立于 1923（日本大正 10）年。

从北京到山东省会济南，乘飞机要 50 分钟。而从济南到张店，走高速公路需要 1 个小时。

济南被称为“泉城”，有 72 眼名泉。其中的“趵突泉”最为著名，那是在池子的中央，涌出三股水。我曾到泉边的饭店，按日本茶道官休庵、武者小路千家以盘奉送的“礼法”，为陪同的山东日本学会各位先生献“茶”。

后来，我在山东大学和山东工程学院张店，做了题为《金印

之谜》的讲演。在那里 我提出了“汉委奴国王”印〔1〕中的汉字“委”应该如何读的问题。此字在日本语中也许有不同的读法。

当时有学生问我回到故乡的感受，尽管自己回答说，“上了年纪感情变得迟钝了”，但当我从山东工程学院讲演会场的窗户望见外面的树梢，以及看到张店站前广场上的泥土时，胸中情不自禁地涌生了似曾相识的感觉。

程麻译自《中日新闻》，1995年1月26日

〔1〕 1784年 在日本九州的志贺岛发现一枚刻有“汉委奴国王”字样的金印。经考证，此印证明最迟自汉代开始，日本已与中国有来往。——译注

《毛泽东语录》译后记

过去 也就是我幼年全家在中国生活的时候 隔壁邻居那边有一个私塾。在讲课中 经常从中传出朗朗的读书声 虽然显得吵嚷 但也带着某种韵味 听起来很给人以快感。邻居是一个大家族 请了一位老先生来教孩子。孩子们的年龄参差不齐 各人按着自己的学习进度 背诵着教科书。后来我才真正明白 中国话所说的“念书”在私塾和在学校里并不一样。

在前者，其中有除了学学问，还要放声读书这样两种意思。如私塾先生那样 按着活字印刷的教材，一边小声抑扬顿挫地读着，一边配合着自己的声音，上身像被风吹动似地前后摇晃着，仿佛沉浸在课文情景中的样子 那才叫真正的“念书”。在近一个时期 有将中国人郑重其事齐声朗读《毛泽东语录》〔1〕作为一种新风尚来报道的 但弄不清那是一种仪式 还是习惯。而在我看来 这种事情在中国 其实从很普通的“念书”起 就已开始了。

我从私塾里听到的那“念书”的声音 读的是什么呢 大约 是《三字经》 就是按意思将汉字三字一句地排列起来 读来很押韵的一种教科书 或者也许是《论语》。而《毛泽东语录》 我认为

〔1〕 中文原名是《毛主席语录》。——译注

则可视为“现代《论语》”。在长时期里,《论语》曾是中国思想界的基础。以后《毛泽东语录》能不能象《论语》那样长久地维持其权威性,当然不好轻易断定。不过,当进入二十世纪,中国新一代人高呼打倒孔子即儒教以后,《论语》所占据的位置,一直空缺着。在中国民众和知识分子的潜在意识里,能够替代它的东西恐怕还得是“语录”。正像把孔子对弟子的谈话整理而成《论语》那样,《毛泽东语录》也是由毛泽东对党员和干部的讲话编辑成的。确实,毛泽东也对中国的民众讲话。不过,编这本《毛泽东语录》,主要还是面向党员或干部。最初它是发给士兵的,因此也不妨认为,又有面向士兵的意思。这就是说,广大的民众(按中国话叫“老百姓”)读它当然也有益处,但是其编选内容的重点,既然是工作态度或方法,因此,主要还是为了给与广大民众相对而言的党员、干部和士兵阅读的。可以说,它是“治者”之书,而并非是被治者的书。而《论语》也是那样。

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当然会有矛盾。因此在中国,领导者的品德必须比被领导者优秀才行。而政治和道德,也不好截然分开。老百姓受领导者的影响,品德有了提高,会被看作是“治者”的成绩。长期以来,《论语》在中国思想界受人推崇,是因为其中贯穿着政治与道德一致的观念。老百姓同样肯定这种观念,所以,《论语》也是被领导的民众爱读的书。在中国,所谓道德,具体是用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民众日常生活,正与《论语》相吻合。我觉得,透过《毛泽东语录》里关于马克思主义、党或军队的那些庄重论述的表面,可以觉察出贯穿其中的、那种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中国式传统观念。

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有一种向往纯朴、自然、非现实世界的情趣。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现实有关,这其实是人们安于停滞和失败的社会风气的反映。可以理解,《毛泽东语录》强

调人的意志、勤奋和持续而不停顿的革命精神，是想要改变这样的风气。就是说，与其将《毛泽东语录》视为老庄和道教的思想，无宁说它更是儒家和儒教的，或者还含有墨家质朴艰苦的精神。我认为，中国思想的结构是：民众（内在）是道教的，而为政者——知识人（外在）则是儒家的。如果承认这一点，就可以发觉，《毛泽东语录》是想改造中国的这种思想结构。它通过全面普及自己的思想，试图从外在的社会规范中，提炼那些内在的东西，进而将外在规范变成人们内心自愿的东西。就此而言，不妨说，它是反传统的。

然而即使是这样，从中也可以看出其源自传统思想的那些成分。如同以往的“治者”即知识人信奉《论语》的教诲一样，即使中国的党员、干部和士兵信奉《毛泽东语录》（并表里一致）而现在中国的民众，也似乎仍旧与过去的老百姓一样，其思想深处还是神往道教的、超越现实政治的生活境界。对于这一问题，大概只能根据今后《毛泽东语录》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命运去回答了。

“语录”的好处，是从哪里开读都可以。因为从哪里读起都没有关系，于是对某些部分、某些话，就可以依据个人在某一环境里的心情，去加以体味。现在来看第 24 节第 15 条：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不做坏事，而做好事。几十年如一日地只做好事，那才是最难最难的啊！〔1〕

〔1〕这段话中文原为：“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译注

在这本小书中这段话是最发人深思的。毛泽东所说的‘好事’的内容是指‘有益于大众、青年和革命’。所谓‘有益’则是说‘艰苦奋斗’。而我并没有怎么拘泥，在译为日本文时有点改动。改动后的文句，也许与作者的意思稍有出入。不过读起来，会更感觉出毛泽东的彻底性，或者说是竭力追求那种彻底性的坚定不移态度。但要人们做到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这样说有点伪善，不过我觉得，毛泽东能说出这样的话，确实令人有点惊异。在翻译这样的句子的时候，我会情不自禁地感叹起来。虽说如此，这些话仍然萦绕在我的心中，因为它们平凡的真理。这种真理并不像哲学或是国际问题那样玄奥，老百姓也完全能够明白。如同老百姓那样，能极平凡、朴素地说出这种话来的人，可以想象得到，反过来他一定也能够宽容和体谅别人的缺点。无论如何，我对前面提到的毛泽东所说的那些话，对他那种令人惊异的彻底性，以及平凡、朴素地讲出了平凡朴素的真理这一点，毕竟很是喜欢。

本书是受角川书店之托翻译的。在这本语录开始被介绍到日本的时候，曾出版过几种译本，后来又有河出书房和北京外文出版社的日本文译本。我在翻译时曾参考过它们，在此特表谢意。但遗憾的是，直到此次翻译完毕，也未看到《毛主席语录》的1969年增补版，只好有待来日了。

程麻译自《毛泽东语录》角川书店，1971年10月25日

最初的中国语教师

我因母亲提议而学习中国语，是在读小学三年级时候的事。

那时，我家住在山东省的一个小镇上。正好有三、四个日本青年凑在一起，请了一位中国教师开始学习中国语，便让我参加。教材是《急就篇》。那个小镇上并没有书店，教材是在乘汽车要跑六、七个小时的青岛订购的。小学校一放学，我就赶忙跑到别人家里，同其他人一起，从一、二、三学起。

到后来，只剩下了我一个学生。因为那些青年发音很困难，到“三”就说不好了，逐渐都掉了队。而对仅留下来的我，老师挺赞赏。由于得到称赞，我也很得意，每天都去和老师一起学习。

老师并非是特别专门的语言教师。说起教学方法，也不怎么讲究，只是按着《急就篇》，一页一页地读下去。老师念，我也念。老师读一遍，我再读一遍。我因为顽皮，故意读得声音很大。那声音，连在隔着邻居院子的一家中国饭馆的厨房里，都能听得见。正在干活的厨子，听到我读书的声音，很是夸奖，说是很像中国人。我听了他们的评价，也更加提高了声音。等到学完下课，连嘴巴都累得酸痛了。

老师不会说日语，也不翻译和讲解语法。最初读汉字，无非是靠死记，或者是注上假名。在小学校里没学到的汉字，倒是在中国书里先认识了。

在这一过程中，我因觉得累，也曾想逃学。可到了学习的地方，刚向老师诉苦，眼泪就禁不住流了出来。我记得，当时老师曾经把一根绳儿拿在手上，变戏法儿哄我玩。

现在想起来，我们学习的那家日本人，也许是没有小孩子。人们听我大声朗读，可能觉得挺有趣。等读完书，一个老奶奶还让我到浴盆里洗澡，并且逗我说：刚才眼里流的是啥啊？

后来有一天，老师到我家里来。我记得在当时，曾装做默读成人杂志的样子，尽管听到了老师的声音，却故意装作没听见。老师只好回去了。他为此很生气，曾向我家里的佣人说，对老师不该是这种态度。母亲回来之后，恨恨地斥责了我一顿。至今我对这事，还悔恨、羞愧不已。等学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家决定要搬到才成立不久的“满洲国”的“新京”〔1〕去住。母亲让我去告诉老师，我写了“满洲国”的字样给老师看。老师立刻回答说：“不好！”表情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我感到有点害怕。

老师还生过一次气。他在紧挨着我家的地方也收了一个学生。有一天，老师从那个学生家里刚出来，就被中国巡警叫住了，要对他进行搜身，引得人们都来围观。老师因为丢了面子，很气愤。听说那家人利用日本人的特权，曾向中国人贩卖毒品。脸色不怎么健康的老师，被怀疑成吸毒的。从此以后，老师也就不再去那日本人家教书了。

〔1〕即现在的长春市。——译注

在这两年间，我把《急就篇》从头到尾读了两遍，把《官话指南》读了一遍，此外还有一、两册书。不管刮风还是下雨，天天教我读书的老师，那样子至今还浮现在眼前。直到我本身也当了语言教师，才开始明白，那时自己为什么能够难得地受到老师的喜爱。那老师的名字叫萧国栋，大约现在已不在人世了。

程麻译自《NHK 中国语讲座》，1967 年 12 月、1968 年 1 月合刊号

我和京剧

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在我少年时代生活在中国农村的记忆里，曾零星见到过流浪艺人的身影。

男人们有的穿着裤子 光裸着上身 仰着脸 把青龙刀吞了下去，然后从嘴里吐出有一、两厘米高的火焰。还有的牵着狗熊 尾随着一个与人一样大小的女人木偶 与之装扮成夫妻。

当时 我并不知道所看的叫什么。但我想 自己小时候在空地搭成的舞台上看到的 可能便是所谓的“京剧”。观众在搭有舞台的帐篷里 或是站在屋顶上 顶着明晃晃的灯光 欣赏着演出。

中国现代文学的创始人鲁迅 写过短篇小说《社戏》。所谓“社”指的是神庙。社戏就是在节日里临时演出的戏曲 据说孩子们都会去看。那是在夜间演出 因为观众是农民 只能是那样演出。

在我的记忆中，当时也不曾交过入场费。只记得因演出与节日有关系，当地的慈善家曾到家里来为剧团汇聚谢礼。当时，人们都高兴以演戏来向神 献礼”。

至于梅兰芳经过反复刻苦练功，使京剧提高成为一种艺术，那是很久以后读他的自传才知道的。

也有人觉得，京剧的音乐过于吵闹。好象有的中国作家还将之形容为“野蛮”。我想，在剧场演出京剧，大约至今也不怎么合适。因为京剧本是与民众朝夕相处，往来于城乡，由流浪艺人在露天演出的。它从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汲取营养，再返还给民众，因此具有鲜活的生命。它的音乐特征，也反映出了这一点。

例如，这次演出〔1〕的剧目之一《孙悟空》。虽然演员的身体是在日本的舞台上，但人们能够从中观察出，那洋溢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与天空中的艺术魄力。

程麻译自《京都新闻》(晚刊),1982年9月21日

〔1〕 1982年9月25至26日中国京剧团在京都上演了《孙悟空大闹天宫》等剧目。——译注

在外地长大

以出身的地望而觉得洋洋自得，这样的心情，我从来也没有体验过。

即使在现在，也是如此。

人们聚在一起，当知道是出生于同一地方的时候，都会谈起一些共同的话题。如那儿附近有些什么 都认识谁 以及学校在哪儿之类。

于是，彼此间就会情不自禁地兴奋起来。在这中间，还可能掺杂有笑谈或是秽语，尽管秽语也未必就真是在骂人。

然而，每到这种时候，我只好一声不响地洗耳恭听。

那理由很简单 因为我是在“外地”〔1〕出生和长大的。

我并不是因为无法参与这种话题而觉得孤单。只是有时人家要我唱支小时的民歌，自己没法轻而易举地唱出来，觉得挺难堪。我确实不会唱出生地的民歌。

其实，小时候自己和亲戚或与朋友的交往，实在很少。再想一想，甚至连在当地参加日本式祭祀活动的经历，也没有过。

〔1〕 以前在国外的日本侨民，习惯于将日本称为“内地”。竹内实出生于中国的山东省，故说自己生于外地”。——译注

至于说到同当地（中国）人的交往，似乎我也从未被邀请出席他们的什么婚葬嫁娶活动。

当然，那时我还是一个孩子。可按理说，小孩是该有什么游戏的，而我连这类游戏也很少参加。当时，父母住在中国的一个乡村小镇上，那里几乎没有什么文化活动。

有一次，在我家订阅的某种报纸上，开始连载按出身分别加以评论人物的文章。这也算是凭地望自豪之一种罢。这么一想，我才意识到，自己竟是一个划归不到日本任何都道府县去的人。

我的户籍在 T^{〔1〕}。原本属于 A 县^{〔2〕}人。因为是在 T 生活，老是按在 A 的户籍，邮寄起来很是麻烦，便改成了 T。其实，总共算起来我在 A 县只住了一年零四个月。如此说来，自己是连出身于 T 也算不上的。

那家报纸在连载文章中辟有“外地”一篇，并判定我应归入其中，也没有听到周围有什么反对的意见。

这么想起来，对我而言，今后是不可能再凭出身的地望，而感到自豪了。

程麻译自《神戸新闻》，1982 年 10 月 14 日

〔1〕 指东京。——译注

〔2〕 竹内实的原籍，为日本爱知县。——译注

伪造的国家向儿童灌输

以前 日本曾在中国的东北 炮制过一个国家“满洲国”。可以说 这与英国等发达国家 在非洲、亚洲占领和据有殖民地一样 同样属于侵略性的行径 是名不正言不顺的。

为了掩饰殖民地的本质 便在满清的发祥地——中国东北，将清朝的末代皇帝 也就是废帝宣统扶植起来当“执政”。后来竟恢复了帝制 称其为“皇帝陛下”。日本也表示拥戴 竭力鼓吹。我觉得 这是一手制造伪“满洲国”的日本军部 迷信和陶醉于君主制度的反映。同时 也是为了便于收容日本的老百姓 移居到那里去。

执政溥仪的登基典礼 也就是再次正式做“皇帝”是 1934，即日本昭和 9 年的事。第二年 他去日本访问。一回国 就发表了“回銮训民诏”。

“銮”是指天子马车上的铃铛。这是回国后的天子 向子民训导的诏书。其中有这样的话（在满洲通用日语）：

朕如同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一体，尔众庶等更当敬仰，体察此意，与友邦一心一意，奠定两国永久之基础，发扬东方道德之真义。

为皇帝做翻译的林出贤次郎，也在那次旅行中随行（即所谓“扈从”）并写了《扈从访日恭记》。这是非卖品，由“满洲帝国国务院总务厅情报处”刊行，时间是在 1936 即昭和 11 年。

林出贤次郎是日本驻“满洲国”大使馆的书记官。作为“皇帝”的翻译官，还兼任“满洲国宫内厅行走”的头衔。正如“行走”二字的意思，这官衔的职责，便是“跑腿”。据林出的记载，“皇帝”在那次旅行结束以后，说过下边这样的感想（空格为文中原有，尽量使用假名而省略汉字）：

我觉得，由于这次访日，增进了两国皇室的亲善，更有同家同族的亲切感。这是基于东洋精神的亲和一致，即至诚。这次归国之后，理应为彻底推进日满亲善、确立东洋和平、达到增进人类福祉等目的而粉身碎骨。因此，今后凡图谋对满洲不利的日本人，应被视为对日本□天皇陛下的不忠。而图谋对日本不利的满人（原注：即当时在“满洲国”居住的中国人）则应被视为对满洲国□皇帝的不忠。

这些话让人觉得，不过将是前面提到的那“诏书”里的说法，变得通俗了。

那时候，我是“满洲国”首都“新京”（现在的长春）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因此，知道“满洲国皇帝”访日的事。在《扈从访日恭记》出版时，应该读过那本书。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自己不仅对此书的作者林出贤次郎，直接或间接知道一些，而且脑中至今还记得，书中有所谓“皇帝”乘坐的“御舰”比“舰”号的桅杆上，飞来过仙鹤的说法。记得几年前在旧书目录上曾看到过这本书，还特意买了它（有 11 页）。

“昭和”时代的日本 既是日本 又不单单指日本自身 其中还包含着另外一个“国家”。“昭和”年号的翻版 就是“大同”和“康德”的年号。〔1〕

即使是在小学六年级学生的脑子里，也渗透着“满洲国”灌输的观念。林出贤次郎不但到处给人以爱国者的印象，而且其形象，似乎就象征着毫无二心地效忠皇帝。这便是我对他的记忆。

程麻译自《读卖新闻》(晚刊),1988年4月5日

〔1〕“大同”和“康德”都是伪“满洲国”的年号 而伪“满洲国”是日本一手炮制的。所以作者说,这些年号是“昭和”年号的“翻版”。——译注

顽强用功读懂中文

“满洲国”打出的旗号是“王道乐土 五族协和”说是在这个“国家”里应该各民族平等 以友爱之心团结相处。当官的不管是日本人 还是中国人 都必须向“满洲国”效忠。他们分别被称为“日系官吏”和“满系官吏”。

尽管这样说，但即使在按照现代化设计的首都“新京”的马路上 众目睽睽之下 对中国人施暴的日本人的身影 并不少见。只因为人力车夫或马车夫讨要车费，就有举起拳头打人的。地方一级行政区“县”的县长是“满洲人”即由当地有势力的中国人来担任。可实际上的支配者，却是从“中央”派来当副县长的日本人。

对好听的口号和好的事例，我当然也并非没注意到。不过，中国人被欺压 在“满洲国”是真实的。虽然外表看起来 他们似乎无力反抗，但实际上毕竟能够感觉出来，其中也并非全都是那样软弱。

他们的口头禅是：“没法子！”对这句话 那些听中国话马马虎虎的日本人 觉得仿佛是在说：“实在无法可想。”因此也许会感到有点得意。而在我听来，在那话里，却有着比无奈和灰心更强烈的坚韧精神。

这种感觉，也并非就某个特定的人而言。我没有读过中国人直接为自己申张正义的书报文章，更无前辈对我心中的这种朦胧感受给以启发。但凭自己内心的判断，我觉得那些‘满洲人’的心理情绪与一般日本人对他们的刻板理解实际上并不一样。

当然，说起关于中国的书，当时我也并非一本都没有读过。

那时，少年的我对从日本即从当时所谓的‘内地’来的人，未真正读懂中国的书或者说连一页也不肯读，感到很不满。因为在‘满洲国’以前，自己曾在中国北方的农村生活过，我在那里的见闻要比‘满洲国’的宣传和漂亮口号真实些多。

众所周知，日本列岛曾受惠于中国大陆的文化。当然，日本也有自己的种种创造。其中，用日语音序符号〔1〕和送假名〔2〕对汉字标注的‘汉文训读’法，称得上相当奇特。正如有人批评的那样，在现在‘像读’训读’那样用日本语语序解读的汉文，已很难懂，还不如直接读汉文原文为好。

日本人把不加日语音序符号和送假名的汉文原文称为‘白文’。而我小时候最先接触的中国书文，便是这样的‘白文’。后来到了‘满洲国’才熟悉和习惯了在宣传文字和口号上标有日语音序符号和送假名。

在上小学的前几年里，我还读不懂‘白文’。不过，当看到汉文原文时，在幼小的头脑里想想，大体上还是能够明白其中的意思。

这可能主要得益于母亲为我请过一位中国家庭教师，并教

〔1〕 日语的读音顺序符号，如‘√’、“=、”、“上中下”等。——译注

〔2〕 日语中的动词、形容词、形容词等用汉字书写时，其词尾变化部分的假名部分，称为‘送假名’。如‘行<’中的‘<’即是送假名。——译注

我学过中国语。

那时使用的教科书，主要罗列着简单的问答语：

来了么？来了。走了么？走了。行不行？行。好不好？好。……

下面，接着有几十句类似这样的问答。

程麻译自《读卖新闻》(晚刊),1988年4月6日

散步之路

迁居^{〔1〕}到京都之后不久，我曾外出散步。当时，我走到了离新住处很近的“哲学小道”上。

这是一条自己在学生时代，独自或与友人一起经常走的、相当熟悉的路。

从银阁寺旁的门前町走出去，疏水渠^{〔2〕}的水迎面而来，然后拐了个直角向北流去。顺水流上溯到若王子神社的后边，水在那里形成了一个小瀑布。在夏日缺少凉意的时候，那儿显得很是清爽。有时候，能看见成对的夫妇铺着垫子，坐在地上闲聊。而现在，则已有专供休憩的茶屋了。

在那神社前不太大的空地上，建有一块石碑。那是为纪念在日中战争期间潜入中国刺探情报，后被发觉处死的 9 个青年人。另外，还有与日中战争有瓜葛的荒尾精^{〔3〕}的纪念碑。荒尾纪念碑比较大，它会首先映入漫步到此的人的眼帘中。

〔1〕 作者自 1973 年 3 月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任职后，迁移到当地的名园林银阁寺附近居住。——译注

〔2〕 从日本滋贺县琵琶湖，引水至京都的水利工程。——译注

〔3〕 荒尾精是一个因迷恋“大东亚共荣圈”，而主动到亚洲各地搜集情报的日本人。后来他又鼓动日本青年步其后尘。——译注

以前我曾调查过这 9 名青年以及荒尾精的事，以《日中战争和军事侦探——荒尾精、九烈士》为题著文。后来则被收入到拙著《纪行——日本里的中国》(朝日选书)一书里。

日中战争是在日本崛起的时候发生的。将其中一个片断之事刻在这里的石碑上，也许是要反映当时那些人的命运。自然，毕竟也有人对这块石碑，并不怎么在意。

去那里散步，常常会从半路上折回来，很少再能走到若王子神社一带。这次走到某一处，便权作终点，顺着渠中的水流，沿来路又返了回来。

开辟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鲁迅曾经说，路首先意味着是人们走出来的。可是，人们如果不再走它，那路也许就会消失的。

况且，还有人尽管也走路，却并不介意怎么样去走，或者是此路是否可以走得通之类。

此外，有开辟道路的人，但也有使路废弃的人。

比如小时候我曾在中国的东北生活过。

在那个新建起来的城市〔1〕，对都市规划是很精心的。在横贯市中心的大干道上，路的中间铺着石头，而夹着它们的两侧，则是单向通行的柏油路。在隔离带和人行道上，还并排栽了树木。

路中间铺石头的部分，是走马拉的车。那装有橡胶轮胎的车子由 2 匹或 4 匹马拉着。车夫不断地响着鞭子。

在这样的道路上，是禁止车夫乘车的，得边走边赶着马。偶而有人违犯了这规定，被警察看见，就要受到斥骂。

前年年底，我曾听一位参加故地重游的旅行，在几十年后又

〔1〕荒尾精是一个因迷恋“大东亚共荣圈”，而主动到亚洲各地搜集情报的日本人。后来他又鼓动日本青年步其后尘。——译注

回到那座城市的朋友说，那些道路上所铺的石头已经全被剥去了。那些有七、八厘米大小、如同“骰子”一样的方石，大约已被当作砖用去修补房子了。

已记不得是什么时候，我曾站在那石块路的中间，一直向西望去。在那道路的尽头，夕阳正在下沉。那真可谓到处洋溢着红色。我心中被眼前的景色震撼了，连脚步也挪动不了，只是远眺着下沉的太阳。连那道路上的石头，也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

在想象中，被剥离掉石头的道路，也许会有些凄惨。

然而，若翻过来想一想，对于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来说，可能还有比那铺装好的道路更为重要的东西。为了那些更必要的事，就得破坏已修好的路。

我完全可以理解那里人们的心情，一定比我对废弃道路的关注重要得多。毕竟学生时代所走过的路，现在已不能再去走了。由于有这种想法，或许以后自己散步的次数，会逐渐少了起来。

程麻译自《路径》，95号，1981年10月20日

鸥 外 与 我

至今只剩下一些朦胧的记忆 已没有什么确切的根据了 我似乎是借助于森鸥外〔1〕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像《金瓶梅》那样奇异的读物。自己并没有特意去图书馆翻查卡片盒，所以很可能是从鸥外渔史那里了解到的。

当时 我大约有十六、七岁 把图书馆选作了课外活动的对象。记得在图书馆附设的图书室里 陈列着改造社的《现代日本文学全集》，我就是从那里开始尝试阅读森鸥外的。在那套书中，《我的性史》一文里有下面这样一段话：

一天，我在先生的书桌下面发现了一本中文书，一看是《金瓶梅》。我只读过马琴〔2〕的《金瓶梅》知道其与中文本《金瓶梅》有很大的差异，但也明白先生很难同意自己去读它。

〔1〕 森鸥外 (18—19)，日本作家、军医。号渔史。1882年自东京大学医学毕业后参军。1885年去德国留学。回国后开始以文学创作闻名，著有《青年》、《雁》等。——译注

〔2〕 泷泽马琴(1767—1848)日本江户时代剧作家。著有《南京八犬传》、《兔园小说》和《新编金瓶梅》等。——译注

我翻看图书馆里的卡片 并没有找到《金瓶梅》 而只看见了井上红梅〔1〕的学术著作《金瓶梅与支那社会》。尽管自己有些失望，但还是借到并看了那本书。那里面通过翻译，详细介绍了故事的情节。不过，我脑子里读得稀里糊涂，不知不觉间已到了闭馆的时间。

现在回想起来，我确曾通过读小说或是森鸥外，得到过一些启示。在当时“满洲国”新京〔2〕的学校中，中国语曾是正式的课程。然而，讲课只是让记一些实用的会话，根本不考虑通过语言走向另外一个世界。其实，自己也不知道中文究竟能通向什么样的世界，只是觉得颠来倒去光说日本语，有时候会觉得无聊。因此在放学之后 我便钻进“新京神社”对面那座唯一的图书馆里。这大约是当时并不了解另外世界的我的一种幼稚的反抗。

后来到了东京，我才知道了那并不了解的世界。当时对我来说，日本是外国，从来没有想过要长久居住下来。因此，在我看来，鸥外下面这段话很是亲切，禁不住心中的翻腾。

我怀着漠视功名之心 以及惯于翻检的学习能力 今天竟站在了欧洲新的大城市柏林的中心。不管是什么五光十色，都只能迷乱自己的心目。

毫无疑问，这不过反映了投身于城市的庄稼人的不安。而

〔1〕井上红梅(1881—1849)日本作家,改造社成员。曾将鲁迅的《呐喊》、《彷徨》译为日文以《鲁迅全集》的书名义出版。1933年到过上海。——译注

〔2〕即现在的长春市。——译注

自己虽没有鸥外那样自信 但是很羡慕他能够怀着自信 在全新的环境里做个人想做的事情。

在战争（大东亚战争）的第二年，东京几乎没有像样的书。我又在九段〔1〕下的大桥图书馆里 陆续读完了《森鸥外全集》。当年的笔记竟意外地残留了下来，但其中只记有一些片断的记忆 并没有写出自己的反应或是感想。例如在《舞姬》这一篇名下面 并列记着‘太田丰太郎、爱丽丝、朋友天方’等名字 还写有“怀着漠视功名之心 以及惯于翻检的学习能力”的字样。这说明 自己确实曾很注意这些字句。不过对我来说 可气的是竟完全没有“惯于翻检的学习能力”。而所谓“漠视功名之心”也总因为难以做到 常常为此觉得苦恼。而自己当时的志向 是最好能够习惯那“惯于翻检”的书斋生活 哪怕能有一点点也是好的。

比如 对‘鸥外’这一笔名的来历 虽然在大桥图书馆里也推测过 但至今也没有大的把握。可能专家们已经搞清楚了 或者是鸥外自己也许在什么地方谈到过。而在我想来，其似乎是出自于《列子》中下面这样一段话：

海上之人有好鸥鸟者 每旦之海上 从鸥鸟游。鸥鸟之至者 百住而不止。其父曰 吾闻鸥鸟皆从汝游 汝取来 吾玩之。明日之海上，鸥鸟舞而不下也。〔2〕

所谓‘鸥’之‘外’可能是不能无视‘鸥’的意思 即若以利欲之眼 是抓不到‘鸥’的。因此 所谓‘鸥’ 其实是指艺术与真正的人生。

〔1〕 东京地名。——译注

〔2〕 作者记忆有误，这段话本出自北齐的刘昼《刘子·黄帝》。——译注

当我幻想自己的未来时曾读过鸥外的《妄想》〔1〕由此经常联系到自己的一些想法。我由自己种种体验里的感受来推测觉得前面猜想‘鸥外’一名的来历可能并不错。特别是《妄想》里海边的那个老翁，其生活的环境与《列子》中的主人公完全一样。

至于我手头的改造社版《现代日本文学全集》中也夹有《森鸥外集》则好像是在连续读那套全集时于东京中央线电钱沿线某个旧书店里买来了。当时战争已经结束。稍微细看那书皮，已经脱落，记得原来本是布面。仿佛是作为一种补偿似的，当我重读森鸥外所译的《即兴诗人》以及《舞姬》时，竟已到了与那些妄想与现实都无关系的毕业时候。不过，自己却仍旧忘不掉以前那些关于鸥外的零碎记忆。

最近在整理书物时我特别注意到了鸥外在《妄想》一文里关于‘业绩’的意见。不过目前觉得最容易读的除了其史传性的作品之外还是那《妄想》。而让我觉得不怎么自然的则似乎是鸥外那显得有些故意的伤感。因为在我想来，到了自己的晚年，恐怕连他那样的满足感也是难得的。

自古有所谓‘倾盖而谈’的说法。如果说现代语言也能有长期生命力的活那我觉得鸥外就是如此。不过当自己把珍藏的《森鸥外集》拿去装订时书脊上竟被错印成了《森欧外全集》。可能世界上只有这一种仅仅是一册书的全集罢。而后来，自己竟越来越放不下它了。

程麻译自《现代日本文学馆》1附录，1967年12月

〔1〕《妄想》是森鸥外的短篇小说，内容是写一位老人在海边生活的心理感受。——译注

《青春记》和我的青春

读了《青春记》〔1〕我猜想赤尾君大约也在军队里呆过。我和赤尾君相识是在昭和 21(1946 年)进入京都大学学中文的时候。至于《青春记》所记则是这以前的事。

刚进入京大时，我们并没立刻亲近起来。记得当时我很想住到京大附近的公寓里去。不久即在升入二年级后的春天趁同班长谷川君搬出公寓而转住学生宿舍的机会，我便住进了那座公寓。自此以后，我和住在相距约走十分钟左右的另一座公寓里的赤尾君开始有了交往。

不过，那时候，我们并没谈过以前在军队里的事情。而现在读起他的《青春记》来觉得某些事仍恍然如在眼前一样。

为君出征大寒日〔2〕

他的这一句俳句，使我禁不住想起了自己当初的情景。

〔1〕赤尾兜子(1925—)原名俊郎日本著名俳句作家。其作品《青春记》为日本俳句体短诗集，其中收录回忆作者 16 至 20 岁间在战争期间生活感受的俳句共 300 首 汤川书房，1977 年 10 月出版。——译注

〔2〕本文小标题均摘自赤尾兜子《青春记》中的俳句。——译注

我曾被征兵到丰桥的第十一集团军（任工兵）。当换上了发下来的军服，将以前穿过的学生装叠了起来，看着自己穿军服的样子，当时觉得非常难看和别扭。我料想着未来，心中充满了万念俱灰的无常感。

当然，此后我也饱尝过失望和挫折。不过，当时自己那种失望的心情，是我后来永远难忘的。

所谓‘为君之盾’的说法至今也印象深刻。当时要求每个人都高呼‘敢为君之盾’的口号我也曾跟着别人喊过几次。

赤尾君参军之后，竟能有某些安定的感觉。我想，那也许是因为他是从自己家里走进军营的。

与父无言火盆前

这种‘无言可谈’的心境我完全能够理解。当自己去参军，在大府的车站上等着换乘的火车时，我的心里曾经突然涌生出一种说不出来是何种滋味的感觉。当时，我很想把这种感觉告诉来送我的伯父。

由于我早就没有了‘父亲’〔1〕所以在整个入伍的过程中，对自己来说根本无法和父亲话别。我从‘满洲’的‘新京’〔2〕进了东京的二松学舍专门学校。第二年，因为不再对文科大学生暂缓征兵便有了所谓的‘学徒出阵’。可因为自己身体很弱，开始我猜测着，可能自己不会被征兵入伍的。

我并没有参加在神宫外苑〔3〕举行的分列阅兵式。不过 在

〔1〕 作者在 5 岁时 父亲逝世。——译注

〔2〕 即现在中国吉林省的长春市。——译注

〔3〕 在日本的东京。——译注

搞过征兵体检之后，学校里已经骚动不安起来。于是，我从阅兵式以后，便没有再去上课，而暂住在了东京的伯父家里。

在东京的公寓里，根本无法安身。开始还在那里吃午饭，后来，则连那顿饭也吃不下去了。

虚渡春光向谁告

当时我和二松学舍的一个同学（比赛买难得的诗集，那个同学后来在战争中病死了）其中白秋〔1〕的《东京望景诗》就是在高元寺的旧书店里买到的。

“洋槐金红遍地散”。那本诗集早就不在手边，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书名也可能不太准确。但我觉得，赤尾君的这种伤感，同我当时的感受，竟是那样的相通。

暂得一隅遣寂寥

确实，那时曾是寂寞的。可是“寂寞”这个词，是不能说给别人听的。这一戒律是我不知不觉中给自己确定的。不过，赤尾这一俳句所表现的，并非仅仅是当时的寂寞心境。

我从东京伯父的家里，又搬到了在知多半岛上的另一个伯父的家。已经知道了12月1日要入伍。在那个伯父的家中，我无事可干。只好随便读点什么书，但已很难再看到新书。

当政府的人拿着红色的征兵证送给我的时候，其实当时自己的脑子里，并非一点想法也没有。

那时我曾不由自主地想到，为什么不回到“满洲”去呢？如

〔1〕 诗人北原白秋，所作三十一字的日本短诗比较有名。——译注

果办点什么手续，也并不是不可能。但是，我不太明白到底需要些什么手续才行。后来，自己没再深想下去。而周围的大人们，也并没太注意我的这些念头。

家破人散旧山河

我所以并没有深想下去，从表面的想法看，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已没有在母亲和弟弟仍住着的那个“新京”的家继续住下去的心情了。不管是从实际情况还是从心理上看，我都不可能再回到那里去。而更内在地说，就像前面提到的，还主要是因为，我当时有一种期待，暗暗地并未死灭。那便是希望仍如以前那样，有可能继续读书。

此时的我，真正地感受到了自己的可怜无助。

人穷无力挡风寒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母亲给我的生活费也并不太少。可是自己在心里，仍然觉得有点孤立无援。不过，也许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感觉，所以内心对作战的对方，就没有同仇敌忾的想法。

圣诞街头勿忘敌

我由“街头”联想到了“跨海”，接着则是“浸水的尸体”。自己这样胡思乱想，也许有点不着边际，但无论如何，我确实难以做到“勿忘敌”。

眼镜蒙霜读‘敕谕’”

对《军人敕谕》自己也曾认真地朗读和背诵过。不过 比起同班那个用功的男学生，我却差得远了。他连《步兵操典》都时刻拿在手里，并能够背诵下来。

而我 大体是背着背着 就半途而废 不知道读到了哪里。自然，当时更没有男女之间的交际。

处女盼顾霜窗外

突然间冒出了“处女”这么个词。而从上下文 丝毫也看不出来 她具体是指谁。

对赤尾君能够轻松平静地走入军营，我当然是很羡慕的。不过 赤尾君的青春 主要就是意味着这样的战争 确实是有些暗淡的。

冬日出征辞亡母

妹妹从东京到知多半岛的伯父家里来看我了。我和她从那个伯父的家里走出来，穿过了一座酱房的仓库，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边走边谈论着。我们走到了一家粗点心铺的凉棚下休息，还买了蜜桔吃。

后来 我们说到了母亲在“满洲”的难处。然而 远离母亲的我和妹妹，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帮助她。附近有一个小邮电局，于是，我们去那里给母亲拍了一份电报。其实，当时我们并没有细想，究竟为什么要那样做。

我被征到了第十一集团军。当检查完身体以后，人家问我有什么特长。我表示自己能说中国话。当时自己这样讲，是暗示着想被派遣到中国去。

奔赴中国成一兵

但是，我并没有被派往任何地方。因为我有病，而后在部队医院住了一年多。到战败前两个月，才从陆军医院出来。接着，便退伍了。

我原是想回忆一下赤尾兜子年轻时的事情，没料到竟也谈起了自己的青春。还望赤尾君海涵。

程麻译自《涡》第 19 卷 2 号，1978 年 2 月 28 日

奇怪的“学徒出阵”

我小时在中国山东学习汉文用的教科书叫《官话急就篇》那书初版是在 1904 即明治 37 年。而我读的那本是 1931 即昭和 6 年印刷的第 112 版 由善邻书院发行 文求堂书店销售。

现在想起来 在这本 182 页的文库版小册子里 确实有些知识 可我却未能将这本中国书 从头到尾真正读完。当然 这并不是自己情愿如此 而是因为 从自己所见所闻而滋长出不满心情的時候开始 我便无可逃避地必须去读另外一本特别的书 那便是“日本”。对我而言 那完全是一本新书。说得具体一点 那指的是“帝国军队”。

而出人意料的是，我竟能从军队里活着回来。而属于同一分队的军官后备生落选组里的人，差不多都战死了。其中一个同伴的信 还被收进了《战死者的倾述》一书（岩波文库版）^{〔1〕} 他的名字叫西村健二，是京都大学法学部的学生。昭和 18（1943）年入伍 第二年 5 月出征到南方，7 月 在塞班岛战死 那年他 21 岁。

〔1〕 此书为日本战死学生生前的书信集，由日本战死学生纪念会编，岩波书店出版。第 1 集，1982 年 7 月 16 日初版 第 2 集，1988 年 11 月 16 日初版。——译注

我记得好象是在昭和 19(1944)年 1月,发来了新军装。我一边在所属的内务班里读着日本报纸,一边低声冷笑说:“真称得上是外强中干。”那时候,内务班里的其他“战友”也都对战争持批判的态度,觉得败局已定。

在“外地”长大的我〔1〕也知道“内地”的四季之美,以及所谓“国家神圣”的观念。不过,即使是在被称为“国家干城”的军队里面,也并非人人都认为应该“忠君爱国”。在大学和高等专门学校读书的学生,曾经被暂缓征兵。可是对文科学生,后来又取消了这种优待。于是就有了 1943 即昭和 18 年的所谓“学徒出阵”。这一特别措施,原是为补充将校军官的。在陆军纪念日前夜的 3月 10 日,解散军官后备生落选者的说法,盛传开来。大家都议论着“明天就要回家了,还互相告诉着个人的地址。”〔2〕

我认为,对“日本”这本书,只有从反面读它,才能理解。至少,也应该看看别人是怎么从反面阅读它的。对于帝国陆军,同样是如此。

在帝国军队里,那种集体生活是相当奇怪的。正像西村健二在他的信中说的:“所谓学徒出阵,并非只是指学生放弃学习而拿起了枪。正如学生必须真地弄刀动枪那样,实际上,学生已不成其为学生,甚至学问已被完全丢到脑后去了。”

当然,也难免有人会被环境驯服,并最终逆来顺受的。

8月 15 日到了。大家猜想,也许“昭和”的年号真会名符其实了。可战争仍然在拖下去,必须参军。参军得打仗,也就可能

〔1〕作者 1923 年出生于中国的山东省农村。在国外的日本人曾称日本为“内地”,所以作者自称是出生在“外地”。——译注

〔2〕实际上,即使是那些不够后备军官资格的日本学生,除个别人像竹内实一样因身体不好之外,后来大部分也都被征入伍去国外作战,战死者相当多。——译注

死人。死人自然可怕 即使是不死 在军队这样的组织里 人性也要被磨灭掉的。因为在军队中 虽然也有心地善良、怀有正义感的人 但在那里实行的训练 无非是要使人适应战死的恐怖罢了。

“昭和”时代 自开始起 有三分之一是与军队联系在一起的。在军队里 那些接近权力 并逐渐掌握了权力人 又支配了剩下的三分之二的的时间。这样，便给时代投下了阴影。我在军队那两年 是毫无意义的。不过反过来想一想 能够觉察出这本“书”读得毫无意义 也并非一点意义没有。自然 现在要想重新体验那两年间毫无意义的生活，已不可能了。不管是想从哪个角度去体验 都是这样。

程麻译自《读卖新闻》(晚刊),1988年4月7日

从“立正”开始的军人精神

对我来说，日本就意味着是“帝国军队”。对此，我已经从反面领教过它了。不过，“帝国军队”存在的理由，是冠冕堂皇的，所以，我还不得不从正面去说说它。

有一本《步兵操练规则》曾直言不讳地宣告军队存在的理由。其第一章《总纲》这样说：

军队之主责为战斗，故诸事以战斗为基础。而战斗之一般目的，在压倒敌军并消灭之，迅速获胜。

为使士兵能在战斗中发挥作用，就要训练他们。先是由教官对士兵进行个别训练，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进行团队（即群体）训练。而每个教官，都是先从“立正的姿势”开始，来训练士兵的。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步兵操练规则》对这种立正的姿势是这样定义的：“两脚张开 60 度”；“将中指置于裤缝处”。

两脚跟立于一条直线并靠拢，两脚向外张开约 60 度，两膝贴紧，伸直两腿，上身直立挺胸，背直且稍向前倾，两肩略向后合，端平，双臂自然下垂，双掌贴在大腿边，十指自然

伸直并拢 将中指置于裤缝处 颈及头保持直立 闭口 两眼睁开 正视前方(通则 第 33 条)

对这种姿势的要求 为什么如此严格 实际上至今我也不太明白。从外观上来看，我做得也不太好。而在上边那段话之前，还这样说：

立正的姿势，是军人的基本姿势。故应经常内心满怀军人精神，外装则要整齐端庄。

士兵必须“满怀“军人精神”而每个教官则要为“锻炼军人精神”对士兵训练(通则 第 27 条)

当时的《步兵操练规则》连同《军人手册》一起 在战败后被我用火柴点着烧了。现在手边的一本 是昭和 3 年 1 月 30 日印刷 昭和 3 年 2 月 2 日发行的，发行者是军用图书株式会社，上面没有注明是初版 还是再版。不过 大约在“昭和”年代 对“立正的姿势”都是那样定义并严格要求的。

不仅依靠军队，还要指望战争，希望其胜利。任何国家的意识形态，都不外乎是这样的观念。而为了保证胜利，平日进行训练 要求每个士兵的素质和习惯 全都是“立正的姿势”为基础的。在这其中“军人精神”必不可少。

所谓“军人精神”的内容 对帝国军队来说 按 1882 即明治 15 年《军人敕谕》的规定 共有 5 条。其第一条是：

军人应以尽忠为本分。

换句话说 如果有命令 就只能按命令行动 别无选择 更谈

不上反对指挥了。

在‘昭和’时代战败的伤痕相当之深。即使是在战败以后，也不能说人们就已经从被训练形成的那种‘姿势’中完全解放了出来。所谓的‘少数服从多数’其实与这种军人的‘服从’精神，不过仅是一步之差而已。

程麻译自《读卖新闻》(晚刊),1988年4月8日

读《论语》

由于政府对文科学生停止了缓征入伍，我进了兵营〔1〕。过了三个月，当觉得新兵阶段快要结束的时候，自己想订购两本《论语》和《老子》。虽然这也谈不上是多么麻烦的事，而那位内务科的准尉在给我盖同意的印章时，竟格外好意地指点说，还是岩波文库的版本比较好。

这像是一种不管内容而只相信名店的心理，又似乎是热衷于收藏“文库本”的遗风。但我在神田〔2〕并没有能够买到，还曾在回驻地的途中，多次下车寻觅。后来有一天，一位下士竟问我“读过了‘文库’么”，那下士的话里所带的意味，使我想起了一个场景。

那是发生在一个旧书店里的事。那店里的老板对一位想卖四、五册“文库”本图书的老妇人，以奇怪得像是被杀的腔调喊着：“这些书不能买，请塞到浴池下面的灶里去烧掉算了。”我看到这些，便与一个同去的伙伴赶着出去，想让那老妇人把书卖给自

〔1〕 竹内实于 1944 年春，从东京的二松学舍高等专门学校被征兵，进驻到日本爱知县丰桥。——译注

〔2〕 神田是东京的书店街。——译注

己。可她推着底下藏着那些书的儿童车，一面慢吞吞地往前走，一面无力地摇着头。我们俩像是丢失了什么东西似的，被一种异样悲愤的感觉压抑着，最后终于停止了追赶。那卖不出去的书是不可能再到手了。

后来过了不久 当我因病住进陆军医院之后 发展把《论语》与《老子》对照着阅读 确实很有意思。对《论语》感兴趣的是孔子一边用手杖敲打着学生的腿骨，一边骂睡午觉的弟子是“粪土之墙”因为确实写得活灵活现。这也许是其因没能好好享受青春的一种发泻。而在《先进》篇中 当四个弟子分别说了自己想干的事情时 他则说如果希望破灭 要想“乘桴浮于海”。〔1〕这一节 不过只是表现了其不得要领的空想而已。而后来 那些没有当上干部候补生的伙伴们，已几乎全都在玛里亚那海湾〔2〕沉没了而无人知晓。

与自己有着如此衣服缘分的《论语》 在战后那样的状况之下 其中所说的“沽之哉 沽之哉 吾待贾者也”的话 自然很合自己的口味。可不知道什么时候 那书已经找不到。《老子》则留了下来。那书很薄 金黄色 封面摸着总像是湿的。《论语》也是同样。

程麻译自《图书》第 152 号 1962 年 4 月 1 日

〔1〕 作者记忆有误 此语出自《论语·公冶长》。——译注

〔2〕 玛里亚那海湾，位于太平洋塞班岛以西海域。1944 年 6 月 19、20 日 美国与日本两国海军曾在那里发生大型海战。——译注

可怕的沉默

日本战败以后 中国再一次进入了我的视野。不过 重新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中国，已与过去我所知道的大不相同。

当看在中国的战犯监狱里拍摄的记录影片时，我曾惊异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茫然地注视着画面。后来在电影《末代皇帝》中 见到原‘满洲国’皇帝的场面 更是格外华丽。然而 使我惊心动魄 感受到新中国已与过去不一样的 并非仅仅是那一个皇帝的变化。

有一篇文学作品里说 在 1941 即昭和 16 年 在中国锦州的街头 有些农民被突然抓走了。把他们押送到哈尔滨 强迫他们修建日本工事之后，这些人又被送去做动物试验。当他们拖着衰弱的身子逃走时，看见自己身上挂着的那个沾满血污的木牌上写着：482 号，大日本满洲细菌试验厂。……在读了这篇大约是从中国非法‘进口’的文学作品之后 当时我并不相信这会是真的。

为了问明真假，我甚至想给北京的编辑部写信。后来我明白了 要是当时果真发出那封信 也就会懂得“满洲”里并没有什么“王道乐土”。可当时的信 原是想有点质疑性质的。那是新中国成立两年之后的事情。那篇作品刊登在《人民文学》杂

志,1951年4月号中。^[1]

为了确认这件事,我又找出了那篇文章。看见原题为:《在日寇细菌试验厂里》,是一篇报告文学,作者弓人。

当时,我确曾为这篇报告写的事情是否属实而苦恼过。我一直在关注“对这样的中国”,成年人,如何能够理解呢?^[2]他们究竟是怎样认识的呢?于是,我想做一些解释,来校正日本人对中国的误解。为此,我一一翻阅了那些描写中国情况的文学作品,写了《昭和文学里的中国形象》一文,发表在中国研究所编的《资料月报》,1957年1月号上。后来,又收入我在春秋社出版的著作《日本人心目里的中国形象》一书里。

但是以后,我给自己确定的这项工作,中途停止了。这是因为我觉察到,日本人对此大都可怕地默不作声。

又陆续地读了一些文学作品,我不禁联想起在战后不久去世的一位男性亲戚。他在即将战败前从军队回来,常常坐在房中架起的火灶旁边,洗自己的眼睛。因为他有眼病,才使他能从战场上活着回来。可是,他回来后既不谈中国,也不讲战争,只是反复地教我打领带的方法。

曾有几百万日本人去过中国,他们总该有一些体验才是。可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只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而他们本人,并不大讲在中国做了些什么。讲的只是一小部分人,大部分都深陷在沉默之中。这种沉默,像是坚固的万里长城,横在我和日本侵华的事实之间。

最近,有一些原来的老兵,讲出了当时的事实。其实,并不

[1] 经核查,为1951年4月出版的《人民文学》第3卷第18期。——译注

[2] 作者小时曾生活在中国,自觉与有的日本人成年后去中国所看到的,感受会不太一样,故如此说。——译注

仅是最近，以前也曾有过这样的人。对他们，我是怀着敬意的。当然，这并非是说，我对那些不愿讲这些的人，就瞧不起。尽管应该瞧不起的人，毕竟还是有的。我想，即使是在沉默中，人们也不应该忘记那些当年在中国，或在战争中的体验。

“昭和”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时代。如今人们再像那年号的意思一样，来感慨终于逐渐迎来了和平，好像已有些不怎么时髦了。但在实际上，从“明治”和“大正”时期开始加速的日本军国主义，确实是在“昭和”达到高峰，并酿成了灾难。而后来在不知不觉中，竟又迎来了可以回味这些往事的新时代。对这些往事，不管是褒也好，贬也好，如今日本再与关系密切的中国打交道，毕竟变得稍微客气一些了。

程麻译自《读卖新闻》(晚刊),1988年4月9日

京都和吉川幸次郎先生

当回忆教室与研究室被封锁的那段情景时〔1〕令我吃惊的是 封锁以前的那些念头已显得相当遥远 就如同穿透宇宙的飞船快速远离了一样。而冷静地回头想想，那很早以前便盼望的，直到封锁以后自己才真正得以参加的京都大学集中讲座，却仿佛是发生在昨天的事。那是在午睡时接到邀请的电话，由小川环树〔2〕先生打来的。在经受了心惊胆战之后，所感受到的无非是惭愧、悔恨与狼狈之类。而等到去研究室的次数逐渐多了起来 才觉察出来 在那里等待我的 是多么宽容和亲切的气氛。在集中讲座结束的前一天，我想到吉川幸次郎〔3〕先生的府上去

〔1〕1968年初，以东京大学学生为首，掀起反对当时日本共产党的“非暴力革命”政策的学潮，并占领学校礼堂、封锁教室等建筑物。从1969年1月18日早晨开始，日本警察机动队开始强行攻占礼堂，解除被封锁的教室。——译注

〔2〕小川环树（1910-1993），中国文学研究家。京都帝国大学毕业。1934年去中国留学。历任东北大学教授、京都大学教授。著有《中国小说史研究》、《中国语学》等。——译注

〔3〕吉川幸次郎（1904-1980），中国文学研究家。京都帝国大学毕业。1927-1930年去北京大学留学。自1947年始任京都大学教授。著有《元杂剧研究》、《吉川幸次郎全集》28卷。——译注

问候。自己鼓起勇气，在东方文化研究所（以前曾经这样称呼）^{〔1〕}办完事之后，找准了那条弯曲的路径。钻进被浓密的树荫遮盖的狭窄小道，越往前走显得越阴暗。等走到了视线有些开阔之处，才发现已经到了京大农学部门前跑汽车的马路上。开始我还以为走错了，后来则联想到，这仿佛象征着自己仍旧是在“初步”或是“入门”与这京都完全陌生似的，于是禁不住对十几年来个人的没有长进苦笑起来。当初在才进入东京大学的时候，在那里的某座楼前，也曾有过类似的感觉。当时因为走错了楼梯，硬是找不到要去的教室，只好再重新从一楼开始爬起。那时自己脑子里浮现出了一个词语，就是：“经院主义”。

而在京都，让人觉得并没有那么高的人工建筑，大自然亲切地拥抱着一切。有一次，我回到乐友会馆^{〔2〕}进了食堂。因为女服务员把水洒得满桌子都是，我不得不坐到后边的桌子旁。当时，吉川幸次郎先生正在那里，静悄悄地，手里拿着一块面包。

到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开始正式听吉川先生的课。他讲的是中国文学史。当时，基于想证明自己有那个能力，我曾记过笔记。现在打开笔记，逐页翻看，还能回想起自己那时的心境。先生在开讲时说：“中国无疑创造了最早的人类文明。”事实不正是如此么？关于《尧典》，先生讲：“儒教的教诲侧重于文化。孔子后来对儒学的发展，证明以前中国文化确是那样的传统。不过让人觉得，这种传统的形成，并非有多么久远。与《春秋》相

〔1〕 东方文化研究所，是竹内实七十年代后工作过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旧称。此研究所是日本政府利用清朝庚子赔款在1929年创立的，为日本最早的人文研究所之一。——译注

〔2〕 乐友会馆是京都大学里一座厅堂式公用建筑。——译注

比 它开始显得较为端庄。”

关于“五经”先生说：“五经里没有真正消极的言论，也很少宗教的热情。其内容，都是人的现实生活自身。而老、庄思想，往往会成为文学的主题。但不应该认为，它们是五经截然不同。归根到底，二者还是相通的。”

关于“士昏礼”^{〔1〕}先生在引用了一节古文后说：“这里的描述是大体确切的。文学要求准确的描写，因此要有敏锐的感觉。中国的散文与日本不一样，没有像余裕那样暧昧的情绪。虽然其与法国式的明朗风格也不完全相同，但基本上是那个样子。”

在第二年，有一门课程是所谓“中国文学的特征”。我记了关于修辞的后半讲（前半讲缺课）其中写道：“应该将日常语言转换成比较文雅的言辞。要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孔子语）不应提倡随心所欲的语言。浪漫的手法必须对修辞有益。而修辞的核心在于严谨，所以应该有必要的形式。其严谨的程度，仿佛如数学的公式一样——乃是理智的结晶。而对偶，便是检验理智的尺度。像：

返照入江翻石壁

归云拥树失山村^{〔2〕}

这样的句子读起来有节奏，能使读者受到很大感染。依靠理智的制约，情感会变得更加细腻。……（中略）诗作要根据素材来决定表现手法。”

〔1〕 士昏礼 是《仪礼》中讲的士大夫阶层结婚的礼节。——译注

〔2〕 见《杜工部集》卷十五《七律·返照》。——译注

我的笔记中不准确或误记之处在所难免，但当时先生所讲的大体内容是这些。那时先生的年龄似乎比我现在还年轻一些。自己边听边记，竟着了迷。后来在东方文化研究所举办的杜甫专题好像相浦杲〔1〕君参加了，而我却错过了那次机会。作为补偿，后来便有参加该研究所在夏季举行的集中讲座的事。记得入矢义高〔2〕先生在讲座上也讲了话。这些事想来宛如昨日。富江寿雄君以英文，记过关于这次讲座的笔记。

在文学系比我高两级，有一位叫杉原康夫的。忘了是什么原因，他曾和我一同拜访过吉川先生的家。当我跟他第一次访问先生时，记得他好像在读钱大昕〔3〕的日记。我翻过那本书，还向先生请教过如何做摘录。记得先生当时曾兴致勃勃地谈论过本居宣长〔4〕。

那时候的我们 特别是自己 还难有那么高的理解水平。记得在文学系狭窄的院子里 在中午打开饭盒 下午讲课之前这一段空隙里，学生们以某个汉字的中国语发音做游戏，借以消遣。相浦、富江、三枝 还有阿赖耶顺宏〔5〕（当时姓竺 箒等 对此都全神贯注。

〔1〕 相浦杲（1926-1990），中国文学研究家。京都大学博士课程毕业。大阪外国语大学教授。著有《现代中国文学》等。——译注

〔2〕 入矢义高（1910-1998），中国文学研究家。京都大学中国语科毕业。京都产业大学教授。著有《明清笔记小说》等。——译注

〔3〕 钱大昕（1727-1804），中国清代学者。江苏嘉定人。曾任翰林院庶吉士。著有《二十四史考》、《潜研堂全书》等。——译注

〔4〕 本居宣长（1730-1801），日本江户时代的学者。著有《古事记传》等。——译注

〔5〕 阿赖耶顺宏（1924-）中国文学研究家。京都大学中国文学科毕业。追手门学院大学教授。——译注

那时 兜子 也就是赤尾俊郎〔1〕曾经写过这样的俳句：

世态炎凉，自暴自弃懒读书。

说起来 与多如过江之鲫的文学系学生们相比 那些研究生院的学生，则显得很规矩。他们与先生见面的机会，也比较多。

记不得是在哪一年，我见吉川先生站在文学系新楼大门的台阶上 似乎那是在与高木正一〔2〕或前野直彬〔3〕君讲读例会结束以后。天色已近傍晚，光线有些昏暗，细雨也悄悄下了起来。先生大约是在那里寻思 没有伞该怎么回家。他在那在紧张的授课之后浮现出放松的神情 有意无意地眺望着眼前湿漉漉的天空的削瘦面孔 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那印象使人觉得 好象先生背负着什么沉重的问题 即他并非是一位已经成名的学者 却像是一个真诚投身于学术的年轻 有些成熟的那种年轻人。

当时 研究生有点特权 可以跟着老师讲读，一边断句一边喝着威士忌酒。高木君等人，就曾说起过吉川先生饮酒的事。但在我听来，总觉得那种事与自己还沾不上边。不过说到吉川先生 无论是后来还是当时 他给自己的印象都相当好。

在乐友会馆里，我曾向吉川先生请教过北京的北河沿在什么地方。先生在我打开的笔记本上画着示意图，边谈着自己过去在北京的感受 边用拼音字母写着地名。看到那些字母 我又

〔1〕 赤尾俊郎(1925-1981) 又名兜子 日本俳句作家。京都大学中国文学科毕业。1960年创办杂志《涡》。著有《赤尾兜子全集》。——译注

〔2〕 高木正一(1911-)中国文学研究家。京都大学研究生院毕业。追手门学院大学文学系教授。著有《钟嵘诗品译注》等。——译注

〔3〕 前野直彬(1920-)中国文学研究家。京都大学研究生院毕业。东京大学教授。著有《风月无限——中国的古典与自然》等。——译注

想起先生在黑板上写字母的特殊样子。那字体，从开始授课的时候开始，一直没有改变。整整二十年过去了，京都始终亲切地笼罩着我……

程麻译自《吉川幸次郎全集 第4卷月报》，1984年6月

延安 也是故乡

—— 初读‘人民文艺丛书’的时候

—

延安 这一地名为相当多的日本青年了解 大约是在 1951、2 年的时候。正是在那时，我第一次读到了“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以下简称为‘人民文艺丛书’）”该丛书汇集了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的文艺作品。也正是在这前后 我还读到了《人民文学》这种杂志。当时，自己热衷于阅读它们，是因为认识到新中国的诞生非常有意义 对促使一个新国家诞生的革命 抱有求知的欲望。后来回想起这些往事，我曾经做过这样的描述：

那时 我们主要通过“人民文艺丛书”和《人民文学》来接触作品。这些刊物、丛书的纸张比刚刚战败后的日本杂志还要粗糙，在又黑又厚的纸上印着压进很深的铅字，并渗出烟灰一样的黑色。可就是这样一行的铅字，使我明白了：以前自以为很了解中国，实际上是什么也不了解。它使我知道了在目力不及之外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哪些东西

在产生，哪些东西在泯灭。当然，作品中也反映出了我们与
中国之间还没有邦交这一事实，但是它使我们感觉到中国
就在我们的身边。所以，与其说是在读文学作品，倒不如说
是在读活生生的事实。作为文学具体表现形式的单行本和
杂志，更使我们嗅到了同代人的生活气息。（东京·研文出
版，《书斋人》，1971年11月号^[1]）

在这里，需要说明几点：

我并非是通过这些文学作品才首次接触到中国。我在山东
的一个小城镇里上过小学，出生地也在那里。自己觉得很明白
中国的事情 所以 上文才有‘以前自以为了解中国’的话。现在
回想起来，其实那时自己家里过的是日本式的生活。在那个
小城镇里的日本人家庭，也都是日本的生活方式。孩子们在日本
人设立的小学校里上学，而那里并不教授汉语课程。虽说是住
在中国，实际上和中国社会几乎没有什么接触。

我的家住在车站附近。在车站前的马路上，有一个包子铺。
“热呀 热、热、热包子呀！”伙计大声地招徕着顾客。自己常常
向母亲要几个叫作“铜板”的钱 跑去买来。包子很大 买两三个
就得用两只手捧着回来才行。

车站与我家之间 有一块宽阔的场地 那是从农村运货来的
马车的停车场。在那里，经常可以听到骡马的嘶叫声。那儿还
是杀人的刑场，我有时也见过一些杀人的情景。后来读鲁迅的
《阿Q正传》对里边的枪毙阿Q的场面，就不觉得奇怪了。总
之 我是通过孩童的眼睛 看到中国社会的一鳞半爪 对中国社
会更深奥的东西 实际上没有什么认识。关于这一点 是我读了
“人民文艺丛书”和《人民文学》之后 才意识到的。特别是读了
“人民文艺丛书”里的作品 给我以强烈的冲击。作为书籍来说，

丛书的封面和纸张是粗劣的，印刷的油墨也不大好。我上完小学四年级，举家北迁到长春。长春的冬天十分寒冷。因为烧煤，家家有烟囱冒烟。烟灰飘落下来，把冻雪染成点点黑斑。上文里所谓“渗出烟灰一样的黑色”实际上说的就是在东北所看到的烟灰颜色。

在那丛书里令人难忘的，是关于斗争地主的情景描述。作恶多端的地主被押解到了广场上，被压迫的农民奋起揭发他的罪行。地主的罪行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苛刻和残酷。农民怒斥着，咒骂着。一个老婆婆走上台来，手指着地主，想要控诉他的罪行，但因为愤怒，便咽在喉，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好容易喊了一声，眼泪就流下来了。她哭着，说着，悲愤万分，最后竟昏了过去。

我内心被老婆婆的悲愤所打动。她不得不忍受压迫与虐待，被置于绝望的境地。这也是在一篇报告文学中描写的情景。当我把丛书一册册地读下去的时候，又发现了一本诗歌和民谣专集。其中也刊录有那个老婆婆的发言，不过它是作为民谣这一形式收录的。我在惊讶的同时，不得不叹服，这才真正是人民的文学艺术。

那老婆婆的发言，是作为民谣收集的，其中没有注明是在斗争大会上的控诉。我想，也许是在斗争大会之后，老婆婆的控诉作为民谣被传播了开来。老婆婆在指着地主控诉时，音调已经具有抑扬顿挫，正因为如此，听起来就像是歌谣一样。参加大会的人们，向他人转诉她的形象时，同时模仿其语言音调，那大概就形成了一种民谣。当然，这只是我事后的想象。

通过报告文学了解这些情景之后，我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农民，充满了同情，心境十分压抑和沉重。但当知道它已流传为民谣，心中又增加了一份感慨。从前，我不过是漠然地

凭空想象着中国农村的情形，并不知道地主与农民之间竟会有这样敌对的情绪。那无名的陕北农村老婆婆的控诉，是自己理解中国革命的开端。

当时的“人民文艺丛书”现在已经找不到了，以上所写全凭记忆。故那篇报告文学的题目、作者姓名和书名都没有记住，也可能有记错的地方。

二

当时在日本读“人民文艺丛书”和《人民文学》很不容易。东京大学文学系中国文学研究室里有一套，我读过它们。1949年3月我从京都大学毕业，来到了东京大学。从4月份开始，我就利用那研究室的藏书。那套“人民文艺丛书”陈列到书架上，我想是在1951年以后的事。当时在日本，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套。研究室是如何购置的，详情不得而知。

在读“丛书”的时候，我又购买了《人民文学》。那是在有一天，一个陌生人来到了研究室，从皮包里拿出一册，说：“进货了。以后可以每月来送杂志。”当时他的皮包中只此一本。记得以后好象是把每一册或两册杂志卷成邮件寄给收信人的。总之，自己是借助于一个神秘的陌生人的帮助，才读到了《人民文学》。不久之后，还读到了《文艺报》。

这种不自由的状态，与当时的国际关系有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美军作战。在当时，新中国是美国的敌人，占领日本的美军因此变得神经过敏。11月，《人民日报》揭露过日中友好协会会员被捕的消息。1951年6月停战以后，形势虽有所缓和，但美军的检查仍是很严格的。

那时 我接受友人的建议 翻译了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 初稿》。其中的附录 有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 文中有关朝鲜战争的文字不得不删去。译本 1951 年 10 月由五月书店出版 译者署名“东京大学中国研究会”。虽然署了东京大学的名字 其实与东京大学本身并无关系 所谓“中国研究会”只是学生自发的组织。

不过，当时对文艺作品的限制，却并不怎么严格。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等译本 相继出版了。我和朋友一起从“人民文艺丛书”中 选出几篇 译成了日文。书名是《游击队》 由青铜社在 1952 年 6 月出版 译者仍署名“东京大学中国研究会”。真实的译者 是桧山久雄 宇佐美真规和竹内实三个人。

书中所收作品的作者姓名、题目与选自的书名如下：

华山《碉堡线上》(《英雄的十月》)
高朗亭《雷老婆》(《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
郑笃《英雄沟》(《英雄沟》)
高朗亭《怀义湾》(《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
马烽《张初元的故事》(《诺尔曼·白求恩片断》)
董均伦《小小的故事》里面的几篇
袁潮《李空沟反维持记》(《英雄沟》)

现在回想起来，遗憾的是，让我感受最深的报告文学和民谣，并没有收录在内。我们一边翻译这些作品，一边也了解到“日本帝国”的军队 曾在中国大陆进行过怎样的侵略活动 对此 中国的民众又做了怎样的抵抗。也就是说 我们学习了日本的现代史 而教师则是中国的民众 以及记叙这些民众行动的作

者 与收集这些作品的‘人民文艺丛书’。

当我读‘人民文艺丛书’时 感到费解的是 文中出现了一些没有见过的词句。至今仍能记得的，是赵树理《小二黑结婚》里的一处：

小芹今年十八了，村里的轻薄人说，比她娘年轻时候好得多。青年小伙子们，有事没事，总想跟小芹说句话。小芹去洗衣服，马上青年们都去洗；小芹上树采野菜，马上青年们也去采。

“野菜”这个词 在日语里是蔬菜的意思。而这里与日语不同的，是指在野地里自生自长的可以食用的野草。但使人莫明其妙的是“上树采野菜”一句。难道树上还长着野菜么 我们几个人组成研究会 每周一次研读赵树理的作品 可谓是煞费苦心。

阅读解放区的文学作品，是为了了解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另外 我们也开始研究革命史。我们每将《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译出一章 就油印二、三十份作为材料 来开展革命史研究会的活动。文学作品对了解革命洪流与社会变革中人们的生活和心理变化 是很有用的。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 有关于农民分到了果园 当眺望被阳光普照、闪耀着光芒的果园时 被优美的景色所感动的场面描写。这一段文字，在长篇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由于革命而第一次感受到美的农民的心理变化的描写 很引人注目。

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里的铁锁 至今还像一个现实中的挚友 让人感到很亲切。小常这一形象 也使人难忘。铁锁第一次遇到像小常那样没有架子的知识分子，从他那里学到了许

多社会知识。但后来小常被捕了，据老木匠的猜测，小常大概是共产党，一定会被杀害。那天晚上，铁锁失眠了。赵树理在书里这样写道：

从这天晚上起，他觉着活在这种世界上实在没意思，每天虽然还给人家打洞，可是作什么也没有劲了。有时想到应该回家去，可又想着回去还不是一样的？

《李家庄的变迁》我也搞到了一本。拿出当时的书籍看时自己曾在上面那段引文的空白处写有“觉醒者的心理”的字样。可见对铁锁的心理一步步变化的轨迹我曾经多么踏实地追寻着。

友人宇佐美直规当时是东京大学的学生，出版有中国现代诗的译诗集，书名为《从延安到北京》。我们当时觉得把中国的地名和人名按汉字发音音译比较好，所以书里并没有出现“北京”和“延安”这样的汉字，用的是片假名〔1〕。这本诗集所收有闻一多、杨骚、艾青、田间、胡风、冯至、鲁藜、天蓝、孙钿、亦门、王亚平、庄勇、严辰、柯仲平、马凡陀、萧三的诗，还有民歌。田间的诗论、马雅可夫斯基歌颂革命的诗，也一并收入。书由大月书店在1951年10月出版。此外，自己还翻译了陈登科的《活人塘》、《杜大嫂》由鹤书店出版，那是1952年12月的事。我又全译了柳青的《种谷记》，但至今也没有得到出版的机会。

三

指导解放区文艺的理论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1〕片假名是日本的大写字母。——译注

的讲话》。那篇文章中穿插的一些生动具体的事例 使人感到很亲切。在日本 也有要遵循《讲话》的精神 来推动文艺运动的呼声。对这一问题 由于关系到当时革命运动的路线 有赞成与反对两种意见，但它确实是推动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动力。

我认为，《讲话》所指出的文艺方向 基本是正确的。不过，日本的大众与《讲话》里所说的工人、农民 似乎全然不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 在幅员辽阔的中国是可行的 可把它硬搬到日本来则不然。中国有“三十六计走为上”的谚语 中国工农红军的游击战 按这一谚语去做很容易。而日本国土狭小 电信通讯发达 在山野僻地里辗转移动 开展军事行动 势不可能。

我也曾考虑过，那些日本读者比较容易理解的作品。其中，韦君宜的短篇小说《三个朋友》与“丛书”里的其它作品意味不同 很值得一读。主人翁是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 来到农村最先结识的朋友 是一个喜爱文学的地主。接着 听到来自城镇的旧友 谈论城镇旧闻 引起他对城镇的留恋。最后他体会到 只有农民才是真正的朋友。在“人民文艺丛书”中 这似乎是唯一一篇描写知识分子动摇性的作品。我曾想有机会把它翻译出来，但这一愿望至今也未能实现。

随着对中国社会知识的增长，我也开始考虑起日本的社会现实 对关系到两国现实的作品特别关心。除《三个朋友》之外，也重视丁玲的《夜》、《在霞村的时候》这样一些作品。过了不久，中国开始了对《武训传》的批判 我的注意力便转移到那上面去了。

我们自发地热衷于阅读“人民文艺丛书”。当时的东京大学

主任教授仓石武四郎〔1〕先生，对收集新出版的中国文艺作品，更是不遗余力。他还聘请当时在日本居留的谢冰心先生为讲师以汉语讲解老舍的《二马》和曹禺的《北京人》等作品。有时，我也代替仓石先生做口译工作。听说谢先生将在 1951 年 7 月结束讲授 携家属移居去美国。她的最后一课题为《诗人与政治》讲的是像陶渊明那样看上去不问政治的文学家 最终也不能逃避政治现实。我们兴奋地听着那一句句热情洋溢的话语。在讲义的最后部分 她对美军占领日本 做了简短但又尖锐的批评。仓石先生没有把这些话翻译过来，而我聆听在耳，大为感动。

不久 暑假来临。一直到了 9 月份，我们再次聚会在研究室时，才知道谢先生并没有去美国，而是返回新中国去了。谢先生的《临别寄东大学生》一文 由仓石先生交给我 译成了日文 刊登于《东京大学学生新闻》1951 年 10 月 4 日号。其中 谢先生这样写道：

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教师，最挂记在心头的，是尽快进行两国间的新文化和文化人士的交流。只有尽早彻底的交流，才是两国真正持久和平的基础。根据我在日本居留五年的经验，深感对日本人民的真正了解很少。和平条约

〔1〕 仓石武四郎（1897 - 1975），日本中国语学家和中国研究家。1921 年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科毕业。后接受京都大学研究生院狩野直喜的指导。1927 年任京都大学副教授。1928 至 1930 年去中国留学。1931 年兼任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研究员。1939 年任京都大学教授。自 1940 年兼任东京大学教授。1949 至 1958 年任东京大学教授。为日本的京都支那研究学派著名人物。重视现代中国语的教学与研究。著有《支那语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汉字的命运》、《中国文学讲话》、《中国语五十年》、《仓石武四郎著作集》等。——译注

的缔结越延期，两国人民的接触就越缺乏。隔着一条战争的波堤，两国人民只能远远地伸出手来，相互间不能听到和平的呼声。但我决不悲观。两国人民的友谊，恰如连接两国的海洋的波涛一样，必将冲破一切障碍。

谢先生上面所讲的“两国间的新文化”就中国而言我理解就是指新中国的文化。谢先生回归北京一事，以及关于与新中国文化交流重要性的话语，对于热衷阅读和翻译“人民文艺丛书”的我们来说是莫大的激励。中国的教育有身教与言教的说法。谢先生对此身体力行，给我们以很大的教益。如此说来，“人民文艺丛书”并不单单只是书籍而是生气勃勃的新中国的一部分。

后来随着接受进一步的专门训练我已能够获得关于延安的政治动向和文化运动的知识，并可以对它们进行分析与评论了。在此时当回想起最初阅读“人民文艺丛书”的往事总有像遇到想念已久的老朋友那样的感觉。

延安是中国文学家、革命家的故乡这自不必说。对于通过延安文学来接触中国革命史的我们来说在某种意义上延安也是故乡。

杨福春译 载《延安文艺研究》创刊号，1984年12月

K 君的旧皮包

那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有一位像是大病初愈似的消瘦 脸色不太好 加之戴着浅色眼镜 越发使气色不怎么好看的汉子——我称之为 K 君的来探访。他从破旧的皮包里，拿出了一、两本杂志。它们是在北京发行的《人民文学》。

我没有问他，是通过什么途径搞到这些杂志的。它们都特意卷成了圆形，好象是作为普通邮件邮寄来的。

K 君也有一个店铺。每当我从育英会〔1〕拿到了奖学金 便常常带着钱 到他那个店里去。虽说也叫“店” 其实那不过只是一座普通住宅。打开那横拉式的房门，可以看见在铺着地板接应来客的房间里，竖着书架。书架上陈列着新来的杂志和书籍。在它的旁边，还有一张小桌子，K 君总是面对着桌子静静地坐在那里。实际上 他对来客内心很是高兴 因此也常常拉起一些话题。

书至多一次只能买三、四本 因为新货并不总是很多。可当《人民文学》每期一到 即使是踏着薄冰 我也要去买。当然 其

〔1〕 育英会是日本著名教育基金会之一，主要向在校学生资助，借贷学习上的费用。——译注

中也有因某种缘故，有的期号不留神而漏买了，未能到手的月份。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也是这样买来的。记得价格并不太贵，可是纸张质量好，印刷也精美。包装并不是用马粪纸，尽管是一种平装书，却加了彩色印刷的外套。那在当时中国的出版物里，是最高的水平。至今我还记得，当时能买到那样像模像样的书，心里是多么的狂喜。因为那是我虽然并非同活着的毛泽东 毕竟也是与书本上的毛泽东的最早接触。

《人民文学》大约在第四、五期之后 有的没有买全。后来过了四、五年到北京去的时候，我在西单商场的旧书铺里，想补买所缺的几期。当我问旧书铺的老人，有没有那些期号时，他忙答说：“有。有。”记得他像鸟儿似地飞走了，稍后便抱了一些有点脏的杂志来给我看。仿佛该杂志的创刊号，就是在那时候补买到的。而在另一个旧书铺里 我还看见一些旧的《人民文学》 随便堆在台子上，一文不值地唾手可得，自己的心情真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除《人民文学》之外 我还买过文艺评论杂志《文艺报》 那自然是为了了解中国文坛动态方便一些。现在回想起来，我在少年时代，不知道为什么曾非常迷恋过春山行夫编辑、由第一书房出版的《蛇》丛书。而后来收集《人民文学》或《文艺报》 则仿佛是它的延续。

在这依着惯性，不断地购买、热心阅读的过程里，我也曾暗暗自问过：这样究竟能买到什么时候？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当中国所有的杂志全都停刊了时，说句真心话，我还确实有点稍微松了口气的感觉。

而最后的结果是：《人民文学》第二号、《文艺报》从创刊号开始的 7 册，一直没能收集齐全。在眼下，一本不缺的整套《人民

文学》和《文艺报》可以在许多大学或图书馆找得到 我的那些收藏品已算不得稀罕。但是 我却总忘不了它们中的某一册 以及那为了一册杂志而每月每月都去购买的时光。在去年下半年 当《现代中国的文学》一书煞尾的时候 我好象是在一面镜子中看到了自己的样子，不由得生出了似乎要送走自己的过去的复杂心情。

《毛泽东选集》后来还出版了第三卷。而等到第四卷问世时，我已没有了当初购买第一卷那样天真浪漫的激动了。这在我来说 好象变得有点冷漠了。然而想起来 那毕竟也是很自然的事。实际上 即使人们在阅读并不怎么热心的文献时 也同样可以觉察出它究竟是不是具有吸引人的力量。

前不久，我曾被时髦鼓动着去了一趟香港。在那里的旧书铺刚一落脚 就在最上层的书架上看见了一本《实践论》最早形式的小册子。那是一种没有印明作者名字，谁也不会注意的版本。

在那一刻 我突然联想到 看起来自己是无论如何也离不开与书的缘份了。

程麻译自《每日新闻》，1972年 8月 21 日

辩解的辩解

几个月以前，已经忘记了是谁，有一个朋友见了我说：看了最近到的《读书》杂志没有？那里面有一篇文章讲到了你。我马上到所办公室负责收发、登记杂志工作的人那里去问，拿来了《读书》1982年第7期。

当时，我心里是有些内疚的。在此地关心中国文学的人们当中对于《读书》杂志的评价很好我也曾经听人家的推荐订了一段时间。但是我的书太多，在研究室里放不下，勉强放下也不好整理。因此，从今年开始，便尽量少订杂志，采取了取消预定的蛮横手段而《读书》也在被取消之列。现在又拿到了它难免有一点再会自己多少违背了诺言的友人之感。

果然，其中有一篇提到我的文章，那是何为先生写的《在北海道的文学交流》。不错，正如那题目所示，我跟何为先生在北海道见过面。此外，还有韶华先生和陈喜儒先生，陈先生是当翻译帮我们的忙。我已经拜读过韶华先生在《鸭绿江》杂志上连载的《北海道纪行》那是此地一位订这家杂志的朋友复印后送给我看的。

读完何为先生的文章之后，正如读韶华先生的文章一样，我心里浮现出了我们在北海道报社一间客厅里见面、谈话时的情

景，再一次沉浸在当时愉快、融洽，对我来说又是很有教益的气氛中。我认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由现代中国的作家来描绘，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两位先生的笔调没有浮夸，但我觉得还是对自己有些过奖了。

后来此地有一位外国籍（并非中国籍）的年轻朋友，有一天开完所里的讨论会后，与我在研究室里一面休息，一面聊天。我不大喜欢拧开天花板的电灯，而只打开书桌上比较小的灯。我们喝一点点威士忌。彼此的面孔在不太黑，也不太亮的光线中，有时看见又有时消失，有些像英国童话里的猫的笑脸。

这位朋友也是《读书》杂志的热情读者，碰巧他手里正拿着一本。谈话中，他提及了何为先生的文章，问我读了没有。我说，我读了，可其中有一句我的话被记错了。于是，这个朋友劝我投稿给《读书》。

我这是指何为先生曾这样记录我的发言：“叶圣陶先生文字平易，译成日语很方便。”

其实，这与我平常的看法并不一致。我的看法是：叶圣陶先生文字平易，但要译成日语却很难。”

我在当时讲的，并非是何为先生所记录的那样。也许因为我的口音不太清楚，或者是说明不够，便被何为先生理解为他记录的那样。（这也证明，我认为何为先生对我的中文有过奖的感觉，是对的。）

我认为叶圣陶先生的文章（也可以说文字）是地道的白话文、地道的中文，平易、朴素，但每个字、每个词都富有自己的内涵，想要更换成别的字、词，不太可能。想把它译成日文，在日文里找到相当于它的日文字、日文词，很难。而要把这些字、词组织成像叶先生的文章所具有的那种调子，就更难了。

人们也许会怪我：难道除了叶圣陶以外，其他中国作家没有

写白话文的？用的不是中文？不平易？我承认这种反问有道理，但还是想固执己见。

我这种“己见”在三十年以前就已经有了。

那时中国出版了一套丛书，叫《文学初步读物》，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不知道总共出版了多少种，每一种都很薄，有30页左右，大约有可以塞进西装口袋里那么大。其中一种是《寒假的一天》，叶圣陶著，费声福插图。

偏巧今天有点小空闲，我整理平常顾不大上的研究室里的书架，发现其中有一捆就是这套丛书，一共39种，都是1953年前后出版的。

记得当时，我在一家中文讲习所做教师。教入门、初步还可以，当学员们上了中级，我这个讲师就感到吃力了，因为没有适当的教材。那时正好碰上了这套丛书，看见《寒假的一天》文字平易，内容有思想性，也有故事性，我就用它来上课。书里面至今还保留着我所加的注音字母和四声符号。

我还记得当时自己感觉那里面的很多字、词，很难翻译。

比方，开头的一页里就有：

院子里阴沈沈的发白

这样的景色我也见过，但是怎么翻？

草草地穿著停当，我们两个开了后门，探出头去。

在日文里找得出“停当”这样干脆利落的词么？

我认为，中文文章里有一批字、词，很有中国气息和中国味道。如果译成日文（故且不提日文以外的外国语），它们就消失

了。

自然，当时我的中文水平比现在还低，如果现在有相当的时间，也许可以勉强译出。不过，当时我头脑里产生的上述看法，一直到如今也没有变。并且我认为，叶圣陶先生的文章能够屹立在中国文坛，其理由之一也就在这里，所以我喜欢它。有这样的文章，才给开始学中文的外国人，带来了一种学中文的甜蜜感。

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除了叶圣陶先生以外的中国作家的文章都缺乏应有的中国气息、中国味道，也不是说过去的日译本中国文学作品，在翻译上有毛病。我只是把 30 年来的幼稚看法，在北海道见到中国作家时喜出望外之余，偶而冒昧地吐露出来而已。而最后也就有了这个辩解。

也许我已经是一个“遗老”即语言上的“遗老”所以才这样固执。但我这样说，也有语病：把叶圣陶先生划成“遗老”成份了。我说这话，可本不是指这个意思。

为此我终于只得写了这篇《辩解的辩解》。

选自《读书》，1983 年第 3 期

七号环线公路与《工人绥惠略夫》

出寒舍百十来米，是东京的七号环线公路，去那里乘车很方便。而其讨厌之处，则是当夏天开着窗户睡觉时，汽车轮的磨擦声总是不断，特别在下雨的时候，更显得吵闹。过去门前小巷的路很狭窄，连出租车都走不开。就在我常散步的这条街上，有一家旧书店。似乎那里主要是收购破烂东西，再把从中拣出来的旧书摆在架上出卖。打开玻璃门走进去，总有种尘土的怪味道。有一天，我在那里的书架上看见了小开本的《工人绥惠略夫》。作者是俄国的阿尔志跋绥夫，中岛清译为“万神殿丛书”的第五种，由金樱堂书店发行，于大正 3(1914)年出版。从卷末的广告得知，当时这套“万神殿丛书”，除此还计划出版契诃夫的《农夫》、梭罗古勃的《死亡的胜利》、高尔基的《底层》、梅特林克的《阿古拉维奈与塞里塞多》和安特烈夫的《向星空》等十余种书。翻译者有松本苦味、升曙梦、秋田雨雀、小山内薰，计划参与的翻译者则有森鸥外、茅野萧萧、楠山正雄等人的名字。那是一种很漂亮的袖珍文库本。因为鲁迅曾翻译过这本书，我便买下了它。鲁迅的那个译本，自己只读过一次。而借助于这个日语译本，我发现鲁迅的小说集《呐喊·自序》里的一段话，曾经参照过阿尔志跋绥夫小说中的内容。那是写借住在肮脏的贫民街宿舍里的工

人绥惠略夫，看到邻室的大学生亚拉藉夫替同一住宅里的穷人还借款，并为穷困、质朴、傻乎乎的少女阿伦加读书以启蒙她。而当少女为了钱只得被迫结婚，来向亚拉藉夫诉苦时，工人绥惠略夫旁观地看着，说了下面一段想法：

伊来到你这里，是因为伊爱你……因为伊有着纯洁的澄澈的灵魂。这就是你将伊唤醒转来的……现在，伊要堕落了，伊到你这里，为的是寻求正当的东西，就是你教给伊爱的。你能够说给伊什么呢？……没有……你，这梦想家，理想家，你要明白，你将怎样的非人间的苦恼种在伊这里了。你竟不怕，伊在婚姻的喜悦的床上，在这凶暴淫纵的肉块下面，会当诅咒那向伊絮说些幸福生活的黄金似的好梦的你们哪。你看——这是可怕的（中略）可怕的是，使死骸站立起来，给他能看见自己的腐烂……可怕的是，在人的灵魂中造出些纯洁的宝贵的东西，却只用了这个来细腻他的苦恼，敏锐他的忧愁。〔1〕

鲁迅曾以上面这种想法，特别是最后一段话，来回答《新青年》杂志希望他投稿的要求，连用词也差不多。鲁迅质疑道：启蒙者是否真有责任把睡在铁屋子里并要闷死了的人们唤醒，增加他们临死的痛苦？

鲁迅后来对阿尔志跋绥夫作品的评价是否定的。不过在谈到与个人思想的关系时，他说其思想也束缚过自己（见《两地书》），而正是在翻译《工人绥惠略夫》之后，鲁迅创作了小说《阿 Q

〔1〕 本段译文录自鲁迅译《工人绥惠略夫》，《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译注

正传》。鲁迅在这部俄国作品的《译者附记》中曾感叹它表现了俄罗斯人民在面对“小人物”时的人道主义精神，而中国却没有这样的“小人物”。后来在《阿 Q 正传》的俄译本自序里他再次表露了希望能够描写出从未被揭示过的中国民众的靈魂。

鲁迅在翻译《工人绥惠夫》时是否见到过这个日译本不得而知。但无论中岛还是鲁迅，在翻译这部作品时，用的都是德文译本，而且是同一位译者。小说日文版与中文版所附原作者的照片也都一样。

在这本“万神殿丛书”的小书里，原作者肖像后的白页上不知哪一位读者写下了如此一段感想：

这部作品使我懂得了什么？大约尚未被我们理解的虚无党的心，即世称社会主义者的心理状态，便是如此。在这部作品里，无论是绥惠略夫还是亚拉借夫，他们头脑中所有的幻想，不能不越来越搅动我们的思想。

按照用铅笔标出的价格，我以 20 日元买下了它。那个废品店，是在面对着环线公路的一栋钢筋楼房下面。旧书店现在已装着宽敞的铝合金玻璃窗，但大概很难再有像“万神殿丛书”那样意外的收获了。后来我在散步的途中，几乎再也没有光顾那家旧书店。

程麻译自《春秋》，1969 年 1 月号，1968 年 12 月 25 日

与北京交换新刊

在我的住处 并没有十分珍贵的书籍 书也没有多到铺得满床都是的程度。

要想调查材料 我便靠去国会图书馆、日比谷图书馆 或是东洋文库〔1〕。以前我经常利用中国研究所〔2〕的图书馆 因为可以借出来用。而近来，能够委托其复印的国会图书馆和东洋文库也比较方便。

旧书主要来自东横线〔3〕学艺大学站前的村田书店。由于热心于中国的事情，每当看到相关的图书目录便去买。可光是买财力又不允许，所以也曾让店里给自己卖过书。每当看到老板写结算支票的时候 确实很高兴。以前在村田书店里买的 主要是日本人的中国游记之类的杂书。而最近，由于有预定的方法 目录到后 可以尽量从容地翻看 然后打电话给他们。

〔1〕 东洋文库，是由日本人岩崎文弥在 1917 年从外国人购得的 24000 册与亚洲有关的书籍的基础上，于 1921 建立的，为日本最早的私人东洋学图书馆。目前是日本国会图书馆的分馆。——译注

〔2〕 中国研究所，是由岩村三千夫等人 1946 年在东京成立的研究中国的机构。——译注

〔3〕 从东京至横浜的铁路。——译注

像同文书院〔1〕学生的游记等书，若想收集，无论在哪儿的旧书店，价格都已很昂贵。于是，我就注意那些不太值钱的书。如我曾意外发现过冈村宁次〔2〕的一本很薄的小册子，里边记录的庐山地形非常准确。作者并非是中国研究者，对中国却是那么样关注。

新中国成立后的出版物，最早是买自大安书店。后来又与北京的日本文学研究者交换起书刊来。在东京买的书也真有重复的，自己便高兴地特意包成小包，寄给文学兴趣深厚、年龄相当的中国人。

批判胡风厉害的时候，自己去索要胡风的“意见书”。人家在材料封面特意用红笔写了“胡风的反动意见”的字样寄了来。而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三本《中国现代文学参考资料》虽不能说在日本完全看不到，但在我手边确实帮了大忙。《燕山夜话》也是在开始被批判就注意到了，出版社早早就寄了来。

这种对我非常有用的类似于“通信教育”方式的交换，已经停止了三年（理由从略），信件也断绝了。每当偶然打开书架上的书刊，看到北京朋友的签名，自己的心便会立刻变得暖洋洋的。

程麻译自《北海道新闻》，1967年4月3日

〔1〕同文书院，1900年由日本东亚同文会在中国南京创建，次年改称东亚同文书院。1902年在东京也成立了同名的机构。——译注

〔2〕冈村宁次（1884—1966）日本军人。1937年日本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曾任日本国驻北京、上海武官。1941年任北支那方面军司令。1944年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长期指挥侵略中国的战争。——译注

《毛泽东的生涯》前言

毛泽东 是一位兼有政治家、思想家、军事指挥家、文学家和教育家等多种身分的、伟大的人物。要想理解他，无疑也应该综合把握以上各个侧面才行。而在这本书里，虽然也触及到了他的不同方面，可主要还是就其本人，即毛泽东如何走过他的人生道路，进行尽可能具体的追溯。

我记得，自己是在日本战败后的 1947 年 从自中国的东北（过去叫“满洲”）回到国内的母亲嘴里 最初听“毛泽东”这个名字的。

我出生于中国的山东省。少年时代的后半段时间，曾在战前被称为“满洲”的中国东北生活过。所以，这一次是与母亲分别多年之后的再会。忘了是在谈起什么话题的时候，母亲压低了声音讲道：“中国人说 以后是毛泽东的天下了。”她像在中国夸耀一个人那样，边握着拳头伸出大拇指，边说着。

长期生活在中国的母亲，所懂得的中国话，也并不怎么标准。与她会话的人 只限于卖菜的、卖面包的、修鞋的、在市内赶马车的、附近饺子馆里的人之类，都不是什么大人物或有教养的人。

母亲大概是听了他们中间的人的话，才那样猜测，而且还不

只是某一个人。

在中国的长期生活里，母亲亲身懂得了认识中国的方法。那是指，在仿佛反映着中国民意的传言中，隐含着聪颖的智慧。我自己也很受这种影响。

母亲和我都相信，既然普通民众都那么讲，尽管里面难免有夸大其词的成分，但大体上不会错。

过了两年，在中国诞生了新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说得直白些，也就是那里真成了毛泽东的天下。

我禁不住想到：果然不出所料。

从此以后，我也多次有机会教中国语、写介绍或研究中国文学与中国的文章。

回过头来看，在我的那些文章里，关于毛的内容，曾经占了不少的比重。不过，有时我也会不无愧疚地扪心自问：我到底是怎样认识毛泽东的呢？果真像能使母亲做出正确预测的中国普通民众那样去理解他么？

当然不好说，中国确是毛泽东的中国。可要不是听到一般民众对毛泽东的评价，自己恐怕就不会对他那样关注。

孔子曾说过：事看两面。如果没有普通的中国民众做基础，毛泽东现在不会被全世界所知道；而没有毛泽东，中国民众也不可能今天这样的生活。

我并不想在这本书里，写尽毛泽东的一切，而且所写的也未必全都正确。但我要把这本小书，作为自己对毛泽东理解的基础。我想在这有限的纸页里，融进自己对中国，以及对中国人民的无限感受。

如果读者能够通过这本书，对中国、对中国历史与风土人情，产生更深厚的兴趣，那将是作者最高兴的事。

著者注

本书中提到的毛泽东诗词，引用了旧作《毛泽东：其诗与人生》（与武田泰淳合著 文艺春秋社出版）中的译文。

一九七二年六月五日竹内实

程麻译自《毛泽东的生涯——调动八亿人民的魅力的源泉》 光文社，1972年6月25日

新中国之旅归来

新中国结束了一个历史时代。现在由于交通工具的发达，似乎人们已经有了不再依靠革命，也能从以往的历史时代，飞身跨越到一个全新社会的自由。在一定意义上，这当然称得上是一种幸福；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这种幸福，也可能意味着是一种不幸。

我这里指的是，在通过旅行的方法跨越历史的进程，把自己带进全新的环境时，如果不论多么热心记录、拍照或是回忆，也都难以获得明确理解的话，那便会觉得，变革观念和积累全新的知识，实在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比如，一个从新中国归来的旅行者，要是在途经香港的晚上，其右手曾经搂过舞女的后背，那他也许会感受到温暖的刺激。然而，在他的头脑里，难道不会浮现出去访问上海妇女劳动教养院时得到的印象吗？他不会联想不到，当香港解放时，那舞女也必须到某个教养院去接受劳动改造。这样一来，其感性和理性之间的距离，决不会像他的右手与头脑那样，只有 40 厘米左右罢。

他右手的温暖感觉，是那种正在崩溃中的社会精神生成的，因为他在与对方的关系中泯灭了人性。当时他本在香港，却错

误地觉得是在日本。他那足以区别什么是人性与非人性的头脑，并没能支撑起其真正的人生。

铲除旧社会污辱妇女的制度 树立新社会重新做人的精神

一进上海的妇女劳动教养院，便看到墙上写着有以上字样，足有一个人高、白地黑字的大标语。成为新（再一次做）人——尽管这口号并非是林肯〔1〕或毛泽东等伟人的格言或座右铭，但在设有这种标语的地方，像这样的机构，不正反映出了新时代的新之所在么？

在教养院中间的院子里，有一块黑板报。上边写着某人的转变。其名字里有一个“菊”字。这美丽得如同花一样的名字，现在已是其命运的象征。目前这个并非标示出号码〔2〕而是写着真实姓名的女人，作为真正的人，她是过去与未来的中介。据说这位叫作“菊”的妓女，也并非立即就振作起来的。她曾经反抗和自暴自弃过，对新社会有怀疑，并不信任。由于怀疑，后来还很颓废。但终于被队长和被收容的其他人说服了。这个教养院，共分为两个队。队长属于管理方面的人员。他们的说服工作很耐心，逐渐让那些女性参加劳动。她们最后终于改变了。

.....

劳动真正使人变成了人。说到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和殖

〔1〕林肯（1809—1865）美国第16任总统。生于肯塔基州。后任众议院议员，加入共和党。曾反对与力主废除奴隶制度。——译注

〔2〕以前卖身的妓女，大都不称呼其真姓名，而用号码或假名来代替。——译注

民地、半殖民地社会 曾经使工人变成为非人。可现在 劳动则是恢复人性的根本。从非人状态到变成人 其变化之快 就像是由水变成为冰，或者是由冰变成水那样迅速。对于这一变化的过程 黑板报上只写着是“依靠说服”。也许在这个说服的机构里 再详细的解释本是多余的。不过作为临时参观人来说 对其中的详情 总还是不怎么明白。

例如 在北京的一所监狱里 也有同样的情况。若看北京的监狱，可能有人会觉得，能够住进去也挺好。但那样想显然不行，因为监狱毕竟是监狱。虽然其中没有丰多摩拘留所^{〔1〕}里那种随时可见的铁栅栏，但看那些染袜子和操纵编织机的人的样子，还是与普通工人不太一样。在监狱的角落里，有一个商店，出售毛巾和香皂。当用奖金在这里买东西时，不知犯人们有什么样的感想。据说 刑满之后如果想继续留在那里工作的话 还可以加入工会。不难明白 关于政治权利的这种处理方法 无疑是从人性的角度来考虑的。

在监狱的走廊里 有所谓的“批评（批判）专栏”。上面写着一个男人的名字，说他因为不遵守劳动纪律，没洗手就去染袜子，出了二十双废品……。

琢磨一下这些也许可以说明，在作为国家权力机构之一的监狱里所具有的自由。这种自由的幅度，可以从前面提到的批评中看得出来。正是靠这样的“批评”即前面提到说的“说服”，才能使犯人们重新做人。

为了理解以上这些做法所遵循的原则，需要对现实的正确认识。而所谓对现实的正确认识，如果不排除自己已往旧有的感受习惯，又如何能够形成呢？仅仅靠着觉得监狱不错这种

〔1〕 丰多摩拘留所，是东京的一处监狱。——译注

浮浅的感觉，并不可能深挖到其现象背后的意义。尽管我们作为缺乏变革意识的旅行者，可能已经去过那个充满着变革观念的国家。

丁玲有篇小说叫《夜》。它创作于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年之前。我现在读起它来 对其中那种已往旧有的感受 觉得相当惊异。

.....这些过去的印象带着一些甜蜜、辛酸和兴奋来抚慰他。他实在被很多艰难的政治问题弄得很辛苦.....他对于这孤独的夜行，虽不能说养成为一种爱好，但实在并不讨厌。

通过罗列这些描写旧有感受的词汇，确实能以作者的心情，反映出现实中的深刻矛盾。依靠这种写法，这篇作品凭着其沉重的压抑感 使已经阅读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我们很是注目。不过丁玲这样写，很难说是基于对解放区现实的正确理解。丁玲是把旧社会的感受，带入到了全新的环境中。

在现今非常政治化的时代里 即使不依靠革命 也可以使自己的社会环境发生新的变革。但以往旧有的感受习惯，理解政治时一般不会考虑到革命。他们在头脑里只是觉得对政治反感。例如 看商品广告 就可能引起人们依恋旧环境的心理。我们从广州去了北京、沈阳 到天津开始看见广告时 觉得很是亲切。说起来有点可笑 其实我们在天津所看到的 是水泥和化学肥料的广告。从现在开始，即使自己再活 50 年 恐怕也不会掏腰包去买水泥的。但自己竟会对那样的广告感到亲切，实在是让人有点莫名其妙。回想一下，以往当在快要塌了的车站的墙上 看见饭店的招牌时 不也是容易引得肚子咕咕叫么！

无论是在广州 还是在途中的车站上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最应该树立广告牌的地方，却都是富于政治感染力的海报、宣传画、黑板报 以及墙报。其中有的内容 是宣传五年计划或国庆节的意义 还有则是关于某个城市、某个工厂 或是对某个车站及其附近存在的问题的报道和批评之类……。虽然有人因为在北京只能看到《人民日报》 于是便认为中国即使有所谓新闻报道 也只是习惯于官方的语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那里的新闻报道 实际上是按照《人民日报》→地方报纸 如《北京日报》、《解放日报》→墙报 包括集会、讨论会 这样的顺序 层层进行的。但在日本，像那种关于穿着夏天衣服的艺人被摔倒在街上的无聊报道《朝日新闻》，1956年1月5日）却会传遍全国。

由此可见 所谓宣传 也就是政治 并都是为了实现政治教育的目的。说到这一点 在沈阳看到的波兰“高乐”歌舞团的海报 与其让人想象到歌舞团的美丽歌舞 无宁更使人感受到其中的政治意味。因为提到波兰，便不能不联想到目前中国的国际环境 其也是国内政治的反映，而相反 日本倒像是在遥远的彼岸。

令人有点怪怪的是，东京的电影海报，就像是看电影本身。如《海底两万里》的海报，觉得很能代表那部电影。尽管当看到那些连篇累牍并列着的电影海报时，心里也会有是在宣传某个外国的感觉，但它毕竟能吸引我想去看那部电影。心里总在琢磨 究竟是去看 还是不看 可在香港看到美国的电影海报 似乎只有薄薄的一张纸，并感受不到那里面的电影到底是什么内容。

其给人的感觉是 那海报的纸 上面并不是女演员的脸 而是画的面具。

香港虽然与中国的土地相连，可还是英国的殖民地。那里

中国人的国籍 据说既非中华人民共和国 也不是大英帝国。香港岛那些美丽的别墅，都是百年来殖民地经营的结果。从国际环境上说 香港确实可以标榜是“自由”的。然而当这么想的时候 也会觉得那些海报似乎并不怎么真实。实际上 在形成这种感觉之前，我们在香港这个处处残留着旧中国痕迹的大都市里，已经觉察出了它的虚幻感。身穿着据说是今年很流行、高高的领子、开气直到大腿的旗袍的女性，走在大街上。她们的化妆，已经很美国式了。美不美且不说，给人的感觉像是无根的浮草似的。路边有卖香蕉的露天店铺。商店的入口处，也有卖刺绣品的老太太。整个城市五光十色 喧嚣嘈杂 令人眼花缭乱。处在这样的环境里 那些在新中国的见闻 便显得如同清水那样透彻。那些见闻对自己来说 其实决不再只是所谓的见闻 它们对自己的感性与理性的影响 已经到了使自己身在香港时 竟产生了想毫不犹豫地离开当地的念头。

另外我觉得 新中国的艺术 也只有在新中国那样的气氛或感觉里 才能够创作得出来。在北京观看歌剧《草原之歌》时 我们《抓奴隶》和《快船》的作者〔1〕，多次担心我们是否能够听得惯。在香港 当觉得那里给人的感觉有些像是“海报”时 我开始理解了 像安部公房那样的创作手法 对香港来说并不合适 却非常适用于日本的真实生活。

我这样想 当然只是就其基调或方向而言 并非说他的创作方法，对于现今日本的现实完全没有问题。处在社会现实之中，要能够获得理解现实本质的正确认识 当然有如何感受现实 即

〔1〕 指安部公房（1924— ），日本作家。在中国沈阳长大，1949年回到北海道。1948年大学毕业 并弃医从文。其作品带有现代主义与前卫的风格。著有《饥饿同盟》、《沙漠之女》等。——译注

所谓感性方面的问题。不过，那显然与人的政治态度也有关系。

如果说到人们之间的非人性关系，显然不应该产生如前面所说的右手温暖的那种感受，而应该感受到强烈的痛苦才对。只有抑制那种温暖的感受，才有可能使健康的理性生发起来。

程麻译自《北斗》，2卷2号，1956年3月10日

日中友好运动的新阶段 ——中国之旅归来

编者按 作者已访问过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三次。第一次在 1953 年奉还中国人殉难者遗骨时，第二次是随日本六大城市代表团访华。

作者依其感受，在对日本至今的日中友好运动提出批评的同时，也大胆表明了自己的意见。我们认为，不管这些意见正确与否，毕竟都与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有关，另外也涉及到日本人今后的方向等重大问题，因此，希望听到各界读者的反应。

今年十月，我作为以风见章〔1〕为团长的日中恢复邦交国民会议访华团的成员之一，访问了中国。在此，我想写出在中国各地访问一个多月的印象。目前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可以不断提供丰富的话题。而我这次，主要想谈一点与日中关系有关的问题。当然，这些看法无非只是作为一个旅行者的印象，这是应该

〔1〕 风见章（1886—1961），日本政治家。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学系。曾任《朝日新闻》记者。1930 年当选为议员。战后任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首任会长。曾任日中友好协会顾问。——译注

首先声明的。

中国人民的友情没有变

首先是进入深圳时的印象——受到了热情洋溢的欢迎。我已听说了花柳德兵卫代表团〔1〕关于中国态度“严峻”以及台湾的局势一触即发〔2〕的传言。因此，当时曾想到会有一些冷漠的表情在等待着我们。猜测由于军事的原因，也许拍照会受到限制，尽管也带去了八厘米摄影机。可实际上，进入国境后的印象，与三年前访问中国时的情形，并没有什么变化。到深圳来欢迎的 K 先生、Y 先生 都是老朋友 喜笑颜开的非常亲切。

这可能确如《日本周报》〔3〕所说的那样 是因为这个代表团乃由“对日中问题而言最重要的成员”组成。不过谁都能够看得出来，事情也并非全是为此。这其实意味着，“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友好没有变”。

终于到了国庆节那天，我出于担心，曾向 K 先生询问是否可以摄影。他不仅回答说“可以”还很自然地跟问了一句：“不是朋友么？”我听了这句话，真的非常高兴。后来去北京郊外的石景山钢铁厂时，那里的厂长没有谈日本占领时的情况。而外交学会的 S 先生却告诉我，眼下还没有达到日本占领时的产量。又对我说：“毕竟是厂长 对你们还有点顾虑。”

到重庆去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事。周恩来总理曾在当地

〔1〕 花柳德兵卫是日本民间舞蹈花柳派传人之一。——译注

〔2〕 当时中国政府因美国干涉台湾问题，决定人民解放军炮击大、小金门等岛屿。——译注

〔3〕 《日本周报》是中国外文出版社发行的日语刊物。——译注

住过的楼房的一角，被日本军队炸坏了。而现在那里成了革命纪念馆，上面有木牌写着那属于重要场所。其中还注明：“日寇轰炸遗迹”。当我们去的时候，据说讲解的人有些担心，曾对由外交学会派去陪同参观的 C 先生讲：“他们听了心情有点不太好吧？”

我对讲这话的人的细心体谅很是感动，觉得真应该表示感谢才对。并非专门从事中日友好工作、地方上的普通中国人就是这样接待我们的。

还有战争的伤痕

那么，是否就天下太平，都在沿着和平友好之路前进呢？我这一次在北京听到过这样的话：一位早就在民间外交方面很活跃的 K 女士在北京说，要是忘了过去就好了。而陈叔通^{〔1〕}先生却站起来说道：

不，我们并没有忘记过去。日本友人在为和平而努力，而我们也在尽量忘记那段历史。

我认为，这些话是值得记取的。大多数中国人表达想法比较简洁。前几年，王芸生^{〔2〕}先生来日本时，也与日本的中国研

〔1〕 陈叔通（1876—1966），中国实业家。浙江省杭州市人。曾任上海浙江兴业银行董事。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译注

〔2〕 王芸生（1901—1980）中国记者、日本问题研究家。1928至1942年任上海大公报社总编辑。新中国成立后任天津大公报社社长。1960年任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1973年任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著有《中日关系60年史》。——译注

究者见过面。那时他曾说，往事如流水。而安藤彦太郎〔1〕则站起来回答道：不，我们日本人并没有忘记。我觉得，这表明日本人对这一问问题，还有不同的看法。

每当开报告会时，必有人提问：中国人对日本的感情究竟怎么样。我认为，对这类问题应该像上面那样来回答：即不要忘了过去。因为在我看来，对我们日本人来说，“战争”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我经常想到，我们日本人还没有摆脱战争的责任。我们与作为战争真正受害者的中国人之间，尚未缔结媾和条约。

当去郑州时，那里政治协商会议的副秘书长 S 为我们做向导到人民公社进行现场参观，并做了很多讲解。通过与其交谈，我知道他出身于冀中抗日游击队。有一次，他曾经和五位同伴被日本军队俘虏过。那五个人全被杀害了。当时他有一个三岁的孩子，患了病，因为缺医少药，最后也死了。当从汽车窗户外远远看到像是放学的学生们时，他口中嘟囔道：要是孩子活到现在，也该是高中生了。

正如俗话说：“不忘死儿之龄”〔2〕。我能够设身处地感受到中国人此时的悲伤。如果他的孩子能够活到现在，他们恐怕也会看到人民公社，作为肩负着新中国使命的下一代，健康生活着。

我清楚地知道，作为人的共同感情，中国人与日本人同样都有反对战争的心理。深刻的战争伤痕，现在仍残存在人们的心底。中国人从这种战争体验中，吸取了正确的教训，建立了否定

〔1〕安藤彦太郎（1917-）早稻田大学经济学部毕业。曾任早稻田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日中友好运动活动家。著有《现代中国》、《日中关系的视角》和《日本人的中国观》等。——译注

〔2〕日本谚语，类似于中国人说“白发人送黑发人”之意。——译注

战争的社会主义体制 并使之不断健全。那么 我们日本人应该怎么办呢 现在 日本人的精神问题 以及谁都看得清楚的政治问题，无不令人沮丧。当时的战犯竟当上了首相，这是体制使然。其实 日本人也是爱好和平的 人人都在心里诅咒战争。然而作为一种体制，实际上不可否认地又在重蹈战争的复辙。如在眼下 日本的军事基地 便被用来以武力干涉台湾海峡。

在日中恢复邦交国民会议和中国外交学会的共同声明中，有这样一节话：

日中两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两国人民团结的基础。

这段话在日本方面起草的原稿里，语气本来是很有“锋芒”的，而中国方面将其改得缓和了些。他们说：“我们也许右倾了。可是反过来想想 这‘团结的基础’是必须有最基本的限度的。作为日中友好运动的基础，必须立足于此。

“积累方法”究竟如何？

在这方面，我认为有许多日本人的疑虑和担心，是不必要的。

例如 我觉得至今有人在担忧 民间外交的‘积累方法’^{〔1〕}已遭到否定，或是会被否定。记得在九月份的本刊^{〔2〕}上 岩村

〔1〕 这是在中日邦交恢复以前，中国政府对中日民间外交活动所提的方针。其意思是通过民间外交活动来逐渐促进两国正式恢复外交关系。——译注

〔2〕 即第 377 号《亚洲经济旬报》。——译注

三千夫先生曾写道：“在日中恢复邦交国民会议的部分人中，有所谓将恢复邦交作为首要问题的意见，这是错误的。”由于我同样有这样的疑虑和担忧，所以对这段话的印象特别深。现在我愿根据这一个多月旅行的见闻，谈谈这个问题。即，如果把目前的日中问题极端公式化，将“积累方法”论与“首先恢复邦交”论截然对立地看待，无疑会出现上边所说的担忧。不过，在我看来，这显然是不必要的。因为如此机械和公式化的认识，不能抓住目前的要害。实际上我们感到，即使是在以往中国所说的“积累方法”阶段与“首先恢复邦交”有关的努力一样，也都给人以很深的印象。因此，现在或是以后，我们同样应该采取具体的措施，像中国一样，在努力“首先恢复邦交”的基础上，来实行“积累方法”的政策。

当然，在日本，对日中关系问题，特别是在日中友好运动和日中贸易运动里，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我觉得，在评价与分析诸多问题的时候，我们与其痛快地批评那种不适于“积累方法”的意见，还不如力求错误的分析少一些为好。这次访问北京的日本各团体，都分别同中国的有关方面发表了共同声明。日中恢复邦交国民会议与中国外交学会一对一，日中友好协会也同红十字会、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等几个中国方面团体相对应，但并没有谈促进贸易的问题。这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这固然算是一种缺失，但也象征着与此前日中友好运动有别的新格局。建立日本和中国的友好关系，并促使日中外交正常化，这个根本目标仍然是很渺茫的。但“积累方法”也滋生出了一个弊端，即只限于起到某种“窗口”的作用。我认为，要纠正这一弊端，也许应该进行必要的反思。因为这种“窗口”主义（即类似于争夺专卖特权），似乎使与日中友好运动有关的政党、团体里那些访问中国的人，产生了一种“特权意识”。我觉得，当前日中民间交流

中反映出来的停顿或有所停顿的困境，除了源自缺乏政治远见和主见以外，也是因为思想上有这种‘窗口’主义和‘特权意识’。不必说今年访问中国的团体的全部费用，即使是服装费，代表团中人所缴付的也只是实际上的一半。此外，自然还有通讯费、事务费和杂费，也都是超支的。幸好尚未出现因视访问中国为“‘特权’而反对缴纳这些费用反向‘窗口’团体伸手的行为。但是我担心，如果‘窗口’意识渗透到每一个访问者中去，大约也会出现那样的事情。

正是这样的小问题，使我们削弱了“积累方法”的效果。小问题多了，也会造成困境。如果只靠个别人一点点地解决它们，那也许将会变成必须从根本上加以解决的大问题。那样的话，整个运动的方向就会发生偏差。所以，必须改正这些问题才是。

“反省”的意义

我认为，现在我们应该充分反省战后日本的日中友好和日中贸易活动。如果不在从事这些活动的团体部内进行充分的讨论，即深刻的反省，仅仅是被动地应付今后的局面，那恐怕难免会再次受到挫折。

读《日本与中国》（日中友协机关杂志）看到其中谢南光^{〔1〕}先生有段话说得很肯切，也很清楚：

〔1〕 谢南光（1902 - 1969）本名谢春木，台湾省彰化县人。台北师范学校毕业后，去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留学。1925年开始从事抗日活动。1929年到中国大陆。1937年在广东发起台湾民族总同盟。1945年台湾解放后，曾去台湾，后到日本。1952年回到中国大陆，从事对台宣传。曾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中日友好协会常务理事。著有《台湾人这样看》、《台湾人的要求》等。——译注

现阶段在日本的民间出现混乱，大概是没有看到真正的敌人。（大意）

在目前敌人很清楚的情况下，我们能像猎犬看见逃跑的兔子那样光是盲目地追赶吗？追赶当然是应该的，但也必须很好地检讨和批判自己：为什么有的人竟没有能够看清楚“兔子”？对运动的组织者来说，这样做很有必要，也是起码的政治原则。

其实这样的反省已见端倪，并且在日见清晰。我在去中国前才知道风见章、细川嘉六、伊藤武雄、中岛健藏四位共同写了一份《呼吁反省》。在这份《呼吁》中，尽管没有明说反省以后该怎么做，但我对其中所说的参与活动的人对日本的战争责任，在“战后”也负有政治和道德方面的责任的看法很有共鸣。这种责任与曾是军国主义者以及目前的统治者所负的责任本质上并不相同。这意味着，一直觉得活动领导者对战争并“无责任”的日中友好运动从此也许可以走上新的路子。

在北京会谈时，赵安博先生曾这样说：

应该高度评价以风见先生为首的四位发表的《呼吁》。其中关于必须从政治和道德上加以反省的话，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岸和东条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是帝国主义的责任，和日本人民没有关系。但是，日本的国民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对日本今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这种认识表明，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各位有这样的认识，那与我们的看法完全一致。我们之间就是好朋友。要是认识不到这一点，虽然来往也会比以前多起来，但那种进步都是表面而并非本质的。就此而言，要向风见先生及各位先生表示敬意。

这是我速记的中国译员 Y 先生翻译的会谈中的一段话，也许不十分准确，但主要观点是这样。

回到日本后，我在今年禁止原子弹大会上，听到过一次关于“历史学研究”的报告。当我在分组会上谈到日中问题，批评以前去中国访问的人回国后，并没有都进行很好的报告时，会场上响起了掌声。我所说的报告，自然不该理解为只是讲中国有些什么，或怎么样了之类。这种掌声，代表着比访问了中国以及参与日中友好运动的人，具有更宽广视野的人民大众的批判态度。

为了回答这种掌声，我们在今后不应该进行更认真的思考吗？

程麻译自《亚洲经济旬报》第 380 号，1958 年 12 月 10 日

我与毛泽东

我见过一次毛泽东〔1〕而且握了手。握手时，他的手实在太柔软了，我的内心很是一惊。因为革命家的手持枪握镐，想必是粗糙的。而我却觉得他的手很软和，像是被他的手掌包住了似的。有一种叫棉花糖的糖果，很软很轻，放在嘴里一块不用嚼就化了。我握着毛泽东的手时，就正好有这种糖果的柔软感。

也许是自己握手时太用力的缘故，当时他却并没有把我的手握住。或者他并没有正经握手，而只是表示一个握手的姿态而已。

拍完纪念照片后，他向另一房间走去。我紧随其后，看着他的脊背，感到其肩部象虎背似地高高隆起。

经常有描绘出没于竹丛里的老虎的画。虎从半山腰的竹丛里走出来，脊背部较前足要高。画家借以画出了虎的全身。就是说，那肩部很突出，前大腿的骨头紧顶着脊背。

毛泽东是肥胖型身体，不象消瘦的人那样瘦骨嶙峋。但是，从后面看他的脊背，觉得他那隆起的肩部，确实象是虎视眈眈的。

〔1〕 竹内实曾随日本文学家代表团，于1960年6月访问中国，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译注

老虎的脊背那样。现在回想起来，他的脊背实在很宽。

到了另一个房间之后，我们隔着桌子坐下来。桌子上放着叠起来的毛巾。当然 我和其他人没有使用。此外 还有带盖的茶杯。在日本，茶杯是放在茶托上的。而那里好象没有茶托，茶杯就直接放在桌子上。桌上铺了绿色的绒布。

入座后 他对我们的团长说了一、两句无关紧要的话 就开始谈话。

他的话几乎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因为有翻译在内，我想实际上是讲了三、四十分钟。我几乎全部笔录了下来，不过记录的是翻译后的日语。

能够见到毛泽东 听他讲话 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很想听他讲的汉语，然而，毛泽东对坐在他身边的翻译耳语般地讲话 声音很低 根本听不见。我并没能听清他说话的声音 觉得很遗憾。

只是有一处 我听出了他的声音。

“Maiguo”。

我明白了 这是说“美国”。

而用北京话说，应该是：

“Meiguo”。

他的湖南乡音没有改，一直是用湖南口音讲话。说话时口型变化也不大。恐怕湖南省的方言不是飞快、爆豆般的说话方式 而是相反。

我看过新中国成立大典的电影。毛泽东站在麦克风前，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那声音很是高昂。

我们几个人隔着桌子，面对毛泽东并排坐着。他没有同我们一一说话 只是边注视着他与我们之间的空间 边讲着话。

谈话的内容是中国近代简史，同时也回顾自己的经历。他

一边追忆过去，一边娓娓道来。这样的说话方式把视线放盯住眼前的空间是很自然的。我想，伟大人物的目光，一般不注视下面的百姓，恐怕自己也不太愿意让别人看见自己的面孔。但是我还是热心地盯着他的表情。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有点失礼了，觉得非常惭愧。

正如同想亲耳聆听他的讲话一样，我也很想把他的表情深刻印在脑海里。

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句话，是说他本来想做一名小学教师，不是想成为革命家，而是不得已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当时日本关于他的研究尚未真正进行，我只知道他毕业于长沙师范学校。因此这句话记得特别清楚。

上面说过，他和我握手的那只手（手掌）柔软得令人吃惊。而刚进入房子的大门，立即就能看到站在大厅里的毛泽东的身影，那简直就像一座山似地耸立在那里。因为是在夜里，由于从天花板上照明的关系，他就好象置身于剧场舞台的中央。用汉语的“巍然屹立”来形容，是再确切不过了。

立刻，我就注意到他浑身上下充满了沉静的氛围。那种沉静的氛围很感染人，好象人被吸进去了似的。据说宇宙有“黑洞”，而毛泽东具有的沉静的氛围，就像黑洞一样——巨大的、深不可测的空洞。

我觉得可能在刚刚不久之前，他还坐在那所房子深处的某间书房里，沉浸于读书之中。我从自己的印象中得出的结论是：毛泽东“与其说是革命家，勿宁说更是一个读书人”。

一直到后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时，毛泽东在书房会见他的照片公开发表了。书房里成排地摆放着书架，堆放着书籍。看到这张照片时，我再次确信我以上的印象没有错。

我与毛泽东会见是在 1960 年。四年以后，《毛主席诗词》出

版了。北京的朋友寄给我一本。偶然间，拿给出版社的朋友一看，他们建议我翻译出来。而且已得知，拜托了武田泰淳〔1〕先生与我合译。

恰巧武田先生要去北京，我委托他购买当时出版的革命回忆录《星火燎原》。他给我买了一套。我在翻译诗词原文时译文力求一听即懂。为了了解毛泽东吟诗填词时置身于怎样的环境，我只能依靠读革命回忆录来汲取资料。于是我也被毛泽东的诗词引导着，开始追溯起中国革命史来了。同时还参考了军事博物馆发行的红军长征地图。

我们执笔是在 1964 年夏天。那时，对毛泽东的政治见解，在日本有各种各样的观点。而我，决定主要理解作为文学家的毛泽东，不加政治性的评论。

当时，日本还没有关于详细记述中国革命艰难困苦的历程的书籍，也没有帮助理解毛泽东创作的诗词所必要的注释。1965 年 5 月，这本著作终于出版了。出版社一登出广告，尽管书还没有发行，书店里的预定单早就到了。出版时，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刊载了书评。我对日语译文倾注了心血，努力传达出其文学的味道，而不加自己的评论，诗句的注释也尽量详细。我想，这可以使读者引发自己的感受，直接进入毛泽东的诗词世界。

许多日本读者，由此知晓毛泽东是一位具有深厚文学修养的人物。直到现在，还能见到谈论当时被此书感动的读者。我在写那本书《毛泽东——其诗与生涯》时，颇感他作为中国的

〔1〕 武田泰淳(1912-1976) 日本作家。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科肄业。著有《司马迁——史记的世界》、《毛泽东 其诗与人生》(与竹内实合著)、《武田泰淳中国小说集》等。——译注

语文教师，是确有非凡才能的。如果不选择革命道路的话，毛泽东作为某所大学的教授，会留下业绩。而且，说不定我还会听到他讲的课呢！

现在想来，他在师范学校学习了五年，具有丰富的中国文学、历史方面的知识 这并不怎么奇怪。

在那本书出版的第二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对我来说，给自己带来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不管怎么说，我的那本关于文学家毛泽东的著作能于 1965 年出版，是我的幸运。对于 1960 年在百忙中挤出时间，为我（当然还有别的日本人）谈论革命及其经历的人——毛泽东 如果能在这里表达自己的谢意 那对我来说，无疑意味着一种难得的安慰。

卢洁译，《我与毛泽东的交往》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 月

在中国的感受

尽管这已是我第四次到中国去，可每去一次，都觉得很新鲜。这其中的感受，有的是别人已有的，有的则还没有。毕竟我已去了四次，便从我已有感受的事情开始谈起。

说起中国来，我认为还是非常稳定的。至于说到国家建设得怎么样，当然是社会主义正在不断发展，给人以很安定的感觉。在与领导人见面时，我觉得作为领导人的他们，相当自信。我已从《西行漫记》〔1〕中知道，应该从中国的大众那里去，了解他们的领导者。然而，从另一方面说，作为承担着国家责任的指导者，他们的自尊心与大众，还是有所不同。比如到人民公社去，1958年我所见到的，主要是意气风发的情绪。而这次再去，通过日常生活对人民公社的了解，印象也有不少。下面，谈谈其中一些非常难忘的事情。

其中印象最深的，除了最后在广州举行告别宴会的时候，便是在我们去石景山中苏人民友好公社时，听到那里的干部反复述说，中国人民是日本人民最可信赖的朋友的话。说这话的是一位副主任，33岁。在那里的人民公社，不称社长、副社长，而

〔1〕 美国作家爱德迦·斯诺的著作，原名为《红星照耀着中国》。——译注

叫主任、副主任。“战友”这是我们到达北京时，在当天的报纸上就已看到，后来在中国的一个月里，也常听到的褒意词汇。我觉得，它表明了对于我们，也是对在日本参加反对安保条约〔1〕斗争的全体人们的高度友善和信赖。那副主任真年轻。在站起来致辞时，他背后的毛泽东肖像，在其头顶上熠熠闪光。那青春的目光炯炯有神，头上的毛泽东肖像和蔼地看着他。我仿佛觉得，这像是大毛泽东和小毛泽东，共同在与我们谈话。

有些话已经记不太清，但正如刚才野间〔2〕先生所说，在与陈毅先生见面时，印象最深的是他曾说：“我们通过这次斗争，重新认识了日本人民。”这是让人非常高兴的话。当时我有点担心，野间先生听了这话，也许会兴奋得站起来，然而他却谈吐朗朗，以像方才那样很亲切的语调，做了回答。我们觉得声音挺和蔼，又挺响亮，很是沉稳，不愧为团长。〔笑〕不过，野间先生很能讲话，在北京开报告会的时候，他一页一页地翻稿子，有的人急得直叹气。大江〔3〕先生曾经说，将来日本人民共和国成立，要是野间先生当主席，在百万人的大会上做报告，那可能会有40万人中暑的。〔笑〕中国人听了这话，并没有否定。〔笑〕由此我觉得，可以说日中两国之间，完全没有成见。

〔1〕即《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是1951年9月8日在旧金山签订的日美军事同盟条约。条约以维护日本的“安全”为由，规定美国有权在日本驻扎军队和建立军事基地。1960年1月，日美两国修改了该条约，重新签订《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其主要内容为“发展日本抵抗武装进攻的能力”“在应付共同危险时，日本负有保护驻日美军的义务，美国继续有权在日本驻军和使用军事基地”“鼓励两国经济合作”等。日本人民当时掀起了反对修改并重新签订这一条约的斗争。——译注

〔2〕本文为作者在访华归国报告会上的发言。野间宏是日本作家、作者所参加的日本文学代表团团长。——译注

〔3〕当时访华的日本文学代表团成员之一、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后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译注

在与陈毅先生会面时，野间先生谈了日本的政治运动。野间先生特别强调 对日本发动的战争所犯罪行的反省 正是这次斗争的动力。对此 陈毅先生则表示“逝者如斯夫”即已往的事像流水一样过去了。后来 龟井先生又谈到 我们是到可以称之为日本文学母国的国度来访问。龟井先生在讲反对安保斗争 尤其是受美国欺负时 谈了在日本的文化 以及在日本人的生活中，有哪些颓废的现象。我发现，这时中国人听得非常认真。松冈^{〔1〕}女士则讲了去见岸信介首相的事。她说在那里等了多半天 却只被允许见 3 分钟 由于她流了泪 才延长到 40 分钟。而在中国 不管说多长时间都可以 真应该表示感谢。

最后 说说中国方面认为 青年人应该怎么办的意见。这也是在与陈毅先生等会谈中，非常突出的话题。首先我们报歉说，自己还年轻 而野间先生、龟井先生和松冈女士像是将军 我们只是小卒。可陈毅先生讲 将军开始也是小卒 将来说不定就会成为将军的。我又说，自己有责任把方才提到的战争责任问题，在日本写出来 讲给青年人听。中国方面表示 忘了也好。只是我们不愿意再发生战争 想阻止负有战争责任者的接班人 来把握以后日本的政治 所以才不忘。谈到这里 陈毅先生非常高兴地说 我们讲忘了 而日本各位讲不忘 那就可以结束这个话题了。相反地 要是现在中国人讲不忘战争之恨 而日本人却讲忘了 那就是还有余恨 也许还会再发生战争。由此使我强烈感受到，关于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政治问题，当然必须从理论上搞清楚，但同时，也要从国际法及法律方面很好地解决。而在此之前 两国之间能否真正实现人们情感的坦诚交流 的确是一个大问题。

〔1〕 日本作家松冈洋子。——译注

在这之后 开高〔1〕君和大江君也都讲了话。当开高君引用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时候，陈毅先生脸上似乎露出了笑容。（笑 我觉得到北京去引用《资本论》实在是很大胆。他说 资本主义就是指不断地生产同一类产品，最后使自己陷入困境。岸信介便大体走到了这样的末路。而大江君的讲话，北京电台还多次播送过，《赤旗报》周日版也登载了。尽管我与编辑《赤旗报》没有什么关系 但也很想读一读。

此后，据说日本绘画展览开幕了，急忙把我们送到了上海。中国人并没有讲 为什么要我们到上海去。按我们的想象 猜测也许是与毛主席会面。还没太弄明白，我们就乘专机从北京向上海飞去。在空中，我们从飞机上望见了泰山、黄河和长江在 21 日晚上，日程突然改变，听说马上就要去见毛主席。途中我们一直乘着小汽车，基本上没有交通堵塞。大约走到一座建筑物门前 才看见站着 一个交通警察。在下车时 松冈女士说 毛主席就住在这里。才进大门，便见到毛主席在大厅中站着。在宣传画里 有毛主席视察中国山河的形象。而在我眼前 毛与那画里一模一样 堂堂地站在那里。在我的印象中 他旁边站着周恩来我觉得他的骨骼与我们不同，可以说像是猛虎，即老虎或者大象的样子 仿佛是由特殊的骨架构成的。接着就是合影 后来看了照片，野间先生显得比较高。我站在后面，同毛主席比较 要矮一些。现在想来 是毛主席先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之后野间先生虽矮 但坐在突出的位置上。而按摄影的道理 坐在前面的便显得大一些。后来 说马上到里屋去 便开始了会谈。我觉得那时 毛说话的声音很低。今天没有带详细记录 如果有错误 当以整理后发表的文章为准。我只记得他说 这次日本的斗

〔1〕 日本作家开高健。——译注

争非常好。特别是能搞 20 次统一行动的斗争 这在中国也没有过。日本人民发明了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方法，找到了群众游行 即以群众的集体行动 来表达自己意志的方法。我们也讲反对美帝国主义，可是并不想立刻拿着大炮到美国去打仗。日本人民这一次发明的方法非常好。出发之前，我在日本倾听与批判安保条约大会有关的人员会议时，曾听到有人对活动方式拿不准主意，对此印象很深刻。自然还会有各种不同的斗争方式，但毛泽东肯定了这样的方法。毛主席还说 听了各位的年龄 都很年轻啊 的确 当时在场的人 没有比毛更大的了。他讲 要在世界上有所创造 创造性的工作有四个条件。一是年轻，一是地位低，另一个是没有钱，再一个就是没有名，这样四个条件。野间先生接着说 大江、开高已经有了名 钱也有了一些 怕不够条件了。看毛的样子 似乎还是没有那些钱的好（笑）

后来 毛又像在《实践论》里讲的那样 从鸦片战争开始 就中国斗争的历史讲了好长时间。如同野间先生担心的那样，不知道这种历史的谈话该在哪里结束。毛说 就是这样 中国人民的觉悟逐渐在提高，每经过一次失败便提高一些。也不只是中国人民 作为领导这个革命的我们 觉悟也因此提高了。日本人民的觉悟，同样是在不断提高。例如，两年前也有日本代表团来 他们并非不谈美帝国主义 可是不特意说反对。而现在来的日本文学代表团 也讲反对美帝国主义。由此以见 日本人民的觉悟非常高。历史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前进的。用在中国常讲的话说 就是要一步一步的。听了毛泽东的话 我觉得他有一种目光远大、鸟瞰历史的感觉。这当然并非是说，他从参加革命时，便有这样的眼光。毛泽东主席开始是想在小学校当一个好教员 后来迫于形势而不得已参加了革命。周恩来这时接着说 我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会成为共产党员。比较他们俩人，毛泽东

主席更显得坚定、威严些。看得出来，周是非常尊敬毛的。二人虽都是中央委员，可身份毕竟不同，在礼仪方面分得很清楚，几乎总是毛在讲话。

后来，在谈到桦美智子的事〔1〕时，毛好几次提到她是“民族英雄”。最后，野间先生问，是否还想写新的哲学著作。毛回答，因为忙而没有时间，最好停止现在的革命，能专门去写论文。这时，我觉得他的眼神非常自信。毛的目光没盯着我们，既不是看我们的后面，也不是看高处，而是注视着他与之间，似乎有些威严。谈话的主题，围绕着“还是年轻人好”。不过他又说，归根结底，按自然规律我已经老了。说这话的时候，他稍微向旁边侧着脸，好象觉得有点寂寞，又像是下一代寄予很大期望的样子。

从这一次我开始知道，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的俄语说得很好，他已经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后来我们到军事博物馆去，在抗美援朝馆里，有一张照片拍的是“毛岸英之墓”。还有中国慰问团扫墓的照片。虽然没有说明，但可以看出就是扫那座墓。据翻译曾丽卿说，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曾把毛岸英托付给瞿秋白的未亡人杨之华扶养。她清楚地记得，大约在1953年，杨之华参加慰问团为毛岸英扫过墓。中国人讲事情不太喜欢轻描淡写，但她虽没说此事有多少根据，大约还是可信的。

这一类事，对我的触动实在不少。不过，在回国后的第二天，当我到都立大学的研究室〔2〕说到反对美帝国主义，却有人

〔1〕1961年在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斗争中，东京的大学生桦美智子被日本军警杀害。——译注

〔2〕当时作者在东京都立大学文学部任教。——译注

表示反对。^{〔1〕}而令人吃惊的是，持反对意见的人竟也参加了反美游行。我觉得 这可能是因为从目前日本的思想 或日本的感情角度说，我们以前并没有这样提过。中国人所谈的帝国主义，是充满了实在感受的词汇。其中大约有类似于我们在讲被战争毁灭时 提到的“战争灾害”一语中所含有的那种真实感受。我认为 所谓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如同狗改不了吃屎 帝国主义也改不了侵略本性”等等对帝国主义的看法，是很发人深思的。对现实生活中的帝国主义 以及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 也是值得我们再三加以思考的。正如毛泽东在谈到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时所说 自从 1945 年以后 中国已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变为反对美国帝国主义。这就意味着，两国人民之间有了共同的战线。这个意思 在陈毅先生“往事如流水”的话里 也讲得很清楚 它也是《矛盾论》思想的具体体现。这很值得参与日本政治斗争的人们参考。

我还听到每个中国人忘不了另一个讲法 那便是说 日本人民的斗争，是对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支持。这是一直陪着 我们 并安排各种活动的孙平化先生 在去苏州的汽车上跟我谈话时说的。他说，你们的斗争是对我们的斗争的支持。这很使我难忘。这就如同我们听到，南朝鲜的高中生和大学教师举行游行 感到很兴奋 觉得必须反对安保条约一样。现在 日本人民从南朝鲜人民“获得支持”的感受 又在中国人的话里表现了 出来。不管是去工厂 还是人民公社 每当我们谈到反对安保条约时 中国人总是谈相同的话题。我感到，通过这种新的日中交流，也会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代表团全体成员一致认为，

〔1〕 当时，有的日本人从政治的民主程序的角度来反对批准新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而未明确将斗争矛头指向美帝国主义。——译注

我们当然并非是为帮助中国社会主义，才发起反对安保条约的斗争的 然而结果恰恰就是如此。

在回国的途中 我一直在思考 陈毅先生所说‘重新认识了日本人民’的话 以及在中国农村和工厂的人们中 感受到的那种无限信赖的战友情谊 并非只是针对着日本人民 也是对所有日本人的。其实 在反对安保条约斗争中表现的日本人 中国人通过这一斗争所看到的日本人，不该获得高度评价么？当然是应该的。在中国人看来，以前实际的日本人，也许并非是这样。比如 侵华战争无疑是日本军阀发动的 不过 有的中国人觉得，毕竟日本人是到中国干了坏事。他们看到的就是普通的日本人。而中国人眼里的这种日本人形象，现在可以说开始改变了。从象征的意义上着眼 甚至可以讲 通过这场斗争 我们所欠的战争债务已经偿还了一半。再搞三次游行，差不多就全还完了。（笑 当然 通过这次斗争 我还没怎么感受到日本人该有的那种自豪感。回国后第二天到学校去，学生们都想听关于中国的话题，而我则想了解这一个月来日本的情况。我至今访问中国已有四次，还从没看到过谁用介绍日本的情况这种形式来欢迎我。谢谢各位。（鼓掌）

程麻译自《文学》第 28 卷 8 号，1960 年 8 月 10 日

《野间宏全集》第十三卷解说

本卷在“创造新文化”这一总题目之下 收录了野间宏〔1〕关于国内外旅行的报道和纪行。其中《访问中国的旅行》一文所写的那次 与我有一些关系 因此自己想再多说几句。

在 1960 年那次旅行〔2〕回来后不久 我写过一篇名为《与野间宏在中国旅行》的小文。关于那次去中国的旅行 收入本卷的文章里 还有几篇也写到了它。所以 自己那篇短文 很有点像是“屋上架屋”。不过 通过它也确实可以多了解一些当时“旅行”的气氛。

另外 我也想借此使自己反思一下 那次“旅行”的真实内情。那篇小文章本是为角川书店出版的《投机的天地》一书的附录《野间宏纪念册》而写 其中 另外还有盐浜文雄的《中学时代的野间宏君》、和田勉的《炽热的未来》 以及野间宏本人写的《触

〔1〕野间宏（1915—1991），日本作家。生于神户。1938年京都大学法文科毕业。1946年参加日本共产党 并加入新日本文学会。著有《投机的天地》、《青年之环》和《野间宏全集》等。——译注

〔2〕野间宏（1915—1991），日本作家。生于神户。1938年京都大学法文科毕业。1946年参加日本共产党 并加入新日本文学会。著有《投机的天地》、《青年之环》和《野间宏全集》等。——译注

及照片》等文。当时我写道：

停在首相官邸阴影中的日本教职员工会宣传车的喇叭声里，提到进入官邸的代表中有野间宏。宣传车后来又说了，从傍晚直等到深夜，野间宏等人也没能见到首相，只好退了出来。而在这两次广播之间的空隙里，我们坐在路边，议论着与政治无关的笑话，有时还在群众中发现了多年未见的朋友的面孔。^{〔1〕}

作为推举野间宏为与政府交涉的代表的群众之一，后来我在与他去中国旅行期间，一直跟着他那巨大的身躯转来转去。每当有机会，他就要把开高健^{〔2〕}和大江健三郎^{〔3〕}招呼到自己跟前。这时，我也常与他们在一起。不过，在正式场合要做的关于反对“安保条约”斗争^{〔4〕}的报告，得由担任主要工作的团长野间宏负责。他为完成这项任务，放弃了不少在各地参观的好机会。毕竟那篇报告稿花费了时间，写得很有吸引力。尽管未必句句都是如此，但

〔1〕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中，日本教职员工会曾推举作家野间宏为群众代表，与政府进行交涉。——译注

〔2〕开高健（1930—），日本作家。生于大阪。大阪市立大学法学系毕业。著有《裸体的国王》、《越南战争纪实》和《开高健全部作品》等。——译注

〔3〕大江健三郎（1935—），日本作家。生于爱媛县。1959 年东京大学法文科毕业。1994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著有《万延元年的足球》、《大江健三郎全部作品》等。——译注

〔4〕《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是 1951 年 9 月 8 日在旧金山签订的日美军事同盟条约。条约以维护日本的“安全”为由，规定美国有权在日本驻扎军队和建立军事基地。1960 年 1 月，日美两国修改了该条约，重新签订《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其主要内容为“发展日本‘抵抗武装进攻的能力’，在‘应付共同危险’时，日本负有保护驻日美军的义务；美国继续有权在日本驻军和使用军事基地；‘鼓励两国经济合作’等。日本人民当时掀起了反对修改并重新签订这一条约的斗争。——译注

作为通篇讲话，还是以其恢宏的气势征服了听众。

那是在广州的报告会上。我听着报告，与众多听众一样心情激昂。在我以为报告即将结束，想要松口气的时候，没想到野间宏突然说，今天是国际儿童节，让我讲个日本的民间故事。于是，便开始讲起了那个“咔嚓咔嚓山”的故事〔1〕。翻译陈惠娟确实名不虚传，她把日本的故事，连同野间宏那极有修养的话语味道，都恰到好处地表达了出来。而到最后，野间宏得出结论说，美国是狡猾的獠子，而中国人民则是和善的兔子。这时，会场上爆发出了一片笑声和掌声。如此强烈的反响，反过来也感染了我们。

当野间宏讲说那个日本故事时，其实自己正注视着听众们的表情。我敢说，他们脸上浮现出的微笑是发自内心的，而且全神贯注。也许有人会反对用那样的传说用来影射政治。但在关于日本人反对“安保条约”斗争的严肃报告之后，能够独辟蹊径，附带上那样使民众产生强烈共鸣的结尾，确实是受到了广州听众的欢迎。那天晚上，大约在近两千个广州家庭里，野间宏的日本故事给孩子们带来了欢乐。

在十年后的今天 再来读那篇小文中上面这一段文字 可能使人觉得有点轻佻。重新抄写它们时，自己已感到不太好意思。但虽说如此 毕竟它们可以反映当时集会的气氛 而且其与野间宏的《访问中国的旅行》一文有密切的关系。回想起来 那仿佛就是昨天的事情。在当时那样的气氛里，野间宏确实是最卖力

〔1〕 日本著名的民间故事，是一个关于獠子杀死了老婆婆，而兔子又替老爷爷报仇杀了獠子的传说。故事中的兔子敲着火石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想引火烧死獠子 并骗獠子说 那山名叫“咔嚓咔嚓山”。——译注

气。不必说，如此心态也同样反映在他收入本书的那些旅行报道与纪行里。

当然 野间的报道尽管详细 也不无遗漏。比如 当时我们在饭店就餐时，作家李英儒与各位翻译并不跟着一起吃。虽然去上海、苏州和广州时并非全都是那样，可在北京时绝对是如此。除了公开的宴会之外 每当结束一天的活动 回到饭店吃饭时 他们总是说 其他地方另给他们准备了饭菜 要我们自己慢慢吃。接着，便马上到隔壁房间去了。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另吃什么 对此事觉得很有些好奇。

实际上 正如那次旅行一、二年之后才逐渐明白的 当时中国的粮食供应相当紧张。我想 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 李英儒和各位翻译守口如瓶 不让我们知道实情 是值得称赞的。不过对于此事 我又觉得并非只是应该称赞他们。除此之外 自己还有些“后悔”甚至是感到有点“惋惜”。这指的是 自己当时为什么竟没有想到或是考虑 从某些真实的线索入手 再深入一些了解中国的内情，认识一下与饭店仅一路之隔的北京平民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这显然说明了，浅尝辄止的毛病还制约着自己。我当然反对那种所谓的“唯内幕论” 即若是找不到对方的阴暗面就觉得不算是“真实”的态度。因为比如去朋友家访问 人家不让你一一看遍厨房，难道便要怀疑人家的诚意么？如果主人是在客厅里招待客人，那客厅里的欢笑难道就不好吗？显然不应该那样认为。我之所以这么想，还因为包括自己在内的我们，并非是什么“中国真相调查团”。当时没有了解到中国的真实情况 以及后来未能预见到“中苏对立”或者是“文化大革命”之类，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不过 毕竟我已去中国访问了三次（1953、55、58 年）接待的主人与翻译在吃饭时离开饭桌的事，还是很罕见的。而自己在

当时对这种例外不仅未加以注意，还认为是人家对我们的特殊照顾。只是笼统地觉得那本是出于好意，除了该接受这种好意之外，只能表示感谢罢了。那时我猜想，他们大概是对在饭店里与客人一起就餐有些不太习惯。认为叫客人享用的东西比自己所吃的更好一些，也是东方人的礼节。而按东方人的礼节，要让客人觉察出主人的为难之处，有时反而会使人难上加难。如此说来，如果人家在形式安排上已经比较妥当，便不应在实质内容方面再去挑三拣四了。当然，现在我也仍然觉得，当时他们若能讲出“实话”，也确实更好一些。但问题是，自己那时未必就能够接受对方那种坦率的态度，或是那种坦诚的人格。

其实，问题还不仅仅是这样。在我看来，所谓“事实”，未必即意味着原本如实，“事实”也是有可塑性的。“事实”这种东西，人们对它的认识，应该能够接受来自“事实”本身的检验才行。对“事实”来说，那种“被理解的事实”，在朋友或是敌人眼里，是会截然不同的。而在实际上，不管什么样的“事实”，如果其不被人理解，它也就不具备“事实”的力量。

这里也许只该记录一些与野间宏《访问中国的旅行》一文有关的个人见闻才对。不过我又想，在过去了十年，特别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考验之后，自己在这里公开当时的一、二件“事实”，恐怕已经对中国无关痛痒了，而且那也并不是当初接待我们的那些人的什么过错。即使是那些曾跟着野间宏去中国访问的同行者，我相信他们也都会怀着宽容之心，来倾听自己讲述这些事情的。

另有一次，那是在苏州访问时发生的事。当时，访问的日程已经全都结束了，该是休息的时间，我们便去了一趟那里，为的是看看常说的虎丘、留园和拙政园等名胜古迹，然后再买点土特产之类。在那商店云集的街道深处，穿过如同位于东京浅草的

浅草寺内那么大的广场 我们望见了一个很大的寺庙 那是有名的道教玄妙观。后来 我曾从报纸上的专栏中读到过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红卫兵破坏那里原用来祭祀的器具的情形。不过在当时 我们还不知道那道观里 有自唐代传流下来的法灯之类的东西。大家慌慌张张地从汽车里出来，便进了商店。我在那里只买了一个小船样的摆设物。因为零用钱原不太多，也就没敢有再买当地著名的刺绣装饰品的念头。当自己走到商店的外面时，看见在商店的玻璃窗边 附近顽皮的孩子们拥挤着 向导不让他们到商店里面去)不知闹着要干什么。另外 还有妇女和老人。就是说 那里有一些“群众”。

走出店外的我 越过一片黑压压的人头 好象是仰望富士山那样，看到了玄妙观巨大的屋顶那流畅下滑的曲线。但屋顶下的建筑究竟是什么模样，因为被人群遮挡住了，并没能看清楚。这里，忽然从人群中传来了一声呼喊：“Dikang!”

那喊声似乎并非是苏州方言，而是标准的普通话。我没能看到那喊话的人，感觉中像是二十年代前期或本世纪头十年左右学生的声音。所谓“Dikang”，一定是“抵抗”两个字。但“抵抗”谁呢 让人弄不明白。大约正因为不太明白 我当时主要是从正面去理解这个词的，这使自己没有能弄懂当时喊这句话的人的“本意”究竟是什么。至今自己还记得 当时我在听到这句喊声的一那瞬间 如同闻所未闻似地感到十分惊异。这时候 同伴们也都买完东西出来了 我们又奔向了寒山寺。在汽车里 我曾问陪同我们的向导 苏州城是怎样依靠人们的努力 发展到了现在的规模，但是，并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在我脑子的深处，因为刚才听到的那一声“抵抗”曾觉得有点不太舒服 可是也并没有深入思索人们为什么要那么喊。那迷惑不解的心情，主要还是由于突如其来 觉得有些尴尬。实际上 那向导想必也是听

到了那喊声的。他所以对此沉默而不语，大概是认为这种本不该听见的词句，让日本人听到了会觉得很狼狈。然而在我看来，既然他听到了那喊声，还是应该说明了为好。要是他说自己根本没有听见，则显然是在故意隐瞒，那我会感到很不愉快。

每当想到自己在那个喊话的少年眼里的形象，自己便觉得很难过、很痛苦。在他那里，一定并不明白我们是为了反对“安保条约”的斗争才到中国来的。在他看来，不管是苏联人也好，日本人也好，那些穿着西装，坐着高级轿车，进出只有特殊人物才能够出入的商店的人们，在满是历史典故的苏州城里游山玩水，应该一律禁止。就像他们反感于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那样，也许口中还会骂出“日本鬼子”之类的话来。而他们尽管并没有那样骂，可毕竟还是喊出了“抵抗”之类的词语。我觉得，这反映了他们对以买东西的外国人为标志的、国内现实中存在着的“磨擦”的不满。

在他们的眼中，我们是特权者的形象。而自己不仅充当着这样的角色，还对此毫无觉察。我曾为此感到很羞愧，暗自受到良心的责备。

其实，由于当时中国国内的种种“磨擦”，这样的呼喊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过在实际上却很难听见。我并不觉得，自己就应该那样敏感地引伸分析那喊声里的含义。但是既然已经知道了在北京的接待者不同我们一起就餐的真正原因，我怎么还能再对那喊声置若罔闻呢？即使是想那样做，也不可能。或者说，即使不让我听到那喊声，而继续叫我们在北京的饭店里与接待人员分别吃饭，恐怕也会感到有些别扭的。

就像前面说过的，北京的接待者那样做，当然是出于好意。而实际这么做的，也并非只是他们。后来当我们去人民公社参观时，并没有让我们参加劳动或在那里住宿。要是当真那么办

了，大约也会与在北京吃饭的情形大同小异。他们决心不让你看见、听到或议论的事情，对我们那种在日本养成的迟钝的政治感觉来说，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无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他们确实是想做得滴水不漏。

然而另一方面，他们又确实难以做到滴水不漏。例如其中的诸多“磨擦”大都已在外国报道过。而这些情况被反馈到国内来时，无疑会被视为含有某种政治的意图。特别是有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时，虽然所谓“事实”的价值实际上只在于其自身，可那“对事实的理解”却只能对其中某一条政治路线有用，而对另一路线不利。因此，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他们也就不想让包括我在内的我们“知道某些‘事实’”。即使是与政治斗争并无关系，仅仅基于本能的自我防范意识，他们的这种意图，也难免会给人留下带有政治色彩的印象。应该说，这本不怎么难于理解。因为归根到底，究竟有没有必要那样滴水不漏，其实也本没有一定的标准。

如果出于以上这样的理解，来阅读野间宏所写的那些报道与纪行之类，虽然其中描写的多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中国事情，但在看它们的时候，还是应该尽量把视野扩展得更宽广一些为好。而野间宏那些与《访问中国的旅行》有联系的文章，也有校正以往不足，并加以追述和补充的意思。当然，从另一方面看，这种追述与补充并非是能够无限制叠加的。因为那样做也许将导致对原有报道或纪行的否定，而且只能是在原有观念基础上的自我否定。

上面我讲述了 1960 年在中国时，由于自己缺乏眼光，所碰到的那些“未能了解的事情”或者说“只听别人说却无法确认的事实”。这样做无非意在表明，指出“仅限于肤浅了解的事情”的文章，也并非毫无价值。我觉得，当时、当时的观察者的肤浅眼

光 不管其有多么肤浅 毕竟仍不失为对当时、当事人的生动感受。

尽管如此 这并不意味着 当人们在同一时空中 面对着同一事物时 所得到的印象 都会是完全相同的。例如 关于周扬，野间宏曾这样写道：

周扬的话很有条理。我一下子便将它与在日本靠书本很难理解的新中国人民文学联系了起来。周扬血压高，正处在疗养中，但他在一个小时里不断地说着话。那鸭蛋形的白色脸上，看来血压正在升高。我从那敏锐的眼睛、雪白的牙齿，直觉他是那种反应非常灵敏的人。周扬以前会见的日本作家，从他身上得到的印象，并不怎么好，而我却有些与他们相反，觉得他是一位战斗的、乐观的领导人。他把自己的意见毫不隐讳地告诉对方。那回答从不浪费时间，却很快就使你确信不疑（本书 395—396 页）

此时野间宏对周扬的这种印象，当然并非是什么指鹿为马。由于当时自己没有像野间宏那样公开个人的感觉，这里似乎不宜说三道四。不过我认为，他的如此印象也许不怎么靠得住。因为从这文中很难看出来 此时的周扬与不久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的周扬 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联系。

当然，在这里还可以再补充说明一些情况。就是在那次会见的前一天接到见面通知的时候，曾说会面时要讲讲关于对丁玲和胡风的批判，但后来其对此事竟一句也没有涉及。如果会见时问大家 各位还有什么问题么 按说是应该提出质疑的 但我什么也没有提。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自己确实缺乏足够的勇气。可那时如果当真提出那样的质疑，恐怕也很难断定会发什么样的事 或者人家是否会感兴趣。见到周扬时 他的讲话基

本上是官样的表态。幸亏萧三的反应，还比较真诚。这种官样的态度，实在大大减弱了我提出质疑的热情。而使自己丧失勇气的原因，是我猜想他大约只会再给我们以刻版的回答。这样一来 我觉得正滔滔不绝讲话的周扬 恰好正像我所写的一段关于他的文章。要是周扬不特别接见我，自己未必就会有那样的感觉。我那篇发表在 1955 年 10 月号《新日本文学》杂志上的文章 题目是《鲁迅和他的弟子们》。我曾在其中这样写到过周扬：

从《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可以发现鲁迅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意见。他承认抗日统一战线的原则 但当田汉和周扬将胡风说成是“间谍”时 却非常愤怒。因为统一战线属于政治问题，让鲁迅随便接受田汉和周扬的这种非文学表态，很难办得到。

胡风的问题，也许会在法律上逐渐明确起来。我近期读到周扬在中国作协扩大理事会上的报告，其中列举了胡风在 1927 至 28 年曾写过反共文章的事实。这使我突然联想起了在读前面提到的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时得到的印象，心中浮现出年轻周扬的影子。

要是提及胡风的问题，我的立足点恐怕只能仍旧像上面说的那样。至于笼罩在刻版与僵硬的态度下的谈话，内容会怎样的冷淡无味 看看“文化大革命”中种种显现出来的事实 已经不难明白了。当时 所谓刘少奇的“自由化路线”正在一步步地推行 但其尚未获得全面的胜利。在如此微妙的阶段 自然不可能向为反对“安保条约”，来自日本的野间宏一行透露什么消息。既不能不公式化，也不可能太热情。

不过即便如此 若是改换一下提问的方法 也许现在还会有

更多的故事值得讲一讲。然而遗憾的是，自己当时并没有那样做。当然我也希望，最好不要为了证实野间宏所写的那些印象，再让那种公式化的场面重新出现。相反的，在 1960 年的时空中形成的那些暂时的印象 让它们仅仅反映当时、当地的情况 也就足够了。

与周扬的立场不同的是李英儒。此人在“文化大革命”的一段时间里 曾是江青主管的“文革小组”的文艺组成员。读过野间宏详细记录下的他的一些话 会觉得后来出现那种事情 并非是没有道理的。但他虽然在政治上有些投机，并没有真正进入文革小组。我在为他感到窃喜的同时，也更加关注野间宏所记录下来那些有助于深入挖掘其人的本性的文字资料。《访问中国的旅行》一文写得也许有些过于自信，可我还是就那次“旅行”多说了一些连自己也未必能够深入理解的事情。自己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这些难于理解的事情 原本就以其难于理解的形态 存在于现实的阴影中。除此之外 它们也可以使野间宏所写的那些报道 显得更加真实一些。

当读到《访问中国的旅行》时 会使人产生一个疑问 即通过“旅行”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把握住所看到的对象（人）这既是摆在我面前的野间宏的作品与文章中存在的问题，恐怕也是包括野间宏在内的文学创作的普遍性问题。

野间宏曾在《旅行者的悲哀》一文里 就“旅行”对所见能够真正把握住的程度 这样说过：

我和她都生于有着富士山的日本，但自己无法与她在
一起生活。既然不能共同生活，也就不可能真正支撑着她。

每当这种时候，我总常常想起旅行者的悲哀。我想越
着走过去，从其旁边，或者是从它的前面横过去。第二天，

我会已经不在那里了(本书 60 页)

毫无疑问 我们想要把握的对象 未必都是‘与之在一起生活’之类的事情。于是 所谓‘旅行’所见也就会某种受到限制。值得注意的是 在阅读收入本卷的文章时 人们会觉得其中仿佛也是在讲述着如何摆脱那种限制的方法。这并不令人惊奇, 不过 毕竟它们多是写‘访问旅行’以及‘去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的旅行’。其中 作者与那些地方的人们关系相当密切 而且对与当地人们的关系如何处理 作者比较明白 对其自然环境也相当亲切。

“前面的五层公寓楼已经盖好了, 正等着人入住。想入住而必需的手续, 也是最早交上去的, 但入住许可总也不下来。这也许因为像曾经猜测的那样, 是提交的文件有什么差错? 可连消息也不告诉一声。”

这些呼声 应该被看作来自于野间宏的基本文学观念 而并非只是光会旅行的人们的议论。恐怕不应该狭隘地理解所谓“一起生活”这一命题。即使是在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老师与学生的关系中, “真正地支撑”也并非容易。而且, 上边引用的那段文字里面内含着的“愤怒”似乎在启示人们 究竟什么叫作“真正地支撑”其实是不太好说清楚的。

野间宏收录在本卷里的文章, 鲜明地反映了战后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通过那些四十年代后半期, 以及五十与六十年代的文字 可以清晰地看到民众或大众运动高涨的影子。例如 对我而言 虽然没能有机会亲身体验战后流行一时的所谓‘从孤立的个体中解放出来’的社会时尚 但从四十年代后半期日本共产

党的文化运动中 已经可以觉察出战后的这种风气了。这从《缤纷多彩的女子员工》以及《通过工会思考的新思维》^{〔1〕}等文章（我身处的环境又与之有所不同）里 都不难看出当时工会运动盛极一时的气氛。那些集体舞会，那种类似口号一样的思维规矩等等 在今天看来 确实已称得上是过眼烟云了 但毕竟人们就是从那样的时代走过来的。

至于当时迫使人们这样思考的风气，如何反映在野间宏的文体里，这可以从其所使用的那些足以唤起人们强烈视觉印象的修辞中觉察得出来。在上面引用的那两段文字中，前一段便表现得相当明显。而通过这两段文章，也不难理解支配着如此修辞手法的日本共产党的文化路线。不过我觉得，借助于合成本卷书的各篇文章 又似乎使人能够感觉到 野间宏在服膺这一文化路线之前的那种“自有文化观念”更是其自然与本质的东西。它也许可以称之为以个人本性为出发点的“本色文化观念”。我认为 正是靠着如同《受歧视的部落已改观了么？》一文里那样的个人本色，野间宏才成就了他那真正具有自己风格特点的“个人讲座”^{〔2〕}。而正是这种本色，才是野间宏文体的实在根基。

不过 当野间宏立足于这样的根基 尽力摆脱了实际的政治路线的束缚时 这条政治路线在其文章中的痕迹 也就所剩无几了。

关于战后民众运动、文化运动和政治路线与野间宏的内在

〔1〕 这两篇文章 以及下文提到的《受歧视的部落已改观了么？》均见《野间宏全集》第 13 卷。——译注

〔2〕 指并非根据政府或学术机构的安排，而是日本文化人按自己的愿意或学术观点所举办的讲座。——译注

关系，也许还应该谈及这套全集的其他各卷。按我的印象说，“访问中国的旅行”这一特定情况只是短时间内的事。而所谓集体行动，也多是日常的场面，如前面引述的文章里提到的讲“咔嚓咔嚓山”的故事还有对周扬的描述之类。从根本上看，它们并非是什么政治路线问题。说得武断一点，我觉得它们未必就是野间宏文学创作的主流。当然，所谓主流或支流也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当一个人作为人而存在的时候，其本能的心理反应，其中未必没有政治性的感觉。它们也是作者对面对的对象（人）的一种真诚反映。即使是他对中国作家李英儒能够把握得比较准确，同样得益于那种真诚与对方交流的态度。我想说自己在苏州玄妙观听到的“呼喊”以及野间宏在受歧视的部落里听到的“呼喊”其实都是同一类“呼喊”。只不过场合有别，听的人不同，以及其与呼喊者的关系各异而已。即使是野间宏本人由于处在不同的场合与对方的关系不一样他在文章里的描述也显然很不相同。如此看来，如果他以后果真以“旅行”或“旅游”的感受为基础再写什么“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话，说不定其中仍会有作为听“呼喊”的人或是已经听到者的野间宏的影子。

程麻译自《野间宏全集》第 13 卷 筑摩书房，1970 年 8 月 10 日

《日本人心目里的中国形象》后记

本书是以前出版过的同名旧著〔1〕的再版本，但内容有所增删。

作为第一部分的“啊，大东亚共荣圈”原来的旧著中没有收入。

这是该文在单行本中首次出版。

在战后日本的历史学中，“大东亚战争”、“大东亚共荣圈”曾经是犯忌的词语。为此，我故意用了“大东亚共荣圈”来做文章的名字。为了充分利用这一词语，不得不连写了三篇文章。

1970，即昭和 25 年，我停止了在大学教学，心情很是沮丧。〔2〕正在为生计忙碌中，又迎来了 8 月 15 日。自己很想纪念这个日子，便执笔写了本书开头的《难民的思想》一文。第二年，接着写了《建国的思想》。再过一年，又写了《安抚的思想》。当初没有受什么人委托，也并非是想公开发表声明，只是自己对个人的要求，想在 8 月 15 日这个日子里，以《大东亚共荣圈》为总的题目，一篇篇地来研究几个问题。

〔1〕《日本人心目里的中国形象》春秋社，1966年10月20日。——译注

〔2〕竹内实于1970年3月辞去了在东京都立大学的教职。——译注

第二部分“日本人心目里的中国形象”主要试图通过文学作品来考察一下日本人心目里的中国形象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其间有些什么样的变化。

在日本学术界经常使用“中国观”这个词。可我想所谓的“观”无论如何总该是比较系统的看法。

而我更关心日本人的心目里，那些未必能形成体系的印象，甚至是无意识的东西。因此自己把它叫作“中国形象”。

至今还记得当初排出校样时，书名是叫《昭和文学里的中国形象》。可后来责任编辑将其删改成了现在的名字。

实际上，与那题目的旨趣差不多的论文还有一些。因为它们没有收入别的评论集或论文集，便编成了一册书，即旧著《日本人心目里的中国形象》（春秋社，1966，即昭和41年出版，共400页）。

第二部分中的《昭和文学里的中国形象》是从那本旧著中选取了当时论述昭和文学的部分内容。

如此选编使本书的内容划分成了两个时期，第一部分写于七十年代，第二部分写于六十年代。

将每十年划分为一个时间段，可以使其分别显示出各自的特点。我觉得它们所反映的内在特色，是第二部分即六十年代的我给人以如饥似渴的印象，而在第一部分的七十年代自己则感到处于被孤立的地位。

到八十年代初，我又将论述中国的文章汇总为《友好容易理解难》一书出版（同合出版会，1980，即昭和55年）。

到现在九十年代的第二个年头，才编辑和出版自己六十及七十年代的文章。当觉察有些问题没能再写新的文章时，使人意识确实应该正视时代的变迁。在九十年代也许有时，无宁说

是频繁地 会重新有文章加入到这个“当代图书馆”〔1〕里面去。

当三十年前重印自己在二十年前所写的文章时，并非是由于那些东西里面充满着什么预见，倒是羞愧于它们太过于暧昧和模棱两可了。

别人觉得事情是很明确的，但在我却常常不是那样。这也许是因为自己所面对的 大都是一些过于莫名其妙和模棱两可的事情。不过回过头来想想 这种莫名其妙与模棱两可 似乎已潜在于自己的身上，它们在内心里左右着我。

我的这种感觉，从昭和头一个十年便开始了。记得自己在昭和 9 年 即 1934 年 3 月到达“满洲国”的首都新京时〔2〕 站台上冷得结了冰 脚滑得竟站不稳。那一年 我 11 岁。

自己的少年时代，在昭和和康德〔3〕两个年号里各过了一半。刚到 18 岁的时候 与战争遭遇了。

那就是所谓的“大东亚战争”。

第二年 我回到（现在应该说是回来）了“内地”〔4〕。也就是说 前后有大约 10 年的时间 自己曾经是“满洲国”的国民。而在日本战败的 1945 年 6 月 我又被命令从陆军医院出院 解除了兵役。有一年半的时间 自己竟当了“内地”的士兵 军衔是一等兵。当时 自己曾想回“满洲”也去过位于东京车站前丸大厦的交通公社 可因为不是公务 没有能够买到票。

这种莫名其妙、暧昧模糊的事情的阴影 至今还仿佛在纠缠

〔1〕 收入本文的《日本人心目里的中国形象》一书 作为岩波书店“当代图书馆”丛书第 120 种出版。——译注

〔2〕 当时 竹内实随母亲从山东省张店 移居到中国的长春市。——译注

〔3〕 竹内实在伪“满洲国”年号康德中期回到日本，那又恰是昭和年号的中期。——译注

〔4〕 当时在国外的日本侨民 把日本称为“内地”。——译注

着我。

本书能被收入“当代图书馆”丛书 全赖林建朗君推荐 也幸得担任编辑的小野民树君无微不至的细心校点。而对阿部知二〔1〕《北京》(原题为《燕京》)一书共同倾倒 则是我们之间一个值得纪念的话题。

一九九二年七月竹内实

程麻译自《日本人心目里的中国形象》岩波书店,1992年8月20日

〔1〕阿部知二(1903-1973)日本小说家、评论家。1926年东京大学英文科毕业。其作品具有无产阶级意识和现代风格。著有《幸福》、《日月之窗》、《欧洲纪行》等。作品《北京》发表于1938年的《文学界》杂志。——译注

《中国电影生机焕发》前言

我曾去上海电影制片厂访问过。当时是赵丹出来欢迎我们（现在）记得当时曾想最好能有一个关于制片厂历史的什么讲话，可他在出迎时并没有讲话，只是笑呵呵地出来迎接我们。大约是接了紧靠正门收发室的电话，他知道我们已经到了，便远远地跑了过来。那跑来的样子，至今还浮现在眼前。

自那过了几年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于是也就没能再知道赵丹的情况。其实对制片厂里的人，任何人的情况我都不了解。等“文化大革命”后结束不久我在大阪看三十年代的上海电影才又在那看到了赵丹。

那上面的赵丹是一个白净的漂亮年轻人。

啊 我终于又在电影上见到了赵丹。

自己不禁涌出了泪水。

我与电影演员相识，一般是在影片的画面。当知道有电影拍摄了并公映时自己很想去观看。至于看电影自然希望及时去看，且能够及早看到。无论是剧本、布景、外景风光、演员、导演、工作人员 还是电影进口公司 最好都富于活力。而接触富于生机的东西，自己也会生机焕发。

说起来 那情不自禁的眼泪 其实并非意味着自己真正从中

悟得了什么道理。至于我在本书里提到的影片，确实都在电影院里看过。尽管说是特意从京都乘新干线去东京看电影，那过于夸张了 总之为看电影还是经常出门。而另有一些影片 则是看的录像带。因为能够在公开上映之前看到，所以录像带我一概不扔。为此 我得以“随时可看”。不过 与初映 或者是试映）时能够看到的人相比，毕竟还是稍逊一筹。

即使是这样，也可以使我了解电影的方兴未艾。电影是一种让人兴奋的推动力量，是对心灵的呼唤。它让人觉得，拍摄制作影片的人们 是生机勃勃的。当然 要是没有使制作影片的人们兴奋的原因，他们也不会生机焕发。这些促使生机焕发的原因 可以归结为人、时代 或者是心灵。而所谓电影 在我看来 应该通过银幕 显示那激动人心的力量 并使自己能够感受到那种力量。

我不明白 究竟是什么原因 使赵丹在仅仅二十岁时 便会有那么好的演技。在上面说过的自己与他的交往中，我很想问问他。所谓疑问，自然也可以通过解读来弄明白。

不是有所谓的“电影语言”么？

我所解读的是 中国电影的“电影语言”。

尽管自己的解读，远不及佐藤忠男^{〔1〕}那样深刻 但很高兴能与其合写一本书，并由我承担其中的一半。策划本书的则是川口信行先生。从川口先生还是《朝日周刊》的编辑主任时，自己便多蒙其宝贵的指教。而这一次，又幸亏他为我们指明了路径。此外，也曾给原田利康先生和大映股份有限公司东光德间添过麻烦。另外，自己还应为曾借鉴一直热心称赞中国电影

〔1〕 佐藤忠男 1930 -)日本电影评论家。主要评介与推荐亚洲电影 著有《黑泽明的世界》、《小津安二郎的艺术》等 并创办个人杂志《电影研究》。——译注

的畏友阿赖耶顺宏与户张东夫两位以往的研究成果，而向他们表示敬意。

竹内实 1994 年 8 月

程麻译自《中国电影生机焕发》朝日有声
杂志股份有限公司,1994 年 9 月 3 日

文化大革命和我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在此前一年，文艺春秋社出版了我和武田泰淳〔1〕先生合写的《毛泽东 其诗与人生》一书。那是一本翻译毛泽东创作的诗与词（诗的一种形式）并结合其革命运动的背景来加以解释的著作。在写这本书时，自己脑子里对中国革命的过程已有大体的了解。由于这样 我对所谓‘革命’还是大体能够理解的。

但另一方面 就我当时读过并很失望的小说而言 觉得既然中国肯定 1960 至 1962 年间的进展，认为它们刷新了以前的形式主义文风 便不应该在‘文革’中又对这些作品和作家进行严厉的批判。

1960 年我访问中国时，曾会见过赵树理和老舍。听说这些人在中国都受到了批判，我觉得这种批判与人的信义是相悖的。而在日本研究中国的学者当中，却有人在以前被其赞扬的刘少奇受到批判时，竟也反过来恶意地谩骂他。

〔1〕 武田泰淳(1912-1976) 日本作家。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科肄业。著有《司马迁——史记的世界》、《毛泽东 其诗与人生》(与竹内实合著)《武田泰淳中国小说集》等。——译注

我并非对刘少奇的过去全都肯定，但很讨厌那些如此研究中国的日本人，便决心不再对刘少奇说坏话。自己曾经在一个讨论会上发言说：“比起日本的革命家来 中国的反革命要更好一些。”

在研究中国的日本学者里，也有的因为不从正面赞扬文化大革命 被违心地贴上了标签 并受到推挤。而现在他们可以心安理得了。

中国曾有所谓的“五七干校”即把知识分子送到那里去从事农业生产，也有去那里参观的人对其表示称赞。然而据报道说 被称为“毛泽东的战友”的林彪却认为 那是“变相的劳改监狱”。于是在日本就有人借用这些话 如“林彪说……”之类。不料有的日本研究者发言 竟将那话变成了“竹内实说……”。这就是说 我也曾让人贴上过某种“标签”这被视为我的一条新罪状。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几年以前，我已经与日本的日中友好运动疏远。我遵循着自己确定的三个“原则”来进行思考。所谓“三原则”是指：

- (1) 进行书桌上的研究。(2) 以自己心目中的中国为对象。
- (3) 有中国人的地方才有中国。

进行中的“文革”呈现出种种复杂的事态。当时 我以自己的眼光来窥探 曾说过：“北京上空树起了‘抱怨’之旗。推测由于市民和红卫兵不知道“文革”小组何时收场 而开始厌恶起革命的喧闹来。

“文革”结束以后 我参加旅游团 曾经在北京的市内散步聊天。听一个男人说 在“文革”中，《人民日报》刊登过日本的革命组织或剧团颂扬“文革”的消息。那男人周围的朋友 都感到很气愤。对遭受过“文革”摧残的北京市民来说 革命旋涡中那些

漂亮词句 不过都是些喧嚣罢了。

在“文革”期间访问中国的人 耳边是听不到这种真实声音的。而且 他们相信中国革命是绝对的善 于是对那些与他们的信念稍微不吻合的事 都不愿意听 也不愿意看。

我所从事的是“书桌”上的研究 实际的“文革”并不会跑到自己的桌子上来。我预定了公式化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 每天认真琢磨其中的文章。随着时间的流逝 也看出了一些门道。有时从堂皇的文词里能发现其实情。自己有意按照尊重文献 研读文献这一京都学派的特色 用心揣摩各种文字。当时所读的剪报资料 装订起来有 100 多册 至今仍摆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洋学文献中心的书架上面。

几年以前 当我住在北京某所大学里时 在这所大学工作的一位朋友曾指着一栋 4 层楼房 嘟囔着跟我说 在“文革”里 有不少教授就是从那里跳下自杀的。另外，我在北京还看过电影《红尘》。那是描写在北京特有的胡同 原编者注 平民生活的小巷 里的“文革”以及那里人们之间的欺侮。不可否认，“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 但民众也大都参与了。从早有的暴力、欺负人等类情况可以知道，中国社会的缺欠并非是一时的事情。

文化大革命的记忆在中国已经逐渐淡漠了。看来，由于自己不与“文革”同调 而曾意外受到的赞扬 即我所获得的“勋章”也正在慢慢失去光彩。这次，《产经新闻》通知我要重新连载《毛泽东秘录》 我觉得确实应该将那些被埋没和人们不知道的事情，继续加以发掘和研究。

程麻译自《产经新闻》，1999 年 7 月 28 日

思考中国

稍微回顾一下，在称不上是什么“好年景”的去年（1970年）不管着眼于个人 还是从社会的角度看 我却偶尔曾在心里感受过些许的喜悦。

据说在 11月20日（日本时间 21日）的联合国大会上 当以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为首的 18个国家提出的“恢复中国政府的合法地位与驱逐国民党政府代表”的议案，结果表决为 51票赞成、49票反对时，刚刚在这一议案被“确认作为重要问题”通过时还未听见的掌声出现了。它们从会场的各处响起 进而像海涛那样又响又猛 经久不断。这样的掌声 在联合国生活了 25年的外交官们 还是第一次听到过。

当读到这样的新闻时，连那些生活在经济利益第一的国际社会里的人们，也不得不相信，确实还存在着懂得什么叫“正义”，并且为此矢志不渝的精神力量。这也许只是我个人的感受 不过 即使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考虑这件事 也同样值得高兴。对个人与社会的经验相一致的感受 我不只是去年 多年来已经屡试不爽。这在自己来说 确是一件喜事。毫无疑问 历史确实是在不断前进。而中国 也已不只是需要帮助 或者是可以任意诽谤的对象了。她就堂堂正正地存在于地球之上。被联合国大

会上的掌声雄辩证明了的这一事实，当然会有人持强硬的反对态度，但我却将之视为正义感的反映。

日本的当权者，所以对此局面仍在犹豫不决，与其是缺少政策上的准备，不如说在道德意识方面比较欠缺。夏目漱石〔1〕在明治 34(1902 年 3 月 15 日)日记中谈到的事情至今仍像发生在人们的周围一样，也可以将其看作对当今日本当权者的心理素质的尖锐批评。夏目文中所写的“支那”和“支那人”，今天已该叫作“中国”与“中国人”了。夏目的真知灼见虽然也会受时代的制约，可为对其至今仍闪烁出的光芒表示敬意，我还想在这里大胆引用其原文。

反观日本人，不管其对被称为支那人的人厌恶到什么程度，其实支那人是远比日本人更值得尊重的国民，只是眼下暂时不幸陷入了不振的状态。有心之人，若被称为支那人，应该觉得比被视为日本人，更为脸上有光。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日本人至今不知给支那人添了多少麻烦。稍微回想一下便不难知道，日本人有多么喜欢模仿西洋人，并愿意对他们献殷勤，却反过来讨厌支那人。对邻国如此无礼而竟洋洋自得，并觉得自己过得很景气，可见其性情之浅薄。

自然，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地位，并不等于毫无问题了。

〔1〕夏目漱石(1867-1916)，日本近代著名作家。本名金之助。1894年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英语科毕业。1900至1903年去英国留学。归国后任第一高等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讲师。著有《我是猫》等。1909年曾去朝鲜和中国旅行，回国后发表《满韩各地》等文章。——译注

我们还没有同中国签订和平条约。众所周知，“昭和 15 年战争”^{〔1〕}的主要内容，实际上便是对中国的侵略。尤其严重的是，日本民众至今还未能从那场恶梦中解脱出来。此外，关于日本为此，究竟应该如何向中国的民众赔罪，也没有什么头绪。

这里必须事先讲清楚的是，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那本是中国实力的当然结果。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没有丝毫必要向我们感恩戴德。关于两国邦交的恢复，同样也是如此。

作为与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研究者并不相同的学生以及关心这些事情的人，我老早就注意到上文所提到的那些问题，并几乎为此感到绝望。但对我来说，在那样的情况之下，毕竟并没扔掉自己所学的中国语和中国文学。但如果有人就此觉得，我们所担负的战争责任，似乎只应该由像我这样的人来承担，那我只能闭起嘴来，无话可讲。

所谓“三岛事件”^{〔2〕}，自己好象几年前就预感到了。那是当日本将同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时，日本公然企图重新军事化的标志。在即将迎接欢喜的日子的时候，预料也许会有痛苦的大雨浇来，这大约要被人责怪有些过于悲观，仿佛是要放弃应有的努力。然而，如果今后还将继承日本自近代以来对于中国所抱的那种态度，那只能让人猜测，是不会去认真检讨百年来的日中关系的。

就中国自身而言，当然也有难以预测的困难。举最近的例

〔1〕指从 1931 年至 1945 年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译注

〔2〕三岛由纪夫（1925 - 1970）日本作家。本名平冈公威。1947 年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其作品《假面的自白》、《蓝色时代》、《金阁寺》等带有现代风格。1961 年发表《忧国》，批判所谓“人性天皇制”。后加入自卫队，并组织“楯之会”。1970 年 11 月 25 日，其与同会学生进驻自卫队东京市谷驻地，呼吁自卫队奋起，并当场剖腹自杀。此即所谓的“三岛事件”。——译注

子 作为文化大革命象征的红卫兵 当他们被下放到农村去劳动时 会想些什么呢 比如我 尽管想搞明白 却很难得要领。

这些人 以前曾有过破坏神圣的中国共产党机关的经验 后来再加上劳动锻炼的经验。当他们在思想上形成个性时，将要迎来中国新的大发展时期。那时，一定会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问题非常关注。不过，他们会有形成自我的条件么？如果真有的话 他们的个性将是什么样子呢 这些 无疑都是我们应该研究的课题。

幸运的是 倘若注意 我们还有可能从中国的历史、文学及其现实的动向中，嗅到那里人们的气息。这也是我们的先人们向中国学习，思考中国时一贯采取的态度与方法。如果确能以反映中国本质的文字为媒介 去认识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 那么，我们也就不愁在多难的七十年代活不下去了。

程麻译自《每日新闻》，1971年1月28日

《毛泽东谈文化大革命》编者后记

看过构成本书〔1〕的主要部分即《毛泽东思想万岁》(在本书中称为丁本〔2〕)我对其颇有“久违了的从容”的感觉因为自己曾评论过它《赞 毛泽东思想万岁 —— 精神活力的表现》,《现代之眼》15卷9号,1974年9月1日)我在那文章里这样写道:

其中贯穿着一种整体基调。这种基调,任何作伪者都无法模仿。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本是精神活力的反映。我完全同意斯图亚特·施拉姆〔3〕,关于这是货真价实的毛泽东的看法。所以称其为精神活力的反映,因为给人的印

〔1〕 竹内实编译《毛泽东谈文化大革命》,现代评论社,1974年12月5日。——译注

〔2〕 据本书《凡例》称作者所见中文版《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书有甲、乙、丙、丁共4种版本。本书主要依据的丁本,内收毛泽东在1949至1968年的130篇文章,于1969年8月出版,共716页,原编者不明。日本的现代评论社,于1974年出版过该书的复印本。——译注

〔3〕 斯图亚特·施拉姆(1924-)生于美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其实1966年出版的著作《毛泽东》有日语译本。——译注

象之一，是听到毛泽东所讲的那些话，会很容易让人想到那是他在接见别人时的记录。以前的《毛泽东选集》里也并没有这样的谈话记录，但这些印刷品确实显示出了这样的特点。有位台湾研究家评价其“最容易读”，也是由于通过这些谈话能够看得出来，毛泽东既有才华横溢的智慧，又很从容。

当时我还从《万岁》一书里译出了与文化大革命问题有关的毛泽东讲话〔1〕。而现在，自己仿佛重新体验到了那时的心境。在1960年，我曾有过在上海见到毛泽东的机会。那是隔着一张大桌子我们这边的一些人 与他谈了约一个半钟头的话——按中国的说法是听其“讲话”。自己在翻译毛的这些文章时，也曾一边回顾着当时的印象。我曾想，要是在翻译中碰到疑问或是不明白的地方，最好还能像那时隔着桌子，向他请教才好。然而立即又在内心提醒自己那不过只是个梦想而已真可谓是有缘无份。确实无论是在开始还是在结尾 哪怕能再有一次那样的机会或者经验，对于我翻译这本书都是非常重要的帮助。而实际上我的这一想法只能落空。例如毛泽东的真实声音当时自己确实想听得更真切一些。不过，当那声音在传到我的耳边之前，却在隔着我们两个人的空间中，逐渐变得越来越微弱，竟没有听到。毛泽东像是只跟紧坐在他旁边，担任口译的赵安博说话。只有一次当说“美国”一词的时候那声音飞进了我的耳朵里。他的发音，不是像北方人那样说“MEIGUO”而是说“MAIGUO”。而且那个“MAI”与北方语音的“MEI”相比中间变

〔1〕 竹内实《日语首译 毛泽东最新讲话》四篇，《现代之眼》，15卷9号，1974年9月1日。——译注

得有些低 重音也不一样 是一种从上向下降低的声音。

当时 我看着就在眼前的毛泽东 却听不到声音。那种焦急的程度 在翻译本书时 仿佛又重新出现了。因为这是谈话 而且是面对面地讲，所以应该很简洁。这对于当时的听讲者来说，是不言而喻 无需说明的。然而在实际上 虽然能够明白其中每一句话的明确内容与含义——这是作为谈话体毛泽东著作的译文的魅力之所在——但对它们的针对性，还是不太容易理解。其实 即使是能够理解 怎样才能把它们转换为让日本人能够明白的说法 也是很困难的。本书在印成活字之后 我已将其中的两、三篇译文重新改译了。可令人汗颜的是 后来还是有一、两处 觉得还需要再进行订正。

我想 这些讲话所以难于理解 原因之一是因为对实情不太了解。从这一点说，《万岁》丁本 其实给了我们很多新的知识。应该读丁本自不待言 其实结合读丁本 有时也可以理解甲、乙、丙本。或者是相反 靠甲、乙、丙本 同样能够明白丁本。确实，我现在更加能够感受到，知识本就是互相联系着的这一平凡的道理。正因为如此 如果本书所收录的内容 能够在今后使我们增加新的知识 那么 它便不愧具有特别的价值。

本书也让我们觉察到，文化大革命中那些未太受到关注的侧面。实际上 像毛泽东在收入本书的《给林、周及中央文革的信》里 反对赋予毛泽东思想以特别权威的事 若不看《万岁》丁本（即只看甲、乙、丙本），便不会明白其中的原因。我曾抱着如同从清水寺的舞台跳下去〔1〕的胆量 写过《置疑毛泽东》一文，发表在《群像》1968年8月号上 收入《毛泽东笔记》一书 新泉

〔1〕 清水寺是日本京都有的寺庙和游览地 其中大殿前的‘舞台’高耸 从上面跳下即等于自杀。——译注

社,1971年12月1日)而实际上早在一年半之前,毛泽东已经在采取纠正文化大革命副作用的措施。可见,毛泽东确有所不及的远见。而相比之下,我禁不住为自己的杞人之忧感到无地自容。从此以后,自己再有新的疑问,就不只是不经意地自然流露出来,而更愿意认真去加以玩味了。

作为本书主要翻译底本的《万岁》丁本,其编辑出版显而易见反映出了,文化大革命即将进入结束期。其例证,由于前面说到的《赞毛泽东思想万岁》一文已经提及,此处不再重复。本书译出的文章与信件有一些虽然收入了《万岁》甲本,丁本却省略了。我想读者看过本书的《题解》便不难明白原来的书名虽然都是《万岁》,可各种版本的选编意图却在不断变化。仅仅是从1967到1969年这两年的时间,竟有如此大的变迁。谁都能理解,《万岁》一书从甲本到丁本连《毛主席文选》〔1〕也包括在内,它们并没有把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表的批示、交谈、所写的书信和所写的论文,全都收集起来。

譬如,《万岁》丁本所收录的与毛远新、王海蓉的谈话本是所谓的“家里话”。如此与夫人江青的谈话,也是应该收入的。因为江青夫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起的作用,非常之大。

即使是另外不太重要的人物,同样也有耐人寻味的。像《在召集和接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时的谈话》〔2〕里提到红卫兵领导人彭小蒙,对其有批评的味道(见本书206页),可当初他的名

〔1〕《毛主席文选》收入毛泽东1939至1967年间的著作58篇,另收录林彪的文章4篇。编辑者和出版时间不明。日本的小仓编辑企画社,于1974年出版过该书的复印本。——译注

〔2〕正式文名为《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6页。——译注

字在《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1〕中提及，则是赞扬的口吻（见本书 113 页），而后来关于他的名字就完全没有了消息。其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的思想及其境遇的变化，也不再知道了。如果能够认真追索这种人物后来的出路，也许会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毛泽东的书信和谈话与现实的关系。

尽管是这样，通过本书所收录的内容，毕竟多少可以反映“惊天动地”的文化大革命中那些栩栩如生的侧面。我们面对着这些活生生的内容，一定会触及到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而要想回答这一问题，则需要在不同程度上依靠毛泽东那些收录在本书里的谈话。不过，即使我们确实能够回答这些问题，那些曾使人感到模糊的疑问里难以理解的部分，便会都无影无踪——例如像毛泽东常说的“大快人心”——了么？我觉得恐怕还很难。之所以这么说，一个重要的原因，像前面所提到的，在于我们对有关的事实还无法完全了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由于我们有些人对文化大革命被剥去“神话”的外衣并不怎么习惯。在我的印象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在中国似乎已经大体确定。起码从表面上看来，自“批林批孔”以后是这样。然而，同时也应看到，直至 1971 年在《红旗》杂志所发表的文章里尚有“刘少奇一类的假马克思主义者……时常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欺骗和吓唬工农干部和天真烂漫的青年”这样的话。那篇文章中所讲的“天真烂漫的青年”显然是指红卫兵。这是说红卫兵被假马克思主义者欺骗了。而所谓“刘少奇之类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则指陈伯达。中共北京市委写的这篇文章，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委员会写作小组《批判唯心论的锐利武器——学习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年 1 月，第 12 册，第 87 页。——译注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红旗》,1971年第4期)即使不能代表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也说明在中国共产党内一些人的见解。而根据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不难理解他也有包括像类似见解在内的思想倾向。

程麻译自《毛泽东谈文化大革命》,
现代评论社,1974年12月5日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12册,第71页。——译注

沉 默 之 墙

—— 忆 共 乐 馆

“拆解共乐馆〔1〕的工程开始了 据说正在揭屋顶。”—— 当电话那边有声音这样告诉自己的时候，我耳朵里自然是听得清清楚楚的。

记得在几年以前，我曾访问过花冈。关于当时的感想，以及为什么要去花冈采访，并且此事一直萦绕在我心里的原因等等，都已经写进了拙著《纪行日本里的中国》（朝日新闻社出版）一书中。然而，那在花冈的街上等候公共汽车的时候，无意中回头看见的共乐馆屋顶的样子，却至今难以忘记。

我对拆解这座建筑的意图，多少是能够想象的。实际上，那建筑物在我这样的外来人冷静地看来，其漂亮与否倒无关紧要。在回顾历史的时候 人们免不了都会有追求“美”的气氛的心境，我也同样是如此。可是，当说到这座建筑物时，其给人的感受，毕竟不太一样。

〔1〕 日本青森县大馆市北面的花冈矿山，在侵华战争期间曾强迫中国劳工做苦役。共乐馆是当时在中国劳工暴动时，日本人杀害中国矿工的建筑物。—— 译注

例如 据说在姬路城^{〔1〕}里 有一个执行刑法或剖腹的地方。那里尽管并不“美”，却有着一种吸引人思考历史的气氛。而公共馆这种东西，如果说作为历史的东西，它会让人联想起什么，那只能是由于其“丑恶”，而使人们不再愿意去联想罢了。我甚至觉得，那拆解的工程，就像是那段丑得无法再丑的历史，呲牙咧嘴地撕碎了那座建筑物。

我说那一段历史非常丑恶，实际上，它也并非仅仅意味着只是丑恶。也许称其为沉默的壁障，更为合适一些。

在少年时代，我曾生活在当时被称为“满洲”的地方。当时有一天 我们同从“内地”^{〔2〕}来的军人们见面。在军营旁会面的地方，最后只剩下了我们俩个人，另一位是我的一个大约 20 岁的年轻亲戚。记得当时他讲到了，前不久在中国——至于他是否称之为“支那”已经记不清了——北部进行的一次“讨伐”。其中说道，由于一名战友被打死了，队长就下命令包围了一个村屯 并且烧毁了它。

其实 关东军并非只是到过“满洲”同时在华北也活动过。不过，当时那位亲戚只是讲烧了村庄，还是说也杀害了那里的民众，我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但在我残存的印象里，好象他并没有说，光烧了房子而没有杀人。

他主要是谈着自己开始“实践”的感受，而我对他并不怎么怜悯中国人，却有些不满意。当然，当时我也并没有当面抗议。我把带去的点心盒交给了他，便走出兵营。几名门卫士兵们那嘻嘻哈哈的样子，很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它们至今还浮现在我的脑子里。

〔1〕 是日本兵库县姬路市一座著名的日本古代城堡型建筑。——译注

〔2〕 这是当时在中国的日本侨民，对日本本土的称呼。——译注

这个曾经是士兵的亲戚 至今应该还生活在日本 即那时我们称之为“内地”的某个小镇上。大约在十余年前 我们还见过一次。那是在他的一位老人病重时 我到医院去探访 在那里意外碰见了。当时 我的脑海中立即浮现出了 他那次关于“讨伐”的谈话 只是我并没有说出来 他也没有再提起那件事。

说到战争与亲戚 还使我想起了另一个人来。就是他 最早教会了我打领带结的方法。但我同他的结识，却并非是在想打领带的战后，而是在那整个日本都对领带敬而远之的战争期间。

在与前面说过的那个当兵的亲戚见面一、两年之后 我暂时在“内地”居住过。当时 我曾经拜访过各地的亲戚。就在这些亲戚当中 有一个从部队回来的中年男子。在去他家拜访时 见他总是坐在火钵旁边，用白色的纱布蘸着药水，擦自己的眼睛。据说他去过南京 但是关于战争的事 却一句话也不提。现在想起来 他像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对战争的话题，一点也不愿意谈。

在那时，我还不知道日本军队在南京，究竟都干了些什么。

到了战后 我看他的样子 似乎生活的心境很不错。说起当初教我打领结的事 他显得挺高兴 真像是笑自内心。大约是因为他没有子女 在结婚的时候 也将女方不会说话的妹妹带了过来，一视同仁地扶养着。

在他去世之后 两位未亡人的生活 据说由于衰老 当然并不怎么好过。

我曾很想去拜访一次那相当于婶婶的老女人们，可始终未能如愿。而使我对那“沉默的壁障”感到忧虑的 则包括那婶婶们的丈夫。

当后来，在我如回溯体验似地调查关于日本和中国的事情时，一碰到“南京”这个词 我就会想起他那坐在火钵旁 用白纱

布擦眼睛的样子。而在将“白色纱布”与“南京”联系起来时，我于朦胧中仿佛有点明白了，当时他为什么总是那样沉默着。

我所谓的回溯体验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并进行调查，是指对有关的文学作品。

最初，我将写好的这些文章冠以《昭和文学里的中国形象》之名。但也许是出版者不怎么喜欢生疏的说法，在给我的清样上，把其中的“形象”一词删去了。当时我以少有的不妥协态度，坚持一定要写做“中国形象”。后来在出书时，书名就叫做《日本人心里的中国形象》（春秋社出版），那篇文章也收入了其中。

不过到后来，我仍然不得不面对所谓的“沉默的壁障”。尽管当初那工作是自己主动承担的，但我仍然觉得，像是撞在了一堵墙壁上面。

这堵墙壁，便是我所谓的“沉默”。比如，作文引用已写成的文章，是很容易的，而尚未写成文章的事，要引用起来，就似乎很难。

然而，尚未写成文章，并不能断言，就没有那些事情。当然，也不妨持另外一种见解，例如可以说，没写进文章的事，便不存在之类。

可对我来讲，却想要推敲：今天发生的事，都如实记下了吗？那些已经成为记录的东西，是否都已保存下来了？进而还想进一步追问：已经记录下的事，全都是事实么？如果被记录的事实只是全部事情的几分之一，或是几十分之一，那这记录能够反映全部的真实吗？

与此相关的还有：尽管我说引用已写成的文章是容易的，但实际上也并非都是如此。

譬如，我直到最近才知道佐多稻子有《分身》这样一篇短篇小说（收入旺文社文库版《树树新绿》）

这篇小说发表于昭和 14(1929)年 前边提到的《昭和文学里的中国形象》一文 本应该提到它。但当时 我没把刊登这篇小说的杂志《文艺春秋》全部翻看完,《中央公论》和《改造》是全看过了的 所以并没看到这篇作品。

现在要让我在前面提及的那篇论文里补充分析这篇小说,已确实有点难。它描写的是由中国父亲和日本母亲所生的姑娘。我不太可能将那女性的喜怒哀乐,按原样加以评说。我这样说 是因为我在那篇论文中 即使有过如实引用的例子 也并非是将提到的作品全都按原样引述。我的想法,只是意在透过文学作品 追溯那真实的人物。然而 在这些真实的人面前 却大都立着一堵“沉默的壁障”。

在花冈,我访问过信正寺。在与主持芎谷达元师父寒暄之后,他特意介绍了公园墓地的慰灵碑和“日中不再战”石碑。从芎谷师父那里 我听说了“日中不再战友好碑保存会”的事 并且和同去的传统与现代杂志社的岩浩君,一起加入了该会。自那以后 每当夏天收到为墓碑除草的通知 我总是耿耿于怀 可至今也没能再去访问过。

自己没有在那片土地上生活过,因此很难明确表达自己的感受。而且我也清楚 对自己来说 那种感受 其实是根本无法表达的。

不过我又觉得 自己总有一种念头 时时出现在脑海里。那便是想要咬碎 并且吞没共乐馆 连同那堵竖在人们眼前的“沉默的壁障”。

或者换句话说 我好象已经在耳边 切实听见了那粉碎共乐馆的声音。

《鲁迅远景》后记

给我以讲演机会的纪念鲁迅连续讲座，是由位于东京世田谷区上野毛的大东急纪念文库〔1〕举办的。该文库设在五岛美术馆的隔壁，两馆的馆长均由文学学士西村清氏担任。

我在京都的研究室里，接到该馆和该文库学艺员冈崎久司先生打来电话，是在 1975 年 9 月 16 日。冈崎先生说，当年把该文库每年举办的讲座的主题，定为《中国三十年代与鲁迅》，为纪念鲁迅而连续举行六次，并希望我担任开头的三场。第一次最好是全部讲座的引言部分，概述一下“中国的三十年代与鲁迅”的话题；第二次希望谈到作品；第三次要谈到评论。也许是由于长途电话的缘故，冈崎氏单刀直入地说了计划与委托的要点。我并未就此提出什么疑义，只记得在屏住呼吸听完之后，表达了承诺的意思。虽然我没有见过冈崎先生，但是他设计的主题，以及分配给我的部分等等，都使我内心激动不已。

接着，冈崎氏用稍微缓和的语气，告诉我此外还将有内村刚介、尾崎秀树、陈舜臣诸人讲演。不消说，后来都按计划实

〔1〕大东急纪念文库，位于日本东京都世田谷区的一家出版社，成立于 1949 年。东京铁路公司五岛先生组建。——译注

现了。

使我至今仍然感动的是，该文库的馆长西村清氏，以及直接负责人冈崎久司先生，能够订下一个这么好的活动计划。即使我没有受到邀请，自己的这种感觉也不会改变。我还要感谢的是，自己作为接受邀请的讲演担当者，被介绍给了当天来听讲的听众。不必说，前来听讲的各位的关心与热忱，其对象并非是我，而是鲁迅。当时我深深感到，在那称得上异乎寻常的寂静环境里凝聚着的热情，是与鲁迅沟通的纽带，确实十分难得。

我常常想，青睐我的著作的读者，其实水平远远高于我；青睐我的讲演的听众，也远远高于我自己。这里所说的“水平远远高于我”，指的是他们对所写、所讲的对象关心程度之深、理解程度之高，以及思想之丰富，等等。当然，其中也未曾没有过某些意外的事情，讲演也同样是如此。

记得，在东京的文化学院举办的以“革命”为主题的一个连续讲演会上，我曾讲过中国问题。在讲演结束时，有一位听众站了起来，举出当时某位称颂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生的名字，说他的看法远比我的讲话更有实践意义，并说“文革”是伟大的，想把“文革”在日本付诸实践的某先生，也是了不起的。还有一次，当我在代代木大学考试预备学校关于亚洲问题的讲座上讲演时，讲演还没有结束，就有一位听众大声喊道：“批林批孔”运动不是批判周恩来，在中国也没有“文革”派和反“文革”派的对立！

我当然相信，就对我所讲的内容来说，这些听众远比我更感兴趣，理解也许更深刻。我所以至今仍记得这种事情，是因为在文化学院讲演的那一次，也有另外的听众站起来为我辩护，说我的话很有基督说教的气氛！而在代代木大学的研

讨会讲演时，主持会议的年轻人仿佛是我的保镖，不仅把我送到走廊，还在以后写来了慰问信。

这次在大东急文库讲演时，提出尖锐质疑的也不乏人。非常遗憾的是，我没能把这部分都记录下来。无法在这本书里重述的当时的质疑，主要指：一、讲演里说鲁迅把所有粉饰全给戳穿了，是什么意思？二、讲演说“无”与“有”同质、同量，又是什么意思？这些质疑，对我来说如同刻骨铭心，至今难忘。

在第一次讲演结束回到京都之后，我收到了从香港寄来的一封信。那是友人、《明报月刊》编辑黄俊东氏所寄。他跟我商量，可否在《明报月刊》杂志创刊十周年之际，为该刊写篇稿子。而在那第一次讲演，即本书头一部分里谈到的胡菊人先生，就是该刊的编辑，也是我的朋友。我于是回信说，自己最近讲过一些东西，如果可以的话便给他们。不久胡先生来了一封回信，表示相信这样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文化交流。而事实上，我在讲演时也曾想过，应该本着胡先生就在眼前的态度，来谈这些问题。这就是所谓的“以心交心”。

此外，还有上原淳道先生，也特意光临纪念文库。讲演结束之后，又不吝指正我的谬误。牧田谛亮先生则惠赠了《沪友》杂志。外务省外交资料馆的各位，也为我提供了阅读资料的方便。

如我在本书《前言》所说，虽然这是一本微不足道的书，但其能够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全得益于把此书第一部分推荐给《文学》杂志发表的岩波书店编辑部的田村义也和山田馨，还有同意我使用绍兴一带地图的松枝劲二、协助我从《资料·世界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一书中，转载鲁迅两篇评论的三一书房社长竹村一，以及田地书店的石田明诸位的好意与帮助。我在

此一并深致谢意。

最后，也许应该说说为什么把这本书叫做《鲁迅远景》。但又觉得这对本书的读者来说，有点多余，故从略。

1977年11月21日 竹内实记

莽永彬译 水急、卢洁校 录自《鲁迅远景》 自立晚报出版部 1992年10月

《鲁迅周围》后记

这本《鲁迅周围》是差不多三年前推出的《鲁迅远景》一书的所谓“姊妹作”。

前一本书由三次连续性的讲演组成，是从时代、作品和评论三个侧面，来描述鲁迅的。而本书，则收录了自己在长达 20 多年间里写的 17 篇长短文章，论述的也都是与鲁迅有不解之缘的人物，故名为“周边”。

书中每篇文章的末尾，都标示出了初载的杂志及其年、月、号，并在编录时做了某些修订。而分两次在《文艺》杂志 1969 年 11、12 月号上连载的《鲁迅与柔石》一文，也有较大的增改，篇幅增加了大约近一倍。

回头来审读当初在《文艺》上发表时的《鲁迅与柔石》，自己觉得它大体如同随意躺在山里的一块石头，故称其为“拙”，名符其实，或者说是良莠不齐。为弥补这些不足，我动辄将值得注意的材料记在稿纸上，准备随时把它们添加到合适的章节里去。原以为增补得充分一些，可以变成一个小册子。但是后来发觉，更多地论述柔石以外的人，以重现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景象的打算，像是想着容易实现难的梦幻。而且为填补这些缺陷，虽然也搜罗了不少新资料，可后来已没有重新改写它的气氛了。

当初写这些文章时，也就是在十几年前，称得上资料的东西如中国的杂志或报纸很难看到更没有单行本。例如现在为追踪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线索，有必不可少的非定期刊物《新文学史料》那是在1978年开始发行的。它的第一辑，还没有印明出版日期，按其中收录的文章来推断，可能是在当年9月。但那时还是内部发行，想立刻读到是不可能的。

在写这些文章的当时，以及后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于资料我曾经有过走投无路的感觉。而目前已有可能对其进行修订和补正了。但以现在的认识去修订过去，我总担心那会给人以自己早有先见之明的错觉，还不如让它们成为过去为好。尽管有些不足但在我心目中它们毕竟是自己走在走投无路时凭着个人能力写出来的。

从去年春天直至夏天，自己之所以迷恋着整理或修订这些文章，就是因为觉得它们全是凭自己的力量写成的。我越来越感到它们虽然有点笨拙但像《鲁迅与柔石》还是应该保持原貌不必再有补写进新章节的念头。

我这样做是想使其成为过去但又不要影踪全无所以也做了一些修补之类。因此要标示出每篇文章所发表的杂志不妨说就是为了记住它们过去的样子。在这里，便不再一一提及那些发表的杂志了。

至于收录在“鲁迅周围”这一标题后边的文章则大体上是按发表顺序排列的。记得《鲁迅及其弟子们》一文最初在杂志上登出来后不久，我到当时位于一口坂〔1〕的中国研究所〔2〕去

〔1〕 东京地名。——译注

〔2〕 中国研究所，1946年由伊藤武雄、岩村三千夫、平野义太郎、石浜知行和尾崎庄太郎等人在东京成立，主要研究中国的社会、文化等问题。——译注

上班。当我登上靠窗横七竖八地排着正式研究人员的办公桌的二楼时，野原四郎^{〔1〕}先生拿起桌子上的《新日本文学》杂志，翻到了我那篇文章。我也顺势坐在野原先生身旁的椅子上。（顺便说一句，虽然我已去工作了几个月，但仍没有个人专用的椅子。）我看见在自己的文章上面，几乎每行都以铅笔（不是红铅笔，而是普通的黑铅笔）划了线。野原先生这样做，并非是在褒奖我。他没对这些地方表示赞成，还是反对。野原先生只是谈到了文中所写的事实。当我进一步讲了自己的见解后，认真听完的野原先生说，这些地方，你还没好好地推敲。

那时，我还不知道野原先生翻译过陶希圣的《中国封建社会史》一书。直到去年底，我才按旧书目录订购，买到了它。那书是1931（昭和6）年，由东京的四海书房出版的。关于原作者，译者野原先生只注明是“据说是国民党的理论家（原文如此）”。

当时的中国研究所研究的，并非是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而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以及中国革命。野原先生在研究所里，似乎也从没有提起过陶希圣。

现在回想起来，野原先生也许是想通过旧中国的萌芽，来展望新中国罢。当时对野原先生来说，新中国似乎是隐约可见的。

后来，当我终于得到这本书时，也曾想带一本自己的中国旅行记去探望他。不过，在京都就已经知道，他住进医院很久了，并且谢绝会客。

我在这些文章里，谈到过的胡风和萧军，前不久已经终于复出。据说，胡风的头脑现在尚未恢复到往时的敏锐，心情颇不平静。而萧军，仍旧很健康。

〔1〕野原四郎（1903—1981）生于札幌。毕业于东京大学东洋史科，中国史学者。专修大学教授。著有《中国革命和大日本帝国》等。——译注

后来野原先生不幸辞世而去，已无法再与他谈论这些事情了。不过在他的旧书中，想必还收藏着当年的那本杂志。

如果可能，我真想把这本小书呈献给活着的野原先生。我想告诉他，自从那篇小文之后，自己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倒退。或许可以再加上一句，就是自己最后的学术结局，还算得上是差强人意。

另外，我也想将这本书，呈献给武田泰淳〔1〕先生的灵前。至于其理由，这里不再详述了。

在“鲁迅周围”之后，我还收录了关于周作人和瞿秋白的两篇论文。因为我觉得，这些文章毕竟也是与鲁迅有关系，或者说应该有关系的。而且关于周作人和瞿秋白，如同柔石一样，目前研究得还不深入。这些不足，大概只有靠后来人去弥补了，但自己也不该放弃个人的努力。

1981年2月7日竹内实

程麻译自《鲁迅周围》 田地书店，1981年4月20日

〔1〕武田泰淳(1912—1976)日本作家、评论家。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科肄业。曾与竹内实合著《毛泽东 其诗与人生》，另著有《司马迁——史记的世界》、《武田泰淳中国小说集》、《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学》等。——译注

也谈杂文和民主

我的朋友栗栖继^{〔1〕}先生 在 1 月中旬给我寄来了当月的《争鸣》^{〔2〕}杂志，并劝我读一读其中所登的怀冰^{〔3〕}先生的文章《再谈杂文和民主》。另外还有怀冰先生以前发表的《杂文和文艺》、《评毛泽东的文艺观》的电子复印件。而那篇《再谈杂文和民主》带有副题“怀冰先生表示要同我‘商榷’”真让我惶恐之极。

怀冰先生在这三篇文章里展开的议论很是中肯，我应该表示赞同和敬意。不过恕我直说 其大文 我指的是《再谈杂文和民主》 除让我敬佩之外 也使我心里有一种很难讲清楚的感觉——我暂时把它称之为‘冤枉’的感觉罢。开始自己心中有些纳闷 弄不清楚这种感觉是从何而来。经过再三拜读 觉得主要还是怀冰先生的下面一段话，使我心里有点疙瘩。怀冰先生曾这

〔1〕 栗栖继（1910 - ），日本翻译家、世界语学者。任日中友好通信会会长。——译注

〔2〕 《争鸣》第 27 号，1980 年 1 月 1 日。——译注

〔3〕 怀冰（1934 - ），中国香港文艺评论家。本名纪馥华。原籍福建省福清县，生于印度尼西亚。1947 年回国。1952 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1969 年定居香港 曾任香港现代教育出版社编辑。著有《中国现代抒情诗一百首》、《鲁迅梁实秋论战文选》等。——译注

样说：

栗栖继先生文章既经刊出，日本著名的“我想”这里“著名的”三个实在没有必要。我们写文章，并不考虑有名还是无名。可既然怀冰先生已经写了，我还是按照原文抄下为好。——竹内注。以下凡括号中未特别说明者，均为竹内注）中国文学研究家竹内实先生看到之后，提出了异议。他在 11 月号的东京《文艺》杂志上发表了《关于为杂文恢复名誉》的文章，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怀冰先生的这段文字，是在其文章第二节的开头。而在第一节里则介绍说他在《争鸣》杂志上的文章发表之后得到了栗栖先生的热情支持。这是指栗栖先生在当年《文艺》10 月号上刊登的文章，确是事实。接着便在这第二节里介绍了我的所谓“异议”。而从第三节以后，是其对我的反驳，共占了杂志的两页。

我觉得怀冰先生这样写，也许会引起《争鸣》读者的误会，让人以为竹内实确实提出过什么“异议”（这是怀冰先生的判断），而其对象则是怀冰与栗栖两位先生。

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么？

怀冰先生手里肯定有发表于 11 月号《文艺》杂志上的拙文。如果他再翻看一遍，就不难明白，我主要是因为栗栖先生在发表于 10 月号《文艺》的文章里批评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有下面这样一段话，所以才提起笔来回答的。

是否对怀冰“提出了异议”？

栗栖先生是这样说的：

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这样重要的说法，以竹内好〔1〕和竹内实为首（怎么能以我“为首”这样的讲法实在不合适，但不得不照抄原文）本该这是有保留的口气，因此，似乎栗栖先生并不认为我就是其下面所说的那种“特别关心”或“理解深刻”的人。对毛泽东和鲁迅特别关心而理解深刻的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从来没有过问过。我对此觉得很不可思议，并且很不满。这并非是自己无知与武断，我是通过别人请教了关于这一问题的专家，似乎我的判断并没有错。

对于栗栖先生的这一批评，竹内好先生已经去世了，无法再来开口回答。好在他的文章还留在人间，也许将来会有人从他的文字中找出证据，来替他与栗栖先生争论。不过，那要靠别人自觉这样做，这里不必说了。那么我呢？（我现在想向好奇的读者说明，我和竹内好先生虽是同姓，但并没有血缘关系：不是父子，也并非兄弟。但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曾跟他在同一所大学里奉职。栗栖先生显然是在斥责我，不过看那文章里总的口气，又好像是批评日本所有的中国文学研究者。按道理，我并没有

〔1〕竹内好（1910—1977）日本评论家、中国文学研究家。生于长野县。1934年毕业于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科。曾发起中国文学研究会。著有《现代中国论》、《鲁迅论》等。——译注

资格来代表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来说话。可《文艺》杂志编辑部的 F 君 在杂志出售之前寄来了栗栖先生文章的清样 并说既然栗栖先生举出了你的名字，你就应该回答。

其实 我已经在拙著里写过自己对杂文的看法 只是栗栖先生似乎没有看到。于是 我便在 11 月号《文艺》杂志的回答文章里 讲了实际的情况。本来 我只要说自己在 1972 年 2 月 由研究社出版过一本《现代中国的文学 进程与逻辑》 那里边已有我对杂文的看法 有时间请看一下 也就够了。不过光写这些 文章太乏味 也无法填满 F 君允许我写的 7 页稿纸（每页 400 字）。因此 我又写了那拙著的摘要 不过是旧文新题而已。

出乎意料的是，在怀冰先生看来，我这样来回答栗栖先生，就是“提出了异议”。

我们常会发现 有时候一部分事实确是真的 但它并不能代表全部事实。要是这时有人只讲这一部分真的事实，却对其他事实置之不理 那么 他所讲的事实总的真实程度 请注意 我说的是“真实程度”）还是值得研究。

那么 我真“提出了异议”么 故且退让一下 就算是我“提出了异议”罢。但我很担心 怀冰先生那样来概括 会给读者带来一种什么样的印象。

每篇文章都会有各自的角度。我提醒自己，应该尊重怀冰先生所写文章的角度，同时希望怀冰先生在讨论别人的文章时，也注意人家的角度。按照我在上面所说的情况，怀冰先生提到的我对杂文的看法 其实是我早已在拙著里谈过的。在这里 也许应该介绍一下那本拙著的来龙去脉，因为其与我对杂文的理解 是有一些关系的。

类似于墓志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拙著《现代中国的文学进程与逻辑》其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文学史。在其中 9 章里没有谈到长篇小说这是它的缺点。当然，还有其他不少缺陷。不过，我觉得其也有优点。这里说两点：第一，提出了胡风无罪的看法；第二，对刘宾雁、王蒙做了很高的评价。这并非自我吹嘘，只希望怀冰先生与目前还肯于读此书的人们，从其中能够看出我思考问题的角度。

在我写这本书时，根本没有想到还会有今天。当时，我只不过是想把这本书，像墓志铭一样地写出来。这主要是因为，从新中国的文艺开始走出第一步时，我就开始跟它打交道。比方说，我有一套《人民文学》其创刊号是我住在东京的时候从一个没有店铺、只有一只皮包的“书店老板”那里买来的，其中有几期没有买全。虽也曾设法补齐，但仍旧缺一本“总第 2 期”。后来在去年，我偶然向从上海来的一个学术代表团里的某位青年学者，提到了这件事。那位学者回国之后，主动八方寻找，花了不少精力，终于找到一本给我寄来了。因此不妨说，这套杂志是友谊的纪念。另外像《文艺报》也是一本一本买来的（至今还不齐全）。

后来我每年都用一段时间来为某《年鉴》^{〔1〕}的“文艺”部分执笔，同时也在各种报刊上写一些介绍中国的文字，还翻译过几篇文学作品。接着来了文化大革命，我这个中国文学的“同路人”能够“同路”的对象不存在了而且那对象还被说成是“反革

〔1〕竹内实自 1960 年起在新潮社出版的《文艺年鉴》中撰写介绍中国文学部分的章节，直至 1965 年。——译注

命”要不得的。要果真是如此，那我十七、八年时间的工作，不是等于徒劳了么？于是，我便想来写一部类似于“墓志铭”的书。这样做，一来是为了坟墓里的东西，即已被判了“死刑”的中国现代文学；二来也是为了自己。因为我当时刚刚辞掉了在大学的教职〔1〕，生活很成问题，必须用两个月时间写出它来，换点稿费（因此难免有若干缺欠）。当写完这本书的最后一张稿纸时，我所感到的空虚是难以形容的（当时日本的中国研究家还不知道中国作家们被迫害的具体情况。虽然自己也曾想象到这点，但后来所知道的那种残酷程度，远远超出了我当初的猜想。即使是这样，当初我那低能的想象，也曾受到某些热烈赞同文化大革命的人的批评与蔑视），但必须补充的一句是，我并没有后悔自己做了一名中国文学爱好者。

我在上面提到过，这本拙著有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史性质。而这就应该向读者交代，我凭什么使其中所写的，与此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区别开来。对此，自己是用“鲁迅以后”这四个字来概括的。在书中第一章里，我便讲了“鲁迅以后”所包括的含义。其中，我把以前鲁迅的工作归纳为两点：第一，其从内部对中国社会进行了批判（所谓“内部”也指人的心灵深处）；第二，则是创造了批判性的文体，也就所谓的“杂文”。

怀冰先生似乎没有注意到，我在拙文里所说的对杂文的看法，只是上面提到的拙著里见解的摘要。而他视其为所谓“异议”，表示“不敢苟同”，并要“就教于”敝人。为此，他提出了两个问题。

其实，我并不认为自己提出过什么“异议”，因此，本来也无

〔1〕 1971年3月，竹内实因不满于当时任教的东京都立大学教职员一窝蜂地支持学生“革命造反”的气氛而辞去教职。——译注

须回答怀冰先生那基于我的“异议”所表示的不同意见。不过，在怀冰先生为此而表示的‘异议’中除了谈到个人的看法还夹有对我的一些误会。于是，我便想在下面校正这些误会。对怀冰先生说的要“就教”，自己实在不敢当。如果怀冰先生只是说个人的意见，而并未涉及到我，自己下面这些话也许是多余的。

关于鲁迅的杂文

怀冰先生的第一个问题是：“鲁迅杂文只是针对敌人吗？”

好象怀冰先生认为，我曾讲过“鲁迅杂文只是针对敌人”这样的话。因此他便在这句话的后边加了一个“？”号来作为对我的质疑。实际上如果“鲁迅”真是专门来写对付敌人的文章，那还不如请这位“鲁迅”担任公安人员或是志愿军司令员，去逮捕与消灭敌人，岂不是更痛快么？

怀冰先生的大文的第二段，是介绍我的“看法”。其中引用了这样的话：“鲁迅为了要对付敌人而使用杂文的文体，但是解放区内并无敌人，只有人民。”其实说这话的并非是我，而是毛泽东。既然怀冰先生也知道其为毛泽东所言，那他就应该向毛泽东而不该来向我表示“不敢苟同”。

我现在则想对“敌人”这个词，做一点说明。怀冰先生在第二段介绍我的观点时，都是使用“敌人”一词。可值得提醒的是，我在日语里并没有用“敌人”这个词，而是用了“敌”。这个“敌”既指“人”，也指“事”或“物”。怀冰先生在文章中说过：“鲁迅在写文章时并不会顾及对方是敌是友，而是以‘事’为对象。”我原文里的“敌”就包括这么多的意思。当这个“敌”与“人民”相对应时，可不可以将其译为“敌人”呢？我想这虽不能说是误译，但也难说很准确，因为它还包含有“事”或是“物”的意思在

内。这在整篇文章里很重要。当然，现在不是讨论如何翻译的时候。我们只要认识到，尽管中日两国都使用方块字，但其内涵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也就够了。

怀冰先生的第一个问题，大约便是由这个“敌人”的译词产生的。在我看来，似乎怀冰先生提这个问题，是出于一种担忧，即以为日本的学术界有偏见，认为“鲁迅杂文只是针对敌人”的。再看后边的文章，我们又不难明白，怀冰先生所以如此担忧，是因为他觉得这一概念多少与文化大革命有些关系。但我认为，他对日本学术界的这种担忧，是不必要的。

当然也要说明，我以前对被鲁迅批评过的人物，有些是很尊敬的。比如去年6月，唐弢先生到这里时，在开完座谈会之后的闲聊中，我曾谈及这一问题。似乎我当时说的是：“鲁迅先生的文章也有过分的地方。”只是我并不想在这里写明，当时唐弢先生是怎样回答我的。这也并非有什么机密，而是不愿意由于我的万一笔误，引起无谓的争论。

鲁迅笔下的阿金和江青

趁着谈及如何翻译，我想顺便说说怀冰先生在介绍我的看法的那一节里所存在的问题。怀冰先生在引述了我“肉眼上看到的敌人”的话之后，接着说：“所以，怀冰先生在上文中并没有‘因为’，怎么便来了‘所以’？”竹内氏认为，在中共区域内，“杂文是有权限的”。

查查字典，“权限”的意思是“职权范围”。那么，按他上面所写的我的那句话，只能说成“杂文是有职权范围的”。但这是什么意思？我实在很难明白。既然怀冰先生表示不同意这句话，按理说，他是应该明白的。因为只有明白了话的意思以

后 才能表示“不敢苟同”。所以 我很想怀冰先生请教 这句话究竟应该怎么解释。

我猜想 怀冰先生所说的“杂文是有限制的”这 7 个字 很可能是他从拙文中原来一句共有 79 个日文字的话里归纳出来的。现在 我试将自己那句话 译为如下中文：

因此 说到杂文的复权(“复权”即恢复名誉)我也觉得，复权总比不复权好。但是我又认为，最好是不要让谁有权来允许它复权。”

这句话中“有权”的“权”字 在日语里指“权限”。日语中的“权限”一词 与中文的“权力”有些相似。可译成中文的“权力”，又有点过于郑重了，有时甚至歪曲了愿意。比如说，某位皇帝把自己的一部分皇权交给了宰相，让他去处理某些案件时，用中文可以说，某宰相有“权力”。但在日语里，却说某宰相是有“权限”。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我把自己原来 79 个日文字的那名话，译成汉字时是 42 个 怀冰先生却只压缩为 7 个字 而且没有太明白其中的含义，归纳之后便不再理它了。

我的汉语水平不高，译成的中文可能不怎么准确。因为原文比较含蓄，自己想在这里再说说这句话的主要意思。我原想讲的是：

杂文能够复权 当然是好的。

但是 如果这种复权是靠官方的允许 那如此复权仍有问题。

想写杂文的人写就是了，不必管别人允许与否。

以上这些含义(尤其是第 一点)引起了我的一些回忆。于

是紧接着上面那 79 个字的话之后，自己还写了一段往事。这往事虽然仅是我个人的，但由于与鲁迅的杂文有关系，下面也不妨译为中文：

我想起了 1966 年，在新日本文学会〔1〕开办的鲁迅讲座上，自己曾以《阿金考》为题做过讲演。那是把鲁迅所描绘的阿金，跟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拼凑在一起（但并没有讲出江青的名字来讲的该讲稿后收入《鲁迅与现代》一书由劲草书房在 1968 年出版）

大家知道，《阿金》是鲁迅在 1934 年写的一篇杂文。阿金是鲁迅对门的某家女佣人的名字，这个名字也曾出现其在 1935 年写的小说《采薇》里。前一个阿金有能力玩弄男人；而后一个阿金，由于追问伯夷和叔齐，结果逼这两位义士饿死了。我在讲演里说，在中国群众都把这种类型的妇女叫作“泼妇”。然后我又举了几个例子比如《红楼梦》里的尤三姐、《水浒传》里的潘巧云等。杨雄在梦里骂潘巧云是“腌臢泼妇”虽然加有“腌臢”的形容词，但实际上“泼妇”未必就一定“腌臢”。像李英儒先生的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里的金环她在性格也被说成是“泼辣”。处于“社会金字塔”下层的平凡妇女中有泼妇，即使是上层的皇后或皇太后，也不乏其人，例如吕后、武则天。当然还可以举出一些名字来，可当时我没有那样做，而是用鲁迅的话来做结尾，以暗示自己的意思。那就是：

〔1〕新日本文学会，战后日本文学家团体。于 1945 年 1 月由秋田雨雀、江口涣、藏原惟人等发起。其宗旨宣布：“发起人不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只有反对这一战争的作家有参加本会的资格。创办《新日本文学》。——译注

愿阿金也不能算是中国女性的标本。

我在回忆了以上往事之后，用下面的话结束了自己在 11 月号《文艺》杂志上的文章：

为了杂文，也许江青仍旧拥有她的权力才好。

“拥有她的权力”在日文里原是“健在”两个字。如果读者觉得译为中文仍旧可以说“健在”那也无妨。但是我实在不希望她继续给中国老百姓带来苦难。我的意思只是说，正因为有她那样的人，才值得写杂文来加以嘲讽。

我承认，如果没有江青的霸道，中国也会出现好文章，比如刘宾雁的《人妖之间》就是。但也应该看到政治或社会的压迫，确实是能够促使作家们写出好的作品来。

关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

正面，再谈谈怀冰先生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毛泽东对杂文始终如一。”

怀冰先生说，不应该只看毛泽东说过，“鲁迅式的杂文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还必须注意他所说的写杂文的条件。毫无疑问，我们在引用别人文章时，尽管篇幅会受到限制，还是应该力求全面。而当初写杂文的人们，若是全面注意到怀冰先生提到的，像毛泽东所说的那些写文章的条件也许就不至于被打成“右派”。但我的理解是毛泽东发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时，是立足于“放”的立场，所以才讲了写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与缺点的杂

文也可以那样的意思，而这样的话也确实产生了效果。最近，我读了王若水的《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训是必须反对个人迷信》一文。其中说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那篇报告，“整个文章的调子 仍然是反‘左’多于反‘右’”。我觉得这一分析也适用于《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总体上的调子。前一篇文章原是讲话，是在 1957 年 2 月 27 日 而后一次报告是在同年 3 月 12 日。我猜想，在这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的政治看法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我怀疑，怀冰先生所说的毛泽东心目中的“政治限制”可能在讲话时本没有说 是在后来发动起反“右派”斗争之后补充进去的。即使是在讲话时说过，恐怕也没太强调。无论是说者还是听者，大约都没怎么在意。

在文章的后边 怀冰先生还提到了《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时代与社会背景。日本人对此已多少有些了解。在日本，大约并不会有人反对怀冰先生的看法。当时，我也写过评论，论及到它们与鲁迅杂文的关系〔1〕。我觉得，当时中国能够出现那些杂文，也许是因为环境有些宽松。可由于这只是我的推测，所以就写了“我以为，1960 年以后宽松一些……”那样的话，以留有余地。而怀冰先生却说：“竹内氏只说是‘大概是宽松’的缘故……”在这里 不必讨论“以为”与“大概”这两个词的区别。但应该声明的是，尽管怀冰先生转述我的话时带有讥笑的口吻，我当初这样说却是对读者负责的。

正巧，在前面提到的王若水的文章里，曾谈及毛泽东 1962 年初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虽然毛的讲话是在《燕山夜话》发

〔1〕 竹内实《关于〈燕山夜话〉——文化大革命的否定一切》，《日本读书新闻》，1966 年 10 月 10 日。——译注

表以后 不过二者之间还是有联系的 即首先有宽松的环境 才会写那样的杂文。王若水说：“在这次讲话中 号召发扬民主 让人讲话 并且提出了‘不抓辫子 不戴帽子 不打棍子’。……那些在三不主义的鼓励下讲了一些真话、对五八年的工作提出了些批评、为彭德怀讲了几句公道话的同志……”

在 1962 年初，《燕山夜话》大约仍在继续发表 其第三集的《前言》写于当年 3 月 25 日）。而这些作家开始写杂文的时候，尽管毛泽东未必愿意宽松 起码刘少奇是想宽松的。当然 对当时的具体情况，我们还知道得太少。我也不打算拘泥于自己的推测，不妨靠以后对细节的了解来加以验证。

对栗栖和怀冰两位先生批评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并非不同意。不过我觉得 过去人们把它视为‘神圣’的著作 现在又把它看作‘恶魔’的著作 来批评它 剥夺它的权威 并不能万事大吉。在 1949 年 7 月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 人们不是都举手赞成沿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路线走么？难道那是毛泽东强迫他们举手的么？而批判胡风的时候 人们也是依靠着《讲话》的权威。我想 对这些情况，我们还是应该冷静地分析。若是能从其中找到一些规律 并根据其来说明一些问题 我觉得那会很有说服力的。在我看来 毛泽东的《讲话》毕竟是‘人’的著作。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对某些地区，针对着特定的文化水平，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在把它收入《毛泽东选集》时 却想要修改成具有永久性、放之四海 不知指中国 还是全世界？）的经典著作 反而使其原有的合理之处减少了许多。所以 我希望今后如果《毛泽东全集》能够出版，这篇《讲话》不应该再像其被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那样改动了，以免使人觉得其作者并不真像是毛泽东。

至于对今后的中国文坛，我并不能像栗栖和怀冰先生那样

乐观。不妨举一个例子：在去年 10 至 11 月间召开的全国第四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夏衍曾致了闭幕词。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文艺创作和理论方面，不应该有任何禁区。但是，我相信，一个爱国作家、进步作家，特别是共产党员作家，在对他感到兴趣的题材、事件、人物进行创作之前，必然会考虑到怎样使之有益于振奋人们的革命精神，提高人们的道德和审美水平，必然会感到自己对祖国和人民肩负的重大责任。

这究竟是“放”还是“收”？读者自然会去认真领悟。这里提到了“爱国作家”、“进步作家”还有“特别是（为什么要说‘特别是’？）共产党作家”三种分类。令人不解的是，如果有的作家不属于这三种人，那么他是不是就等于“卖国作家”呢？尤其是“共产党员作家”这个概念，为什么现在还要提出来呢？这作为夏衍先生心中的理想，也许不好否定。可现在很难断定，将来它不会成为一个框框。尽管我的这种预测是否准确，还要看以后的情况。现在，我想结束自己的稿子，奉呈给怀冰先生。要是有人认为这是一场争论，那也无妨。在这次争论中，我从对方所得到的教益，肯定比怀冰先生从其对手获得的要多。对于这一点，读过这两篇文章的读者们，都会明白。

原载香港《争鸣》第 31 号，1980 年 5 月 1 日

茶的天地

——《中国品茶诗话》序

咏茶的诗 在中国相当多。

品茶的时候 能够产生诗 而作诗的时候 茶则可以助兴。

即使不说茶能够产生诗，仅就茶的本性来说，也是属于诗的。

当然不必说 在日常生活里 茶还能使额头渗出汗珠 让人们觉得轻松 重新打起精神来工作。

关于茶的这种种功效 诗中咏唱过 小说里也有描写。由于在文艺作品里，曾表现人们如此喜欢茶，茶就更加显得亲切了。

于是 我想尝试回顾一下 中国文艺作品里 那种种饮茶与品茶的情趣，重新在茶的天地里漫游一番。我想亲手查阅诗集、小说，并涉猎古典文献，将其中与茶有关的作品与内容翻译出来 使中国的茶文化更广为人知。

说起来 其实茶也并非仅仅出现在文学里。喝茶的“茶馆”，在日常生活里 也是时刻离不了的。

虽然我少年时代在中国生活过，却没有进过茶馆。不过在近一段时间里，自己竟屡屡想念起茶馆来了。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 连自己也说不清楚。

新中国成立四年之后，我又活着回到了那里，竟去了天津。我进了公园 看见园林工人在工作时脱下的上衣口袋里 插着自来水笔。在以前的中国 工人有自来水笔 是不可想象的事。不过在那公园里 也能见到旧时中国的情景。即在公园一角 架起帐篷 遮着阴凉，下面摆着一些粗木桌椅 那便是所谓的“茶馆”。有两个老人正在那里一边喝茶，一边说话。等我在公园里转了一圈 又回到那里 见那两位老人如先前一样 仍旧是边慢慢品茶 边断断续续地说着话。那气氛 真是太诱人了。

又过了四、五年 我幸运地有了去四川省旅行的机会。在位于成都郊外的杜甫草堂访问时，我去找厕所。一个人转来转去，忽然进了一个很大的厅堂。那里排列着许多中国式的桌椅，人们都静悄悄地品着茶。现在回想起来，那仿佛是附近寺庙里的大殿似的。

从乘坐的汽车里望去，市内也有不少正在营业的“茶馆”。不过 当时竟未能到那里边去品茶 至今想起来还很后悔。

到两、三年之后自己再访中国 去江苏的寒山寺时 记得曾在那庙门入口附近的休息处喝过茶。那是一座两层的建筑。向窗外望去，见有高大的白帆静静地从左向右移动着。当地多江河 大都靠船走路。那些堆满了农作物或杂物的船只 连船头和船体都看不见，只能见到白色的船帆，在随着时间和背景的变换 无声地移动着。

后来足足有二十多年 我未能再亲自到中国去。然而 那静静移动的白帆，总时时浮现在自己的眼前。

1979(昭和 54)年 自己又去苏州访问了寒山寺。但是 那个曾给我留有印象的休息处 已经关闭了 附近也没有了白帆。

人们在中国大陆（即新中国）旅行时，在火车里也能够体

味到“茶馆”的气氛。在列车的包厢里，靠近窗户有一张小桌子。上面摆着像奶糖纸包着的茶叶。把那茶叶倒进带盖的大茶杯（当时是随啤酒赠送的，有啤酒杯一样大小）里，等一会儿就会有服务员来给你倒上滚烫的开水。一会儿，等茶叶沉了底，便可以喝了。觉得时间差不多了，服务员又会来给你注入开水。这在冬天不必说可以暖身，而在酷热的夏天，这茶则能够驱赶暑气。

如果真是在“茶馆”里，客人要先买一包茶叶。在桌子旁坐下来，服务员会送上茶碗和灌满开水的茶壶。要是茶壶里没有水，服务员就用大水壶把开水注满。

服务员展示“才能”便是在这种时候。

服务员并非是把大水壶的嘴紧对着你眼前的小茶壶，而是在自己的胸前斜拿着大水壶。

如同日本的魔术师一样，让水从大水壶里远远地注进小茶壶里。

在阿拉伯国家，人们喝一种名叫“玛卡黑”的红茶。据说那里把红茶从壶里倒进茶杯时，也是一种“艺术”。

那是先把壶嘴紧贴着杯子，而倒水时则把它再高高地举起来。

不管是喝茶还是喝咖啡，我都想去那里看一看。

我前后共用了大约五年时间，才写完了这本书。其中有些图片和照片只得割爱，但也有新增加的部分。另外要说明的是，全书的章节，是按历史顺序编排的。

回想起来，对当初在杂志上连载这些文章〔1〕时那种犹如散步一样悠然的心情，至今还留有印象。

〔1〕本书中的大部分文章都首次发表于《静谧》杂志。——译注

我确实想永远停留在这本小书之中。

如果能使读者借助于它，进一步接触中国的典籍与风土人情，那这片茶的天地就会变得更加宽广起来。

程麻译自《中国品茶诗话》 淡交社 ,1982 年 1 月 26 日

《中国生活志——黄土高原的衣食住》后记

与罗先生（按我的习惯叫法，还是应该称其为罗漾明〔1〕先生）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以及怎样彼此认识的，现在的记忆已经相当渺茫，说不太清楚了。而罗先生与我不同，他的记性好，也许还记得。总之，我们是在京都时就相识了，后来到东京，才有了再会的机缘。记得与其在东京的交往，好象是开始于我们在翻译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学，也就是“人民文学”作品的时候。由于有些词语在字典里找不到，我便去向他请教。至今我还想着，罗先生很快就向我们说明（还加有身体动作）了什么叫“假眉三道摆”〔2〕，解释那是演员扮演的高傲的样子。而后来，尽管也是有事便互相联系，但接触逐渐有些少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大概是每月一次，或者隔月才见一面。直到大修馆书店发行的杂志《中国语》的专栏

〔1〕罗漾明（1920—），生于中国山西省。1949年京都大学毕业。1957至1980年，在日本NHK国际局工作。后任驹泽大学、樱美林大学讲师。——译注

〔2〕这是中国北方民间戏曲里的一句唱词，意为大摇大摆、神气活现。——译注

“茶馆”实在缺少稿子，我才又向罗先生求救。

在这个杂志的彩色纸页上开设“茶馆”专栏，似乎并非是我出的主意。但为了支持它，自己总不断地送稿子去。文章里有过 A 与 B 对话的形式，可其中的 A 和 B 全是我一个人。这种对话到了一定数量，集为一册^{〔1〕}，可以靠一段落了。然而，书店并不想让“茶馆”专栏停下来，不管是杂谈还是闲谈都行，只希望再继续座谈下去。因此，靠着罗先生矢志不渝的承诺，我们才开始了正儿八经的“对话”这也就是收入本书^{〔2〕}的内容。在这期间，我已搬到了京都来住^{〔3〕}，而对话还没有结束。我便请了罗先生到京都来，两个人曾在门前有白川河水^{〔4〕}流过的小旅馆里，咕咕囔囔地对着话。

罗先生还记得，他来日本后说的日语，在与荞麦店的主人问答时，搞得店主实在不明白，只好不要他的饭钱。也有过与某大学教师问答，曾窘得不行的事。前一件事在收入本书时被删去了；而与后者相似的，则有罗先生在书中的提问：在买卖土地时，是买方从价款中支付税金，还是由卖方支付？接着，又问：在中国，为什么是卖方出钱呢？

这实际上指的是：中国的地主把自己的土地里，那些没有收获却必须交税的部分，转租给农民时，要向农民支付与租用几年间的税金相当的钱数。这样实际上等于是由卖方来交税

〔1〕 竹内实著《茶馆——中国的风俗与世界形象》，大修馆书店，1974年7月15日。——译注

〔2〕 竹内实、罗漾明合著《中国生活志——黄土高原的衣食住》，大修馆书店，1984年3月1日初版发行。——译注

〔3〕 竹内实自1973年5月开始，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工作。——译注

〔4〕 白川是京都西北部的一条小河，从竹内实住所附近流过。——译注

金。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买方大体上都很贫困，他们交不出税金来。只能由地主掏钱来雇用农民种地，而买方则很缺钱花。我最近才知道，在日本，也有（或曾有过）用酒来支付工钱，让农民种地的所谓“酒地”。而在当时，自己听罗先生说那样的事，不过是莞尔一笑，觉得很值得同情。

然而过了不久，我看到北京发行的报纸上，也看到在农民使用人民公社所有的土地时，将土地搭配给农民，并要农民分担借款责任的事例。现在与过去当然不太一样，但我想，面对着贫瘠的土地，不管怎么动脑筋，也终究难以想出什么好的办法。

当然，我并非是想以这样的个别事例，来证明过去的事情，还没有成为历史。正像罗先生说的那样，希望我们所谈论的（应该说是请罗先生说的）种种话题，能够成为过去，并将永远过去。

罗先生所谈，不愧被称为“博识”。但这里所谓的“博识”，并非像是走在沙漠里，最终也碰不上绿洲那样的漫无边际的行进，而是以一个绿洲为最终目标的“博闻多识”。夏目漱石在梦中，曾见过一个雕刻巨木的男子，从那男子手里的凿子尖上远远望去，那巨木逐渐变成了佛的样子，因此而引起过感叹。^{〔1〕}实际上，当我们开始对话的时候，自己也并非没有像夏目那样，对这些对话后来能够集为一本书（如书那样的外形与内容），抱有些许的惊喜和奢望。

〔1〕夏目漱石（1867-1919），日本近代著名作家。本名金之助。1893年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英语科毕业。1900至1903年去英国留学。归国后任第一高等学校和帝国大学讲师。著有《我是猫》、《三四郎》、《明暗》等。此文见《梦十夜》。——译注

罗先生的故乡在山西省。更具体地说，是朔县。真是有点不好意思，直到后来，我才终于看到了《山西通志》。可惜的是，那时候已经没有了将对话与书本上的记载加以对照的心情（现在手头上的《山西通志》上有嘉庆 16（1811）年的序文。其原为雍正 12（1734）年的刊本，此为重校本。）

在志书里的绘画（是横跨两版的山西省全图）上，怎么也找不到朔县。我有些发慌，后来仔细一看，原来与我们常见的地图不一样，那是按北方在下面的方位绘制的（《山西通志》卷一，绘图）。当时的地名叫“朔州”。那时候我觉得，它非常靠北（从“版图”上看，北边还有很大的地方），已接近万里长城了。不过，在那几个县，或者是府（朔平府、大同府）的里边，还修了一道长城。也就是说，那一带是围在第一道和第二道长城之间。那无疑是为了在形势危险的情况下，即使是放弃了第一道长城，也不至于遭受外敌的蹂躏。

为了准确，我又查了《辞海》。其中的“朔县”项下注明：“位于长城之外。”那大约意味着，第一道长城崩溃后，还有存在着第二道长城。（《辞海》为 1983 年版，中华书局）按《山西通志》的记载，在很早以前的秦代，便在朔县修筑了城池，但不知为什么，不久又瘫痪了。据说，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一匹马，围着一个地方不断地转来转去。后来，在那个地方又修起城墙，就没有再塌坏过。因此，该地又称为“马邑”。（《山西通志》卷八，城池“朔州”条）不过，以此为名的，另外还有马邑县。在战国时代，这里是“燕”地的“中山国”的一部分，更早则属于“幽州”。

看《山西通志》里的绘图，在朔州的南面，确实也画有雁门关。按记载，“雁门关山在县东南六十里”（卷 22，山川“朔州”条）。

初唐的诗人陈子昂，曾经登上这一带的高丘，赋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歌词（《登幽州台歌》）

难以想象的是，陈子昂是怎样比罗先生以及罗先生的祖辈（即所谓“来者”）到了更北的地方，并在黄土高原上谋生的。

一九八四年一月

程麻译自《中国生活志——黄土高原的
衣食住》大修馆书店，1984年3月1日

在 北 京

到北京已经有几天了。昨天晚上，在一个地方与久违的朋友畅谈之后，要回自己住的旅馆，便雇了一辆出租汽车。

可那车在途中出了故障。于是，司机急忙跑开了，过了一会儿又跑了回来。他替我另找了一辆车。

夜已深了。画有四条车道的马路，让人觉得似乎比以前明亮了些，但与日本比较，还是有些暗。两侧公寓住宅里的电灯，大都关闭着。

在出租车里，有俄罗斯语的商标，车是“伏尔加”牌。我问摆弄着断了风扇皮带的司机，这种车要换零件怎么办？司机回答说，自己加工配得上。

在黑暗里，替换的车在不知不觉中来了，是“皇冠”。坐进去，正如那坏了车的司机所说，是新车，空调也挺好。

以上的经历，说得如此有声有色，也许有的读者认为我是在特意编造。而亲身经历的我，却觉得像是碰上了一个多少带有象征意义的事件。

现在，中国与苏联，以及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恰好就像是这个汽车替换的故事。那么以后，情况还会有些什么变化呢？

我自然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好转，“伏尔加”可以跑得痛快一

些。但中国会向哪里去？这却是我的关心与不安之所在。

几年前的北京，建国饭店几乎还是唯一值得炫耀的现代建筑。而现在，与之毗邻的京伦饭店，则称得上拔尖了。更令人吃惊的是，据说已在建设三十多层高的国际大厦。此外，十几层、二十几层的高层住宅林立，使人觉得那早已不是在摆摆样子。

借着所住饭店七层的窗户，远望那些高层建筑群，让人似乎有这里并非北京，而是莫斯科，或者是东京的感觉。

北京的饭店的大厅里，如同繁华街道一样嘈杂。因为那里有几台电话，急切的声音接连不断。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在那里是否讲中国话并无要紧。眼下在北京所讲的中国话，不知道为什么，让人觉得非常之快。

据说，北京可能会成为商业与会议之城。

在饭店的街道的对面，有一个公园。在其入口处，早晨会有老太太用力握着拐杖，弯着腰。一会儿，两个老太太走到了一起，高声喊道：几天没见了。

后来，有一个看似上了年纪的男人，在一根长棍的尖上绑了把剪子，从洋槐树上剪下槐花，然后收集了起来。问他在干什么，回答说那是药材。又问是什么药，则说能治高血压。而不知是在什么时候，他的旁边来了一位妇女，插嘴说：没那么回事。那男人并不和她争辩，把鼓胀的袋子挂在自行车两侧，走开了。

在地上，摆着五、六把练太极剑用的笔直的剑。一个妇女与卖剑的男人讲了点什么话，便把一块手表放在男人那里，拿了一把剑，进了公园。她说是要拿给熟人看，并去借钱。还说我是国家公务员，不会骗你拿跑了。临走时又加了一句说：你这剑卖五块五角一把，可我那表是七块钱买的。那卖剑的回了回答道：我认识你。

在这时，围观的人都在看热闹，而买卖双方则很认真。

在涉及不到政治的情况下，老百姓每天就是这样生活着。而他们的上层，也许离政治近一些，对政治就比较敏感。他们提着皮包，脚步匆匆，坐在汽车里。也许过了不久，那皮包会变成办公用的公文包。

至于中国的最上层，旅行者的眼睛是看不见的。

在这年（1985年）9月正在召开党（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会议。^{〔1〕}

面对着天安门广场的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三中全会以来伟大成果展览”陈列着统计数字、图表、照片还有新的产品。让人觉得，其中展示了社会舆论对正在召开的代表会议的热烈期待。可是到外面去看看，也能发现有因满员而坐不上公共汽车的孩子们。

如果是大学副教授，每月基本工资是八十元，另外再有职务补贴。据讲，新任的副教授说是工资八十元，实际上是一百六十元。不过物价也在上涨，鱼、肉和鸡蛋，涨了两倍到两倍半。两年前只卖一元钱的一瓶啤酒，现在是一元五角。

至于寄信，本市是四分钱（相当于不到四日元），还很便宜。^{〔2〕}

听说政府正在限制工资上涨。可要是当真实行限制的话，似乎靠工资过日子的人的生活，不会快乐的。不过，鱼的价钱上涨得那么高，也说明市民的饮食，确实是在提高。

这一次，到西安去了一周多。与两年前相比，那里的自由市

〔1〕 1985年9月13日中国共产党12届4中全会在北京开始举行。——译注

〔2〕 在作者写此文时的1985年8月底，100日元相当于人民币1元1角。——译注

场空前繁荣。大笼子里装着鸡蛋，蹲在地上的农妇们，排成长长的一列。在一个男子开来的两轮拖车上，满满地堆放着辣椒。鸡蛋白花花的，辣椒红艳艳的，非常漂亮。还有卖冬瓜、青菜、豆芽菜、肉、杂货和裁缝铺、补衣服的……

看起来像是卖单一饭食的小饭馆，可以供应一、两种食物。还有从中国古典文学里经常提到的岐山地方来的拉面馆。

在兵马俑博物馆前面，在西城门前，在去延安去的长途汽车站一带，卖单一饭食的小饭馆的白色帐篷排成一行，非常壮观。五十年前的中国，正在复活与再现。^{〔1〕}但不好好的，也有污水乱撒、剩饭和垃圾堆积如山之类令人扫兴的现象，以至于到了“不要乱扔垃圾，不要乱吐痰”的标语随处可见的地步。

就连从丝绸之路沙漠吹来的沙尘暴，也让人无可奈何。被人请看当地的传统戏曲，是我多年的愿望，觉得能有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可等演员翻跟头时，舞台上的白色沙尘到处飞扬。在舞台的前边，也积了一层厚厚的尘土。而主人出于好意，是让我坐在从前面数第二排的座位上。

我想，尽管无法制止从沙漠吹来的风，但为什么不能将尘土扫得干净一点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

饭桌上的杯子里，当然也有一张叠成块的餐巾纸。但一看，主人用它仔细擦过杯子的里边之后，又去擦盘子、筷子和调羹。然后，就用它们来装啤酒、果汁，或者是用来盛菜。

由于太麻烦，自己没有那样做。但我的女儿做得很认真，完了还铺开餐巾纸看了看。我从旁边扫了一眼，并没看见有污垢。

〔1〕一般的日本人认为，50年代的中国洋溢着新生的活力，并深受鼓舞。——译注

我打开带来的《谷崎润一郎〔1〕随笔集》其中介绍过美国记者到中国去，对列车里的不洁感到惊异的事。谷崎自己也曾因为那里的厕所不干净，到其入口处又返了回来。这篇文章写于昭和五年（1930年）（岩波文库版，18至19页）。

我很共鸣于他的感受。因为自己也对北京的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厕所“清扫得不干净”留有印象。

说到“不干净”即使是在日本的车站里也并非没有过，似乎不该吹毛求疵。可我曾靠近展览场所的地方，想进看起来扫得很干净的厕所里的休息室去，却被管理人员拒绝了，而且还在入口的门上挂了锁，据说那只是供贵宾使用的。

而展览场所里楼梯的平台，兼做了别的用场，大都很阴暗（也许是为了节电），不管是陈列史前到近代以前历史的历史博物馆，还是展示近代以后历史的革命历史博物馆，特别的展览另当别论，都看不到什么新的内容。

不过，在前面提过的谷崎的那些话之后，他又这样写道：

“不管引进多么进步的科学设备，一旦交给他们来管理”，“便都会变得分外懒惰”。显然，那是一种对西洋人的清规戒律与神经过敏感到厌恶的情绪”。

如果把那文中的“西洋人”换成“我们”，那我们对中国现代化的担忧，例如我在这篇小文里的这些指责，大约也称得上是一种“神经过敏”罢。

谷崎所感受到的“懒惰”，实际上是对他们的智慧的另一种说法。而用现在的话来说，它们就是正在提倡的“具有中国特色”。

〔1〕谷崎润一郎（1886—1965），日本作家。1911年东京大学国文科中退。主要作品有《春琴抄》、《细雪》、《钥匙》等。其曾于1918和1926年两次游历中国。——译注

的社会主义”。

我有时也不能不觉得，眼下海外对目前中国方向的批判论调里确实有‘清规戒律’似的狭隘偏见。

我认为 即使是在给予他们的帮助这一方面 也未尝没有问题。譬如，耸立在北京繁华街头上的日本某公司的巨大广告牌，就很欠思索，一点艺术性也没有。

对中日友好医院〔1〕的评价，也不太好。据说，有一个朋友因为交通事故需要动手术，其夫人竟在医院的走廊里站着等了一个半小时。

在北京，我也接触到一些纪念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四十周年的宣传活动，感到日中之间的裂痕确实还存在着。

不过，仅仅只是从一方的残暴行为的角度来理解过去的历史，恐怕也有负面的作用。如此看来，与其说勿忘历史，还是应该更正确地认识历史。

程麻译自《现代中国的实像》 苍苍社，1987年4月5日

〔1〕 该医院由日本政府出资协助中国建成，位于北京东北部的和平街北口。——译注

两幅书法作品

在我的房间的白色墙壁上，挂着两幅书法作品。

一幅上写着杜甫的诗《登岳阳楼》，那是大阪的有恒俱乐部成员中西篁梦氏挥毫书写的大幅字轴。

另一幅，则是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写的七律诗，镶装在小镜框里。在前年夏天，我在北京的法源寺，曾拜会过赵先生。自从五十年代他到日本时我担任翻译以来，实际上我们的交往已有二十多年了。那首七律诗是他 1985 年再游日本时所作 写在比叡山^[1]上远眺的情景，并特意为我书写的。其起句是：

重来更觉友情真。

这既是先生的体验，也恰是我在北京时感受的心情。

接着一句 则是：

[1] 比叡山是日本京都市东北的一座游览胜地，其上有著名的古老寺庙。——译注

老幼扶携逢故人。

这显然是指，我会面时带着女儿的情景。

自己也忝列中国研究者之列。在前后相隔了大约二十多年，不必说，其间久违了的中国，已有了许多变化。当我作为研究者，终于又一个人开始访问那里的时候，不知道先生怎么了解了这些情况，特意分神书写了这样的诗句，并送给我。

而中西篁梦氏，则是我在有恒俱乐部主办的旅行中，结识的一位朋友。

所谓我的房间，其实就是研究所〔1〕的所长办公室。在我就任所长时，承蒙篁梦氏送了一幅刻有“乾坤浮”三字的木板来祝贺。那字句的出典，源于杜甫的诗。而到今年3月我即将届满从所长的位上离任。

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时，我会暂时忘却了一切，仰望着这两幅字。在这时候，书法便意味着一种启示。

程麻译自《书灯》第479号，1987年3月1日

〔1〕 竹内实曾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译注

《转型期的中国》后记

这本论文集，是作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研究报告出版的。

以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为主 并汇集周围地区的研究者 来组织共同研究班 在三年或五年的时间里研究一个课题 这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一个特色。而这本论文集，便是其中的一个研究班 即现代中国班的成果之一。

现代中国班，曾分别开展过以下几个课题的研究：1975（昭和 50）年 4 月至 1980 年 3 月为“现代中国的政治进程与民众观念”；1980 年 4 月到 1985 年 3 月为“现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1985 年 4 月至 1987 年 3 月为“转型期的中国”。

以五年为一期的共同研究班，应该共进行三期。而最后一期所以只有两年，是因为我这个主管研究班的班长，即竹内实，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限。

所有经常参加这个研究班的人，差不多都为这本论文集写了文章。而在主管人的退休之年出版这本论文集，其中固然有把它作为常见的退職 或退休 纪念论文集的意思 另外 也是因为本人已到了退休年龄，想总结一个共同研究班的成果。因为毕竟这是已历时两年的共同研究，第一次出版论文集。

作为研究所的惯例，每个研究课题都应该分别出版论文集。本书则是该研究课题第三次共同研究的报告。当初想出版这样一种论文集，也曾受到过某种责难。这无疑应该由我这个主管的班长来负责。

这主要是因为，作为这次共同研究的对象的中国，既非古典、也不是历史的中国，而是变动着的当代中国。想想这个研究班开始的 1975 年这个年份便不难明白，那一正在转换中的研究对象是很难把握的。第二年 9 月 9 日 毛泽东逝世（此前不久，周恩来、朱德也去世了）接着发生了江青等“四人帮”被逮捕的事件。

在日本知道这事件是 10 月 12 日。那一天，在间周星期二晚上 6 点举行的定期研究会上，原定由佐佐木信彰报告国营农场问题，河田悌一讲在墨西哥召开的国际汉学大会情况，而我则要谈 8 月访问台湾的情况。可傍晚，在研究会开始之前，我从 NHK^{〔1〕}里的时事解说员那里，知道了“江青因未遂政变而被逮捕”的消息。研究会结束之后，此事便成了议论的话题。那是在会后饮酒的时候。当时几位研究会参加者已看过晚报，知道一些详情，开始对这一报道（即未公布理由而进行逮捕）还有点不太敢相信。

总的说来，所有参加研究会的人们，对此事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当然，有不同的意见而发生争执，那才称得上是共同研究。不过虽然如此，可为了展开争论，也必须具有共同的基础才行。在我们的现代中国班上，若说到其共同的基础，可以举出不少方面。其中之一，我觉得便是都对“现代中国”的强烈关注。像社会上一般的人，大都不太会从如此强烈关注的立场来观察

〔1〕 NHK 是反映日本政府倾向的电视、广播系统。——译注

周围的情况。他们缺乏如同学术研究那样，清晰地确定学术研究的对象，以便将其作为特定的领域来加以认识，或者是进行论究。

实际上，这当然也称不上是什么轻视。不过，对具有强烈关注意识的人来说，感觉毕竟还是有些不太一样。

正因为这样，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从 1975 年 4 月开始，创建了“现代中国”这一新的研究部门，以组织共同研究作为其主要的活动。自然而然地，这里便聚拢了内心里有种种想法，并愿意对中国的问题剖根问底的人。

在当时，由于其研究对象变动不定，想每五年出版一本研究班论文集，当然是有困难的。并且，情况往往是：虽然有以前面所说的那种强烈关注作为共同的基础，可大家的关心尽管热切，却未必就能够在一些问题的认识上实现统一。而在这一期间，中国也在不断变化。因此，虽然曾有想过出版论文集的计划，但由于不同人的理解常常有冲突，难以归纳出统一的主题。即使可以尊重各人的不同认识，而当出来校样时，也许中国又有了新的发展，于是又得分别由作者来加以修订。等到书籍真正出版了，说不定中国的政策也有了新变化，又会显示出种种不切合实际的地方。不过，虽然研究对象自身在不断地改变，可研究仍旧是必要的（其也能够具有价值）。只是研究班的参加者必须注意，不应该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由于中国自身的变动而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虽然并非是什么奇谈怪论），从而出现不足或是过分的评价。

尽管现代中国研究班没有出版过特别标示的研究报告，但像《亚洲季刊》第 12 卷 2、3 期合刊号（1980 年 6 月）的“现代中国的文学与世态”特集、第 13 卷 4 期的特集 I“中国的政治与文艺”与特集 II“鲁迅诞生百年纪念”等整期杂志都是研究班策

划，并由全体成员来执笔，并作为研究班的发表成果出版的。

另外像 1977 年由三一书房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 3 卷·附题解、注释》全三册、1978 年由讲谈社出版的《毛泽东早期著作集 民众的大联合》、1983 年由霞山会出版的《众人的墓志铭》、1983 年由风媒社出版的《邓小平说（全日译本）邓小平文选】》以及 1987 年由同合出版会出版的《中国文学最新事情》等出版物，也都是作为研究班的报告，或是经过讨论的。

除了整个研究班，某些个人或两、三个人合写的论文与出版物，也算是共同研究的产物。有不少就是首先在研究会上发表，或者是发表之后召集过评论会。

作为研究所的出版物，在 1981 年 3 月还发行过《毛泽东著作年表》上、下卷（上卷年表、下卷语汇索引）^{〔1〕}。上卷由中村公省执笔，下卷由中村公省、矢吹晋执笔。

还有，想与这本论文集同时出版（提出计划与开始编著，则早于论文集的《中国近现代论争年表》眼下除正在精心编著的最后一年部分之外，全部原稿已经大体完成。这同样是现代中国研究班的一个成果。此书原定由同朋舍出版，但由于包括自己的疏懒等在内的种种原因，出版拖后了，于是便又增补了一年的内容。

关于本论文集里提出的‘转型期’概念的内涵我已经在《序论》中做了说明。不过，正如自己在那篇文章里说过的，其实也不必太计较‘转型期’的定义。这本论文集作为历时 12 年的共同研究班活动的纪念，本想尽量让全体成员都参与写作。正如所见到的那样，其中也包括有为书名所容纳不了的内容。至于

〔1〕 下卷于 1980 年 3 月 31 日 上卷于 1981 年 3 月 31 日 均由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出版。——译注

其论述的课题 在这些年中 尤其是在这一特定的时期里 大都被我们所关心的对象，默默无闻地验证了。

尽管是这样 这本论文集 中所收录的每篇论文 当初并非全是为证明这个“转型期”以及为什么是“转型期”才提笔写作的。说明这一点也许有些画蛇添足，但仍然想在此记下一笔。

当然不可否认 在这个世界上，一些地方也许会存在着某些神圣的真理。然而共同研究班至今所产生的这些论文，却不是为了证明这些神圣的真理而写，也并非只有为这些神圣真理做注脚的意义（当然事先也没有特意商议过这一意图）

因此 我所写的这篇《序论》 只可以看作是一种探索的导引 既是其入口 也是一条通道。所谓“转型期”只是一种基本与笼统的理解。即使有些论文曾经言及这一命题，它们的认识也是从各自领域原有的问题中提出来的，充其量也只能作为以后也许可以深化的一种设想。但愿通过阅读这个论文集，能够使这些设想逐步地充实起来。

1987年9月17日竹内实

程麻译自《转型期的中国》京都大学
人文科学研究所，1988年3月31日

《 大地之子 与我》解说

在国外，当有朋友来访时，也未必都那么高兴。这里说的朋友，指的是南原勇一郎。而当时，我是在北京。

我到机场去迎接他。在去旅馆的出租车里，南原君潸然泪下说：“在电视里看了《大地之子》^{〔1〕}我哭了。”

南原与我 都是在昔日“满洲”即现在中国的东北 渡过了少年时代。我们在长春（当时叫“新京”）的商业学校 曾是同级同班的同学。南原有个一个好伙伴，叫森宽，两人总是在一起。他们俩，一个是卖寿司的饭馆老板的儿子，另一个则是木屐店老板的儿子。记得当时同学们在一起时曾议论过，好象谁也没敢去掀过南原家店铺的门帘（也许曾跟着父母去过），因为档次很高。而森家的店铺，则是在一条叫吉野的繁华马路的中心地带。

那时 从“内地”对日本的称呼 来的摄影队 曾在南原家住过。当时导演和摄影师都夸他很可爱。虽说搞艺术的都难免有些夸张，但南原毕竟早早见识到了外面的世界。而我是生活在

〔1〕 《大地之子》是日本女作家山崎丰子根据采访的素材创作的反映侵华战争期间残留在中国的日本孤儿生活经历的小说。后来此小说被改编和拍摄为电视连续剧。——译注

所谓的“母子家庭”母亲经营着旅馆，养育我们三个孩子，日子过得挺紧巴。

南原君曾被关押在西伯利亚。回国以后继承家业，不久成了市会议员，后来还当选为市议会议长。那次他来北京访问时，还没有退休。这里说的市议会指的是福冈市议会。

对他看过《大地之子》后哭了，我并不感到意外。

昨天南原收到了NHK^{〔1〕}的电视剧制片人河村正一先生的信。人家告诉他，正要播映《大地之子》，赶上有日本在中国的残留孤儿成批回国，便让他们看了这部片子。日本政府福利部负责这一工作的人，也给他打电话，说这些人是“流着眼看完的。”

当我听南原讲了这些情况，忽然想到森君的时候，南原又一次流下了眼泪。他说：

“森君的妹妹，大概是让苏联军队用刺刀捅死的。”

风闻森君回到日本后，不久便去世了。但关于他妹妹的死，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自己再也讲不出话来。

在北京的梅地亚中心，有一个NHK与中国在技术方面合作的机构。《大地之子》的录相带到了以后，那里的总经理实村明男先生，设法举行了一个首映式。我在那里看那部电视剧直到第七集。当时，从日本派到我所工作的北京日本学中心来的两位先生，也一起去了。（首映式的最后一次是在平成8年，即1996年3月20日。）

那时听说，这部片子马上会在中国放映。结果却未能做到，直到现在也没能实现。

《大地之子》是以日本人残留在中国的孤儿为主人公的故事。由于从中国到日本来寻找亲人和亲戚的日本孤儿，屡屡在

〔1〕 日本基本反映政府倾向的广播和电视系统。——译注

报纸与电视上露面,《大地之子》使人们感觉到“残留孤儿”作为一个用语,已经被人们认可了。

残留孤儿的亲人们,当初是根据日本政府的政策,作为由日本农民组成的“满蒙开拓团”的成员集体离开日本到现在中国的东北各地定居的。后来赶上了日本战败,苏联军队突破国境(旧“满洲国”与苏联之间的国境)攻打了进来。——在NHK播映的电视剧,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我现在松坂大学(三重县松坂市)担任名为“历史之眼”的基本教育课程。在去年的前一个学期,我专门以《大地之子》的录相带为教材(每周一、两节课(一节课90分钟)连续进行讲授。

第一次播映时,在教室前面的大屏幕上,突然出现了受到苏联军队的攻击,四处逃散的开拓团的老人、妇女和孩子们的身影。接下来,又出现了中国农民像获得猎物一样,分配着残留下来的日本兄妹的画面。

学生们看完了如此刺激人的景象,当播映结束时,一定禁不住会产生这样一些疑问:

(一)为什么日本的农民家庭会生活在中国大陆,而后来又

要逃跑呢?

(二)为什么苏联军队要进攻他们?

(三)为什么开拓团只有老人、孩子和老人,父亲们都到哪里去了?

于是,我根据事先设想的这类问题,在用连续两节课的讲授时,先用一节课进行讲解。

通过对每次播映的电视剧画面的讲授,使学生们能够带着问题再去观看录相带。

确实,这部电视剧的开头部分,是有一些问题的。

接着，在后来的授课中，还播放了在昭和 15 年即 1940 年拍摄的日本电影《大日向村》的录相带（《日本电影杰作全集》录相带 电影俱乐部发售）

《大日向村》是穷人的故事，看起来并不那么令人愉快。画面的光线也昏暗不清，相当费眼力。不过，看期末考试的结果，把握了其中的内容的学生，确实并不少。

这部电影，描写了日本长野县南佐久郡大日向村决定向“满洲”移居一半的人口，并实施这一计划的具体过程。这个村庄俗称“半日村”。因为它位于山谷中间，刚看到日出，太阳很快又落了。由于陷入了贫困，当时村里的负债额，高达 40 万元。农民梦想着，“满洲”那广袤的大地正等待着他们。“满洲国”的成立，确实使当时日本的这类矛盾，暂时得到了缓和。

因为若把“满洲国”包括在内，日本的“领土”足足扩大了近四倍。

电影结束时的情节，是留在村里的农民，送走了组成开拓团并出发的人们。人们顺着沿山间小河修建的公路，一直向前走去。而实际上，像《大地之子》开头那样悲惨的命运，正在七年之后等待着他们。仅仅有七年的时间，变化之大真是不可思议。

像这样的解释，可以回答上边提到的第一个疑问。而对第二个质疑，我举例解释了日本与苏联签订的彼此承诺互不侵犯的“日苏中立条约”（1941 年签订）。至于第三个疑问，还联系谈到了“关东军”和“全民皆兵”的日本义务兵役制等等。

借助于《大地之子》的这些故事，还可以进一步讲解“日中邦交正常化”、“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之类的问题。如此从电视剧入手，便于进行日本现代史、中国现代史和以日中关系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等课程的教学。另外，为了让学生们了解中国的自然条件，我还讲述过黄土高原，播映了电影《黄土地》。关

于当今中国的青年一代的思想状况，我放映了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录相带给他们看。

虽然是一边征求意见，一边讲课，但自己仍有点担心，不知道学生们是否能够接受得了。

考试的前一周，我在教室里宣读了试题，即“请谈一下通过讲课究竟在哪些方面给你下了印象？”使他们能有足够的时间，整理出自己的想法交给我（另有一道题是即出即答。）下面，举例来看一个学生的回答：

（前略）听说要看录相带 我觉得很高兴 也曾想欣赏有意思的打斗片。而实际上却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日中关系的片子。自己觉得很失望。我曾认为，那是自己最讨厌的问题之一（看那样的录相带非常无聊）。然而，从第一课开始慢慢看下去，仿佛是不知不觉地从梦中惊醒了似的。

我为什么竟会关注那曾经是自己很讨厌的问题呢？开头只是因为 在《大地之子》的角色名单里 有自己熟悉的名字。我确实没有想到，他能在那部电视剧演出。自己就是在注意这位演员在电视剧里演了些什么故事的过程中，逐渐被这部作品吸引住的。（说得有些迟了，那演员叫饭塚雅弓。后来 看的集数多了一些 自己想的问题也逐渐多了起来。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了。对此，我曾有过认为日本自身只是战争的受害者的想法。确实，他们遭受过原子弹，也有很多被伤害的人。而现在我觉得，同样不可忘记的是，日本也曾给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和韩国等，带来过很大的损害的事实。虽然自己以前也未尝没有过这种念

头 但与其他国家的人相比 要淡薄得多。

我也读过历史教科书 可其中强调的内容 只是“日本遭受了原子弹，在战争中失败了。后来，日本在旧金山公约上签了字。”至于以前日本军队许多无法饶恕的行为，却被掩盖了起来。通过看这部电视剧，我认识到，日本也有过显而易见错误行动。

其实在讲课时，我并未顺便提及害人者与被害人的关系，以及“大屠杀”等问题。然而通过被电视剧所吸引，学生们在理解主人公和出场人物的心情的过程中，达到了使他们思考以往“历史”目的。他们能够去反思在其他讲课中所受到的思想影响，以及从高等教育，甚至从自己所读过的书里得到的印象。这决非只是个别学生才有的情况。该答卷还接着说：

我觉得 至今在日本 还有很多人认为日本并未干过坏事，坏人都已经过去了，应该把他们忘记掉。可是，即使我们日本方面忘记了，那些遭受到伤害的人们，毕竟是仍然忘记不了，而且终生不会忘记。日本人对这些事情，应该抱有更诚恳的态度。这部电视剧，便能使人们进行这方面的思索（政治经济系 3 年级学生 U.M）

在这个学生的回答里，还写了对我讲课方式的不习惯及其要求。我感到非常坦诚。就是说 他写这些 并非是为了要分数来让我满意。

讲授历史是一件困难的工作。我并没有采用出示结论，让学生们去死记硬背，然后根据背诵的情况来打分的办法。我不是不会用 而是不想采用那种方法。

我主要是想 要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也就是使他们具有现场感。尽管完全再现当时的状况是不可能的，但我想提供公正的资料。就是说 我的态度是 要鼓励学生得出未必与自己完全相同的结论，不过这种结论应该是他们自己从头脑里总结出来的。

以前 我曾接过文艺春秋社中井胜先生的电话 说因为山崎丰子女士想写以现代中国为题材的小说，希望我见一下。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可以在大阪的日本航空旅馆里 边吃寿司饭团边谈话。那是我与山崎女士的初次会面，记得是在昭和 59 即 1985 年 7 月 25 日。中井先生也从东京方面过来了。

自己写过《毛泽东 其诗与人生》一书。那是一本把毛泽东的诗 其中有很多词 那是诗的一种形式 与其革命的经历结合起来分析的著作 由文艺春秋社在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前一年 也就是昭和 40(1965)年出版。承蒙合写此书的武田泰淳〔1〕先生答应得很痛快，担任责任编辑的池岛信平先生也同意接受了。而力劝我翻译毛泽东诗词 并建议我请武田先生合作 从分工到书籍装帧都一直负责到底的青木功一先生，却年纪轻轻就夭折了。毕竟由于这本书 自己才切实迈出了研究中国的第一步 因此 青木先生称得上是我的恩人。也是靠这本书 我与文艺春秋社结下了缘分。比如，中井先生就曾给我很多照顾。

不过 当初自己虽然没有明说出来 也曾有过担心 怕山崎女士的选材未必合中国当局的胃口 可能要碰壁 会使山崎女士扫兴。不过 山崎女士要求见我 自己也并未拒绝。当有人在探

〔1〕 武田泰淳(1912-1976) 日本作家。1935 年与竹内好等创办《中国文学月报》。1937 年参军 去中国作战。退伍后 发表小说《司马迁》。1947 年到上海。主要作品有：《审判》、《风媒花》、《秋风秋雨愁煞人》等。——译注

寻如何攀登中国这座大山的入口之处时，自己总是应该尽力提供一些帮助才对。

当时我觉得困难的 是自己对实际的中国说不上有多么熟悉，再加上研究得也不怎么深刻。因此，对山崎女士的写作计划，自己不好说就一定行不通，只是没有什么很大的把握。当然在彼此交谈的过程中 我还是提出了一些想法 比如应该尽量找各种人物进行采访之类。另外也说了点意见，即似乎向山崎女士表示过 其中的主人公虽然是日本人 但最好后来以中国共产党员的身份出现。如果发现了这样的人物形象，请通知我。

后来听说 山崎丰子女士接受了我当时的暗示 设计了陆一心，即日本名字叫松本胜男这样一个主人公。关于小说的这一点，我觉得挺有意思。

第二年夏天 我偶然去北京 听到了山崎女士克服交通不便等困难 设法去各地调查采访的情况。据说 采访的过程相当艰难。我是从第二天《人民日报》的头版报道中 知道了在这年 12月 7日，她会见了胡耀邦总书记，并当面提出要求的事。其实，我也并没有帮上她什么大忙。可以想象得出来，采访时的翻译也非常不容易。当时担任这一角色的，是现任立命馆大学国际学部副教授的夏刚。

正如前面引述答卷时所说的那样，学生们曾经被这部作品的情节所吸引 从而触及到了自己未曾经历过的“现代史”直到追溯应有的体验 以及个人的想法 等等。在这一过程中 也有学生在答卷里 谈到了自己在阅读小说原作时 觉得有比看电视剧体会更深刻的地方。

确实，这部电视剧具有迫使人们感同身受地回顾历史的魅力，进而也会唤起了人们了解事实真象的愿望。

不过另一方面 当初亲身体验过这一切 如今都已年过六旬

的当事人 当把自己那些不愿意说出或不太好说出、已经封存起来的痛苦记忆 再次向世上众人广泛传播的时候，一定会感受到另一番滋味。日本人一般不太善于雄辩。他们常常把想说的、悔悟的话 以及抗议的话 暗暗铭记在内心的深处。依靠着小说或电视剧 这些要表达的话语得以披露出来 这也许会有如同宗教一样的‘救赎’作用。

恰如前面引述过的学生们的答卷，说明了读者都会有自己对历史的体验。

读者 如同对自身有意见与不满一样 也自有对历史的看法或反感。

在中国 至今还没有可与《大地之子》相匹敌、追索同一时期并涉及日中两国的家庭或个人命运的长篇小说 不过 也能够读到描写抗日战争和关于“东北开拓团”的读物。最近 我便读到过类似题材的小说，不过其中颇有作者基于误解而去阐述历史的地方。

中国的小说，一般都描写过由日本军队酿成的悲惨故事。然而 对于文化大革命引起的可悲遭遇 反映得却并不多。这大概是出于领导方面不太愿意让写的缘故。但是，文化大革命不也是历史么？

我愿意提醒的是，《大地之子》里描写的人物命运 其实并没有结束。历史只有靠当事者的不断切磋，才能逐步被认识得更加深刻。

程麻译自《〈大地之子〉与我》 文艺春秋社，1999年6月10日 1

杭 州 日 记

二月六日（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星期四

中午在 S 君家吃晚饭。据说在年底应该吃丰盛的“年饭”，即在除夕之夜，一定要全家团聚，共进晚餐。

这也称“吃年夜饭”。可以招待朋友、亲戚和邻居，或者是被别人邀请。从几天以前，人们便开始准备。今年“农历”腊月只有 29 天。这里不叫“旧历”，而称“农历”。“新历”被说成是“公历”。

因为晚上冷，被请去中午吃。S 君住在杭州大学的宿舍楼里，登上了 5 楼，已经有点儿吃不消。据说 6 楼以上可以安装电梯，但这里只有 5 层。整座楼很安静。只见到邻居夫妇在 5 楼的走廊上，那里有煤气和自来水炒菜。

人们都回家了。这位 S 君往年也要回武汉的，听说这两、三年因为忙，便抽不出时间了。是 S 君及其夫人做的饭。他们在幼儿园工作的姑娘也在。中国的春节，相当于日本的新年，大学和商店都放假，农贸市场也休息。主人准备了一、两天的食物，让我带回自己所住的位于西溪路 47 号 22 栋的外国专家楼 301 室。

在床上伸开腿，在后背垫上枕头之类，打开正在读的《法国人和英国人》一书。这书是从家里带来的。直到读后才知道，法国与英国之间，竟是那样一种出人意料的关系。

无论哪个国家，都有对对方的异国情调情有独钟的人，他们会由于钟爱而引发出类似于爱情的东西。

这也像是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作者所写的感叹，仿佛便是对此而发。

有时候，自己不得不以较大的篇幅，来叙述两国民间传统的敌对情绪，来代替那美好愿望。

尽管如此，“但其中既非总是充满着幸运与光明，也不全是暗淡和痛苦。”如果说本书有什么作用那我无非是想通过它来说明，至今英、法两国的关系始终相当复杂。只有历史地分析问题才会看到，决不应该把英法两国之间的感情，仅仅归结为单纯的彼此交恶。“事实上给人的印象是两国在广泛领域里的彼此互惠。”（理查德·费巴著 北条文绪、大岛真木译 法政大学出版社出版）

法、英关系是欧洲区域里国家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已是欧洲历史上的常识。人们不管是从法国流亡到英国，还是从英国流亡到法国，无一不是想从流亡之地回首祖国，或是与流亡之国的政治局势休戚相关。两国之间那种在政治变动上忧患相连的传统，比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更为久远。

可以说像英、法之间那种“逢欢成仇敌 遇难变朋友”的关系，与日、中两国的关系基本上差不太多。值得注意的是，在后

二者之间，其瓜葛更多地表现为许多表面的冲突，除外之外则是彼此互不关心的冷淡。我在翻译今年早些时候出版的萧向前著《作为永远的邻国》（同合出版会）一书时已经觉察出了，倒是以前日、中两国间尚未恢复邦交时的关系，比现在似乎还要密切一些。

后来读着书，不知不觉睡着了。等醒来时，已经是下午 4 点钟。而 4 点刚过就响起了敲门声，原来是 K 君来了。他按着昨天晚上的约定，给我送来了“汤圆”。

明天是新年，他同我约好，要招待我吃饭。

由于连日来被邀请吃饭，身体有些受不了，真想休息一天。

到了 7 点，什么也不想吃，便吃汤圆罢。

打开提袋，见到汤圆的盒子上，印着注意事项。

煮汤圆的方法：

1. 水煮开后，放入汤圆。
2. 放入汤圆，待沸腾后，加进一杯冷水。等水再次沸腾，汤圆浮到水面，即可食用。

汤圆浮到了水面，约比大拇指头大一倍，有点像日本的粉团子，很是可爱。在热乎乎的皮里，有甜馅，好像还有点咸味。

过年，在北京吃饺子。

而在江南，则吃汤圆。

它们都是新年要吃的东西。

吃完汤圆，开始分类整理起自己的“关于毛泽东的藏书目录”^[1]来。每枚纸写 10 行书名，共 224 张纸，共约有 2200 册左

[1] 竹内实的藏书全部捐赠给了日本福冈市综合图书馆。——译注

右。自己参与翻译、三一书房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最早日文版，已被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馆收藏，但对其译文至今仍不太满意。还有为平凡社编辑的“现代史系列丛书”之一的《文化大革命》，已很难见到了。那其中的译文曾用红笔做过订正，自己郑重其事保存着。而大开本（有百科辞典那么大，但比其厚一倍）的《毛泽东研究大辞典》也没有收入这目录。它或许还摆在银阁寺〔1〕旁边的书架上。去年8月中旬，在北京参加毛泽东诗词国际学术讨论会时得到的材料，也添进这份目录里去。

去年2月，几位朋友到我在北京友谊宾馆西南区62814号的住处来，怂恿我参加这个讨论会。现在查查辞典，“怂恿”一词有“从旁劝说”及“劝诱”的意思（见《挑战者汉日辞典》福武书店。底线为引用者所加），也许我使用“怂恿”这个词未必合适，其实自己是被主办者热情邀请去的，我说“怂恿”不外乎就是那种意思。

幸好吉田富夫（佛教大学）、今田好彦（东洋大学）、小岛朋之（庆应大学）、徳冈仁（城西国际大学）、小木裕文（立命馆大学）和中屋敷宏（弘前大学）几位也都来参加，相伴到了北京。

在全体大会之后，吉田先生在小组讨论中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我在另一个小组讨论）。不过，最后一天在湖南饭店的午餐后，他与今田先生在卡拉OK时，高唱延安时代的歌曲，称得上是锦上添花，全身心地投入。

我在当时的感受已经写进《毛泽东的诗的艺术性》（《中日新闻》，1996年9月24、25日）一文里。自己的发言主要是将日本明治时期维新志士所写的汉诗，与毛泽东诗词进行比较。主

〔1〕银阁寺是京都市内一座著名的寺庙，位于东北部的一处园林中。——译注

办者希望我在年底前再做些修改，然后交给他们。

旧著《毛泽东 其诗与人生》(文艺春秋社出版)问世已有 30 多年。在中国正式发表的毛泽东诗词，也从 30 多首增加到了 67 首。要增补新的译文不太容易。当初自己的翻译原则，是希望一听就懂 还能保持原作的韵味 并保留原来的汉字。按口语翻译当然通俗一些 而主要想理解含义 其中的汉字会不怎么习惯。去年年底，我尝试以口语译了一点，如诗集开头的那篇《沁园春·雪》。

所谓中国诗的韵味 究竟如何理解呢 小时候 自己曾受到北原白秋〔1〕、原朔太郎〔2〕、大手拓次〔3〕、三好达治〔4〕甚至还有斋藤茂吉〔5〕、土屋文明〔6〕和会津八一〔7〕的影响。起初 我觉得中国诗很难理解。像杜甫的诗句：

家书抵万金。

〔1〕 北原白秋 (1885 - 1942)，日本诗人。被认为具有南方人的丰富想象力与重贞之心 作品带有象征主义色彩。著有《回忆》、《桐之花》等。——译注

〔2〕 原朔太郎 (1886 - 1942) 日本诗人。作为日本现代诗的代表之一 其诗作语言平易 意象怪异。著有《吠月》、《青猫》等。——译注

〔3〕 大手拓次 (1887 - 1934)，日本诗人。早稻田大学英文科毕业。其诗作有法国波特莱尔等人幻想、奇异的特点。死后出版诗集《蓝色的蟾蜍》。——译注

〔4〕 三好达治 (1900 - 1965) 日本诗人、翻译家。东京帝国大学法文科毕业。其诗风有传统汉诗和欧洲现代主义等多种风格。著有《测量船》。——译注

〔5〕 斋藤茂吉 (1882 - 1953)，日本和歌诗人。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毕业。主要有短歌集《寒云集》、《白山》等。——译注

〔6〕 土屋文明 (1890 - 1990)，日本和歌诗人。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毕业。曾任政法大学、明治大学教授。主要短歌集有《山谷集》、《韭菜集》等。——译注

〔7〕 会津八一 (1881 - 1956) 日本和歌诗人、美术史研究家。早稻田大学英文科毕业。主要短歌集有《南京新唱》、《鹿鸣集》等。——译注

自己觉得其中与钱相比的说法，有些铜臭气。像日本短歌里那种将感情激发到极致，然后加以抒发的手法，在杜甫的诗里很难看到。例如茂吉的短歌：

明晃晃的路向前延伸，无奈我这条性命。

这样的抒情诗，恰到好处地表现了青年时代方向不明的烦恼。但它并非是所谓的“宣泄”而是营造一种特殊的空间或时间环境，然后将情绪隐约表达出来。现代中国诗也有这样风格的了。

在中国诗歌里并非只考虑作品而认为人是根本，诗只是枝叶。其中也有作者刻划的时间与空间。理解这样的诗作，要先通过诗去认识作者的人品，然后再回过头来欣赏诗。

中国除夕的电视节目如何呢？看看各频道，新年的气氛都很浓厚。令人欣慰的是中央电视台有名的“春节晚会”有很多歌舞和相声，收视率又有上升。它有点像 NHK^[1]的红白歌会，意在扶持大众化的节目。可要是全家都盯住电视，团聚时的谈笑岂不是要会扫兴么？其实也用不着如此担心。

我决定睡觉。然而不一会儿，震耳的爆炸声突然响了起来，并且接连不断。这使人联想起日本夏天的焰火大会。打开窗帘一看，在楼宇林立的小区上空，烟雾弥漫。不久，小区的庭院里也处处闪起火光，鞭炮直窜天空，然后爆炸。还有从来未曾听过的像机关枪一样连珠炮的响声。

其实在晚饭后，自己已到外边去过。外国专家楼外的铁栅栏门，正对着妇女服装商店街（我随意给它起的名字），街道两

[1] 是日本基本反映政府倾向的广播电视系统。——译注

旁的店铺都已下了百叶窗，连一个人影也没有。我沿着百叶窗的墙边往西走去，过了 30 米，便来到大路上。往右去，是杭州大学的正门，离那里大约有 100 米左右。稍微再往前走，有一家理发店还亮着灯。在女装商店街上，只有这理发店还在营业，但是没有客人。我又走了回来，碰上了一个卖花生米的小店。想尝尝卖的花生米好吃不，便买了一斤，不想再回家去。

那店主说，他与我一样，也是外地人。而花生米的味道确实不错。本说 13 元一斤，后来则降价成了 10 元。

程麻译自《苍苍》第 74 号，1997 年 6 月 10 日

《人民币的‘面子’与市场意志》后记

这本书采用了老师与学弟对谈的形式，不知道读者是否会感到希罕。在大竹〔1〕君提出，想同我以对谈的形式共同出一本书以前，自己确实从来没有想过。

大竹君以前的著作《在与若林荣四《日本战记》Ⅱ）、增田悦佐《日本战记》Ⅲ）采用对谈的方式时，都是两个人的姓名并列。我以为这次也会沿袭过去的习惯，然而等打印出的原稿送来一看，自己竟被注明成了“老师”，心里觉得很不好意思。

也许未必准确，听说在禅宗佛教里，“老师”是用来称呼那些有能力指导别人的人。尊其为终生之师的弟子，对他的一言一行，都五体投地服膺。而我实在没有资格充当那样的身份，彼此的关系也并非如此。

当然，大竹君确实来听过我讲的中国语课程。一般在中国的学校，也可以这样称呼那里的教师。孩子、徒弟和学生，对

〔1〕大竹慎一，资产管理人。一桥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课程毕业。去德国、英国留学后，曾任三井银行金融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野村综合研究所研究员等。——译注

教过自己的老师，大都是这样叫。而在更多的情况下，这样称呼，则意味着在教室里听其讲课和学习，或是接受指导写论文之类。它是我喜欢的中国语里的一个词汇，发音是“Laoshi”。

在日本学校里，也有所谓的“先生”。不过，那样的称呼，主要还是用来指社会中的参政代表、律师，以及教授等特定的职业，情况有些复杂。而在 NHK^{〔1〕}广播里，都一律称为“样”^{〔2〕}，大约就是为了省去许多麻烦。

如此说来，似乎在日语里，还没有对男士的一般称呼。这可能是以前的日本社会，总把人区分为士、农、工、商等身份的缘故。而在中国，所谓“先生”，便是指男士。因此，有的日本翻译到中国去，由于被称为“先生”，便望文生训地觉得，仿佛自己的身份高了一格。这样说来，作为日常的中国用语，自己被称为“老师”，我也能够理解。大竹君也许就是按照中国语的意思，来称呼我的。

但他不该自称为“学弟”。一般是称作“学生”，然而作为自称，在中国，也并不用“学生”来代替“我”，或者是“俺”。只是在给老师写信等情况下，在署名的时候才自称为“学生”。他自称为“学弟”，有点自谦了。即使随便一些，读者也是能够理解的。

孔子说：“必也正名乎。”按这样的说法，既然是老师与学弟之间的对谈，那老师就应该给学弟以教益。但看过这本书的读者一定会觉得（或已经觉得），其中所谓的教益，并不是单

〔1〕 大竹慎一，资产管理人。一桥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课程毕业。去德国、英国留学后，曾任三井银行金融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野村综合研究所研究员等。——译注

〔2〕 日语里对人的敬称。——译注

方面的。也许正由于这一点，这本书让人感觉（到）还可以读得下去。

在当初同意对谈时，我所以痛快地答应了，实际上是因为自己想向大竹君请教几个问题。所谓“当初”，指的是 1995 年夏天。那时，我处在疑问多如牛毛的状态。至于都是些什么问题，看看这本书便可以明白。而其中的疑问之一，则是在经济，或者是经济学方面。

正像在这本书中所看到的，大竹君对于我的疑问，已经从经济的角度，或者说从以经济利益为重点的经济学的立场，做了快刀斩乱麻似的解答。不过，从这种简捷明快的解答中，也会使人产生出更新的疑问来。

我的意图，是想立足于文化思想的立场上。当时，日本的媒介异口同声地宣称，人民币将要贬值。而我从中华思想的立场出发，却认为不会贬值。在这样说了之后的来年 2 月，我首先在热海〔1〕召开的自行车竞赛管理者〔2〕的讲演会上，接着又在 8 月东京的亚洲大学亚洲研究所的夏季讲演会上，这样讲过。而这次在本书里，同样根据这些看法，与大竹君精心阐述的意见，进行了对话。也许这本书没像当时有些人那样对人民币说三道四，而显得不那么令人注目。但可以看得出来，在这次对谈里，向大竹君所请教的，是包括了上述问题在内的。

不管是叫纽约，还是简称为 N. Y，从那里的华尔街证券交易的“战场”上走出来的大竹君，始终据守着东方思想的堡垒，并从中汲取着营养。在校对这本书的过程里，我觉得像具

〔1〕热海，是位于东京西南 100 公里的旅游地。——译注

〔2〕日本的自行车比赛如赛马，属赌博性质。若选中选手可获得奖金，比赛的门票收入则归地方财政。——译注

有他那样生活态度的人，并不是很多。这也许便是大竹君能够不固步自封，通过结交朋友，形成自己的亚洲生活方式的根本原因。作为老师，我确实由衷地想向他学习。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

己卯年立秋之日于京都白川畔空竹居 竹内实

程麻译自《人民币的‘面子’与市场意志》，
森林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9月13日

“爱而不恋” ——记谢冰心先生

自去年秋天开始，有件事我一直难以忘怀。那是在北京访问谢冰心先生时，听她嘟囔的一句话。当时，我翻译先生的一本书出版了，去送给她。那本书叫《关于女人》，由朝日新闻社在1993年刊行。

这本书，以淡雅的笔调记述了 14 也可以说是 16 名女性。说是笔调淡雅，其实颇有意味。谢先生曾对我说的书里“没有一个坏人”的话回答道：“这世上没有坏人。”过了一会儿又补充说：“坏人也许只有我。”

实际上，在这话之后，先生还自言自语讲了一句：“爱而不恋”。但当时我没有将这话写进书的《后记》中。

在这以后，听说先生曾反复住院和出院。有一天，我到北京医院去看望她。原本身材不高的她，横躺在病床上显得很小时。我感到很悲伤。

不过与一年前相比，先生的语调并没有变化。她不时地随意问我是什么时候来的 现在住在哪里 有几个孩子 都结婚了么？

也许她的耳朵确实有点背，小女儿吴青把我的中国话，又大

声重复一遍给她听。说了一阵子 我想起了一个问题问她 就是前一年她说的“爱而不恋”是什么意思。

“那是孔子的话。”

这回答似乎有些意外，我有点没听清，吴青又问了一次。

“讲的是道德。”

接着 她解释说 即爱而不欲 讲的是“性”。又补充道，《庄子》里有“君子之交淡如水”的话。

先生说 再过几天 到 10 月 9 日 要过 94 岁生日了。吴青强调是 95 岁。她又问了我几个问题，并说：“71 岁的学生 来见 95 岁的老师。”并表述感想道：“难得的很。”

这是指在战后不久，我见过先生，还在先生讲课时做过翻译。当时还是孩子的吴青，现在已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英语和美国学教授。

当现代文学在中国开始出现的时候，谢冰心先生便不断地写作和发表文章。她有诗、小说、随笔和儿童文学 还参加社会活动。我向躺在病床上的先生提着问题，觉得内心很是不安。

“等出了院 和夫人一起到我家来吧！”先生这样说着 让吴青记下了我的电话号码。

程麻译自《中日新闻》，1994 年 10 月 24 日

王蒙先生事

在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 我对中国人坦率的言论 并不怎么觉得意外。因为自己是在军阀混战时期，出生于中国的农村小镇。所谓中国政治多变的观念，早已在我的头脑里扎了根。不过 当时读北京发行的文学杂志 由于没有进口渠道 只能借助于邮寄购买一、两册)也有从字面上难以理解的地方。那时写农民的题材很多，农民的语言并不怎么好懂。

后来 我看到一篇以北京市民 以及在党政机关工作的青年为主人公的小说。我逐字地认真阅读 印象很深刻。那是《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作者王蒙。

读后的感觉确实非常新颖，其主人公对新社会提出了批评。但很快“反右派”斗争便开始了。所谓“右派”是给那些批评新社会的人贴的标签。后来“反右派”成为了社会运动。王蒙也成了“右派”。那是在 1957 年。接着 发生了“文化大革命” 道路更加曲折了。而在那以后 王蒙曾担任过文化部长 不久前辞了职。

去年，王蒙来过日本。那是日本三洋电机公司的川西重忠先生帮的忙。川西先生在北京工作时，与王蒙先生有过交往。他将王蒙到日本的消息告诉了我，使我有机会在东京的松本楼

与王蒙初次见面。后来，我便对王蒙称“君”了。

王蒙君在“文革”后发表了小说《蝴蝶》，评价很高。他尝试使用意识流的风格，突破了以往所谓主流的“人民文学”的局限。我的挚友相浦泉，将这篇作品译成了日语，由美铃书房出版。

仿佛王蒙君生来就是为了被批判似的。他还写过一篇以粥为题材的短篇小说，曾获得当年短篇小说优秀奖。然而，突然出现了批判性的文章，而且那口吻与文化大革命时期整知识分子的批判论文一模一样。王蒙愤然反对这样的批判，并诉诸了法律。法院对此的反应，还有几重波折。

由此我觉得，“粥”称得上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侧面。自从王蒙君的“粥”成为问题以后，有些人发表了一些关于“粥”的随笔。这使我对“粥”的知识丰富多了。

前些日子，我终于拜访了王蒙的家。那是一座传统的四合院，红漆的大门。王蒙很健康。

与王蒙见面时，我提到他在关于北京胡同的随笔里，曾写过小时在父亲的书房里，看到有日本人的书。王蒙微笑着回答，说父亲曾经在东京大学教育学部留学，所以常有日本客人来往，但没有一个是军人。

程麻译自《群像》第 54 卷 12 号，199 年 12 月 1 日

下 编
回顾战后中国研究

日本人心目里的中国

有时候，我注视着自己那破旧的书架，会突然感到热泪盈眶。那些书，是我从熟悉的书店老板还很年轻时，在书店里陆续买来的。它们破旧理所当然，而自己所以时常对它们感慨万端，主要还是由于其中的学术性内容。

那几排书架并列在一起。其中令人瞩目的，是日本人所写的与中国有关的著作，书名都差不太多。这些收集于五、六十年代的书籍的脊背上，几乎全冠有一个“新”字，像《新支那的……》或者是《支那的新……》之类。甚至连“新”字也觉得不过瘾，还有使用“最新”与“最近的……”等词。至于它们的出版时间，是明治、大正和昭和年代，什么时间都有。每当看到这些书里面的“支那在变化 请看支那”之类的话，我便会禁不住地魂牵梦绕，那感觉几乎足以掉泪。

后来，日本人使用的字眼，又从“支那”变成了“中国”。至今我还记得，那时自己最容易动情的，是对中国近、现代史上那屡见不鲜的、天翻地覆的政体变化。因为可以想见，在那些过程中，中国的民众无法躲避历久不减的生活苦难。一般的青年人，不管对学问还是艺术，大都愿意从思想的角度去加以理解。希望依靠思想的力量，社会至少是个人的实际生活，能够等到一些

改善。等到他们成了老年，衣食俱全之时，他们的儿子或是女儿，又会重新以这样的态度，来看待学问和艺术。也正因为如此，弱国、弱小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青年人的痛苦呻吟，甚至从日本那些带有偏见的研究者们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在距今 40 多年前在日本第八高等学校〔1〕留学的郁达夫曾在其小说〔2〕的末尾喊出过：“祖国呀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我觉得，那实际上决非只是他一个人的呼声。

当然，人的感情是相当复杂的。我的感受，也并非如上面说的那么简单。觉得中国“更新了”或是中国“变化了”只不过是当时日本一般读者的说法。在日本人研究中国的领域，最常见的仍旧是中国人那种无处不在的强烈屈辱感。我应约所写的多数文章，也大都是关注这种常见的耻辱意识。对自己来说，它们已经是天经地义的了。当然，随着时间和形势的推移，我的工作虽然主要仍是面对中国人的这一类感受并将它们反映出来，但自己对类似感受的怜悯，以及对它们的伤感，也似乎难免有些淡薄。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常常有热泪盈眶（未必一定流出泪来的时候）。

后来，从一个因要盖房子而来自己家挖掘地下室的男人身上，我恍然联想到了在中国新变化里，那始终不渝的中国形象。为此，自己按照这样的印象，确实曾经尝试着做了一些工作。

回过头来想想，我的这种种念头，并非仅仅是开始于注视那些书架而感慨万端的时候。早在此前十几年，当听见人们以如饥似渴的心情提到“新中国”这一称呼时，自己对其并不怎么太关注。与之相反，我倒是常常注意那并非在访问或研究中，而是

〔1〕二十年代的日本第八高等学校，位于名古屋。——译注

〔2〕指郁达夫在日本留学时创作的小说《沉沦》。——译注

在普通日本人心目里的“旧中国”观念，对其抱着怀疑的态度。也就是说我觉得如果不能否定‘旧中国’的意识，——也许称之为与‘旧中国’决裂更好一些。——那么“新中国”的观念无论如何也不会人们的心里扎下根。

于是，我决定了解一下，以前日本人曾经是怎样看待中国的。而在实际上，这个问题所涉及的范围非常之广。最近我想起来了，由于自己找书很困难，当时在看旅行记和访问记时，决定将作者是军人或是政治家的著作，排除在外。因为这些人的中国观，已经被历史学家和研究国际关系的人采用过了。那种成型的结论，并不是我想关注的。……至于像日本人调查庐山地形时所写的那些东西如被中国人视为‘魔鬼’的冈村宁次〔1〕关于中国见闻的小册子，尽管非常详尽，我也不愿意光顾。

我想总结的，是那些本人尚未很好整理过，但可以引起自己兴趣的东西。即使其中的观念未必很清晰，至少我要觉得有些意思，即它们应该是那种蕴含着人生的真实感受，或是反映生动体验的著作。如果其中所发现的，并非与人的真实情感有联系，尽管可能在考古学研究上有相当的价值，自己也不会对之有多大的兴趣。另外，还有那种虽然有人猜测过，或是作为常识已经广为所知，但由于以在中国实地的见闻将之推翻之类的报道，也很值得看。而那些在报纸或书刊里所发表的调查报告，即使是其报告被证明十分优秀，却未必能反映人们在中国的实际生活，我也同样排除在外。

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如果不那么求全责备，我认为在明治

〔1〕 冈村宁次 1884—1966) 日本战争罪犯。1913年陆军大学毕业。先后任日本驻上海、北京武官、关东军副参谋长、北中国方面军司令官 直至中国派遣军部司令。战后曾任日本友会联盟会长。——译注

时代 竹添井井〔1〕的《栈云峡雨日记》(明治 11,1878 年)和冈千仞〔2〕的《观光纪游》(明治 17,1884 年)首先值得注意。前者是地道的游记 而后者的特点 则在于其中有作者与中国人关于时局的争论 并最终说服了他们。起初 我对冈的那本书原怀有反感。在两、三年前 就曾想写篇小文来说说它 但竟一直拖了下来。这可能是因为在后来,自己的想法有了一些变化。至于竹添的著作 则完全是以文学文化人的眼光 将所经历的景色与见闻,尽心尽性地倾注于比中国人毫不逊色的诗文当中。

阅读这两本书 如果能够拉开点距离 便不难觉察出 尽管不可一概而论 但其中大体可以区分为静观中国 或是与中国有些瓜葛,这样截然不同的两种姿态。而近年来日本人谈论与中国的关系的文章 与冈千仞那样的著作 正在逐渐多起来 其特点似乎很是流行。不过 其中的绝大多数 仍旧还是像竹添似的关于战后中国见闻的报道。至于阿部知二〔3〕发表在《世界》1965 年 4 月号上的《近代日本与中国》一文 究竟应该归入哪一类 虽然自己把它读了两遍 还是觉得难以下断语。我所以有这样的感觉 是因为这篇论文 试图从全新的视角来展望日中关系。它是作者在反对中国核试验的声明上签了字,又作为访华代表团的团长,在北京参观了国庆节游行后的发言。他注意通过一个个具体的见解,从总体上来理解中国。在这种总体的理

〔1〕 竹添井井(1841-1917),日本明治时代外交官、汉学家。原名竹田进一郎。曾任日本驻天津领事、驻清朝政府公使。——译注

〔2〕 冈千仞(1833-1914),日本明治时代汉学家。原名冈修。1880 年任东京府学教授,后任东京图书馆馆长。其设办的私塾绥猷堂共培养弟子 3000 人。曾访问李鸿章并送“清国改革论”受到李重视。——译注

〔3〕 阿部知二(1903-1973),日本作家。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毕业。明治大学教授。主要作品有:《冬眠》、《幸福》、《北京》《风雷》等。——译注

解中，当然还有不少的疑问，但由此更加深了对中国的认识。因为基于理解的目的，质疑是会由质疑者自己来加以消除的。在实际上，并不需要中国的文化人，来亲自回答日本人对中国的种种疑问。如果真能够听到那些对中国的真实感受，就有可能使日本人在对中国的理解上，扬弃以前如同竹添与冈之间那样截然对立的态度。

在明治时代，涉及到中国的，也并非只是像见闻录之类的东西。在文学创作方面，还有与竹添或冈的风格迥异的作品。例如桃中轩云右卫门也就是宫崎滔天〔1〕的《盖世危言明治国姓爷》〔2〕（明治36,1903年）和岩垣月洲〔3〕的《西征快心篇》（安政年间？约1857年）。后一书也许不好划入明治时代，但是作者活到了明治6年因此也不妨这样归类。

前一书是浪花节〔4〕的脚本曾经在《二六新报》上连载。故事里的主人公少年，对俄罗斯怀有强烈的义愤。他偷渡到了西伯利亚，在那里与中国秘密团体的革命家结交以后，又去了欧洲流浪。最后其为实现人类和平的理想产生出了“世界联邦”的设想。作品里的人物都很强悍，他们不断追求新的理想的进取

〔1〕宫崎滔天（1870-1922）日本明治、大正时代志士。原名寅藏，号白浪滔天。与孙中山结识，支持中国革命。其曾拜著名艺人桃中轩云右卫门为师，演出日本说唱艺术“浪花节”。——译注

〔2〕国姓爷，指中国明朝名将郑成功。其因战功被明朝皇帝赐姓朱，故又名国姓爷。宫崎滔天在日本艺术“浪花节”中演唱的人物为明治志士。此作品名意在表示其功绩可与郑成功相比。——译注

〔3〕岩垣月洲（1808-1873），日本德川幕府时代和明治时代儒学家。原名冈田龟。曾任儒学教授与校长。著有《月洲遗稿》、《二十四史评》等。——译注

〔4〕浪花节是日本一种民间说唱艺术，以三弦伴奏。内容多为军事、历史和民间故事。江户时代从大阪兴起。在明治时代，桃中轩云右卫门是最著名的浪花节艺人。——译注

性格，可以使人受到男人世界的魅力的感染。而其中对人物的思想由民族主义向国际主义演进过程的描述，也使人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

不知道口头演唱的效果怎么样，仅就作者具有创作如此富于思想性的浪花节节目的胆识而言，确实已很难得。

与此不同，《西征快心篇》的大意是写为挽救被英国侵略的清朝水户烈公〔1〕自愿率领精兵 8000、军舰 10 艘和汽艇 4 只，经中国、印度去奇袭伦敦并以英国女王为人质，将英吉利分别割让给了俄罗斯、德国、荷兰、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诸国。他谢绝清朝皇帝的褒奖之后，又回到了日本。在中国方面，书里则有共同参与策划此举的魏源登场。

滔天的作品最后否定了民族主义思想，而《西征快心篇》却自始至终宣扬民族主义观念。然而，那并不是各民族平等的合作，而认为只有以日本民族主义来取代亚洲各民族落后的民族主义精神，才能使人们获得解放。

因此，那里面的中国不过是同女性一样，被动地接受日本的民族主义。而非像滔天作品里的主人公那样，能够对日本的民族主义观念给予某些启示。

关于日本人心目里的中国，其中日本人对中国的距离感也是个值得一提的话题。以前曾承蒙《中江丑吉〔2〕书信集》编者之一的伊藤武雄先生，将那书赠给我一本。后来选了一个休息

〔1〕烈公是日本江户时代水户地方的藩主德川齐昭（1800—1860）的赐号，其为当时“尊王攘夷”派的代表性人物。——译注

〔2〕中江丑吉（1889—1942）中国研究家。1914年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并以袁世凯的日本法律顾问有贺长雄秘书的身份去中国，次年辞职。后接受曹汝霖和西园寺公望的资助，在北京生活。晚年接受“满铁”（日本南满洲铁道股份有限公司）的研究费，预见日本侵华战争必败。著有《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等。——译注

日 自己埋头阅读起来 竟连日落也没有察觉到。说到中江丑吉的学问，最令让人羡慕的，无疑是他对北京的沉浸态度。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他对自己理解得越清楚 就越是意识到与中国人之间的距离。

我这样讲 自然不是想轻率地批判中江丑吉。一般来说 从大正时代到日本侵华战争失败这一期间生活在北京的日本人，他们所患的“恋京”病 实际上是其最惬意的状态的标志。那是一个可以让日本人毫不顾忌自己的国籍 或者反过来说 由于是日本人，因而只能对北京的市井生活进行浮浅接触的时代。

隔离着这些人的，当然是日本的国威。尽管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未必全都是如此。其实，眼前中国的风俗以及政治事件，随时都是可以引起兴趣与观察的对象。那些中国人感到不便的方面 日本人恐怕也同样难以幸免。那种不直面权力 不必关注社会 没有社会往来 只沉缅于闲情逸致之中的状态 在一定意义上确实称得上是理想的人生境界。日本人所谓的“恋京”固然是缘于那胡同里的叫卖声 那凝聚着历史感的城墙 以及那紫丁香花的香味之类的异国情调，但也未必不是因为他们能够无意识地 从日本所遭遇的空袭等常见灾难中得以“流亡”。并且，在昭和年代的一段时间里 日本人去中国 连中国政府的签证和日本政府的护照都不需要。在中国 有着无需到“国外”去时的烦琐手续的理想天地。不必提两国在地理上的距离 即使是在日本人的心理上 他们与中国的距离 也几乎是等于零。

至于一般日本人感受到与中国之间的距离，那是始自新中国成立以后。这其中日本人在日中关系的观念上经历过迂远曲折的缘故，另外，也与日本人研究新中国所走的歧途有些关系。这首先是因为 新中国的成立 使日本与中国之间出现了隔阂。这种隔阂并不能以多少米来计算，而是从零距离走向了另

一个极端也许可以符号 ∞ (无限大) 来表示。中国开始以“国家”的尊严站在了日本人面前。为赚钱、为探究文化、为了厌恶日本、为幻想……任何一种理由都无法再使日本人随意到中国“流亡”了。正是这些原因，否定了日本人对中国零距离感。我觉得这种种的“无法”显而易见并不能说明日本人对中国的距离感是合理的。这种不合理只是借助于“国家”的外衣为掩护另外也由于曾经强烈地批判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缘故人们并不觉得有多么明显罢了。后来，尽管日本也承认中国这个“国家”的存在以及她的意识形态但与中国在感情上的距离感仍隐约可见。无宁说正因为这种隐隐约约的情感距离日本对新中国成立后不断增长的尊严，显得很无可奈何。

如此情绪与现实之间的错位，或者说面对现实时心情与事实之间的矛盾等等都使“距离零→距离 ∞ ”这种转换模式连带地衍生出了许多问题。比如对去中国观光旅行，就有影响。我曾应一位朋友的要求与其交谈在他的一次旅行中是否应该带上对中国的浓厚怀旧意识，俩人纵情讨论得竟然忘记了时间。至今我对日本民众中那种对中国“野火烧不尽”的依恋感仍然记忆犹新。即使说到日中贸易和日中友好“运动”故且不论理想的状态究竟应该是怎样，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其深层次上，也有这种零距离感在起作用。

假如真是这样也许有人会反问难道亲近感还不够只有热爱才好么而实际上在日本人里也确实存在着对中国的厌恶或是反感情绪。我认为，这种厌恶与反感，便产生于距离感。比如日本人在评论毛泽东的功过时与评论肯尼迪的功过其口吻就不一样。

当然我也明白亲近未尝就不会演变为其反面即厌恶或反感。这意味着由于情绪和无意识因素难以割舍，“爱憎”也许将

是人类永远说不完的话题。然而无论如何，自己总希望理智能够起更大的作用。……至于说到我对“零距离到距离无限大”这一变化模式的注意，那显然应该提一下最近中国研究里的某些成果。

不知是由于山田宗睦^{〔1〕}的再三推荐，还是自己注意到的，我发现中岛岭雄^{〔2〕}在其所著《现代中国论》（1964年）里已经先我一步意识到了上面说到的那个“零距离到距离无限大”的演变公式。这使我觉得更应该确认这一公式。至于那本书的出版有什么样的象征意义，也许起码得再过5年的时间才能看得较为清楚。如果到那时，其出版价值日益明显，自然也难免会自己在情绪上生出许多感慨来。不过，该书毋庸置疑开始写自作者与对中国的零距离感诀别之时，这一点毕竟还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尽管也不太好说，作者从此以后，是否就一定能够立足于距离无限大的态度。关于它的意义，我认为主要在于作者批判了对中国的零距离感，从而起码使自己摆脱了当初与中国浑然不分的状态，也就是说，他已经不再是零距离感者了。不过作者在进行这种批判时，还应该考虑到的是，它在对方身上是否真正能够产生效果。要人们转换成距离无限大的态度，其实也并非有那么容易。

我觉得，所谓批评或自我批评，与告密或申诉意见不太相同。它为的是通过发表文章，能够使读者具备一种心态。这种心态，便是所说的敢于正视现实。

〔1〕 山田宗睦（1925-），日本评论家。关西学院大学教授。著有《战后日本精神史》（合著 笈。——译注

〔2〕 中岛岭雄（1936-）中国研究家、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1960年东京外国语大学中国科毕业。著有《中国革命是什么》、《中国的悲剧》等。——译注

但是，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像在中苏争论里看到的那种种批判，至今仍会让读者觉得不很舒服。因为在某种程度上，那样的争论带有与对方面对面辩驳的气氛。接受批判当然并不一定要如饥似渴，但也应该让对方听得进去，也就是要使“矛盾同一”。如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运动也能有这样一条共同遵守的规则，那也许可以形成一种非常融洽的局面。以对象化意识为基础的距离无限大的态度，无论冷淡到何种程度，人们都无权指责。但我觉得，作为研究的一种新方法，今后还是应该把立足于批判或自我批判基础之上的零距离感，视为国际主义观念的一项基本内容。当然，对于如何确立这种理论上的零距离感，我现在并没有什么把握。

如今在人们的眼中，好像只有那些用以规范民众的不同‘国家’。虽然也未必没有对这种状况发出反感的声音。而在文人趣味之类中表现出来的零距离感，也许至今还不失为一种可能有效消除‘国家’给人们带来诸多不便的观念。

在相当程度上，日本人至今仍属于那种怀有依恋中国文化的文人情趣的信奉者。中国曾是他们逃避日本现实的去处，也可以成为他们批判自身世界的立足点。不仅如此，将中国文化引入日本人的生活，除了能够冲淡他们的心灵苦闷，也会把个人的小天地与中国文化的丰富空间结合在一起。通过这种联系，如果可以理解中国文化的深奥底蕴，那无疑将非常富于吸引力。以故人而言，像青木正儿〔1〕、铃木虎雄〔2〕等中国文学研究者，

〔1〕青木正儿（1887—1964）中国文学研究家。1911年京都帝国大学国文科毕业。曾任同志社大学、东北大学、京都大学等校教授。著有《中国近代戏曲史》、《中国文学思想史》等。——译注

〔2〕铃木虎雄（1878—1963）中国文学研究家。1900年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文科毕业。曾任京都大学教授。著有《赋史大要》等。——译注

无一不是这样。而长与善郎〔1〕以“满铁”（日本南满洲铁路股份有限公司）顾问的特殊身份多次去中国旅行时，则发现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是所谓的“古董文化”。于是，当他沉浸于日本人那种迷恋古董的趣味时，也就对中国文化有了零距离的感受。

我不想随意贬斥长与善郎的情况。他也许只是要从毛泽东所说的“只争朝夕”的窘迫境遇中逃脱出来，才能有怀念那种像“古董文化”一样千年不变的感觉。因为长与把中国文化的本质断定为“古董文化”，他无法共鸣于当时中国的现代青年们改革传统文化的热情。他在中国旅行，就有这样的感受。因此，长与对中国文化的零距离感，同时也就表现为对中国社会现实保持无限大的距离。可以将这种心态，视为日本人对中国怀有兴趣的一种类型。

我当然不同意他的这种观念。然而我又觉得，以前日本人曾经仅仅把新中国理解为“革命”。而在这一“革命”过去15年之后，当日本国内对“战后”社会状况的批判态度日益抬头的时候，以往日本人潜伏在对中国的情趣里的那种文人倾向，重新以种种形式表现在日本人关于中国的观念中，其实也未尝不可以理解。

实际上，在历史中，对中国的距离无论是零还是无限大，无非都是多次受到来自中国的刺激所出现的情绪变化。

提到日本人心目里的中国，其中两者之间的文化关系，确实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当然，自近代以来两国的军事关系（即日本侵略中国）是不堪回首的。但即便如此，也不能排除其中确有

〔1〕长与善郎（1888—1961），日本作家。东京帝国大学中退。与武者小路实笃等创办《白桦》杂志。三十年代曾接受“满铁”（日本南满洲铁道股份有限公司）的邀请去中国访问。著有《他们的命运》、《项羽与刘邦》等。——译注

文化方面的因果关系。从日本士兵的心理角度来看，同样可以这样说。

在这之中 到底历史上的文化联系所占的比重较大一些 还是应该更着眼于未来 我说不太好。不过 要求两国在文化关系上十分亲密 即使在一定程度上未必那么现实 也很有必要在关于日中关系的研究方面，注意深化民族主义观念的问题。如果真正能有所进展，就有可能使两国之间自然而然地形成比表面的亲热更靠得住的内在依赖关系。

而在当前 即在联结过去与未来的关节点上 目前仍存在着两国邦交尚未恢复的问题。说到与中国的距离感，无论两国之间的情况有多么大差别，我们都必须正视彼此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现实状况。看今年 1 月份的报纸，似乎各家都在谈论中国问题。实际上 从去年 11 月以来，报刊上已没有一天不以某种方式涉及到中国，这些内容占用的版面还相当大。即使关于越南的报道，也是直接或间接与中国有关系。如果有人统计一下 这一点会显得很清楚。其实 中国现在并不怎么在乎中日关系。法国承认中国，意味着世界已与中国建立了联系。再看看今年 1 月的日本各大报纸 虽然在关于国会的报道中 大体介绍了各种政党与派系对与中国关系的政策，可并没有谁想到可以使两国接近的办法。藤山爱一郎^{〔1〕}建议过日中大使级会谈 但他并非是以普通日本民众的代表出面的。因此，日中关系还是没有进展。我猜测，这其中大约是在受到美国的牵制。

然而 正由于日中两国外交关系还没有恢复 所以必须得恢

〔1〕 藤山爱一郎（1897 - 1958）日本政治家。1918 年庆应义塾大学中退。曾任岸信介内阁外相。是日本自由民主党内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热心于日中友好的人士。——译注

复。这是一个丝毫动摇不得的信念。从日本人心目里的中国的角度来考虑 这个问题作为核心与焦点 也在制约着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至于今后应如何使两国关系正常化，我并不知道。但回顾一下战后无数以此为口号的运动，那不过都只是通过签名的方式 来促使这一目标的实现。这实际上意味着 连从事恢复日中邦交活动的人士，似乎也说不明白究竟应该如何来行动。

尽管都在努力实现日中邦交的正常化，可由于对日中关系或中国形象的理解 实际上反映出日本思想界的实际状况 所以其中显得相当复杂。从思想逻辑的角度说，即使是日中两国外交关系恢复之后 也不一定等于“日中关系”就完全恢复了。我认为 这是一个必须承认的现实。对于那些深层次的认识 目前的宣传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也因为并非是从根本上解决，所以目前这些政治活动都是浅尝辄止，从而使运动远离了人心。无论与中国的距离是零还是无限大，两国邦交尚未恢复的政治现状，都具有着扭曲日中友好运动的作用。

因此 从逻辑发展的方向上看 不管与中国是零距离还是距离无限大 都应该深刻认识共同面临的困难 向着同一目标推进对中国的理解与认识。

不可否认的是 目前人们正在这样做。然而我觉得 中国人对日本的想法 即中国人心目中的日本究竟是什么 也同样值得人们注意 并非是从时间的角度来追述 而是把它作为根本的逻辑立足点，这里所指的 并不是某个中国人如何看待日本 而是说日本人心目里的中国形象如此颠来倒去，其到底是否合理？以及包括与日本并无关系的人在内的普通中国人，他们究竟觉察到了这种现象没有？

要是这些问题还没有明确，我认为，日中关系只能是单相思。如此说来 我们以上的质疑 就不是毫无疑义的 即很有必

要来重新思考日本人对中国的理解。即使中关系已经不再是单相思了，也未必就没有必要继续这样做。

我的意思是，正如中国人心目里的日本形象应该变得比较明确一样，我们在检讨日本人心目里的中国形象时，也必须对自己以前那些不太自觉的观念进行反思。所谓值得反思的过去未必自觉的观念指的是由于自己以“日本人心目里……”这样的方式进行思考，便想当然地认为，对方同样会以“对方心目里……”的方式来理解我们。尽管眼下还不能说，做这样的推测根据十足但至少可以认为在解放后的中国还少有人写基于“中国人心目里……”这样一种思考方式的文章。当然不好说没有写过即等于连想都没有想，但就我们所见的范围而言，确实是尚未看到那样的文章。作为中国人的日本观，给我留有印象的，只有剧作家田汉在日本反对“安保”的斗争〔1〕中所写文章里的一句话：

反对“安保”的斗争首先是日本人民为了自身的利益。

由于现在手头没有资料，也许上面的话与原文有些出入，但大意不会错。当时，自己所以很有感触，是因为觉得田汉在文中指出了，毕竟他们并不等于日本人。我认为，在当时中国的气氛

〔1〕“安保”指《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是1951年9月8日在美国旧金山签订的日美军事同盟条约。该条约以维护日本的“安全”为由，规定美国有权在日本驻军与建立军事基地。1960年1月日美修改该条约重新签订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其主要内容是“发展日本‘抵抗武装进攻的能力’在‘应付共同危险’时，日本负有保护驻日美军的义务；美国继续有权在日本驻军和使用军事基地；‘鼓励两经济合作’等。为反对重新签订这一条约，日本人民当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政治斗争。——译注

中能够这样说，确实是需要点勇气的。即使他并非是特意那么说 作为发言也是很难得的。

其实在谢冰心所写的日本印象记里 也有不少文章是写对日本的感觉。不过 那大都是写中国人的想法 并没有基于“中国人心目里……”之类的方式。只有前面所引的田汉那段文字，显然属于“中国人心目里……”的思维类型。

在中国现代里 有一种把日本或日本人看做反面形象 也就是将他们描写为对中国人进行压迫与侮辱的倾向。事实上确实是如此。在战争期间，交战双方无疑都不会给对方好的脸色看。而山田均〔1〕对中国士兵说三道四，当时便曾引起巴金的强烈批评。日本的山田均研究者 也提到过这件事。自己由于拖拉 对此还没有详细调查。但解放后中国出版的一本文集，收入了巴金的这篇文章〔2〕。我看过之后觉得，日本人还是读一读为好。

巴金还写过以否定的眼光来看待花袋〔3〕、藤村〔4〕等关于日本文学的文章 增田涉〔5〕《鲁迅的印象》初版本介绍并评论过此事）他像是从总体上明显批评过日本的人。至少 他在情感上曾触及到了日本。战后 他也来日本访问过 发表过感想。如有可能 将他在战前与战争期间的言论加以对照 大约会对我们

〔1〕 山田均（1880—1958），日本社会活动家。曾参与社会主义运动 批判福本和夫的折衷主义 重建日本共产党。战后创办《社会主义》杂志。——译注

〔2〕 指巴金的《致一个日本友人》后收入《巴金全集》第13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11月。——译注

〔3〕 田山花袋（1872—1930），日本作家。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主要作品有《蒲团》、《重右卫门的最后》、《生命》等。——译注

〔4〕 岛崎藤村（1872—1943）日本作家。1891年明治学院大学普通学科毕业。曾任东北学院讲师。主要作品有《破戒》、《家》、《春》等。——译注

〔5〕 增田涉（1903—1977），中国文学研究家、关西大学教授。曾与鲁迅有交往 并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译为日语。——译注

在前面所提到的那些问题有点帮助。

再如鲁迅在二十多岁那样多愁善感的年代里，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日本渡过的。但他并没有写出对日本的完整感受，仅有一篇《藤野先生》。凭此也许可以说，他对日本是亲近的。然而看那语气，又让人觉得并非是那么简单。在这方面，他的弟弟周作人似乎有些随便。这不只是说他的文章有些唠叨，而且指其曾与日中政治关系有过牵连。不妨说，他是以自己的生活，显示了中国人心目中的日本形象。此外，还有一位叫张香山〔1〕的，在两、三年前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杂志《红旗》上，曾发表过赞赏与支持日本共产党的文章。而在三十年代的中国杂志上，有一篇《岛木健作〔2〕访问记》，其作者也叫张香山，大约是同一个人。看过那篇文章，我发现其中有自己所不知道的诸如东京世田谷区西班牙风格的文化人住宅在增加之类的事，称得上是一篇充满着作者青春气息的文章。那篇文章是在船上写的。可能是为了响应抗日的号召，在离开日本之前去访问了岛木健作。不知道他是如何了解到岛木健作的。显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中国人对日本的注意力，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作为一个例子，这篇文章确实有助于人们理解，中国人曾经怎样把日本看作认识的对象。

可能有人认为，日本与中国之间，应该抛弃那种互相视对方为对象的观念，而改为彼此设身处地理解对方的立场为宜。而

〔1〕 张香山(1914 -)中国外交工作者。1934年在东京高等学校留学，并参加左联东京分会。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历任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宣部副部长等。——译注

〔2〕 岛木健作(1903 - 1945)日本作家。原名朝仓菊雄。1935年考入东北帝国大学法文学部。后参加学生运动，并深入农村，被捕后因病假释。著有《生活的探求》等。其著作《满洲纪行》曾在青年中引起反响。——译注

我所选择的这条认识路径，不管以后是否会被证明是徒劳无益的，自己仍然愿意重申“日本人心目里的中国”这一认识方式所具有的价值。也许我在这里所提的问题，最后竟未听到中国人质疑，或者是毫无反响。如果当真如此，那不只自己会难免觉得寂寞，也意味着这些无意义的喋喋不休，最终将自消自灭。可即便是如此，我的这些劳而无功的努力，也未尝没有足以提醒后人切勿重蹈覆辙的作用罢。

程麻译自《日本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
春秋社，1966年10月20日

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

1. 现代中国研究与中国形象

在中国成立了新国家以后，并不意味着立即便能够开辟以其为对象的全新研究领域，即所谓“现代中国研究”。

正如后来已经看到的那样，对于中国政治的左右“摇摆”，即使是在中国本土，其研究也并没怎么深入。现在只能说是在逐渐接近其本质而已。

而在日本，对于中国的“摇摆”同样在研究界里留有痕迹。不妨说，即使在现在，其仍然残存着如同“后遗症”一样的影响。这种影响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对“文革”支持或不支持的态度之间的那种对立。

日本原本与中国有很深的文化关系。在地理上很接近，在历史上也有过长期的交往。中国在不远的过去，还曾是日本军队的战场以及作战的对手。日本的中国研究，既有增加与中国的亲近感的责任，同时也得承担着像“战争责任”之类的负面历史遗产。

显而易见，如何承担，或承担着，这些历史的遗产，确实是日

本的中国研究之重要的课题之一。而实际上，即使已经决心与过去诀别，也未必就能够超越历史。而且，亲近感或战争责任之有无，也并不像以化学试纸来测量酸碱浓度那样简单。因此，所谓“必须承担”历史遗产，并非意味着就是强迫别人或普通人一定要接受这些责任。

在我看来，日本的中国研究，应该注意到日本人心目里的中国形象。中国研究和中国形象，当然并不是一回事儿，但二者相互有影响，有的部分还相互混淆在一起。

其例子之一，便是对新中国成立的看法。从中不难发现当时日本人的认识方法。

(1)《世界》杂志的新中国专号

1948年12月人民解放军(当时日本报纸称之为“中共军”)进入北京(当时叫“北平”)。第二年4月，南京也解放了。中国的旧都和首都两地，全都被共产党占领了。

在那些将之视为共产主义胜利的人们眼里，这些意味着旧中国的分崩离析。于是，便出现了新问题：中国新生了么？换句话说，新中国与旧中国是否就一刀两断了？

与旧中国相对应的学术研究领域在日本称之为“支那学”。在这前后，《世界》杂志(1949年8月号)很快推出了“怎样看待中国的现状——支那学者的回答”的专号。其中论文题目和作者如下：

仁井田升《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性课题》

吉川幸次郎《中国的城市和农村》

平冈武夫《“天下”的世界观未变》

松本善海《中国的苦闷和中国研究者的苦闷》

贝塚茂树《现实的革命和学者的革命》

日本的“支那学”是在接受法国式的中国研究以及清朝考据学学风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研究方法与成果。它有意识地同过去的“汉学”相区别。而所谓“汉学”则指应用中国的典籍进行道德说教的学者方式，及其处世原则与人生哲学。这种学问曾在日本历史上有过重大的贡献。在居住在京都的学者看来，“汉学”是指东京一带的学者自己则属于“支那学”的群体。

在上面所说的专号里的论文作者中所谓“支那学者”也包括住在东京的仁井田升和松本善海，这当然是不够严谨的。不过按战后日本的风气人们对“汉学”的名实已经不怎么拘泥了。

在这些论文中仁井田升认为历代的革命与孙文领导的革命有所区别。相对而言，现正在进行的革命比较重视人的变革。变革的对象就是根深蒂固的“面子”意识。这种看法显然出自于所谓的“汉学”。

为了了解这个专号对后来新中国的发展有怎样的见解，似乎还应看看其他作者的观点。如：

吉川幸次郎谈到了中国城市和农村的显著差别，另外也夹杂有他在中国留学期间的见闻。像他说，中国的城乡之间有着某种平衡而农民的暴动会打破这种平衡。实际上中共便代表着这样的农民势力。只是文章没有预测，他们在进城以后会发生些什么样的变化。

平冈武夫的论文指出中国的世界观是“天下观”。中国的历史可分为“天下观”以前的时代、“天下观”的时代以及探究“天下观”对人的意义的时代等。而现在已进入第三个时代所谓的“天下观”将发生蜕变。

松本善海将当时日本人心中的中国形象，归纳为两种中国观：一种中国观认为中国不变，说自古以来中国的民众在国家政治方面本就没有什么目标，个人生活与政治相分离。因此，表面上有些变化，其实并没有根本改变。另外一种中国观，则觉得中国解放了，变革了，已与过去断绝了关系。这两种中国观截然相反，可无论哪一种，里面都掺杂有观察者个人的主观臆断。它们是强加于中国身上的，因此所反映的情况就未必都那么真实。

贝塚茂树在其论文中，则预言中国将发生变化。因此他认为，以中国史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者，也应该变革自身的观念。

以上各论文的内容，所触及的具体问题不太一样，但至今已大都被首肯。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虽然在某个特定的时期曾有过倒退，还有个别的“运动”或事实无法解释清楚，但如果现在大体回顾新中国的历程，应该说这些论文所谈论的各种问题，仍旧不可忽视。尤其是松本善海批评中国的新闻报道不真实，至今仍很有针对性。这些文章并没有过时。

上面这些文章里的中国形象，大都被描述为新中国是与旧中国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只有贝塚的论文与其他的文章见解不太一样。不过，我觉得后来他在别处发表的论文，也承认中国历史是连续的）。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历史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也必须说明其变化的一面。在这一观念里，竹内好的《新中国的精神》（后收入《现代中国论》一书。最早以《解剖中华人民共和国》为题发表在《思索》1949年12月号上）可作为代表。这是他对《世界》杂志专号中作者们论文的反驳。

竹内好首先指责说，京都陈旧的“支那学”者们以自己古老的中国观作为挡箭牌，梦想着这场革命只不过是“易姓革命”的变种而已。

竹内将批判限定在“京都市”，这意味着把专号里的作者仁井田升和松本善海排除掉了。其实，这两位作者的中国形象，也是试图以连续的观点来看待中国的（不过后来仁井田又站在了把新中国与旧中国割裂开来的立场上。他在 1955 年与来访日本的中国学术代表团交流时，将中国学者的见解归纳为“割裂论”。而翦伯赞则以平静的语调回答说，既有割裂也有继承。当时作为口译者，我对他们的问答印象很深刻。仁井田退休时，在一个小型集会上也曾回顾说，自己是“割裂论”。他对中国法制史的研究就给人以“割裂论”中国形象的感觉。他在《世界》上发表的论文，认为催生新中国的革命与以前的革命不一样，也应视为“割裂论”的中国形象。然而尽管如此，他也提到了根深蒂固的“面子”意识。我觉得，这一看法是深刻的。当然，当时仁井田提出这一问题，只是将其视为应该批判的对象）。

原来按竹内好的意思，中共（中国共产党）的道德境界较高。这本是基于中国固有的传统观念。而实际上，中共正是由于根本否定了传统，从而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在日本，有人对中国抱有屈辱感。这种屈辱感所依存的精神，本并不坏。但日本与中国的现代化样态毕竟有所不同。中国落伍于日本人那种固执迷恋资本主义的精神，反倒发现了新民主主义的道路。

竹内好进而认为，中共并非是独裁。其证据是：中共有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而现在执行的是最低纲领；最高纲领则要在将来依据全国大多数人民的要求来实施。毛泽东并不会像铁托〔1〕那样。

文中并没有指出，他借以描述这种中国形象的依据，本是毛

〔1〕铁托（1892—1980），南斯拉夫总统。曾领导南斯拉夫共产党脱离斯大林的指挥。——译注

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正如我们其后在观察中国现实时注意到的 或者当时虽然没有注意 至今却已经明白看到的那样 此后中国并未致力于成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共也并没有完全维持住很高的道德水准。竹内好在非难京都“支那学”者的时候 连续罗列了“陈旧”一词 极力申说新中国之“新”。现在看来 这种对比也是没太有说服力的。

不过在当时 这种对新中国的成立相当重视的中国观 还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这一观念不否认固有的传统，它很能博得早已对中国怀有亲近感的旧读者的共鸣 而对否定传统的说法 也不能都将之归结为主张“割裂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如同为了探讨中国今后的发展 必须对《新民主主义论》进行认真进行检讨 即使是面对当时的中国 也无法抛弃竹内好所描述的中国形象。不过 批判古老的东西“陈旧”“赞颂新事物 新颖”这一类的失误如今是不该再重复了。

竹内好也曾非难过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1〕}说：“吉田首相认为 佛教传来尚且经过了二百年 这次也不必惊慌 可以慢慢来。”我觉得 战后日本政府无视与敌视中国大陆成立的新中国的态度 显然是应该批判的。如今已不能继续以“二百年”的尺度来看待中国（作为当今的中国）了。

（2）对“五四”运动的评价

关于检讨新中国形象，《世界》杂志并非是唯一的资料。

早于上述专号 属于京都大学“支那学”的仓石武四郎 在论述“五四”运动时 就已经涉及到了中国的新变化。

〔1〕 吉田茂（1878—1967）日本政治家。1946至1954年先后5次组织日本内阁 奉行亲美反华政策。——译注

按仓石的看法，“五四”运动主要有以下性质：

在“五四”时期的思想家中，有后来加入共产党的陈独秀，现在的国民党高官胡适，以及民主同盟的领导人罗隆基等。他们的思想如今虽然是对立的，但在“五四”时代却能够协同前进。“五四”的力量是协同之力（《国际新闻》，1948年5月6日）

我找不到当时的笔记，遗憾地忘记了先生论文的题目。据我回忆，在那篇论文里还谈到胡适的人品很谦和，所以他在“五四”以后没有能够跟上时代。

通过仓石的这些讲解，我在1948年便感受到了“五四”时代及当时的历史氛围。然而，这种见解不能不受到所谓马克思主义者的批驳。不久，神山茂夫的《中国革命的分水岭——关于“五四”运动的评价》一文（《世界评论》，1948年8月号）发表了。

这篇文章也承认“‘五四’的力量是协同之力”，但又提出了毛泽东在“五四”的活动是呼应世界革命运动、俄国革命和列宁的号召的观点。强调“‘五四’正是新旧两个时代、两种势力、两种领导权的分水岭”。不过，神山的论文其实也并非仅是针对仓石先生的。

神山茂夫的上述看法看似正确，然而若说得严厉一点，其看法的核心也许只是了解马克思主义，却不了解中国。而要他既懂得马克思主义又知道中国，实际上并非有多么困难。再进一步说，最容易的自然还是了解马克思主义词句，因为尽管不知道中国，也可以由此得出一些结论。

他的论文当然尚未走到那样的极端。他所描述的中国形象的特色之一，是带有以马克思主义为研究方法的学者们的那种自负心态。

《世界》杂志此前已在1946年7月号上，刊登过岩村三千夫的《毛泽东论》以及中西功的《毛泽东周围的人们》（同期还有人

江启四郎的《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与现阶段》但几乎都没有涉及正在进行中的中国革命运动)

岩村三千夫在战前研究无产阶级理论，中西功曾有过在上海反战的经验。他们的“中国革命是以俄国革命为开端的世界革命之一环”的见解按照自身过去的“经验”自然是“正确”的。他们站在“新中国是与旧中国的彻底决裂”这一立场上认为即使旧中国有过什么革命或变革的运动，那毕竟都是在接受共产国际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的事。

前面提到的竹内好强调中共“根植于固有的传统”是要批判那些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所描绘的“断裂的中国形象”。

(3) 民众心目中的中国形象

与这些研究中国的专门家不同的是一般日本民众。日本民众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又是什么样呢？大体说来，它们主要是由亲近感和战争责任感（其中所谓是否“自觉”并不仅指对问题刨根问底，即使平常的表现也有认真的成分在内。比如，我觉得沉默也是一种表态）构成的。另外，其中也与他们在中国生活的经验有关系。这种人大量在日本出现，是残留在中国的日本人集体回国以后的事。

日本投降后曾受雇于八路军、人民解放军，以及新中国各种机构的 968 名日本人，于 1953 年 3 月回到了舞鹤港。^{〔1〕}由于他们的体验报告，人们开始了解新中国的一些具体情况。这吸引了全日本的注意力。

在《朝日周刊》特别发行的紧急增刊号 1953 年 4 月 15 日，

〔1〕 日本京都北部海岸的一个港口。——译注

名为《人民装的世界——从工厂看中国》的头篇报道里 有下列几组文字：1. 青年的理想是在工厂结婚。2. 垒砖的劳动模范。3. 讨论决定工资。4. 登场的苏联式疗法。5. 免费治疗的工人医院。

由这些标题可以想象出的制度与社会生活，在旧中国是看不到的。而在这样的制度、社会生活中 人的思想焕然一新 则是这篇报道的主调。

（4 新中国形象的缺憾

总的来说 无论是研究者还是日本民众 尽管他们会有若干分歧 但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持肯定评价这一点上 却是相同的。日本人因新中国成立而希望大增 这是就整体而言 自然不能否定个别人或与之相反的个别倾向。在我看来 这种希望从 1955 年批判胡风后，开始冷淡了下来。实际上，每当在中国发动新的社会运动时 日本的报纸、杂志的报道 都曾唤起人们的注意。如今回想起来，这些运动就像是将日本人对中国的一般关注不断加温的推动力一样。

我觉得，如果说当初日本人对新中国的成立曾怀有很大的期待 那么到 1955 年以后，仿佛支撑着这种热情的柴薪便在一根又一根地不断抽掉。

研究者自然仍旧在研究，但中国的形象毕竟逐渐有些褪色。而与此不同的是，对中国大陆悠久历史中多次更替兴亡的“王朝”的研究 却在厚积起来。这似乎可以被视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实研究的弱化的一种补偿。

总地来看 在日本人对于新中国的种种议论中 就支持这些议论的事实 细部的具体事实 而言 确实是不够充分的。

这些议论的调门尽管很高 然而事后想一想 它们的内容大都支离破碎，好象只是为了唱高调才那样说。像前面介绍过的

松本善海所批评的那样，判断大胆而资料不足的状况，仍然继续着。毫无疑问，即使在过去时代王朝的资料方面，也不能说很是完备。按理说，要是因资料不足而难以得出结论，是可以暂时不下结论的。但是，日本及其他国度的中国研究者，似乎都感染上了以前那种教条主义的中国领导人所有的说假话、说大话和说空话的流行病。这样，就使得那些接触实际，了解实情，能够提供本真面貌的当事者与中国研究者，几乎无法开口了。

而所谓研究工作，应该是既不缺少资料，又能从中挖掘出真实的东西来。而研究外国的理想方法，也无非是为了促进彼此间的相互理解。我觉得，对所研究的对象怀有戒心，或封锁资料，或对研究者的往来与亲密，加以不必要的限制之类，都会给研究带来很大的不便。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们曾将其历程概括为“左右摇摆”。其实在研究这一方面 说到“现代中国研究和中国形象”这一总体的视角 不妨认为 做出这样一种概括与描述本身 也可以算是“中国形象”之一种。我虽然想将它们归类，但并非是要加以指责。因此不好把上面提到的那些中国形象都一一贴上标签。

即使现在议论这些“中国形象”，也无法下断语。虽然断语也可以下，然而今后的历史将是不留情面的。很难说这些断语，是否能够经得起以后历史的检验。

2. 资料解说略)

3. 研究著作概观

(1) 概观的范围

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研究，有其他时代所没有的困难。

这是指 作为一个时代 它并没有完结。而且如本文开头所概括的那样 它仍在激烈地“ 摇摆 ”。

在中国本土 也并非没有学术研究。不过 其论点常带有政治运动的影子，或有政治倾向的影响。在这里将它们加以分析解剖 并非是我的任务。我只能按不同的类别 以专业研究的立场来对这些研究著作进行介绍。本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从总体上着眼。

在这里，不涉及对中国本土学术研究进行评论的那些论著。

而所谓“ 研究著作概观 ”专指在日本出版的研究著作 其中包括观测和评论。如前所说，在中国研究领域，与中国有关的，并非仅是研究著作。而且所谓观测与评论，有的也并不亚于所谓的学术性研究。在这两种书里 仔细分析起来 都有一些比较深刻的著作。若因其艰深便置之一旁，而仅注意它们所研究的对象，也不对。

在这些著作中，有一些与当时中国的教条主义观点很相似，因而在当时曾被视为“ 权威 ”或“ 正统 ”可后来它们又变得与中国的教条主义见解相矛盾了。对此 本文不一一指出。另外 也并不以此来作为选择取舍的标准。

(2)综合性论著

A. 通史著作

彭泽周《中国现代史——从“五四”运动到“四人帮”垮台》（泰流社，1978年）和中岛岭雄编《中国现代史》（有斐阁，1981年），都是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开始写起。而岩村三千夫的《新中国二十年》（潮出版社，1973年）如名所示 没有关于近十年来的叙述。

中国共产党的历程，并不等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但若离开共产党的政策来了解共和国的政策，也不容易。至于中国共产党对该党历程的描述，必须提到《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中共中央11届6中全会通过）只是其中缺乏具体的史实。宇野重昭《中国共产党史序说》上下（NHK丛书，日本广播出版协会，1973、74年）同作者《中国共产党——其历史与实况》（日本实业出版社，1980年）大久保泰《中国共产党史》上、下（原书房1971年）藤井满洲男《中国共产党略史 1921—1975》（东方书店，1975年）筹书，都是叙述党史。藤井一书是补充原题为《中国共产党五十年略史——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发展和胜利》的著作重新出版的，但其中未提及林彪的名字。竹内实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中公新书，中央公论社，1972年），则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历史上的官僚组织相比较，认为毛泽东与党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关于党史进程，分析了其意识形态方面的特点。其中的个别论述，应该根据近来明朗了的事实来加以修订。

B. 综合论述

仓石武四郎编《变革时期的中国之研究》（岩波书店，1955年）由十余人执笔。卫藤审吉编的《现代中国政治的结构》（国际问题研究所，1982年）作者也是十人。前者列举了人民共和国草创时期的各种问题，而后者试图分析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的中国。它们的时间跨度都有三十年。后书的内容由书名可知，而前一书中未包括语言问题和文学艺术创作等。

论述这一时期的动向与问题的，还有下列著作：

江头数马《现代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大东文化大学东洋研究所，1975年）按顺序叙述了数年来的具体动向，例举了“文革”、宪法、经济建设和人口等问题，展望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及其形成过程。后来又有同一作者的《七十年代变革期的中

国》(霞山会,1979年)户张东夫《华国锋对邓小平——对立的轨迹》(新泉社,1981年)

此外,回溯历史的著作还有:

爱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新中国和过渡时期总路线》(同所1955年)、石川忠雄《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况及分析》(时事通讯社,1964年)中岛岭雄《现代中国论》(青木书店,1964年、1971年增补版)各务寮一《毛泽东的政治》(三一新书)(三一书房1966年)

关于谈论中苏论争和‘文革’的论著另见各分类栏目。以下著作反映的是中共九大以后的状况:

中国研究所编《现代中国的基本问题——两条路线斗争与九大》(劲草书房,1970年)曾村保信《现代中国论》(小峰书店,1970年)王育德《台湾——其苦闷的历史》(弘文堂,1970年)

柴田穗《周恩来的时代》(中央公论社,1971年)每日新闻社外国通讯部《中国的活力》(同社,1971年)同上《通向日本与中国正常化的道路》(同社,1971年)冈部达味《现代中国的对外政策》(东京大学出版社,1971年)入江通雅《尼克松访华后的日本与中国——关于日中问题的看法和想法》(原书房,1971年)

加藤荣治《具有转机的中国——从中共九大到尼克松访华》(日中友好协会出版部,1972年、续编:日中出版,1974年)河地重藏《毛泽东和现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密涅瓦书房,1972年)

小岛丽逸《中国的经济与技术》(劲草书房,1975年)安藤正士等编《现代中国的国际关系》(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1975年)竹内实《对中国的视角》(中央公论社,1975年)赤木昭夫等《中国的技术创造》(中央公论社,1975年)

今崛诚二《中国现代史研究序说》(劲草书房,1976年)加藤荣治《周恩来亡后的中国潮流》(日中出版,1976年)、竹内实《同时代的中国》(田地书店,1976年)嶋仓民生《中国 其治国构想》(每日新闻社,1976年)安藤彦太郎编《对现代史的挑战——中国的思想与科学技术》(时事通讯社,1976年)冈部达味《中国的对日政策》(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

小林多加士《现代中国的历史意识》(中公新书)中央公论社,1977年)、东亚文化研究所纪要编辑委员会《中国现代化诸问题》(霞山会,1977年)。

小岛丽逸编《中国的城市化与农村建设》(劲草书房,1978年)。

石川昌《新·中国事情》(日本实业出版社,1979年)。

竹内实《友好容易理解难》(同合出版会,1980年)高桥正《中国里的苏联》(同上,1980年)。

中岛岭雄《北京激荡》上、下(筑摩书房,1981年)伊藤正《观察中国》(CBS索尼出版,1981年)冈部达味《中国能够现代化么》(日本经济新闻社,1981年)市原亮平《“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晃洋书店1981年)。

(3) 个别问题研究

下面列出关于中苏论争“文革”(含毛泽东 筹大事件)以及对文学、鲁迅、语言、法律、思想、教育与人的培育、经济、解放军等专题研究方面的著作：

A. 中苏论争、对外关系

石堂清伦《中苏论争——对两种思想的研究》(青木书店,1963年)木村明等《中苏论争》(朝日新闻社,1963年)朝日新闻社调查研究室《中苏对立》(同社,1964年)神谷不二《朝鲜战

争——美中对质的原型》(中公新书)中央公论社,1966年)无名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中苏关系——中苏同盟及其动态》(无出版社名 规范印刷,1970年)菊池昌典等《中苏对立》(有斐阁,1976年)入江昭《美中关系——其发展的历史》(同合出版会,1977年)中岛岭雄《中苏对立与现代》(中央公论社,1978年)

研究中国 包括日本在内的对外关系 有冈部达味《中国的对日政策》(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中岛岭雄《现代中国与国际关系》(日本效率协会出版,1973年)石川忠雄《现代中国诸问题》(庆应通讯,1967年)宇野重昭《中国和国际关系》(晃洋书房,1981年)中岛岭雄《记录——日本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日中出版,1981年)

B.“文革”毛泽东

除前面介绍的以外 以下所列包括与“文革”有关的著作、实际见闻和笔记等。其中论述“文革”的都或多或少涉及到毛泽东。为此 将“文革”与毛泽东联系起来考虑。

关于“文革”的单行本相当多,下边按出版年份列出书目。

另外 关于周恩来、林彪等的论述 由于内容上与“文革”有关连,也包括在内。

[1966]大岛康正《花朵中有思想吗?——探讨中共的整风》(东都书房)大宅壮一《观察中共》(无出版社名)石河等《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御茶之水书房)大森实《烧毁天安门——毛泽东革命内幕》(潮出版社)今崛诚二《毛泽东研究序说》(劲草书房)《社会科学特别法季刊 毛泽东主义》(经济往来社)

[1967]高桥和巳《新长城》(河出书房)安藤彦太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安)村松暎《毛泽东的焦虑与孤独》(中央公论社)安藤彦太郎监修《七亿人民的根性——毛泽东思想的活

学活用》(亚东社)江头数马《追赶北京》(每日新闻社)柴田穗《未报道的北京——我被驱逐了》(产经新闻社)吉田实《现代中国党、军、政府》(中公新书)石川忠雄《中共文化大革命的实情及其未来》(大陆问题研究所)。其中江头和柴田二书写的是个人体验。

[1968]安藤彦太郎《文化革命研究》(亚纪书房)新岛淳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青年出版社)山田庆儿《探问未来——中国的试验》(筑摩书房)东亚学院纪要编委会《中国传统社会与毛泽东革命》(霞山会)犬丸义一等《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其根源与矛盾》(青木书店)

给野纯一《北京这一年》(新日本出版社)此书写对“文革”中日共与中共分裂迹象的感受。《今日的毛泽东路线与日本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出版部编、发行)《如何看中国文化大革命》(新日本出版社编、发行)

[1969]中西功《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史再探讨》(青木书店)

[1970]鸟居民《毛泽东五次战争——中国现代史论》(草思社)黑田宽一《毛泽东神话的破灭》(武士书房)黄雨川编《毛泽东生平资料简编 1893 - 1969》(友联研究所)丁望《中共“文革”运动中的组织与人事问题》(当代中国研究所)新井宝雄《林彪时代——毛泽东的继承人 林彪其人与思想》(亚细亚评论社)

[1971]上别府亲志《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逻辑》(东洋经济新报社)竹内实《毛泽东笔记》(新泉社)此书收录了原在《群像》1981年8月号上刊登的《质疑毛泽东》和《思想》1969年4月号初次发表的《关于毛泽东“矛盾论”的原型》。关于后者可参看高田求《论“毛泽东哲学”的原型》(收入《现代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下青木书店,1976年)

[1974]大岛清《学习大寨——真实的中国报道》(御茶之水书房)鸟居民《周恩来和毛泽东——周恩来试论》(草思社)严静文(司马长风)《周恩来评传》(波文书房。日本文竹内实译《周恩来传》太平出版社,1976年)

[1976]三浦勤《毛泽东主义——探讨其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劲草书房)每日新闻社编《中国的巨星消殒》(同社)

[1977]野村浩一等《文化与革命》(三一书房)穗田教之《毛泽东主义的政治力学》(庆应通讯)田中信一等《邓小平传——不屈的革命家》(德间书房)新井宝雄《江青及其一伙——“四人帮”覆灭记》(青年出版社)

[1978]柴田穗《新中国“三国志”毛王朝秘史》(日本工业新闻)东亚文化研究所纪要编辑委员会《中国文化大革命再探讨》上、下(霞山会)

[1979]藤本幸三编译《中国摆脱“四人帮”的日子——文献天安门诗文集》(德间书店)陈若曦著、竹内实译《一个北京人》(朝日新闻社)新岛淳良《我的毛泽东》(晶文社)中邦仁《天安门事件文献》(文艺春秋社)

[1981]丸山升《“文革”的轨迹与中国研究》(新日本出版社)田地佐和子、田地光永编译《天云山传奇——中国检举小说集》(亚纪书房)尾崎庄太郎编译《刘少奇的悲剧》(日中出版)、松野谷夫《远去的周恩来》(朝日新闻社)朝日新闻外国报道部编《中国审判“四人帮”全资料全分析》(朝日有声杂志)

C. 文学

小野忍编《现代的中国文学》(每日新闻社,1958年)同文集刊行会编《天上人间——冈崎俊夫文集》(河出书房新社向会员发行,1961年)竹内实《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合同出版,1966年)小野忍《中国文学杂考》(大安,1967年)驹田信二《对立的

思想——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劲草书房,1969年)竹内实《现代中国的文学进程与逻辑》(研究社,1972年)相浦泉《现代的中国文学》(NHK丛书)日本广播出版协会,1972年)小野忍《中国的现代文学》(东京大学出版会,1972年)丸山升《现代中国文学的理论及思想——文化大革命和中国文学备忘录》(日中出版,1974年)今村与志雄《理智与情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轨迹》(筑摩书房,1976年)小野忍《路标——中国文学与我》(小泽书店,1979年)阿部幸夫《'20'/'30'/'40年代和夏衍》(自费出版,1980年)釜屋修《中国的光荣与悲惨——赵树理评传》(玉川选书)玉川大学出版部,1979年)高岛俊男《于无声处听惊雷——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文学》(日中出版,1981年)

D. 鲁迅

鲁迅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去世的,但在“文革”中及“文革”后的“批林批孔”运动里,他有些被神化了。这对鲁迅研究也有影响。

下面列举的日本人研究鲁迅的著作,包括新中国成立以前出版的。

小田岳夫《鲁迅传》(筑摩书房,1941年)竹内好《鲁迅》(日本评论社,1944年)鹿地亘《鲁迅评传》(日本民主主义文化联盟,1949年)竹内好《鲁迅》(世界评论社,1948年)中日文化研究所编《鲁迅研究》(八云书店,1948年)增田涉《鲁迅印象》(讲谈社,1948年、讲谈社新书,1956年)竹内好《鲁迅杂记》(世界评论社,1949年)川上久寿《鲁迅研究》(黑潮出版,1962年)尾崎秀树《与鲁迅的对话》(南北社,1962年、增补版,劲草书房,1969年)山田野理夫《鲁迅传——其思想与经历》(潮文社,1964年)半泽正二郎《鲁迅、藤野先生、仙台》(1966年、增补版,1974

年)丸山升《鲁迅——其文学与革命》(东洋文库O平凡社,1965年)今村与志雄《鲁迅与传统》(劲草书房,1967年)佐佐木基一、竹内实编《鲁迅与现代》(劲草书房,1968年)桧山久雄《鲁迅》(三省堂1970年)新村彻《鲁迅的心》(理论社,1970年)高田淳《鲁迅诗话》(中公新书O中央公论社,1971年)宫本研《革命传说四部作——宫本研戏曲集》(河出书房,1971年)丸山升《鲁迅与革命文学》(纪伊国屋新书O纪伊国屋书店,1972年)横松宗《鲁迅的思想》(河出书房,1973年)上野昂志《鲁迅——沉默与对语言的抵抗》(三一新书O三一书房,1974年)高田淳《章炳麟、章士钊、鲁迅》(龙溪书店,1975年)伊藤虎丸《鲁迅与未日论》(同前,1975年)花田清辉等《戏曲·故事新编》(河出书房,1975年)竹内好《新编鲁迅杂记》(劲草书房,1976年)丸山升《一位中国特派员——山上正义与鲁迅》(中公新书O中央公论社,1976年)桧山久雄《鲁迅与漱石》(第三文明社,1977年)山田敬三《鲁迅的世界》(大修馆,1977年)霜山远志《戏曲·鲁迅传》(而立书房,1977年)竹内实《鲁迅远景》(田地书店,1978年)、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会《鲁迅在仙台的记录》(平凡社,1978年)竹内好《续鲁迅杂记》(劲草书房,1978年)新岛淳良《读鲁迅》(晶文社,1979年)小泉让《鲁迅与内山完造》(讲谈社,1979年)内山完造《回忆鲁迅》(社会思想社,1979年)饭仓照平《鲁迅》(讲谈社,1980年)《文艺读本·鲁迅》(河出书房,1980年)林田慎之助《鲁迅里的古典》(创文社,1981年)竹内实《鲁迅周围》(田地书店,1981年)。

E. 语言

赖惟勤、户川芳郎编《仓石武四郎著作集》共2卷第1卷：语言、思维和社会、第2卷：汉字、日语和中国语(黑潮出版,1981年)。

F. 法律

法律、制度方面的研究，是旨在通过法律来准确反映中国的形象（或某一阶段的真实形象）

福岛正夫《中国的人民民主政权——其建设过程与理论》（东京大学出版会1965年）仁井田升《中国的法、社会与历史》（岩波书店1966年）针生诚吉《中国的国家与法——以过渡期理论为中心》（东京大学出版会，1970年）浅井敦《现代中国法的理论》（东京大学出版会，1973年）稻子恒夫《现代中国的法与政治》（日中出版，1975）加藤一郎编《中国的现代化与法——法律专家看到的新中国》（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

G. 思想

竹内好等《中国革命的思想》（岩波新书0岩波书店，1953年）西顺藏《中国思想论集》（筑摩书房，1960年）竹内实《中国的思想》（NHK丛书）（日本广播出版协会，1967年）山口一郎《现代中国思想史》（劲草书房，1969年）野村浩一《中国革命的思想》（岩波书店，1971年）

H. 教育、人的培养

小林文男《新中国的人类观——以历史人物为中心》（劲草书房，1965年）城野宏《现代中国里人的成长》（信浓出版，1969年）阿部洋编译《中国教育现代化论》（世界教育选集72明治图书，1972年。原作者舒新城）、斋藤秋男《中国现代教育史——中国革命的教育结构》（田地书店，1973年）都筑一夫《新中国的人类像——献身的英雄焦裕禄的记录》（太平出版社，1966年、复排版，1972年）小林文男编《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的发展》（亚细亚经济研究所，1975年）古田敬一等编《中国的文化和教育》（第一法规出版，1980年）

I. 经济

作为基本文献，首先应提到薛暮桥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研究》（原书为人民出版社，1975年刊。日语译本为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东京中华书店发售，1981年），石川滋编《中国经济发展的统计研究》1-3（亚细亚经济研究所，1960-62年）同作者《中国经济的长期展望》1-4（同上，1963-71年），已有定评。经济类书籍相当多，在近一时期有崎仓民生、中兼和津次编《人民公社制度研究》（研究丛书 297，亚细亚经济研究所，1980年）并不限于经济，是包含有对大众路线实况的分析（小岛朋之执笔）的好作品。另外还有河地重藏编《转型期的中国经济》（世界思想社，1981年）笹本武治、崎仓民生编《中国经济的国际化与贸易发展》（亚细亚经济研究所，1981年）尾上悦三《中国经济入门》（东洋经济新报社，1980年）等。

J. 解放军

川岛弘三《中国人民解放军》（教育社，1978年）古川万太郎《毛泽东的军队》（讲谈社，1978年）《丸》杂志专集《未被人知的军队——中国军队的全貌》（1981年11月号）山下龙三《中国人民解放军——其政治战略思想》（劲草书房，1979年）。

(4) 评论

堀田善卫《在上海》（筑摩书房，1969年。收入《堀田善卫全集》，1974年）武田泰淳《武田泰淳对谈录·混沌沌沌》（筑摩书房，1970年）竹内好《现代中国论》（市民文库，河出书房，1951年。收入《竹内好全集》共17卷，筑摩书房，1980-82年）鲛岛敬造《八亿友人们——日中邦交正常之路》（日本经济新闻社，1971年）加藤周一《往返中国》（中央公论社，1972年）柘植秀臣《我们心里的中国》（亚纪书房，1972年）木下顺二等《从日中的基础开始》（河出书房新社，1972年）卫藤沈吉等《纠正中国

报道的偏失——新闻自由的危机》(日进报道,1972年)武田泰淳等《我不再谈中国》(朝日新闻社,1973年)竹内好《日本与中国之间》(文艺春秋社,1973年)长谷川庆太郎《中国‘现代化’的幻想》(钻石社,1979年)桑原武夫、加藤秀一《与中国交往之法》(潮出版社,1979年)城山三郎《中国震撼世界的生存方法》(每日新闻社,1979年)加藤佑三《观察现代中国的眼光》(讲谈社现代新书)讲谈社,1980年)横山宏章《人民中国的堕落》(鳄鱼之书)(KK畅销书,1981年)

4. 辞典

在事项和用语辞典方面有《辞海历史分册中国现代史》(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现代中国用语辞典》(霞山会,1973年)而安藤彦太郎编《现代中国事典》(讲谈社现代新书)讲谈社,1972年)尽管成书较早但解释详细不少条目仍有参考价值。自由国民社的《现代用语基础知识》每年都增补关于中国的新用语。

人名辞典

同书编辑委员会编《中共人名录》(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1978年)共收入775人的详细经历。此外有竹之内安巳《现代中国人名辞典》(国书刊行会,1981年)外务省亚细亚局监修的《现代中国人名辞典》(霞山会,1982年)克拉克·克来恩编《中国共产党人名词典1921-1965》(哈佛出版社,1971年)黄震遐《中共军人志》(香港当代历史研究所,1968年)柴田穗《现代中国人物100选》(秋田书店,1973年)也是涉及人物的辞书。

文学家人名辞典出版了多种。有林曼叔、程海、海枫《中国当代作家小传》(巴黎第七大学东亚出版中心,1976年)李立明《中国现代600作家小传》(香港波文书店,1977年)《中国文学家辞典 现代第1分册》(香港文化资料供应社,1979年)。

主要机关的主要责任者人名,可以从最近每年发行的《中共组织类人名簿》(广播印刷社编辑、出版)中查到。

年鉴

从1955年后,几乎每年都发行年鉴,现在仍在继续。其中有中国研究所编《新中国年鉴》(1955年后由石崎书店出版,书名改为《中国年鉴》。自1962年起,改由远东书店出版,更名为《新中国年鉴》。自1970年起,由大修馆书店出版)。1960年以后本书编辑委员会编的《中国总览》(霞山会)隔年出版,其内容也包括周围亚洲各国。

中国自1980年开始出版《中国百科年鉴》(同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80年),后未间断。另外有F.M.卡普兰等编《当代中国百科全书》(麦克米伦出版社,1979年)。

年表

综合年表,有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编译的《中国现代史年表》(国书刊行会,1981年)时间跨度为1911年10月10日到1979年12月31日。

分类年表中,有《毛泽东著作年表》上、下(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1年,上卷“年表编”中村公省编、下卷“语汇索引编”矢吹晋编、竹内实监修)第四次文代会筹备组起草组、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理论政策研究室《六十年文艺大事记1910-1979(未定稿)》。

此外,年鉴、讲座、单行本中,也附有各种年表。

讲座

牛岛德次等编《中国文化丛书》共 5 册（大修馆书店，1968 年）菅沼正久等编《讲座 现代中国》共 3 册（大修馆书店，1969 年）贝塚茂树等编《讲座 中国》共 5 册（筑摩书房，1967 - 68 年）野泽丰、田中正俊《讲座 中国近现代史》共 7 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 年，其中第 7 卷后半部提及新中国成立后的问题）。

论文汇编

1964 年以后，每年均出版由中国关系论说资料保存会编的《中国关系论说资料》4 册（第 1 分册 哲学、宗教 第 2 分册 文学、语言、艺术 第 3 分册 历史、政治 第 4 分册 经济 同会出版）。

索引、研究指南、地理、地图类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中心除每年刊行《东洋学文献类目》外，还编印《近代中国关系文献目录 1945 - 1978 年》（同书刊行委员会编，中央公论美术出版，1980 年），使用起来很方便，本文曾从中得益不少。

按类别来划分，还有东洋文库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编《明治以后日本人的中国旅行记 题解》（同文库，1980 年）阿部幸夫《现代 / 当代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文献目录 1977 年至 1980 年》（边鼓社，1981 年）。

在研究指南方面，有亚细亚政经学会的《中国共产党史研究的现阶段》（同会，1974 年）《战后日本国际政治学》（《国际政治》61、62 号合订本，有斐阁，1979 年）亚细亚经济研究所《发展中国家研究——七〇年代日本的成果与课题》（同所，1978 年）等，尝试回顾与展望了日本的中国研究成绩。

地理、地图类，有阿部治平的《中国地理散步》（日中出版，1979 年）浅川谦次监修《中国地理》（筑地书馆，1975 年）地图

出版社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帝国书院,1979年)。

程麻选译自《亚细亚历史研究入门》第2卷
《中国Ⅱ.朝鲜》第4章《中华人民共和国》,
同朋舍出版,1983年11月15日。总题为译者所改。

汉文的复活与对中国的亲近感 ——评吉川幸次郎、三好达治著《新唐诗选》

乘 汉文‘复活’之风

细读《新唐诗选》〔1〕最使人有沧桑之变感受的 是在本书

〔1〕《新唐诗选》日本岩波书店 1952 年 8 月 10 日出版。全书由解释学问与训诂的‘前篇’(吉川幸次郎执笔)和说明欣赏与诗歌创作方法的‘后篇’(三好达治执笔)组成。“前篇”选诗杜甫 15 首、李白 29 首、王维 12 首 以及孟浩然、常建、王昌龄、崔国辅的诗各 1 至 2 首。后篇选岑参、刘禹锡、刘廷芝、高适、贺知章、权德舆、戴叔伦、陈子昂、张若虚、耿湓、杜甫、孟浩然、薛稷、张九龄、李白、崔国辅、杨巨源、韩退之、元稹、杨衡、杜牧、顾况、司马曙、柳宗元等人的诗 1 至 4 首。从所选诗作可以看出选者的旨趣。吉川幸次郎(1904-1980 年)生于神户 京都大学中国文学科毕业、文学博士。曾任东方文化研究所所员和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获 1969 年度日本文化功勋奖、日本艺术院会员。著有《我说杜甫》、《宋诗概说》、《中国散文论》、《汉武帝》等 全部论著收入《吉川幸次郎全集》(筑摩书房)三好达治(1900-1964 年)生于大阪府,东京大学法国文学科毕业。受法国现代诗影响开始诗歌创作,后引入唐宋各诗人的感受,成为具有独特风格的日本诗人。日本艺术院会员。诗集有《春之海角》、《草千里》、《一点钟》、《跨过驼背》等。——译注

的‘后篇’部分‘三好达治执笔’里，首先从日语和日本字谈起。按三好的口气，好象对《新唐诗选》的出版，与日本“限制汉字”〔1〕的时风有些抵触。为此，他曾时有顾虑。而如今这些话已有点让人觉得有点时过境迁了。这其中，自然显示出了时势已经有所变化。

在本书刚出版时，有的书评，确曾涉及到‘汉字限制’的问题，因此，三好的顾虑也并非是神经过敏。因为仓石武四郎的《汉字的命运》作为‘岩波新书’之一种，也同在那一年发行。其中在谈到中国文字改革的历史时，曾预言汉字将会消灭。对日本人来说，当正觉得汉字的前途也许会不怎么长久的时候，如今却被要求将唐诗中的汉字，按中国字音去诵读〔2〕去品味，这显然会被视为是对当时时风的一种抵触。三好在书中开始提到日语和日本字时，是这样说的：

……一般国民的日常生活，已经与汉字文化有点疏远。尽管限制汉字还只是个未决的议案，但不管怎么说，作为一种大趋势，那是无法忽视的。我本未想在此书里深入探讨日语和日本字的问题。可在不知不觉写作《新唐诗选》时，竟偶然产生了这也许会有悖于目前大趋势的担忧。因此，觉得有必要在这里先提一下。

进而，他又说：

〔1〕 日本文字中曾大量使用过汉字。战后，日本政府在 1946 年发布内阁告示 35 号《当用汉字表》1850 字、1948 年发布内阁告示 1 号《当用汉字别表》教育汉字 881 字、以及后来发布的人名汉字等，对使用汉字加以限制和规范。——译注

〔2〕 在日本汉字中，依照中国本音的读法叫“音读”，按日本语音的读法则称为“训读”。——译注

我同意普通国民应该摆脱过重的汉字负担。但我同时又认为，对于相当多足以承受得了这种负担的人来说，还是应该期望他们进一步去承受其可以承受的负担。

他这样想，其理由是：

使尽可能多的人，有尽可能多的机会去读优秀的古典作品，是迎接新的时代不可缺少的条件。……（中略）……即使仅限于期待着出现如同唐诗那样完美的作品这一点，也应该永远爱读它。（159-160 页）

于是他便产生了反潮流地积极推出《新唐诗选》的念头。

其实三好达治觉得在《新唐诗选》里‘有必要提及’的这一问题在其他地方也会有所觉察。如 1965 年末我在神田〔1〕的信山社书店买到的那一本，书后印着‘1965 年 6 月 21 日、第 30 次印刷’。既然此书有着如此持续不断的购买者与读者，大约可以不必再去顾虑所谓‘时代潮流’的（无庸讳言在‘限制汉字’和汉字教育方面，并非仅仅反映在唐诗上面。如果涉及到中国的古典和日本的汉字那当然还会有所谓的‘时代潮流’问题将来也会继续面临着类似的问题）。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来读《新唐诗选》呢？

其中之一在读者方面应该是有些‘汉文’〔2〕的基础知识。

〔1〕 东京著名的书店街。——译注

〔2〕 汉文 指日本里不同于现代日本假名以汉字所写的日语文本 以及解读这种文本的方法。——译注

在中野重治〔1〕对此书的评论中，曾谈到过这个问题：

以前，我曾经学习过汉文。对我来说，那已是 35 年前在中学里的事了。就是在那时，我们碰上了唐诗——其实也说不准是唐，还是宋，仅此而已。

当时是初步接触 在我的印象里 是一点也不懂。对我而言，所谓深刻，与其说的是印象，还不如说是硬刻在脑子里。它至今还刻在那里。……（中略）……我认为，对于我这样的人 这本《新唐诗选》是最合适的读物（《图书》，1952 年 10 月号）

在战前、战中接受过“汉文”教育的人 固然也有对“汉文”反感的。不过 其中大半仍然对“初步接触”或是对“硬刻”留下了印象。事实上 在日本人的中国文学观或中国观里，“汉文”这一教育科目，包括其功罪在内的贡献，已有定论。说到其中积累的“功绩”那对《新唐诗选》感到亲切 便是一个证据。

由此看来，人们对“汉文”教育的功罪之类具体问题，以及《新唐诗选》的出现，予以特别关注，并非是毫无缘故的。实际上 这本书的出版 本该被视为战后日本的“汉文”教育已经跨过衰退期，并逐步复兴起来的征兆之一。

……战败后暂时在学校中消失了的汉文教育，得以从昭和 23(1948)年前后逐渐恢复，我认为这应主要归功于自

〔1〕中野重治（1901-1979）日本文艺评论家、作家。东京大学德文科毕业。曾为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盟员。1926年组织马克思主义艺术研究会。著有《小林多喜二和宫本百合子》、《中野重治诗集》、《日本共产党批判》等。——译注

战前就在旧制中学里担任汉文教育的老师们的努力。其代表团体便是“汉文教育恳谈会”。

昭和 27(1953)年 2 月众议院通过了《关于振兴东洋精神文化决议书》。接着在同年 3 月文部省初、中等教育局长公布了“文部省初中第 308 号”文件再次确认中学校国语科必修科目“国语甲”中也包含有汉文学习。

次年 2 月，文部大臣正式表示要恢复汉文教育。从这年春天开始，高中里学习汉文的人数急剧增加。对汉文教科书的需求也大幅度增多。（牛岛德次《汉文教育与中国语》，《文学》，1961 年 3 月号）

关于 1952 年的“世风”按《朝日年鉴》1964 年版增刊《日本百年步伐》的说法被认为有“开始复古”的迹象。

当时为推广宣传《新唐诗选》而写的书评也看到了此书是与以上时风、世态相适应的。后来，在该书于刊物上连载的空隙里还有一篇名为《畅销分析——（新唐诗选 为何卖得好）》的文章。其中说：

听说近日吉川幸次郎三好达治两先生的《新唐诗选》占据畅销书榜首已经很久了。在限制汉字的时代，这确实让人觉得反常。这称得上是“汉文复活”的迹象，但皱眉之人自然也会有。

显然这本书凭着两先生的声望提高了所谓“汉诗”的格调，也确有取得完全成功的实力。进一步说，它与目前日本诗歌界的低沉状况，也不无关系。

以上背景固然都很对。但据我的片面观察，借唐诗的风骨所反映的下层国民的危机感，以及上面的“汉文复活”

的主张，不也双双推动着这本书畅销么？而我现在担忧的却是当“汉文复活”实现之日，怕又是李白和杜甫的“艺术”远离日本青年一代之时。（猪野谦二《唐诗的魅力》，《图书新闻》，1952年11月15日）

人们在阅读本书时，确实会有以上所说的情况。不过我想，“汉文复活”这一提法实际上比较复杂。因为实际教学的人未必会适应年轻一代的兴趣与关心。按我的想象，那书中也包含有中国文学教师的苦恼与探索。所以卖出的《新唐诗选》里可能有几分之一或几十分之一，是被教师们用来作为摸索破除这种苦恼的参考与样本。

“汉文复活”与《新唐诗选》之间未必只有相互否定意义上的联系。同时应该指出的是，其中也含有新的象征的萌芽，即它表明在“汉文”教育里进而在广大日本的普通民众中存在着对中国的亲近感。它们不仅推动着《新唐诗选》的畅销，也支持了购买中国和中国文学出版物的热情。“汉文复活”这一现象，只有以这种民众的感情为基础，才有可能出现。

出版单位的宣传小册子将《新唐诗选》等“蓝皮新书”的特点，首先确定为“与中国的亲近感”。这可能是他们从出版物的种种反应中，所得出的结论。

对中国的深切亲近感

对广大的日本民众是否有“与中国的亲近感”这一问题，不管重视还是漠视，都不能不承认它的存在。我觉得，在战后日本，对苏联和对中国的友好运动都有所发展。而后一方面的活

动之所以相对活跃一些，除由于其他不同的条件之外，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因为在日中友好运动开展以前，日本民众已经与中国具有“亲近感”。日本人在学问修养、审美和习俗等各方面将中国视为“母国”。这种长期积累起来的“亲近感”传统，虽然眼下有点淡化，但毕竟仍是格外深刻的。

近代以来的战争，也强化了这种“亲近感”。日本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和殖民主义占领，固然迫使很多日本人，基于良心的痛苦而陷入过反省。可另一方面，这种机会，也让大量的日本民众，实地看到了中国的风光，接触到了中华民族的心理和意识。战争和侵略在有所破坏的时候，竟也产生了这样奇妙的反作用。尽收眼底的中国风物，使得日本人在对侵略痛恨的同时，并未憎恨中国反而竟对之加深了强烈的“亲近感”。这种感情让那些即使并不爱好文学的人，也开始接触到了唐诗（或推广而至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正如本书所说，唐诗的魅力之一，是写景。“由那种与我们不同的空间，如以茫茫大漠和广阔无垠的黄土等自然景观培育出来的诗情，足以唤起我们难得的共鸣和奇异的感受。同时，也具有令人震惊的异国魅力。（与此相比，佐渡岛上的横天川，以及五月雨后涨水的最上川〔1〕几乎算不上什么。）我喜欢唐诗的原因之一，便是与它具有这种自然的魅力有关系。（本书第 209 页）

沉浸于这种“异国的魅力”，不应该因为这样的感受相当难得，便忘记了对战争的反省。我认为，中国的自然风光，是使日本人产生“亲近感”的主要原因。至于日本人喜爱唐诗，则与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这种联系，今后将会继续存在下去。

〔1〕佐渡岛位于日本海边的新潟县，以风景优美著称。最上川，是位于日本本州岛东北部山形县的河流。——译注

我方才曾说到“近代以来的战争”。日本在“近代”，一面不断发动战争，另一方面也多次反复出现过“中国古典热”。这从每过几年，就要出版大型的中国古典丛书，便可以看得出来（进入明治后，“汉文”曾一度被轻视。但在明治 10 年以后，它又在“东京帝国大学”开始逐渐“复活”起来。到本世纪 20 年代其学科形态已经相当明显了。与此相适应，在 30 年代前后开始出版了单行本的中国文学史著作）：

- 支那文学大纲(全 16 册),1897 - 1900 年
- 汉文大系(全 22 册),1909 - 1916 年
- 汉籍国字解全书(全 17 册),1910 - 1913 年
- 同前书·补编(全 27 册),1911 - 1917 年
- 日译汉文大成·正编·经史子部(全 17 册),1924 - 1925 年
- 同前书·文学部分(全 20 册),1923 - 1924 年
- 同前书·续编(全 46 册),1928 - 1932 年
- 支那文学大纲(全 9 册),1926 年
- 中国古典选(全 12 册),1955 - 1964 年
- 中国诗人选集(全 18 册),1957 - 1959 年
- 同前书·二集(全 15 册),1962 - 1963 年
- 中国古典文学全集(全 33 册),1958 - 1971 年
- 汉诗大系(全 24 册),1964 年(出版中)
- 中国的思想(全 12 册),1964 - 1966 年

“新中国”诞生后的分化与共存

经过了“战后”10 年的空白，到昭和 30(1955)年代，中国古

典热”再度兴起。进入 40(1965) 年代，仍不见衰退的迹象。显然这既与“汉文复活”有实质上的关系，另外也“对中国的亲近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那么，这种“亲近感”的对象，其实际情况又怎样呢？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从此，日本人中出现了在以前引发“亲近感”的那些自然风光或唐诗中，从未有过的、新的心理因素。

这种“新的因素”便是指在“现代中国”这一称呼上所反映出来的新民族主义精神。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由于在古典文化中看到的中国，与实际发展中的中国并不相同，从来没有过这种新的心理因素。在明治以来日本人的中国旅行记里，实际上陈旧的感受并不少见。下面这篇文章，便是一个例子：

杜甫也好，岳飞也好，王阳明也好，诸葛亮也好，其实在中国是凤毛麟角的。换句话说，现代支那并非是圣人的支那，而是如小说所写的那种猥亵、残酷和贪婪的中国。那种除文章典范和唐诗选以外，便不知支那为何物的汉学情趣，在日本还是少一些为好（梅村良之《愚昧的教训》，《中国文学月报》，1937 年 11 月号）

为保存文章的本来面目，这里仍用了“支那”的称呼。不过，即使是其中那种对以唐诗“文章典范”为代表的中国的强烈反感态度，同样渗透着某种“亲近感”。而这种感情，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重新高涨了起来。在“汉文”范围内无法预测和理解而发生的事态，打开了新的研究领域。这几乎是与《新唐诗选》出版同步的事情。而《毛泽东选集》日语版的发行，便是它的标志。

现在想来，昭和 27(1952) 年，是耐人寻味的一年。在这个年

表上可以称作“复古风气开始”的年分里，与《毛泽东选集》出版相平行，当时日本的中国研究会联盟〔1〕连续举行了7次“毛泽东思想讲座”。我还记得，在当时借用的东京大学大教室里的那种盛况。听众里不仅有学生，还有相当多的普通市民。

而到了前年，在赶走驻日美军的高潮中，《虾球传》（黄谷柳著，实藤惠秀、岛田政雄译）翻译、出版了。以此为突破口，在二、三年中间，又有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老舍《四世同堂》等多部现代文学作品翻译面世，适应了日本读者关注现代中国的要求。

在一定意义上，这意味着是对中国的关心“亲近感”的某种分化或是分裂。事实表明，对中国的审美意向与对中国的政治意向，早已分别有了各自的角度和对象。从时代划分上，其中有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的不同，而从语言方面来看，则表现为《汉和字典》与《现代中国语辞典》的区别和并存。这样的分化与分裂，当然不能说是毫无意义的，甚至可以认为具有积极的价值。年轻一代想对中国进行科学研究的念头，有不少就是靠着研究领域分化而出现的。

那么，普通的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亲近感”又如何呢？按我的理解，尽管审美意向和政治意向正在分化，然而在另一方面，这两者也本并非不可以并存。当人们隐怀着对于侵略战争的歉疚感，以及对现实中国的人情与自然的眷恋，踏上中国土地的时候，那本处于分裂与矛盾状态的审美意向和政治意向，可以同样都表现为“亲近感”。凭着这种“亲近感”，两种意向不也可以调和与并存吗？因此，对日本人来说，当看见《毛泽东选集》和《新

〔1〕 中国研究会联盟是50年代日本研究中国的群众组织中国研究会的联合机构，主要由东京、大阪、京都和神户各大学的中国研究会组成。——译注

唐诗选》并列在同一个书架上，是不应该感到惊异的。实际上，这反映着普通日本民众的真实情况。

自然不应该无条件地推崇这一状况。不过，处于某一个时空点上，凭着近距离的感受，而将连续的历史生硬割裂开来，显然是机械的。毫无疑问，要想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还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来高瞻远瞩。

作为永远古典的“唐诗”

若只把《新唐诗选》作为一本读物来看待，可以肯定，它与政治和现代中国的审视角度，是无关的。这本著作里对待唐诗的观念，就像前面曾引述过的三好达治的话，其中是以“众所周知的完美作品”、“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愿意诵读”来作为理解和评价标准，即所谓要使其成为永远的经典。这反映了作者的态度，试图使读者跨越当今的时代和社会，直接去面对唐诗的世界。应该说，作者是有远见的。

那么，从与读者的关系来看，这样做是否会让人觉得，作者对普通日本民众所有的对中国文化或文物的价值判断尺度，有些迁就呢？这种对中国文化或文物的态度，就是指感动于中国的大自然风光，同时对其源远流长的历史心悦诚服，并怀有一种尚古的趣味。

显而易见，认为中国的文化、文物具有永久不变的价值，从而便无意识地觉得，我们所面对的中国的东西，也将是永久不变的，这种看法，当然非常错误。

在普通的民众心里，有着期待变化与变动的情绪，然而，同时也希望安定和不变。我猜测，这次出版界的《新唐诗选》热，便是这种安定与不变的心理在“汉文”教养上的反映。若果真是这

样，则我确实也有一些担忧。

当然，这责任不该直接由本书的作者们来负担。本书的“前篇”(吉川幸次郎执笔)用了很大篇幅来谈杜甫和李白，以纠正以前不正确的唐诗观念。要说过去对唐诗(或“汉文”)确有过前说的那种尚古趣味，即以逃避现实、遁隐观念的态度来加以欣赏的问题。那么，书里的下述言论，则明显表现出了对此纠偏的意图：

杜甫诗作的热情的源泉，来自于对社会和个政治的密切关注，对人之不幸的悲痛，以及对未来的期盼，即忧世之心。(45页)李白时常神往于人世之外，但那是对俗人之外的向往。李白和杜甫并非是那种完全与世隔绝，自乐于个人小天地的遁隐者。在这方面，日本人对中国的诗歌往往有误解，是必须注意的。(57-58页)

虽然如此，但总地来看，这本书并非数算得上是“忧世”之作。其原因之一，是本书把“诚实”、“忧世”和“友情”视为永久性的观念，并未将杜甫、李白等还原到他们生活的社会，具体解释产生这些作品的环境。现在，我们已难再回到或想象那样的社会了。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作者可以宽泛地解释这些观念。借助于现代与唐代社会的距离感，我们完全可以放开自己的思路。恰恰是在这种现代与唐代若即若离的联系当中，读者能够被引导着尽情地体味原诗作者们的审美情趣。

毫无疑问，这样的阅读方式，具有熨平我们生活中的伤痛，开阔胸襟的效果。另一方面，它们也有保持永恒和安定的心境的作用。

接着出版的《新唐诗选续编》(1954年初版，1965年第6次

印刷)的“后篇”(桑原武夫执笔)已把重点放在解释白乐天的社会诗方面。这固然有助于人们从当时社会矛盾的角度去理解白乐天。不过若是这种已被畅销的《新唐诗选》改变了的、将唐诗局限于具体环境的观念再度复活的话,我相信,也必会有人来加校正的。

问题并不在书籍如何畅销,关键在于这种“校正”(清醒认识)在今后的售书热中,是否还能够继续自觉,并能够真正卓有成效。

程麻译自《朝日杂志》,8卷8号,1966年2月20日1

中国问题入门

在这段时间里，报纸上关于中国的报道有点降温。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就不存在了。听不到禁止大字报上墙之类关于中国的消息，竟觉得好象有点闷在葫芦里似的。

日本人进入近代或现代以后 虽然急切地想了解中国 然而如此愿望却总是难以满足。回头看一看日本人的中国观，其主调大体是在“中国在变”与“中国未变”之间摆来摆去。五十年来，“新中国（当时一般称“支那”）”或者“动荡的中国”这一类书名，接连不断。这种景观在研究其他国家的读物中，是很少见的。

当真变了么？

中国在动，也在变。但是，当真变化了么？

鹤见佑辅抱着这样的疑问，访问了中国的学者和政治家们，写出了《偶像破坏期的中国》（铁路时报局，1923年）一书。他对胡适的大胆说法 即“儒教这东西已经死了”觉得很惊讶。可后来继续访问 见到了认为儒教是教育的根本的人物，又放心了。

我们在当今，仍然会有同样的疑问。但已不可能再像鹤见

那样 当面去质疑 而且那答案也肯定是各执一词。我想在这方面 那些与中国人有长期接触的人的回答 同样可以作为一种参考。

读过内山完造〔1〕的《花甲集》(岩波书店)能够知道这几十年来中国的实情。而如果将其作为一个普通日本人的心态来看待,那么读者的收获,也许比了解当今中国的情况更丰富一些。

以类似的眼光来看《桔朴〔2〕著作集》(全3卷 劲草书房),也是如此。在该书第3卷里,收入了作者参加的座谈会和对谈会记录,其中有的已成了历史的课题。他与长谷川如是闲〔3〕的对谈 也很有意思。

而《中江丑吉〔3〕书简集》(美铃书房出版)其中洋溢着北京的气息,活现出了一个展望着战争前景的日本人的神态。如果不客气地举已故友人的例子 那么伊藤武雄所著《黄龙与东风》(国际日本协会出版)则是交叉着叙述了一个日本的中国研究者的经历 以及当时中国的动向。另外 也有在去解放后的中国所写的游记。与其称之为中国现代史著作,莫如说它更是对中国现代历史的生动理解。

〔1〕 内山完造(1885-1959)日本人 曾在上海经营主要出售日文图书的内山书店。1927年10月后与鲁迅结识。——译注

〔2〕 桔朴(1880-1945)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者 曾任北京日文《顺天时报》记者。——译注

〔3〕 长谷川如是闲(1876-1969),日本社会评论家,其作品曾被译为中文出版。——译注

〔4〕 中江丑吉(1889-1942)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中江兆民的长子 中国研究家。在中国生活三十多年。著有《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等。——译注

“图解·文化史”的价值

毫无疑问 要想理解中国的历史和传统 离不开对当今中国的认识。筑摩书房出版的《讲座·中国》(全 5卷、附卷)就是这方面的一大工程。其中第 1卷 即竹内好〔1〕、野村浩一编的《革命与传统》已经面世。在单行本方面 还有贝塚茂树的《中国是什么》(朝日新闻社出版)

下面,再看与现代有关的中国古典文献出版状况。原田种成的《贞观政要》(明德出版社)收录了古代名君唐太宗的政论,也包括其臣下的意见。现代不流行 也没有什么名君 但若参与政治,却必须参考这些意见。中国的政治家都喜欢这类读物里的见解 所以它们也成了关于中国的参考资料。此书为《中国古典新书》(全百卷 之一册 其内容未必与现代人直接有关系 然而很容易理解。而要了解类似读物的社会背景,则不妨参考角川书店稍早出版的《图解·世界文化大系》中的《中国》(全 4册)。其中图片既丰富 又有座右铭 很有价值 可以从古到今 加以贯通。

外国人眼中的革命思想

描述当今中国的读物也有不少。说到采访报道,首先应提到 K. S. 卡罗尔的《毛泽东的中国》(内山敏译 读卖新闻社出版)读这本书 可以了解西洋人对中国(或亚洲)的隔膜看法,

〔1〕 竹内好(1910-1977) 中国文学研究家、评论家。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科毕业。著有《中国革命的思想》、《国民文学论》、《鲁迅》、《现代中国论》等。——译注

明白它们之所以错误。卡罗尔高度评价当今中国的革命思想，是“另一种共产主义”认为其源头可以追溯至延安。他作为在苏联长大的波兰人，对苏联社会主义失望的根据是正确的。而若与较他早一些访问中国、肯定实权派、以如今的眼光看政策的斯诺〔1〕的《中国另一个世界》（上、下 松冈洋子译 筑摩书房出版）相比，则会发现另一些有趣的事情。

关于文化大革命问题，有大森实的《天安门失火》（潮出版社）、村松暎的《毛泽东的焦虑与孤独》（中央公论社出版）、安藤彦太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安书店出版）和中国研究所编的《中国指南》（德间书店出版）等。要了解在这期间作为中国的基础的农村情况，则可以参看菅沼正久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事实与逻辑》（三一书房出版）。由于作者实地研究过日本的农村，所以其论述比较可信。

饶有兴味的研究论文集

由于某种原因不能读这些研究性专著并不要紧，还有长期从事研究的人所印的论文集。它们既情趣盎然，又有文章、学问的品味。例如野原四郎著《亚洲的历史与思想》（弘文堂出版）、目加田诚著《洛神之赋》（武藏野书院出版）、增田涉著《中国文学史研究》（岩波书店）、仁井田升著《中国的法律、社会和历史》（同前）、小野忍著《中国文学杂考》（大安书店出版）、竹内好著《为了了解中国》（劲草书房出版）、直江广治著《中国民俗学》（岩崎美术社出版）、武田泰淳著《扬子江边》（芳贺书店出版）等。后来，

〔1〕斯诺（1905—1972）名埃德加，美国记者和作家。曾在中国教书和采访，著有《西行漫记》等。——译注

还有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编的论文集《现代中国的思想与文学》(大安书店出版)

若说到翻译 则有以前的作品 却还不是现代的 如平凡社“东洋文库”所收的松枝茂夫译《暑碧——扬州十日记及其他》、增井经夫、今村与志雄译《太平天国——在李自成手下》(全4册)孙伯醇、村松一弥编《清俗奇闻》(全2册)等 评价都较好。还有未能出国的日本人,凭从到长崎来的中国人所得见闻而编的《图解中国生活百科全书》。以上除增井之外 都与我的工作相关 举它们为例也许有点“近水楼台”之嫌 但评价还是大体公正的。

如果以上读物都已读过 需要再推荐一本书的话 那我想提一位热爱北京的作家所写的具有京味的作品 便是老舍的《骆驼祥子》(竹中伸夫译 新潮文库出版)

程麻译自《朝日新闻》,1967年9月29日

中国文学研究与中国观

1

我觉得，如果想在中国文学研究与中国观方面认识得深入一些，应该更广泛地思考“中国研究与中国观”的问题。因为把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考虑，不仅便于在较大的范围内分析中国文学现象，更可以通过二者的比较，看清楚一些问题之所在。也就是说，它们二者之间本来就有着密切的联系。要是将它们完全割裂开来，人们会按照各自的理解，分别描绘出不同的中国景象。而这正是我们眼下所存在的问题。例如，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理解中国的普通视角，是所谓的“风俗”与“人物”，而中国研究的着眼点，则常放在“农村群体”上面。文学看重风俗和人物，社会科学却关注社会结构。这二者似乎都是以人为对象，彼此好象并没有互相抵触之处。然而，事实上并非是如此。以研究中国来说，如果谈论起始终与“战争”纠缠一体的中国历史，那么显而易见的是，所谓“农村群体”、“风俗”和“人”，在一般文学作品中便会具有不同的意义，它们将在我们面前呈现出独特的风貌。下面，我想就中国研究与中国文学研究之间的这种关系，

来分析一下日本从内藤湖南〔1〕到平野义太郎〔2〕的中国研究，以及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古城贞吉〔3〕——田冈岭云〔4〕——吉川幸次郎〔5〕——派与夏目漱石〔6〕——武田泰淳〔7〕——派各自不同的特点。

2

“中国研究”这一用语，本是产生于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其含义主要是指：对中国的综合性研究，即在不否定局部研究的基础之上的总体性研究。就此而言，日本的中国研究者内藤湖南，是可以归于这一类的。而若从把中国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分支领域加以深化这一角度来考虑，那么说平野义太郎

〔1〕 内藤湖南（1866—1934），原名虎次郎，日本东洋史学者。原为大阪朝日新闻记者 后任京都大学教授。著有《东洋文化史研究》等。——译注

〔2〕 平野义太郎（1897—1980）日本法学家、和平运动家。东京大学德法科毕业。龙谷大学教授、日本和平委员会名誉会长。著有《法律中的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法学》、《和平的思想》等。——译注

〔3〕 古城贞吉（1866—1949）日本汉学家。1897年加入每日新闻社。后以记者身份赴上海、北京。1901年回国后历任拓殖大学、东洋大学讲师。其所著《支那文学史》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中国文学史。——译注

〔4〕 田冈岭云（1870—1912）原名佐代治 日本提倡社会文学的评论家。著有《明治叛臣传》等。——译注

〔5〕 吉川幸次郎（1904—1980）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家。京都大学中国文学科毕业。曾任东方文化研究所所员、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获 1969 年度日本文化功勋奖、日本艺术院会员。著有《我说杜甫》、《宋诗概说》等。——译注

〔6〕 夏目漱石（1867—1916）原名金之助 日本近代著名文学家。著有《我是猫》等。——译注

〔7〕 武田泰淳（1912—1976）日本作家。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科肄业。著有《司马迁——史记的世界》、《毛泽东 其诗与人生》（与竹内实合著）《武田泰淳中国小说集》等。——译注

是这类研究的最新代表 也大致不差 甚至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实际上 贯穿于这一研究流派中的主要特点 在于他们都十分强调实际问题的提出与解决, 以及理论的建构和完美之类的美学观念。他们的主题 大都着眼于“农村群体”。其在文章中用来归纳结论的常见词语 是所谓的“长老”^{〔1〕}或“宗族”。也就是说 他们俩都关注在中国农村群体中集中反映出来的“长老”与“宗族”的关系。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从主观的角度说 他们意欲探究中国历史与社会的内在机理 而从客观上看 也是由于中国的变革 以及日本的侵略行为即“战争”对他们的研究有着巨大的压力。

对内藤湖南来说 中国社会的象征便是“长老”。他认为 只有长辈才能全面把握和支配整个中国。而日本要想掌握中国, 也必须采取同样的政策。他的学说体系, 具有一般创始者那种类似百科全书似的庞大结构。既是其全部体系的起点, 也是其归宿的所谓“理论”主要体现在《支那论》(1914年)和《新支那论》(1924年)两书里。据《京都大学文学部五十年史》一书说, 他的学问“从古代到现代均有涉猎 曾经在史学史、绘画史、考证学、思想史等方面 分别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打破了以前中国近代史研究里的‘王朝’模式。他探究中国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其开创的学风 使内藤史学自成一派 至今仍闪烁着不灭的光辉。”他的贡献 固然源于其具备第一手的资料 但更主要的, 还是其立足于学问的根本基础 即所谓“长老”的理论。或者反过来说 正是他的“长辈”理论 使其学说体系更切合中国的实际。

〔1〕 长老, 是日本研究对中国传统农村中具有权威的长者的称呼。日本学者认为, 这些人在中国社会里对决定重大事件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译注

内藤在论述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接着倒袁的“二次革命”失败，以及其后中华民国的政治日趋反动时，曾经这样说过：

我们至今仍对失败的革命党人表示同情。由于革命党人不了解支那的国民性，使自己的辛苦成果成了泡影。支那的国民性，是可以为求安定而牺牲任何东西。在兵乱之际，横行的恶棍猖獗，代表良民的长老忍气吞声。然而等世态稍微安稳一些，只要长老满意，仍旧可以继续统治下去。而革命党人只知锐意进取，不懂得争取长老的支持，便在其后的纷争中丧失了地盘，从而遭受了巨大的打击。……不必问法律之好坏、人格之正邪，笼络乡村长老，乃是在支那成功的秘诀。无论是恶人还是坏的法制，只要懂得这一秘诀，必定成功无疑。……革命党人因为不知道这个关键的秘诀，而导致其失败。眼下袁世凯在县长考试中只采用旧读书人，说明他很明白这一秘诀。不过，这一秘诀对于挽救国家危亡，却起不了什么作用。博得长老的欢心的君主也好，大总统也好，当面对外敌之际，并不能保证国家不灭亡。长老们面对外国时，并不怎么重视独立或爱国之心。只要乡里安全、宗族繁荣，能够平平安安过日子，即使是由外国来人统治，他们也会老实服从。在支那，具有生命力和规范的群体，都出自乡里宗族。其最高的群体代表者，便是长老（引自《支那论自叙》 引用者有所改订）

日本的中国研究 曾从历史、经济、社会结构等侧面 来接近中国 而结果终于在这里 找到了问题的关键。内藤的解答正确与否自当别论，他有所解释也就足够了。因为这如同发现了隐藏于地下的矿藏，及其巨大的蕴藏量。那作为战争中合作研究

的成果 并在战后出版的《中国农村例行调查》(1952年后由岩波书店出版)一书 其中也有同样的问题意识 比如无意中注意记录了与农民的问答。不过 像内藤湖南指出的 其中的精确程度 毕竟还有欠“科学”。那里已经点出了重要问题之所在 然而 并没明确加以说明 围绕着这些“长老”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后来清晰说明了这一点的 则是平野义太郎的《大亚细亚主义的历史基础》(1946年6月 河出书房)一书。平野也把“农村”和“宗族”视为中国社会的基础 并且解释了农村与长老之间的关系。只是 平野将“长老”叫作“会首”或是“绅董”。平野的说明大体如下：

村落一般占有大片的土地，热爱土地的农民，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共同生活的群体中的一员，他们是以生活秩序为中心而组织起来的。在中国北方的农村，有维护生活秩序的“村长”和“会首”。前者必须依靠后者来协商与村落有关的所有事宜。会首是自然村落即“会”里有权力的人，必定是地主才行。每代会首出自传统的家族，一个村里可有十余人。他们集中起来，组成自我管理的机构“公会”。其背后，则有与由国家领导的行政村不同的自然生活共同体，即“会”。它以“庙”为中心来经营大家的生活。……

他们所以谈到所谓的“长老”问题 从客观上说 自然是因为它确实是存在着。若要科学地分析中国农村社会，谁都不能不探究这一问题。不过，内藤和平野却主观地认为，为了中国的“变革”必须干涉中国的政治。而具体来说 内藤的态度较为保守 他似乎倾向于自然而然的温和“变革”。当然 他也并不怀疑由日本来干预中国政治的方法，如主要坚持必须听从全体国民

的意愿这样一种态度。可平野由于不太知道“革命”性“变革”究竟意味着什么，只是强调要对“长老”进行“改造”。当然，这并不是说他要消灭“长老”。他并没讲要将地主的品行改造成什么样子，以及不进行土地改革的话，他们是否能够接受这种“改造”。只是在平野那里，同样也可以看到，与内藤相似的代替中国人思考的那种态度：

然而，在如今农村衰败之时，能够真正拯救农村、复兴经济的最有力的地方势力，毕竟还要靠三位一体和绅董团的财力，以及传统文化的领导力量。镇、县城和城市的工业资本（包括制造业）都与它们相联系。可以复兴中国生产力的现实社会因素，不外乎是它们。指望除此以外的社会阶层，在当今是不现实的。所以，乡村建设的重要课题，便是提高他们中人的优良品德，从政治上积极动员农民，参加生产和经济的重建，努力改造绅董与地主的品格，并联合工业资本加以发展。这也是一般亚洲农村的共同课题。

应该说，当平野讲除了“绅董团”即“长老”之外没有“有力的阶层”时，他只是指望“社会结构的改良”，而并未像土地改革那样，有将贫农、中农变为“现实力量”的想法。至于内藤就更加保守一些了：

支那……要实现共同管理，无论用什么样的统治方法，都不能破坏乡村自治，否则便会打破支那的整体安定。

不破坏“乡村自治”即意味着不能离开“长老”。因为只有靠长辈来保持“农村的安定”和“宗族繁荣”，才能“老实地服从外

国人的统治”。按“内藤史学”来说，由于中国的历史可以靠外族的侵入获得革新而“延续生命”，所以若阻止日本的经济活动便等于中国的“死亡”。这样一来，“什么日本对支那的侵略主义、军国主义等等，就全不成其为问题了。”

在内藤看来，完全应该进入中国。而平野谈“农村社会建设”问题，无疑也是与“日华联合的大亚洲主义战略”结合起来思考的。在前面那段引文之后，他还有这样的话：

因此……应该推动便于生产力发展的大东亚战争，以有助于大东亚建设。

通观内藤的《中国农村例行调查》，其主题本是对中国农村内部结构的纯粹学术性研究。对内藤和平野等人的学术研究成果，当然都不可小视。但是，在他们偏袒“战争”的内心深处，确实涌动着日本国家主义的情绪，这就是所谓的“东洋浪漫主义”。在那里，有着对所谓“东洋”的“幻想”，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日本的国家形态，同时也要求中国放弃自身的主权意识。

内藤湖南曾这样说过：

日本对支那的革新给予推动，并非只是基于暂时情况所提出的问题。可以说，这是鉴于东洋文化的发展和历史联系而产生的必然结论。无论是中国、日本、朝鲜还是越南，从国家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固然重要，可如果从东洋文化的发展这一整体性角度来理解，那么国家便不成其问题了。东洋文化正无视国民的区别，在向着既定的方向前进。（《新支那论》收入 1939 年出版的《支那论》一书）

同样,平野义太郎也提倡亚洲各国“相互尊重”但其目标仍是在“东洋”。

亚洲本来是一个整体,没有整体便没有其存在与繁荣。从地理、血缘、文化和历史等角度来看,大东亚各国都有着难以分离的紧密联系。认识这种整体性,在政治、经济和防务方面互相团结,建设基于道义的共存共荣秩序,是亚洲各国的共同使命。这一使命,只有在开始相互尊重独立自主、确立大东亚的亲和社会关系之时,才能够完成。……天心〔1〕说亚洲一体,我也大胆主张亚洲一体。……东洋同一的过程,是东洋历史的长期发展(《大亚洲主义的历史基础 序》)

平野使用了“使命”一词,内藤也有所谓“伟大使命”的说法。由这种“使命感”支撑的“东洋浪漫主义”情结,寻求“东洋”地区的地理和历史联系。这在他们谈论的过去与未来的“文化”概念里,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然而,尽管他们鼓吹“文化”,实际上却是日本的军事力量破坏了“支那的革新”和“大东亚的亲和社会”。平野曾对樽井藤吉〔2〕和大井宪太郎〔3〕的活动给予很高评价。这使人觉得,在他的思想深处,国家主义即“东洋浪漫主义”的冲动,比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的观念,更起作用。就此而言,平野实际上没能与国家主义划清界限。可以说,他污染了自己,接受了

〔1〕 冈仓天心(1862-1913),日本近代美术家。创设东京美术学校和日本美术学院。著有《东洋的理想》。——译注

〔2〕 樽井藤吉(1850-1922),日本近代政治家。1862年成立东洋社会党。著有《大东亚合并论》。——译注

〔3〕 大井宪太郎(1843-1922)日本近代政治家。1885年因主张改革朝鲜政府引发所谓的“大阪事件”与樽井藤吉等人入狱。1892年组织东洋自由党。——译注

日本民族主义传统，并积极加以传播。我觉得，由于还不能认为平野在学术体系上已经完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立场，所以更应该重新探讨和评价，在战争期间日本思想界里的这种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这特别是因为，此问题直到战后，也没能很好地解决。日本民族主义运动的规律，是随着日本对外势力的扩张，其本身的观念日益明确，同时也就意味着其在逐渐加快毁坏自己。显而易见，平野同样没有能轻易逃离这一规律。谁都看得很清楚，随着中国社会内部产生的“现实力量”而启动的否定“长老”（即地主）的中国革命的展开，所谓依靠“长老”“温柔地促进”“东洋”文化发展的幻觉，是必须抛弃的。这一类研究，伴随着紧接而来的“战争”失败，其理论也终于打上了休止符。而从深层意义上看，以内藤和平野为代表的所谓中国研究，已经变成了历史。因为它并没有能够真正解答自己所提的那些引导自身倒退的问题，便钻进死胡同而消声匿迹了。平野在其所译书维特费格尔〔1〕《东洋社会理论》（1940年，日本评论社）卷头的序文中，曾经引用山路爱山〔2〕的《支那论》（1916年），说那并非是“片断”的知识，自己能够“从整体上理解”并进行“公平、深刻的观察”，试图在中国研究领域建立关于中国的整体结构，为全领域设定了贯穿始终的根本理论。这仿佛使人感到，他像是在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里树起了一块“严禁进入”的警示牌。至今在中国研究里，仍然充满着以前那种“幻觉”以及煽动这种“幻觉”的念头。

〔1〕 维特费格尔（1896—1990），美国的中國研究家。生于德国。后赴美任华盛顿大学中国史教授。著有《东方社会理论》、《东方专制主义》。——译注

〔2〕 山路爱山（1864—1917）日本评论家。曾任《国民新闻》等报记者。——译注

在今天 即使是在中国已经有了人民公社 我觉得在日本的中国研究者里,仍然存在着如平野等人在研究中流露过的那类思想。平野从马克思主义和‘东洋浪漫主义’的结合点出发 指出了‘内在于东洋社会的共同体思想 以及其自主地拒绝欧洲个人主义的事实’。但可惜的是 他们并没能论及革命后的‘中国’时,有所前进。而实际上“1958年,在亚洲东方的广阔地平线上,如早晨的太阳一样蓬勃”出现的新的社会组织人民公社,反映了“顽强的生命力”。归根结底 那种‘生命力’,与日本人所谓的‘共同体思想’也并非完全无缘。它大体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共同体的观念。1958年出现的这一新的社会组织 便是这种‘东洋’的‘共同体’思想的反映。其实在人民公社出现以前,已经有了小组织合并成大组织的动向。如此组织合并的现象,与主要由平野等人提出的“水的理论”〔1〕也不完全对立。这种新的生命动力 已被旧的中国研究理论体系指出过。它也是孕育出新中国的原动力之一。如果说它以前尚未得到过理论的说明,那么这一问题现在必须加以解释。它不应该被看作“近代”〔2〕性问题 而是‘现代’性的问题。这个问题 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并非说组织 而是指其作为一种运动。如果不这样理解,我们便无法在中国研究领域抛弃‘幻觉’并形成全新的视角。

〔1〕 平野义太郎曾认为,中国历来是缺水国家,只有解决水的问题,才能根本解决好中国的社会问题。——译注

〔2〕 日本学术界使用的“近代”概念,一般涵盖中国人所说的“近代”与“现代”。而此处竹内实谈“近代”与“现代”则与中国理论界的用法相同 即前者指 1840年以前的中国现代化准备时期。——译

3

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里，是否也有与中国研究当中的这种问题相类似的情况呢 我曾经谈到 日本人所写的中国纪行 有以‘战争’为中心的现象〔1〕。而后来才知道 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 竟出人意外地看不见‘战争’的阴影。给人的印象是 中国文学研究的视角是‘风土人情’其注意的是‘风土人情中的人’。他们是在与“战争”隔绝的领域，维护着自己独有的研究地盘。因此 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状况是 观念不太稳定 视野开放 未来目标也不怎么明确。当然 这是在把‘中国研究’与‘中国文学研究’加以对比 并将‘文学’和‘中国’联系起来思考时 得到的一种印象。尽管它们之间也有联系，如虽然有的日本文学作品，并非像我方才提到的‘中国纪行’表现得那么极端 但毕竟也都离不开‘战争’这个大的背景。而且“战争”作为一个问题 至今也仍然存在着。从这种视角着眼，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可分为“文学研究”系列的古城贞吉——田冈岭云——吉川幸次郎 以及“中国报道”系列的夏目漱石——武田泰淳两大类。而就与“战争”有关这一点来看 在并非是文学研究的‘文学’这一方面，1935（昭和 9）年成立的中国文学研究会，已经对“中国文学研究”的面貌有所校正了。夏目漱石称得上是其先驱。

〔1〕 见竹内实《通过战争见到的‘中国’——从火野苇平到新安保》（《新日本文学》，15卷5号，1960年5月1日 筹文章。——译注

4

日本人在与“战争”保持距离研究中国文学时几乎涉及到现代文学。这当然不是说，并没有个别的研究者，亲近中国现代文学，但他们并没有能够真正将其研究高度理论化。即使是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其对于理论的热心，也比不上中国研究领域。其中令人注目的特点，主要是逐渐形成了某种“视角”。在这一研究领域，人们显然继承了“汉学”〔1〕的一些东西。因此，研究者对他们的研究对象，先天地具有亲近感。这种无意识的亲近感，使得日本的中国文学史，几乎都是开篇即面对中国的文学作品，却未能想到应从整体上对中国文学来加以阐释。如最近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的问题》（竹田仓石著 中央公论社，1957年）所论述的问题，也没有触及到“中国文学史”的总体性质而只是孤立地涉及到《诗经》和《楚辞》等作品及其风格。尽管它们的“视角”很统一，可由于缺乏如中国研究领域里那样强烈的理论意识，因此与后者的角度仍有所不同。由此令人生疑的是，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中所所谓的“风土人情”这样一种视角，在开始确立的时候，其目的究竟是否那么明确？尽管这样一种“视角”已经确立了起来，可它不过只给“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带来了未能自觉地自圆其说的弱点而已。

首先应该提及的，是古城贞吉所写的那本最早具有文学史形态的《支那文学史》（富山房，1897年）里的“风土人情”视角。

〔1〕一般指古代日本人关于中国儒学或者与中国文化有关的学问。在奈良时代（710—794）和平安时代（794—1192）最为兴盛。到江户时代（1603—1868）汉学再度复兴。——译注

盖支那诗歌文章之特色，在富于山川风雨之气。此全因其阆境中多起伏贯通着长江大河、高山峻岭。……支那文学之精采，殆存于山水烟云之联想。

明治时代汉学者的最大愿望，是能够亲自到中国去，追求以古典教养为基础的知识，并对这些文学作品进行亲身体验。如多田裕计^[1]在长篇小说《亚细亚之沙》(讲谈社,1956年)里,写了一位金泽^[2]的老汉学者。他指着壁龛里挂着的寒山寺墨迹拓本,倾述着渴望的心情说:“哎,真想到中国去,看看杜甫、白居易和孔子的踪迹呀!”而小说的主人公在战争中便去了苏州,他替未能如愿的亡父,圆了到中国去的梦想。他眺望着苏州的风景,充满了伤感。不妨说,这是实现了两代人的愿望。这样一种憧憬,使日本人对中国的风土人情理想化了。正是它们,支撑着日本旧日中国文学史的框架,并成了关于中国常识的基础。同在1897年开始发行,可以称之为系列评传之一的《中国文学大纲》一书的发刊序言,也评价中国的风土说:“北方沉郁朴茂,南方横逸幽艳。”当古城把中国大陆作为“起伏贯通”着“长江大河、高山峻岭”的“阆域”来展望的时候,他是区分北、南两方来理解其“风土”即“文学”的。而田冈岭云则将这种常识进一步系统化了,提出了北、南、西的三分法。他认为,不必说中国文学,包括中国的思想和学术在内,都可以分为三大流派。其中作为具体理解这种三分法的一个例证,便是苏东坡。他出身于西,即蜀。田冈着力将西即蜀的地方色彩,与北或南方加以比较,且时

[1] 多田裕计(1912-1980),日本作家。早稻田大学法文科毕业。1940年去上海加入中华电影社。著有《叙事诗》、《记鲁迅故居》等。——译注

[2] 是日本石川县首府。——译注

有卓见：

夫支那之地气，可分为南、北、西三大部分。蜀乃属西。……盖北方即黄河一带，寒沙土山，旷野荒漠，无花鸟之胜与烟霞之奇。南方则长江浩荡，两岸烟雨，莺花千里，春绿丛中多见远山。至西蜀之地，危岑乱峰，攒头叠翠，江流自其间出，涧溪水势不伸，触岸激岩，成湍为滩。三地三种地气，地气异则风气有别。三样地气、三种风气、三类人文，自古趋向隐约各异。北方极富实力，道德观念最发达；荆楚为道家；西部则关注经世之学，治世言论众多而成秦之法家。法家学说峻峭为山，道家学说汪洋似水，儒家学说平易如野。岂可不看地气乎？（《支那文学大纲》卷四《苏东坡》，1897年，大日本图书出版）

这是认为地理条件对文学流派的形成有所影响。至于苏东坡，书中还这样说：

东坡本为蜀人。夫支那山水之灵秀钟于蜀。生于此间，俯仰此山水中，岂不感应于山水之灵异？……据传，东坡生时，眉山草木一夕尽枯。乃蜀地江山之秀气钟于东坡一身欤！

据说，苏东坡的文章雄浑，是因为其幼年亲受山水之感化，其文风中有风土方面的因素。田冈进而论及苏东坡的人格，还专辟了《东坡的气象》一章。

东坡之气象，一言以蔽之，乃以意辅情欤。人之气象为

智、情、意三者相合而成，则东坡情最盛，意次之，智殆不能也。

作者认为，这里面，也有风土方面的原因：

吾人之觉东坡惜智而偏于情与意，此无非受地方感化之影响。夫南方之情、北方之意，东坡兼而有之。以其兼之者而成西方之气象。巴蜀之地山险而峭，其峻竦之气象，即以此而成。水急且快，激越之气象，由之化成。而激越者，南人也。率直者，北人也。西人兼而有之。

显然，这种“风土”的视角，是田冈理解中国文学的主要原理。这很容易被批判为“唯地理”论。比如，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写于战争期间，1941、49年出版）观点与田冈相同，不过，刘是南、北二分法，其曾被指责为“唯地理”论，便是一例。然而，如此视“风土”为文学产生的基础，又不免使人想起吉川幸次郎的说法。只是吉川称之为“自然”而已。

我还有一个问题，即我们东洋人认为自然是最高的秩序，而人的伦理观念、美的观念次之。……你们也存在于这自然之中，然而那自然的形态，却与东洋有所不同。例如，这个树叶很美，可对我们来说，若这里仅有树叶，会觉得非常单调。在这样单调的景色里，你们能够像东洋人那样视自然为美，或美的基础么？（《西洋中的东洋》，1956年文艺春秋社）

我认为吉川对庞德〔1〕“如阮籍裸体见客”之类超越常规、惊世骇俗的审美意见所做的质疑，其中蕴含的意义很重要。古城——田冈的“风土”视角与东洋人的审美原理密切相关。吉川门下的武部利男〔2〕看著名的洋之助〔3〕所拍摄的长江照片，说感到惊讶和喜悦，那并非偶然。当一枚风景照展示在眼前时，可以使武部惊异地联想到李白、三峡，从而会禁不住想再一次真正到中国去（中国诗人选集《未见到的中国》活页）。基于这一原理，而磨炼出如此敏锐的感觉，表明在这一研究领域，经过严格的训练，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因此我觉得，应该承认，在与“战争”隔绝的这一研究领域，其实也并未逃避世事，而是内在地构筑着与“战争”相对抗的研究观念。

那么，具体的情况又如何呢？实际上，由于有意识与官方的“汉学”相区别，其中田冈的“风土”观念确实具有校正的作用，并有助于真实地认识中国。当时在东京，关于中国文学的研究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学生希望研究中国戏曲，而教授却觉得“你们连经书都不能读，就一下子接触金圣叹，根本无济于事”，而面露难色（《盐谷温〔4〕先生纪念会杂志》，1940年，同纪念会出版）。同时，因为处在天皇制度之下，正统意识形态的观念还很强烈。所以，此时进入东京大学开拓戏曲研究的盐谷温并不自由。

〔1〕 庞德（1885-1972）美国诗人、批评家。自称孔子的弟子，与 T.S.艾略特共同开创了新诗风。——译注

〔2〕 武部利男（1925-1981），中国文学研究家。京都大学研究生院中国文学专业毕业。立命馆大学教授。著有《李白》等。——译注

〔3〕 名取洋之助（1910-1962），日本摄影家。1928年毕业于庆应义塾学校。1933年参军去中国。后以摄影为业，往返于日本和中国之间。1950至59年主编《岩波摄影文库》。1956年再次到中国旅行摄影。——译注

〔4〕 盐谷温（1878-1962），中国文学研究家。190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学科。专攻中国元明戏曲和小说。——译注

后来也确实经常出现“先生被要求朗读外史〔1〕之文吟咏山阳之诗，而倾吐忠义之气，声泪俱下，闻者亦因受感动而流涕”（同上书）的局面。

至于论述苏东坡‘气质’的田冈，为什么能够真实地接近中国文学，这与当时‘汉学’中的学究空气加以对比，可以看得很清楚。田冈是从建立自己的中国文学研究视角，这就是理论的角度，选定中国‘风土’的。恰恰是因为处于并非日本风土的地带，他才能够疏远与‘汉学’纠缠一体的天皇制意识形态。而京都大学的中国学里的中国文学研究，在开始的时候，也是通过批判“汉学”才建立起了自己的学风的。我觉得，现在应该检讨其实际的状况，依据社会形势的变化，以求得其新生才对。也就是说，只有在古城——田冈——吉川系列的‘风土’视角尚未凝固，即不是‘后吉川’而是‘前吉川’这样的样态里，才会给我们以真正学术性的启示。当然，具体说来，在触及‘战争’时能够确立自己的‘视角’的那些人中，值得注意的还有夏目——武田系列。在他们那里，其视角便是‘人’。用武田的话来说，便是所谓‘平民的脸’。

5

对旅行者来说，直接看到的‘风土’是指‘人’。不过，借助于了解古代典籍而憧憬中国，并到大陆去的‘汉学’者们，他们所看到的‘人’大都是一些与孔孟说教显著不同的人群。内藤湖南 1897（明治 30）年在中国旅行之际，便曾因与中国的文人墨客

〔1〕指日本江户时代儒学者赖山阳（1780—1832），名襄，号山阳，又号外史。著有《日本乐府》、《新策》、《赖山阳全书》等。——译注

们谈兴甚浓 当然是“笔谈”)却接触不到大众 感到有些迷惑不解。

在我所乘纤船的头等舱里，已有四位中国客人，一个座位也未剩。我勉强住下，拥挤不堪。与普通中国人不同，我对耳鬓厮磨很不习惯。然而如今也只好挤在一起，几乎整夜未睡 心情很不好(《燕山楚水》)

当时在中国 吸食鸦片者很多 卫生条件也恶劣 所以不好将这些印象，都一概归结为侮蔑华夏。夏目漱石 1909(明治 42)年秋天去“满洲”(中国东北 和朝鲜旅行时 曾写有《满韩各地》一文。其中他对中国大众的感受，也大体同内藤湖南差不太多。而在中野重治〔1〕的文章中 同样偶而出现“中国佬”的称呼。他还说 那里“自然也染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之毒”(《难以忘怀》，《赤旗报》，1958年3月5日 不过 如果细心读夏目的游记，其中也有以作家的直觉，真实描写大众生活的笔墨。比如，大连炼油厂里工人默默劳动的情景，以及被车撞了的老人和气地离去时的表情 等等。

苦力个子大、壮实、有力气，也会干活 加之有人参观，心情也好。他们背上扛着装有豆子的口袋，仿佛像草袋子一样轻。从下面扛着袋子，慢悠悠地向三楼高的空中走去，然后倒掉。倒掉后很快就空着走回来。……在上下两条木

〔1〕 中野重治 (1902 - 1979)，日本评论家与作家。东京大学德文科毕业。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盟员。1826年组织马克思主义艺术研究会。著有《中国之旅》等。——译注

板的途中，人们相遇，一句话也不说。他们像哑巴一样默默地就这样从早到晚不断扛着沉重的豆子爬到三楼高然后再下来。如此沉默地按规矩劳动，使人们看到了他们那充满韧性与精力的生命形象。在那里站着观察他们，很快就会被当时的情景所感染。

后来当漱石看见这些苦力从锅里吃着煮熟的豆子望着他们紫铜色的肌肤和强壮的体魄，不由得想到了“楚汉相争”的故事，觉得逼着韩信在大腿底下钻过去的汉子，“一定就是他们”。将苦力们与通过古代典籍知道的英雄豪杰联系起来，反过来又去理解古典，漱石这样的文化教养，显然是来自于“汉学”。然而另一方面，由此也可以看出描写漱石所理解的那种现代人的文学作品，当时确实还未能在中国出现。

无论如何，漱石通过工作的劳苦大众看到了“中国”的一个侧面，竟因深受感动而忘记了胃痛，这种事确实是意味深长的。而小林秀雄〔1〕1938（昭和13）年在以“满洲”的黑河为旅行终点的中国游记中，也曾有过相似的感受，即：“我觉得在北京的街头见到阿Q似的面孔，比在哈尔滨的道路碰上梅什金公爵〔2〕还要难。”显而易见，理解一个国家的“人”确实并非那么容易。

昭和时代长达15年的侵华“战争”似乎终于克服了这一困难，它使日本人真正看清了中国“人”的真面目。研究中国文学躲不开“战争”，明白了这一点也许会让人觉得悲哀。但通过这

〔1〕小林秀雄（1902—1983），日本文艺评论家。东京大学法文科毕业。著有《新订小林秀雄全集》等。——译注

〔2〕梅什金公爵，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痴》中的人物。——译注

一发现 也确实可以催生出真正的“文学”。武田泰淳便谈到过这样一种见解：

……我们见到过许多表情极端痛苦，意志却毫不动摇的（中国）农民。他们那亦苦亦乐的眼神，总有些不同寻常的东西。看见当地人那被晒得油黑的脸，觉得那颜色就像他们那如同深潭似的心一样。连孩子们身上，也仿佛潜藏着聪敏的智慧。同我们士兵交往的，都是当地有着如此精神的穷苦人。

这种神情，漱石在奉天（沈阳）的街头也见到过。漱石写过一位可怜的、年过六旬的拉车老人：

令人惊异的是，地上的老人向后伸着手，满是伤痕的脸上毫无表情，既没有痛，也没有苦，更不是在特别忍着。值得注意的只是他的眼睛。老人阴沉地盯着地面。

漱石让马车离开那里，在宿舍门前下了车。后来，他莫名其妙地觉得：“冷漠的中国人真是不可思议。”这说明他还没有真正摆脱“战争”的阴影。而武田则相反，他主动接近当地居民，认为那里才有真正的“中国”。

这些居民，在大部分中国研究者和到中国旅行的人的眼里，只是外来之辈。然而，构成亚洲及东方文化源流之一的中国的，正是他们，而并非是那些以高雅的北京话高谈阔论日本的“汉学”者及发现古书的两三学者。出身于高级的东亚研究所和东亚文化协会的人，并不值得骄傲。但他们

的首脑却将住在那片土地上的居民忘得一干二净，去奢谈什么“东方文化建设”。而那些在前线以当地居民的镢头修筑道路的工兵，或是那些用当地居民的锅与他们共同做饭的哨兵们，一定会嘲笑其腔调的空洞。政治家也许愿意使用成千上万的苦力，但是文化人，以及梦想着在东方盛开理性之花的人们，一定会有从一个人的感情中觉察出人们的普遍感情的深切爱心（《中国文学月报》第 44 号，1938 年 11 月）

这里讲的“人”便是后来中国文学所说的“人学”。所谓“人学”，其进一步则发展成了以“人的生态之学、人的生活方法之学，因而即是人的本质之学”为主要理论基础的中国文学论（武田《中国文学与人》）在我看来这里的“人”还应该理解为“政治的人”。在《司马迁》（《史记的世界》，1924 年）一文中，武田也曾从政治上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

世界历史即政治的历史。只有政治才能构成世界。……历史的动力、世界的动力，就是政治的人。……人要成为世界的中心、分裂的集团或独立的个人，都必须首先成为政治的人。只有以政治行事的人，才能在历史的舞台上，担当起某种角色。

武田究竟是如何在五光十色的“人”身上觉察到了政治的呢？无论是已往那臭名昭著的代表性政治人物秦始皇，还是将自己的竞争对手变为“人彘”的那个可怕女人（吕后）他们在历史上都是将“人”作为“政治人”来看待的。这一看法确实抓住了生活在当今与过去社会的人之根本。当然这并非是说当今

的中国无处不是政治的人。然而，即使与汉王朝创立之时相比，从事政治活动的人也并没有减少。“现实力量”即是从这样的人中产生的。这些人的生命力便源自于“政治”。不过，这当然并非是指教条主义的“政治”，而是指与“人”相联系、以“政治人”的形式存在着的“政治”。这也就是我们在当今所看到的，政治之魂本就存在于“当地居民的心”中。曾几何时，在日本观察中国的人，因为那里显现着不可救药的“死寂”状态，便认为（或相信）其根本是停滞不前的。但现实的革命却表明，那里的人正在以“政治的人”行动着，不断如电影似地演出了一幕幕的活剧。

我认为，对这些“政治的人”很值得我们寻找恰当的词汇，去写出以前从未写出过的文章来。以前日本的中国研究，曾不约而同地关注过“长老”即“乡绅”。可中国社会的实际发展完全否定了他们。日本的研究者，当然并非不知道“阶级”这一概念。可由于他们的学问另有旨趣，便忌讳使用这样的词语。这种忌讳，可能就是他们失败的原因之一。而现在，新的人民组织，即人民公社的出现，使人们再次产生出希望，即希望中国研究能够说明古老传统中的“共同体”的生命力。这样一来，我们必须着眼于使传统“共同体”更新的那种原动力，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运动。我觉得，人民公社成立之前曾广泛进行的反“右派”斗争这一政治运动，已预示了这一点。虽然它原属于思想斗争，却并不是与社会结构隔膜而仅限于思想层面的，它实际上也就是规范人民生活的政治运动。在这里，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武田关于“政治人”的说法中，那令人信服的预见性。我们可以认为，将习惯于如此“运动”的人们，仅仅理解为“共同体”式的人，只能认识“古代”的中国。而将组织与人联系起来思考，则可以认识“近代”中国。如果真从“政治的人”的视角入手，那就能认识与批判斯大林、匈牙利事件等代表着“现代”诸问题有关

的“中国”。

当“中国”的雄姿借助于新的“共同体”即人民公社展现在地平线上的时候，其中也蕴含着作为“运动”的政治。而推行这种政治的主体，便是人。不过，回顾过去日本的“中国研究”和“中国文学研究”，这二者却没有同步互应，而是各自在地盘上开辟着自己的“视角”，各自领域都在搞自己的封闭系统。我认为，现在我们则应该把这些零乱的中国观念统一起来，将“视角”统一确立在“政治”与“人”及其它们运动和生活于其中的广大“风土”上。这个问题，既与我们生存的“现代”直接相关联，在中国文学范围内，它也将关系到对如《人民公社史》那样的大众“纪实”文学作品的评价问题。

程麻译自《文学》第 28 卷 5 号，1960 年 5 月 1 日

教育的责任

——中国文学状况

在一个多月的中国旅行〔1〕结束，即将出境的前一天晚上，蒙广州文化界的朋友举行送别宴会。会上大家意气风发，畅所欲言。其中特别是开高健、大江健三郎〔2〕的发言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不过这里想说的，还是当晚华东师范大学校长，无意间说的一句话：

关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3〕我们经常通过墙报和老师讲课，向学生进行教育。如果不这样做，学生会以为，似乎

〔1〕作者曾作为日本文学代表团成员在1960年春去中国访问。——译注

〔2〕二人均为当时参加日本文学代表团访华的日本作家。后者曾获诺贝尔文学奖。——译注

〔3〕即《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是1951年9月8日在美国旧金山签订的日美军事同盟条约。该条约以维持日本的“安全”为由规定美国有权在日本驻扎军队和建立军事基地。1960年1月日美修改了该条约重新签订《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主要内容是“发展日本抵抗武装进攻的能力”在“应付共同危险”时日本负有保护驻日美军的义务美国继续有权在日本驻军和使用军事基地；鼓励两国经济合作”等。为反对重新签订这一条约，日本人民当时掀起过声势浩大的政治斗争。——译注

全体日本人是赞成安保条约的。

也许我对他的话的记忆得不太准确，但大意是如此。这让人觉得 中国的长辈们认为 有对后代进行教育的责任 而且这种责任感 是与阶级和民族联系在一起的。当听他们说 如果放弃教育 新中国将会出现狭隘民族情绪时 尽管自己只是一个短暂去中国的旅行者 却仍然能够直感到 他们流露出的那种紧迫心情。我不由得对抱有如此教育责任感的人，产生出了一种敬意。

我曾经觉得“教育”一词具有使人难以接受的伪善味道 不如之以与学生的平等接触为好。然而在广州的这一夜，不知为什么 竟使自己也感到 身上有了无法推卸的教育责任 而且还是一付很沉重的担子。不过，至于说到自己所讲授的中国文学，我还是觉得没太有必要承担那样的教育责任。这首先有政治上的原因。因为如果那样，也许会妨碍学生的主体意识。实际上 不必将每个人都套在政治里面。对学生来说 这样的教育意识 未必就有什么好处。然而从另一方面看 中国人对后代进行关于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教育的事，其实也应该是日本教育的课题。我觉得 在一定意义上 这种本不属于教育的思想指导性任务，也该包括在教育之中。而英国文学或美国文学的教学，大约也普遍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我会感到，让中国文学承担这样的教育任务，有点“麻烦”呢 这除了与日本的文化观念有些关系之外 也是因为，日本对中国曾有过特别的侵略责任。而就日常生活来说，这还会涉及到毕业就职的问题。要来搞中国文学，尽管对所接触的问题会感到有点厌烦，但毕竟不能不同政治有些联系。与

这种联系有关的处世方法 另当别论 在事实上 日本人研究中国文学的历史，从来就没有完全脱离过政治问题。

现在 战争毕竟停止了 日本的现代化也已经实现。如此说来 似乎不必再多考虑这方面的问题了。但现实的状况却是 人们总是想从中国文学里 寻求改变现状的办法 或是想从中汲取力量 或是想从中获得战略、战术什么的。要是此路不通 则想另有所求。这样一来，便使得中国文学教学显得有些不堪重负。

谁研究外国文学，当然都难免与本国相联系。我也很难将这种情结 从自己的脑子里完全排除掉。研究中国文学 当然要与研究中国的人们保持联系 但归根结底 还是得拿出足以推动这一研究的成果来，其他都在其次。而为了培养文学鉴赏能力，最好还要亲自去中国感受大陆的风光，那肯定也有所助益。由于无根据的想象难免有误解 所以与原作者见面 亲炙其音容笑貌 也可以使人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 更加准确。而妨碍这样做的具体困难，则主要来自日本对研究中国文学的人的那些束缚。在这中间 他们对政治的关心 多是产生于想改变日本不良的状态，即反感于当时的现状。要说这也称得上是文学和政治的关系 那日本与中国之间 还是有很大差异的。可要是认为 中国所肯定的东西 日本就应该完全否定 则显然又过于简单和公式化了。

如果从这样的视角来思考一下 那么必须注意的是 所谓中国文学 其内涵实际上包含有很多的侧面 而不应该仅从纯粹文学的眼光来看待它。中国文学 好比是一条外国人借以了解‘中国’的道路 其中的‘中国’既呈现出种种不同的侧面 又都被称之为‘中国’。这个“中国”对有的人来说 意味着道德 而对另外的人来说 则是革命 还有的人 只把它看作是一个人群种族。这种种各自的想象，自然会引出多种多样的话语来。可实际上，

它们所议论的，又都是同一个对象。日本人心目里的中国文学，在侵华战争以前就已经多次改变形象。而到战后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只是由于战争的爆发、发展和停战，以及革命的发展、胜利、再发展等等这些令人应接不暇的消息使人们忽视了这一点罢了。

中国文学当然并非是铁板一块。即使说按日本研究者包括教师的观念对之会有某些保留的看法而保留性的意见也难得一致。又由于是在少数的大学里教授这门课程，它便不能不受到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意识的影响。另外，所谓中国文学并非铁块一板，也意味着其内容在日益变得五光十色。在东京大学里京都学派与中国研究会的对立其实表明了中国文学研究的活跃而并不是停滞。这很像中国的“统一战线”。尽管当今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还不太定型，却很少见分裂的意识。研究领域的划分在不断精细但在目前尚没有全新的视角能使中国文学研究，出现根本性的突破。即使是研究者们思想对立也不怎么明显。人们大都是在认真地分析作品毕竟这也是研究保持活力的一种办法。

而就当代中国语而言，它首先意味着是一种技能。这种技能掌握得如何另当别论总得能够以当代中国语来译读原著才行。于是便要使用字典和参考书以及查找典故等等由专家们来带领进行的专门训练。这些，大体上也就是目前日本大学里中国文学的教学内容。所谓按原文音读的方法，自获生祖

徠〔1〕，甚至从更早的菟道稚郎子〔2〕以来，到战后才逐渐规范化。而与此不同的读音方法，还有所谓的“汉文”〔3〕。因此所谓中国文学实际上其中也含有“汉文”部分。有时虽然是用音读〔4〕然而对汉字的理解仍然会给人以日本人使用汉文的感觉。例如要解释当代中国语里的“水”和日语里的“水”〔5〕字之间的区别便不得花费些时间。而如果不如此较真地推敲只接触一般的古典文献，当然也可以借助汉文典籍或汉文学者编纂的辞典来阅读古书。要是非常卖力地学也许可以说，一学期便能够学会中国语了。

不过从根本上说中国文学与现代中国语的联系并非是十分密切的。因为中国文学的主要问题，在于其内含着许多文学之外的东西。比如竹内好〔6〕在《鲁迅》一书中时时联系到西

〔1〕 荻生徂徕(1666-1738)，日本江户时代汉学家。名双松，生于东京。曾在自宅设立名为“护国”的私塾，广授中国古文学，提倡孔子前的“先王”之道，反对朱熹对六经的随意解释。主张按汉字原音阅读中国经典。著有《论语微》、《弁名》等。——译注

〔2〕 日本传说中的第15代天皇应神的太子，第16代仁德天皇之兄，将天皇之位让与了后者。据说其熟读中国古典，博学多才，引进中国大陆文化，促成了大和王朝的鼎盛时期。——译注

〔3〕 汉文，是日本人按本民族的习惯用汉字书写或阅读古典文献的方法，与中国人使用汉字的方法，并不完全相同。——译注

〔4〕 日本人按照中国发音来阅读汉字的方法，叫音读；而按日语发音的，则称为训读。——译注

〔5〕 中文里的“水”是泛指，而日语里的“水”字一般指冷水，热水另称为“汤”。——译注

〔6〕 竹内好(1910-1977) 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科毕业。日本评论家、中国文学研究家。著有《中国革命的思想》、《国民文学论》、《现代中国论》、《鲁迅》等。——译注

田〔1〕哲学的主观辩证法、以及以保田与重郎〔2〕为代表的日本浪漫派 还有‘大东亚战争’的阴影等等。而对在那些内在于中国文学的方法观念和方法论之类，却先人为主地加以拒斥。战后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 最值得关注的 并非是类似做饭菜时的那些材料 倒有些像是厨师的技巧似的。

在以前被称为‘汉文’的时代 或者在如今继续以汉字为对象的中国文学领域 推崇的是道德规范。人们抱着‘经书引导思想向善 汉文鼓舞士气 大兴儒教必当吟诗’的观念来学习汉学。但后来 逐渐发展起来的支那文学和中国文学研究 却与之有所不同。就推动形成这种新风格的源头 即所谓京都学派来说 例如在青木正儿〔3〕身上所反映出来的 则是某种‘文人趣味’。他们的兴趣是通过作诗、演戏 或是去中国旅行 借以沉浸在中国的风景、风俗之中。身处在贯穿如此趣味的生活里 那种根植于实际感受的审美情趣 不会轻易被破坏 其发挥了内在地引导他们鉴赏中国文学的作用。在他和他们热衷于享受中国文人生活的方式里 显示出了一种自觉体验异域文化的意识 以及一种溢于言表的满足感。他们全身心地投入 而且品味得很地道 有时确实使人望尘莫及。

如此钟情于中国文学背后的内涵，再回头来品味文学作品，这样一种研究风格 现在在东京大学的中国文学研究会里 还能

〔1〕 西田几多郎（1870-1945）日本哲学家 京都大学教授。是倡导日本“无”的研究和主观哲学的权威。著有《善之研究》等。——译注

〔2〕 保田与重郎（1910- ）日本评论家。奈良县人。东京大学美学科毕业。1936年3月创办《日本浪漫派》杂志 接受并传播德国浪漫主义思想。主要著作有《日本之桥》、《英雄与诗人》等。——译注

〔3〕 青木正儿（1887-1964），日本中国文学研究家、同志社大学教授。著有《中国文学思想史》、《中国近代戏曲史》等。——译注

够看得到。不过，对中国文学研究会来说，那文学背后的内涵，已不再是中国文人的生活，而就是中国自身。正如以“中国”的称呼来代替“支那”所反映出来的尊重态度，其中的研究者们，有相当多的理想主义成分。这种理想主义与其说产生于对中国实际成果的观察，勿宁更是来源于摆脱战争的亲身感受。当然，如果考虑到中国战后逐步在日本人面前树立起的巨大形象，那也可以说，中国文学研究会面对着的，是当今的中国。总之，就像佐佐木基一〔1〕说过的，读中国文学研究会所办的《中国文学》杂志，会觉得它不只是一个专门研究中国文学的刊物，更表现出密切关注中国本身。座谈会纪要《武田泰淳》，《近代文学》，1960年7月号，的倾向。这其中，具有新式的文人情趣，也就是对中国实际情况的强烈兴趣，以及同中国的“事物”交流感情的心愿。他们多少都带有中国“百科全书”式的色彩。在对中国各方面都有兴趣这一点上，他们比京都学派的文人，有着更广泛的欲望。

在这些人的中国文学研究里，那种地道日本式文人的趣味，并不太浓厚，只能算是一种文人趣味。这是他们共同的特色。他们的研究成果也都相当可观。这种研究所关注的，是文学以外的东西，从而也使中国文学与其周围环境的联系密切了。因此，人们都很尊重这种在如此连结点上的研究成绩及其经验。而其今后的发展方向究竟会如何呢？其中一种可能，大约会逐渐从原来抽象的“中国”与近百年来中国的社会变革运动之间的联系上，来看待中国文学。令人欣喜的是，已开始出现了对中国社会变革运动写日本的关系，以及对这些运动与文学本身关系

〔1〕 佐佐木基一（1914—1993）日本评论家、作家。东京大学毕业。1946年与荒正人等创办《近代文学》杂志。曾参加亲新日本文学会。著有《个性复兴》、《现实主义的追求》、《昭和文学论》等。——译注

方面的分析。显而易见 在思想类型五花八门的日本 恐怕不会再把中国文学仅仅看作是中国文学自身了。

例如 在中国农村或工厂 目前出现了许多新民歌。龟井胜一郎〔1〕把它们比作《万叶集》里的旋头歌〔2〕和东歌〔3〕。实际上 日本古代庶民 与现代中国大众并不相同 但龟井如此理解也并非没有道理。这也许可以理解为,是亚洲文化特色从古代向现代的飞跃。这不由得使人联想起,日本社会的现代化也不该完全否定。如果发掘其积极的方面,它还可能对与日本有关系的亚洲文化有所贡献。而且 即使不考虑日本的现代化 其也有助于思考当今如何继承亚洲文化 包括非洲文化 口头文艺的问题。就此而言,将中国的新民歌和日本古代的歌谣联系起来,确实能够对比出日本古典所具有的独特之处。再从这个角度反观中国文学,同样可以发现对日本有益的文化规律。因此可以说,能否选取把日本的大众文学与中国大众文学相联系的视角 乃是关系到日本对新中国文学的研究 会不会分崩离析的大问题。而通过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群众运动,我们有一种朦胧的感受 那就是 采取这样的视角并加以深化 是完全可能的。这样的视角究竟能带来什么后果 现在还无法预料 但是我们总应该扩大这种视角的影响才对。这种视角,并非只是扩大对日本内部观察的视野,也应该把视野扩展到日本以外。如

〔1〕 龟井胜一郎(1907-1966) 日本作家。东京大学中退。著有《日本精神史研究》、《中国之旅》、《龟井胜一郎全集》等。——译注

〔2〕 旋头歌是日本古代和歌体式之一 以 5、7、7 字母的句式多次咏唱,也是日本和歌集《万叶集》中的歌体之一。——译注

〔3〕 东歌是编撰于 8 世纪的日本和歌集《万叶集》卷 14 中所收 230 首短歌的总称,为当时日本东海道地区的民谣体。作者及成歌年代未详,其生动表现了民众的生活和方言。——译注

此国际主义的视野，本是中国文学里就有的。只是中国大众运动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使我们忽略了中国文学里的国际主义倾向罢了。其实作为贯穿中国民众运动的内在规律，我们既然注意到了其中民族主义的意识，那也并非不可以同样关注其国际主义的倾向。应该看到这样一种关系，即日本人立足于自身政治运动，完全能够从中国文学里发掘出比其自身内涵更加丰富的内在启示。

如果由此进一步再深入到文学理论的层面，也势必触及运动、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前研究中国文学的日本人都曾通过鲁迅的作品，接触过文学自身规律的问题。尽管今后必须继续关注日本的政治状况，但日本学者们仍然会尊重文学本身的规律问题。而能果真如此，那也就应该对在呆板地理解“政治”又呆板地理解“文学”的基础上所形成的那种“政治和文学”关系及其造成的损害进行必要的反省。比如去中国演出话剧的剧本生硬地突出政治便是一例。这是日本的生活现实与中国的生活现实正面接触时所发生的矛盾。剧本的改动只是个别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对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问题，认真加以推敲，那才能够实现文化交流的真正目的。日本的政治斗争正在不断深入，可对于表现这些斗争的方向与现状的现实主义文学手法，人们的意见却莫衷一是。这种莫衷一是的现状说明，人们还没有能够从理论上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既反映了日本政治的偏差，也证明了我们实在应该检讨以前那种尚未认识到艺术问题无法依靠政治，只能靠艺术自己逐步解决的浮浅认识。因为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对日本人来说毕竟还不是自己的东西。这恰似对政治运动的评价，从外部和从内部来看，是不会完全一样的。

关于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与中国文学教育里存在的这些

问题 不应该简单地加以解释。目前也不能指望 用中国文学的内部规律 来指导日本文学 或者是通过艺术交流和可能的对话来解决它们。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有待于对轻视战争的罪责，以及日本教育向西欧倾斜诸问题的校正。而这些问题是很难解决的。要想解决它们 也许还有另一条路 那就是日本人通过把中国文学与其环境和政治运动重新密切联系起来，从中国文学里寻找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如果真是那样，也许日中两国文学之间的创作及作家差别，便可以忽略不记了。它们各自的特殊性问题，会无关紧要地如同沙子一样从手指中滑落下去。至于说到中国文学 我们可以把其中文学与社会的关系 形象地理解为金字塔形状 即其最基础的 是变革社会的群众运动 其上则有民众的文化运动，再往上是专门作家的艺术活动。而在日本 艺术家们对大众文化的病态的反应 曾经很麻木。不过 目前在这方面已有所改变。日本作家们为了争取新的读者与观众 正逐渐开辟新的现实主义道路。不可否认的是 在这种变化的过程中，中国文学的历史和经验，对日本有很实在的指导作用。而正在日本展开的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斗争，又把日本与中国、朝鲜等亚非各民族的联系 建立在了全新的国际主义关系的基础上了。从这一点着眼，探讨中国文学所内含的国际主义精神 对我们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其实 关于中国文学的教学 就事论事是无法改善的。我想 如果真正能够从这种角度来看中国文学 并且卓有成效的话 那么 日本的教育领域，一定也会有全新的改观。

程麻译自《文学》第 28 卷 9 号，1960 年 9 月 10 日

理解中国共产党入门

如今，在理解现代中国精神的形成与来龙去脉方面，E. 斯诺〔1〕的《中国的红星》（宇佐美诚次译 筑摩书房出版）以及 A. 史沫特莱〔2〕的《伟大的道路》（阿部知二译 岩波书店出版）两书已经获得了经典的地位。此外，J. 伯尔丁〔3〕的《中国走向世界》（安藤次郎译 筑摩书房出版）也很有趣味。还有波伏瓦〔4〕的《长征》（内山敏等译 纪伊国屋书店出版）凭着自己的感受来理解中国，写得也很明快。而 R. 纪兰〔5〕的《六亿蚂蚁》（井上勇译 文艺春秋社出版）其中有客观的描述但又流露出欧洲天主教徒的偏见。

〔1〕斯诺(1905 - 1972), 美国作家与记者。1928 年来中国, 1936 年访问陕北革命根据地 并写作出版了《中国的红星》一书 中文译本名为《西行漫记》。后又有《中国巨变》等书。——译注

〔2〕史沫特莱 1890 - 1950) 美国女作家与记者。1928 年来中国 在上海参加进步文化活动。死后葬于中国。著有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伟大的道路》是描述朱德生平著作。——译注

〔3〕伯尔丁 美国人。——译注

〔4〕波伏瓦 法国著名哲学家萨特的女友 著有《第三性》等。——译注

〔5〕罗伯尔·纪兰 法国人。——译注

首推《未完的旅程》

我觉得 关于在新旧交替时期的中国 亲自对其现代历程的体验 应当首推大塚有章〔1〕的《未完的旅程》(三一书房出版)一书。这是一本值得反复阅读的著作。而作为在中国监狱里的感受 则里盖特夫妇〔2〕的《解放了的囚犯》(阿部知二译 岩波书店出版)很有意思。除此之外,岩波书店出版的丛书“岩波新书”里,也包含有很多反映现代中国的文学作品。其中很有特色的,是福地今的《我是中国的地主》。作为以个人体验了解中国的入门书 还可以举出川村薰的《七亿人的大河》(理论社出版)

在中国民众自我记叙以往历史这一方面,除《现代中国文学选集》(平凡社出版)中的‘报告文学’卷之外 还有在中国编译出版的《中国红军故事》(大安书店发售)价格十分便宜。冈本隆三的《长征》和《续长征》则是根据中国人的回忆改写而成的。

为回应对中苏发生论战的关注,已出版有 T.曼迪的《中国的身影》(高桥正译 弘文堂出版)K.迈耐尔多的《北京与莫斯科》(河原田健雄译 时事通讯社出版)朝日调查研究室编写的《中苏论战》和《中苏对立》(朝日新闻社出版)新岛淳良〔3〕的

〔1〕 大塚有章(1897-1979) 社会活动家 生于山口县。大阪日中友好学院院长。——译注

〔2〕 里盖特夫妇 美国人 曾因间谍罪在中国服刑。——译注

〔3〕 新岛淳良(1928-) ,日本第一高等学校中退。早稻田大学教授。著有《鲁迅与瞿秋白》、《毛泽东的思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译注

《认识中国的革命》(御茶水书房出版)以及中岛岭雄〔1〕的《现代中国论》(青木书店出版)筹著作。而作为论战的第一手材料,则有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日语小册子,在大安、远东和内山等书店(均在东京都千代田区神保町)都能买到它们。至于苏联对中国的看法,可以从收录苏斯洛夫〔2〕报告与赫鲁晓夫〔3〕演说的《中国共产党批判》(三一书房)一书中了解到。谈及中共党内斗争情况的,则有石川忠雄〔4〕的《中国共产党史》(庆应义塾大学通讯)B.舒尔茨的《中国共产党史》(石川忠雄译 同前),而通过实际观察和与中国领导人谈话触及这一问题的,还有 E.斯诺的《今日中国——另一个世界》(松冈洋子译 筑摩书房)

叙述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比较简捷的有岩村三千夫〔5〕与野原四郎〔6〕合著的《中国现代史》(岩波书店出版)竹内好等著的《中国革命的思想》(同前)比较详细的则是岩村三千夫的《中国现代史入门》(至诚堂出版)

〔1〕 中岛岭雄 (1936-),东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科毕业,东京大学大学院博士中退。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著有《中苏对立与现代》、《现代中国论》等。——译注

〔2〕 苏斯洛夫 (1902-1980)原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译注

〔3〕 赫鲁晓夫 (1894-1971)原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译注

〔4〕 石川忠雄 (1922-),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庆应义塾大学校长。著有《现代中国与世界》等。——译注

〔5〕 岩村三千夫 (1908-1977),中国研究者。生于新泻县。早稻田大学政经学部毕业。日中友好活动家。笔名中山耕太郎。1946年发起成立中国研究所。——译注

〔6〕 野原四郎 (1903-1981),中国史学者。生于札幌。东京大学东洋史科毕业。专修大学教授。著有《中国革命与大日本帝国》等。——译注

《北京周报》上看动向

如果随时关注中国的激烈变动，可看从北京航空邮寄的《北京周报》月刊则有《人民中国》。后者的编辑最近有所改善内容也多彩了些，过期以后还可作为资料来查阅。要了解在中国，或在日本发行的关于中国的图书可以浏览《大安》（大安书店出版）和《书报》（远东书店出版）筹期刊。另外，《中国》杂志中国之会发行，位于东京神田三崎町 2 之 8 东光大厦内 还以竹内好的《现代中国论》为开端 印刷‘中国新书’系列。在现代中国饮食方面，《中国菜》也很有趣。

《现代理论》杂志 河出书房出版 每期都刊登有特色的评论中国的文章。目前，中国研究正在发生新的蜕变，呈现出这种苗头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会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会出版，东京都练马区羽泽 1 之 1 丸山先生）很引人注目。有关这方面的阅读咨询，可去国会图书馆亚非资料室，或是中国研究所图书馆（东京九段 4 之 2）。

程麻译自《东京新闻》，1964 年 11 月 28 日

《日本人心里的中国形象》序言

这本书由我几年来所写的文章中，那些与中国有关的评论汇总而成，也是我的第一本评论集。

本书里所收入的，并非是分析中国的文章，也不包括对日中关系的论述，而是写日本人对于中国形象的探求与描述，以及借助于这种形象对中国和日本问题的思考。我关心的，是日本观念里与中国有关的那些东西。不管是日本人还是日本文学所描述的中国形象，当然都只是一种想象，而我的意图，则是要探求这种想象是怎样的情况。也许这样的想象并不等于真实的中国，即使这些想象中反衬出日本的影子，那也未必就代表整个日本。所以，这些文章既非“中国论”，也不是所谓的“日本论”。如果打比方，它们大约有点像是架在两岸之间的“桥”。可能有人觉得，行人不过只是从这“桥”上来来往往，却不一定在此岸或是彼岸驻足。但我想，“桥”也有“桥”自身的意义，其价值之一便是可以望得见两岸的情况。至少行人们会考虑到，借助于“桥”的想象，并不等于“桥”两边真的对象，它们可能未必那么真实。

具体考察中国的实情或是日中关系，无疑十分必要。不过在像“桥”这样的中间地带，或者说了解日本人对于中国的想象，显然比漫无边际地考察日本人的一般想象，更容易接近既定的

目的。因为这样的考察，原本就与中国有关系。无论是为了认识中国的真实 还是要了解如此想象的结果 都应该重新回顾一下日本人这种想象的内容与演变轨迹。

以上便是本书所收文章的共同特点。至于说到每一篇文章 其中重点回顾的内容 以及所谈论的问题 又有些差异。

首篇《两次‘战后’与国际主义》一文 是对自己近年来所写文章的评点与估价。现在想来，其中也许有不十分切合现实的地方 当时只是想亲自对以前的问题做些思考。后边的文章 则大体可以划分为两大部分。其中从《使命感与屈辱感》到《中国核试验与日本知识分子》，大都是与当时形势密切相关的文字；而从《三代人的中国见闻》以下各篇 属于回顾性与整理历史的内容 但与专门的历史性论文又有些不同 有的部分更侧重于议论。如果说到全书的结构 我觉得与前一类文章相比 后一些文字很像是它们的续篇。前边的文章先提出看法，接着再做后面的工作。至于开首一篇，又仿佛是后边那些文章的总论似的。最后的《日本人心里的中国形象》则以谈论以后想涉足的领域 自己要做的 工作之类话题 来作为结尾。

当然不可否认，由于起初并非有意按照这样的结构来写作，各文里议论与回顾性的内容不是截然分开的。通观全部论文 其中在知识上也有些空白。为了使它们更显得有系统 现在写来也许不会再是那种样子。另外还有一点是，当时自有难以割舍当时感受的想法，于是全书便成了现在这样的结构。

尽管难以割爱，但回首自己数年来的这些文章，如实地说，是很痛苦的。当自己的视线触及这些文字时，时常有被火灼伤的感觉 很想对它们做些修正。虽然靠着这些写出来的东西 可以朦胧地看到自己思想的变化轨迹，会带来某种快感。但将头脑中已有的结论 或是其中追求如此结论的过程变成为铅字 却

并非都是轻松的事情。变成铅字之后 每每自己再去读它时 总是很不满意。不必说 这自然是由于文字太笨拙。除此之外 还因为它们反映了这些年来的“我”。尤其是我的那些社会活动，不仅作为事实依据构成了这些文章的基础，而且回想起以往的活动来 也未必能够使当今的“我”得到完全肯定的评价 这就使自己更加不忍卒读过去所写的文章。然而我又想，不管如何专制的君主 都无法抹杀已经公开发表的文章 何况自己还成不了专制的君主。而自己只能按照“我”的路子 继续走下去。所谓写作时还有另外更难办的事 即要与自己以往的文章抗争 大约便是这种意思。在校正本书的过程中，我曾共鸣于郭沫若关于应该“烧毁自己的全部著作”^{〔1〕}的说法，也产生过那样的念头。

我希望真有烧毁自己所有文章的那一天。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还得像拴在枷锁中那样被自己的文章所累。而为了等待那一天到来 即使是想办法烧毁自己的文章 现在也还不能烧掉它。

其实，郭沫若和我毕竟不一样。将自己过去的文章集为一册 作为今后工作的参考 终归是有好处。此外 在我熟悉或不熟悉的朋友里，也许会有人同样意识到我在这个文集的文章中所提到的问题。即使为了从他们中间得到批评和帮助，也应该这样做。出版这本书的动机，只不过如此而已。

至于说到日本人心里的中国形象，实际上中国是在变化着的。在汇总这些文章 以及进行初校与二校的过程中 自己一直想不断强调这一点。我在过去日本作家的作品、表态、议论、伤感和慨叹等各种各样言论里，似乎听到了他们这样的意思。他

〔1〕 郭沫若在大革命开始时，为与自己的“资产阶级本性”划清界限，1966年4月14日曾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委员会上说过这样的话。——译注

们高喊着变了、变了的声音，就是出于这样的感受。在自己看来，“我”的感慨也不过是如此。但在我的印象里，这些年来中国的变化好象是走过了一个循环。其中也有没变的，可那不意味是简单的静止。我所指的没变，与别人说的不变不太一样。记得罗伯尔·纪兰〔1〕有中国人变了而中国没有变的说法。而在我看来，则是中国在变而中国人并没有变。纪兰所说的中国大体是指中国文化的固有类型，而我除此之外，还包含着因政治制度和产业的发展带来的外貌的变化。当大家惊异于当今人们的外表变化时，其实一定伴随着对人们以往内心变化的麻木无知。在过去的现实中，表面看起来，人们本身的欲望遭到过压抑，并曾因压抑而变得驯服。这即使可以理解为人具有自我压抑的要求，那也不能说这种要求是天生就有的。惊异于外在变化也无妨，但这样的惊异不应像往常那样得到称赞。

在日本人的眼里，中国并没有变化。这除了因为对其多次的变革不理解之外，也因为有过变革半途而废的情况。静止的逻辑，是与历史进步相反的观念。在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怎么看，不变观念里都含有对对象不十分理解的因素。而在收入本书的文章里，我觉得其中的言论，既有贯穿于日本人心里的中国形象的基本线索，也有在对多种多样与复杂多变的中国的研究、游历、建议、指导、迷惘、失望、期待、爱慕、愤怒、无知、傲慢以及倾倒等等里面，所包含的种种不同的声音。万物在流转。不变的形而上学无疑是错误的，然而否定这种错误观念的声音，目前并没能根本摧毁其理论基础。或者说，即使是其理论基础被摧毁了，批判的锋芒也未必就能够触及人们那无意识的堕性。

〔1〕 罗伯尔·纪兰，法国人，曾出版过报道中国社会状况的著作《六亿只蚂蚁》。——译注

我无法完全否认自己确曾看重过“我”的这些感受。另外，或许还可以从中品味出别的什么意味来。不过在现在，自己已不再满足于这些文字。当时我所批判的那些东西，其逻辑基础主要是指“脱亚论”而当今天自己回头重新阅读这些文章时我甚至连自己内在的“我”也想加以否定了。

这本对我来说很值得纪念的评论集得以面世，攸赖春秋社的盛情。尤其是早在这些论文大都还未写完时，出版社便劝说我出版评论集。直到最后的阶段，还承蒙冈田丈夫先生不厌其烦地鼓励。再不以认真检点的论文来报答，真是有点过意不去了。

此外，尽管这里未能一一列出当初认真督促自己写出这些文章的各种杂志特别是《新日本文学》编辑部各位先生的名字，但仍十分感激这些朋友所给予的激励与帮助。

在本书出版的过程中，岩渊五郎〔1〕先生遭遇大祸。此书能够被推出，曾得先生特别襄助。他对本书前面新写的论文不吝赐教，促使我做了补充。如今当文集终于面世时，真想再与其交谈并多聆听他的意见。无奈痛悔莫及，谨以小书奉献于先生灵月。

程麻译自《日本人心中的中国形象》春秋社，1966年10月20日

〔1〕岩渊五郎为春秋社工作人员，于1960年日本羽田国际机场坠机事件中丧生。——译注

评《中国通信》

当拿到这厚厚的通信集〔1〕看见其精美的装祯时，曾担心无法一下子读完它。这并不奇怪，因为其中收录了作者从1964年7月至1966年8月，这长达两年多时间里在中国生活的见闻与感受，内容实在丰富。这些信是陆续寄达日本的，共85封。收信者并非一人，其中所写的也是各种各样的主题，因此不好都按原名、原样收入。不过还是能够觉察出，其中有新闻事件是重复的（如32页和52页各自开头的一段），以及使用了相同的材料（如132和134、321和323页的地方），可见整理得仍不太仔细。可是，这毕竟是像顺着长江放筏那样流水账似的生活记录，如果不太苛求，随心所欲读下去，无疑还是一本受人欢迎的读物。

在开始处谈到北京讨论会〔2〕的部分，有些事恐怕连写信人

〔1〕安藤彦太郎著《中国通信》亚纪书店，1972年出版。安藤彦太郎（1917—）早稻田大学经济学部毕业。曾任早稻田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日中友好活动家。著有《现代中国》、《日中关系的视角》、《日本人的中国观》等。——译注

〔2〕指1964年6月17—31日在北京召开的国际科学讨论会。来自亚、非、拉和大洋洲的44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家与学者，参加了关于自然和社会科学问题的讨论。——译注

也觉得没太有意思 前言 第 1 页)其它还有 如 :

因此,北京的讨论会与世界科学联合会并没有任何关系。(26 页)

.....与普通的学会有所不同,在政治上自然一定很出色。(同上)

书中有类似态度的记述 也许并不难理解。不过 这样会让人觉得 有些未必可信。因为这些话 最终是以作者自己的政治态度,取代了北京讨论会的政治色彩。由于是刚到国际事务局^{〔1〕}不久,过于忙而并未能出席这次会议,仅写了事务局里的种种场面 剩下的便只能写宴会、联欢会的情形以及简短的谈话了。

这种情况 在第 10 节“太原一夜”一节里也有 原因则大同小异。而到第 16 节“去协和医院”第 17 节“讲道理”以后 读起来渐入佳境 也令人信服。因为著者不再从事政治工作 而是开始作为“一个人”在北京生活。如果打个比方 这个人就像冬天北京街头的树 叶子全落光了 只剩下了干和枝。作为“在外研究员”的生活 终于从此开始了。

然而 事情又并非那么简单。作者在《读卖新闻》上登载的《编辑手记》 曾说 其中带有广告宣传的意思 书中所写的是“在中国市民中 与市民环境相同的.....生活”而实际上 这种生活是无法与在日本生活的外国人 或是“在海外生活”的日本人相比的。

〔1〕 安藤曾作为日本代表,参加 1964 年北京科学讨论会国际事务局的工作。——译注

关于这一点 可以第 33 节“接待”还有第 43 节“在渤海边”一节里的“作为外宾”来说明。外国人在中国 只能以“侨民”（日本人是“日侨”）“外宾”或是“专家”的资格居住。所谓“与市民在同一环境里的生活”在这里只是指“侨民”即长期居住的外国人 而后两种人 则是旅行者或从事专门工作的。作者当然是属于后两类人的。他们“住在饭店里”享受优待却没有法律上的特权。虽然可以在北京市内自由行动，可是不能随意到立着“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准超越”的标牌以外的地方去（10 页）。在当时，恐怕只有阿尔巴尼亚外交官，才能不受这种标牌的约束。

这样做，无疑是表示中国政府在行使主权。但此事不是也象征着日本人与中国人之间 还树立着一堵墙么？

日本人对中国的亲近感 曾使他们生出过各种各样的“梦”。 “在中国市民中、与市民环境相同”的生活 便是其中之一。翻一翻这本书，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心中的那种期待，不难明白，那些想法多少是有点自作多情的，因为它们不外只是一些热情的憧憬而已。既然难免浪漫主义的情调，也就少不了愿望与现实之间错位的毛病。

实际上“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准超越”这样的标牌 也树立在作者的生活中。基于这种感觉，我猜测在近代史研究所里的安藤彦太郎研究室和目录室的外面，大概是北京的郊区。^{〔1〕}而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近代史都是很重要的学问领域。关于这一点 作者到中国以前 在与来日本的中国学术代表团交流成果

〔1〕 本文作者此处的猜测有误，实际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位于北京市中心的王府井北大街。——译注

时便说过，也应该得到中国学者的确认。那还是侯外庐和刘大年^{〔1〕}在那个研究所工作时候的事。不过，后来在那里研究了两年，只是在信中介绍说：“那个研究所‘120名人员，分为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侵华史、近代思想史、工人运动史和革命史，五四以后5个组进行研究’”(318-319页)终归让人觉得有点过于简单了。中国方面有保证作者的读书时间的好意，作者也很讲礼貌。然而这样一来，也过于寂寞了。其实据我想，即使是侯外庐和刘大年太忙，作者也会在午休时，与一些无名望的年轻研究者，就如何描述日本史等话题交谈过的。

当然，其中的困难自不难明白。比如在近代史研究所目录室的角落里，有可以检索吴晗与胡适交往的信件卡片。后来，不断有文化大革命的激进派反对阅览这些书信，而当发现了新的书信和卡片后，又强行垄断之类令人心惊肉跳的事（见《光明日报》）。因此，目录室一般不开放，而作者能够进去，自然非同寻常。在那样学问与政治紧密相连的国度里，能够在所内设一研究室，当属破格优待。但是，作者也不会不明白，随着这种破格的待遇，也应该有严格的限制。书中说，那种树立在路边的标牌对自己心理上的影响如近在咫尺，说明作者对其确实是曾经相当介意的。另外，也许我读书有些较真儿，还发现这书里并没有解释，在本书开头的照片上，与作者在近代史研究所大庭里交谈的那两个人，究竟是谁。

如今在人们赞赏去中国旅行时，应该如那里的市民一样，不必因拘于礼节而态度太客气的时候，作者的举止言行却很有节制。这也不算什么。因为所谓的交流，毕竟要在增加和积累成

〔1〕井上红梅（1881-1949），日本作家。改造社成员。曾到过中国，并将鲁迅的作品《呐喊》、《彷徨》等作品翻译为日语出版。——译注

果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不过要是那类标牌，当真不仅对外国研究者的工作，而且还对他们的心理产生了影响，那就必须直率地正视，它确实是现今日中关系里的一个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和澄清，不能只靠日、中某一方，也并非仅仅是研究工作这种社会分工领域里的责任。如果日本与中国，不都站在正确的民族主义立场上，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太可能的。

作者没有看清楚这一点，是本书的局限。此外，读者还会在书中不止一次地发现，作者虽有此局限，但他在标牌准许的范围内，还是在努力。在中国市民中，与市民环境相同，‘里生活。也正是靠着这种努力，作者不断向日本寄信并大有成果，煞费苦心出版了这本短期中国旅行记。通过这此书信，作者以亲身经历的两年的生活，描述了一般日本人心中的中国‘梦’。

作者在书里说：“我作为外来人，根本没接触过生产现场”。（120页）这并不难理解。在日本不从事‘生产’的人，到中国去了解‘生产’（例如去参观）究竟能看到多少真实的东西，是让人怀疑的。不过，作者毕竟是在做‘实地’性的‘研究’。如果写其他方面的文章，也许会更多反映一些中国普通百姓的，如同搜集资料的日本研究者那样，生活或消费状况的。在那里面，才有着真正‘中国’的影子。而就作者生活直接接触的部分来看，尽管有上面提到的那种谦辞，但本书仍旧有自身的特色。

就这一点来说，我觉得第61节‘春天的景气’中‘在酒馆里’一段，很引人注目。即使与至今的中国游记比较，也是相当出色的文章。

其中喝酒中画拳的场面，在中国现代小说里写得并不多。我是在读了本书后，才知道了画拳的方法。那是作者刚进酒馆，四处瞟了一眼，发现里面有个像是客人，差不多喝醉了的男人。见来了罕见的日本人，他便凑了上去。

这男人看出了，与作者同去的老人 K 是日本人，却断定作者是蒙古人。他以前曾被日本军队抓去过。

“……啊对 现在是中国与日本友好。”老人把他的话翻译了过来，而当他回答老人时，我听他使用了日语间歇词“嗯”。后来他又向着我嘟哝：“嘿、嘿、嗯。想起来了。”

过了一会儿，在与这个男人漫不经心的谈话中，他又像清醒了过来，问道：“你是哪国人？”刚才不是说过了么，是日本人。”“我不相信。真的吗？好象是中国人啊！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什么人都行。友好！喝吧！”

是将孙子的照片放在口袋里的老人 K，发现了这个酒馆。他是一个日本商社派驻北京的职员。此文写老人 K 的笑谈 颇有小说之趣。接着 还写了一位年过六旬的酒客 以及后来他和老人 K 的故事。那酒客学说的日语，逐渐不再像作者的小女儿那样零碎了 而作者只能感叹：“对 对。”

另外 其中也写到了西湖虎跑泉的水（283页）。

在去中国旅行的日本人中，有所谓沉浸于中国趣味者。他们面对中国 除了意识形态 的一切 从内心感到充实 想与日本的价值观念一刀两断。井上红梅^[5]、后藤朝太郎^[1]便是这样的人。这种情况在其他类型的人中，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作者对这种人的盲目性 给予了警告：

[1] 后藤朝太郎（1881-1945）日本的中国语学者。1906年东京大学语言学科毕业。向日本介绍与翻译过多种关于中国文人情趣的著作 被称为“中国通”。因反对日本军部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在日本战败前夕，被右翼分子车裂暗杀。——译注

比如到西安去观光。在那里 伟大的古迹、现代工业和土砌的房子并存着。然而人们可能首先被“长安一片月”〔1〕的历史情结所诱惑，而看不见其他的东西。土砌的住房、人民公社的土地，都只变成了装饰历史的附赘。日本人有这种盲目的心理。其次，关于战争的问题。……（220页）

按作者的思路 是首先描述活生生的中国现实 然后再调查革命遗迹 并加以介绍。其中有宝贵的资料 以及认真的观察和报道。对不能实际访问当地的人们来说，这些无疑等于使其戴上了望远镜。

不过 在进入文化大革命的动荡时期之后 这些内容详尽的书信 也曾提出过一些疑问。可惜 书中只是介绍了称得上文化大革命前兆的社会迹象。而当巨大的变化即将在眼前展开之时 作者却以‘就事论事’的态度 自我封闭了起来。

这里不妨举个小例子。比如 记得书里有个地方说 北京有名的黄尘沙暴已经不见了 这是事实 据作者说 这是植树和水库起了作用（183页）。可在第二年，沙尘暴又发生了（395页），这使人觉得前后有些矛盾 而作者也没有加以解释。在自然现象中 可以说四季是反复的 但关于社会现象 却不该这么说。我认为 这其中的理性是非常重要的 而作者却没有对事实进行理性的思考，仅仅停止在所看到的事实上。像附录 I“在北京见到的‘文化大革命’”一节 写了日本人旁观庆祝中共北京市委被解散后的游行。其中有两种观感，一个说：“这才是革命”；另一种则说：“这是人为组织的游行，并非所有人都参加了。”

〔1〕 唐代诗人李白的诗句 ——译注

(538 页) 而作者称 这些意见是在“抬杠”。他只看出了人们对此有不同的观点 却将北京街头的迹象 事实 与在各地旅行的见闻同样看待，而并没有意识到，在这些争论面前应有的思考，以及如何以理性回答它们。另外，书中关于中国核实验的现场报道 我觉得作者也是在“就事论事”。

若并非仅就本书而言 泛泛地说 我认为日本对中国研究的“假象”是要不得的。研究者到实地去 是不难做到的。现场事实的真实 也无法否认。可要是光看重那实在的东西 仍然无法改变前面所说的那种沉浸于中国情趣，或是就事论事的观念与思想。“就事论事”好比是画一条简单的直线 但若不留神 那条线也会有画得曲里拐弯的危险。

作者在中国的两年生活 对我们来说很宝贵、很有益。要是 有谁能这样不断地寄来书信，那该有多么好。

程麻译自《世界》第 255 号，1967 年 2 月 1 日

提纲挈领的《中国的思想》

关于《中国的思想》〔1〕一书，当初自己头脑里想得并非有多么清晰，甚至可以说，还有些比较模糊。开始构思它的时候，我最早关注的，是它的形式应该并无先例。

无论是思想，还是文化，要加以介绍，常见的是采取“历史”的形式。例如“思想史”、“文化史”等。

确实，实际的思想或文化，都是承前继后的历史存在。因此，不妨以“××史”的名义来进行叙述，或者说那样可能是非常合适的。

然而，果真如此的话，读者看了“××史”的最后一页，会有什么效果呢？

我猜想，那时候，读者将会反躬自问，从总体上思考“××史”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样。但是，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可能从“××史”最初开始时就知道的。这是因为，人们总是站在现在的立场上，去思考那些承前继后的历史存在物。

既然预料到人们阅读的这种效果，那么，到底应该如何下笔

〔1〕 竹内实著《中国的思想——传统与现代》日本广播出版协会，1967年4月20日。——译注

呢？显然，必须既清晰地描述历史过程的轮廓，并且把握住其中的内在逻辑，而且最好还能够真正以今人的眼光，去理解自己所要把握的对象。

毫无疑问，我并不想否定“××史”的写作方法。不过，它们大都采用的是“历史+个人”的描述方式。而这种描述方式通常只是注意“××史”的内在逻辑，却很少去质疑将“历史”与“个人”结合起来的那个“+”究竟是什么意思。

其实，作为生命个体的人，在任何时代里，都是比较稳定的因素。就此而言，与时代相比较，个人可以是相对独立的。

因此，尽管实际上思想是承前继后的历史存在，但作为今天的我，却不想将它们还原为原来的面目，而宁愿选取那种提纲挈领地加以描述的视角。

我所以这么想，大约是与我在心灵深处，对中国的体验有些关系。

对在中国出生和生活过的我来说，中国首先是包围我着的“天地”。而将其变成完全身外的客观对象，那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无论如何，我总是倾向于，从内在的和整体联系的角度，去理解自然的中国，不由地会将支离破碎的记忆，构成一个整体结构。

例如，把话扯得远一点，说说“棺材”。记得在小的时候，我曾到邻近的中国人家里去玩，看见在后边的屋子里，放着一口棺材。那口一头稍微高高耸起的棺材，置放在台子上，站在下面往上望，就像是在儿童杂志上看到的，那刊头画里画的水中的大船。后来，那印象已经淡忘了。可是忽然有一天，我在报纸上读到这样一段报道，自己的记忆一下子便被唤醒了，心中不由地感叹道：“确实就是这样。”

那是在长沙访问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队时的事。在原来的一栋地主住宅里，现在住着 4 户农民共 24 口人。在那可称为客厅的入口的地上，堂堂地迎头摆着一口棺材。我的脑子里突然想到，可能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可那年轻的媳妇轻松解释道：“老人还在的。”而旁边的老太太则笑嘻嘻地敲着棺材说：“有它就放心了。”（吉冈秀夫《扬子江》，《朝日新闻》，1966 年 8 月 27 日晚刊）

在报道的同时 报上还刊登了 在棺材前笑嘻嘻的老太太的照片。

在中国 像这样生前便准备下棺材 是自古就有的习惯。有钱人还要尽可能置办价格高的，借此来加以炫耀。现在已经是全新的体制了 按理说 这种“陋习”是应该改变的 但我知道 在一定范围内，对此仍然是默许的。也正因为如此，我才会感叹：“确实就是如此”。

对热衷于此事中国人来说 他们并未意识到 在很缺乏木材的中国，一些人民公社的农民 为了制造木制的农机具 而捐献出了本用来做棺材的上等木板，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也不明白 新思想正在不断成长的重要性。

生前准备棺材这件事 与在日本加入生命保险（那也是生前为死后做准备）相比较，在感觉上完全不一样。这种不同的感觉 总起来说 是基于一些完全不同的观念。追究起来 这是与他们的诸如生死观念、死后世界、孝 以及敬老等精神联系在一起的。

根据以上想法 我认为 从总体上考虑，《中国的思想》首先应该说清楚中国民众的“思想”。而在孔子那样的大思想家的教诲中 也有民众容易接受的东西。这种容易接受的因素 大体说

来 就是所谓‘一般的思想’。

其实 这些民众的思想 也未必都曾被民众视为‘思想’。它们没有被写出来过，也没有被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

而要懂得这些，必须借助于知识人的手。只有通过知识人的系统整理，才能明白民众的、以及进而代表整体中国的思想。

那么 所谓的‘思想’究竟是指什么呢？

我觉得，日本明治时代的学者，曾在下面的意义上使用过“思想”一词 其意见是可以参考的：

余少年时 曾于距家 800‘英哩’之海滨 拾得此动物。带回家后观之，思想其与卷烟草相同，且已死矣。而试置水中观之 见其尚生存焉（石川千代松《动物进化论》，）

这就是说 当在‘想’或‘思考’时 便是‘思想’。此文中日本学者对汉语的理解，与其原义相当接近。这里所说的“思想”一词 同样也在中国日常生活里 被使用着。

因此我认为 日常的‘思想’与非日常的（理论的）‘思想’是相互联系的。而后者，一般又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引伸出来的。它们就是我所说的“思想”。

这样的‘思想’由各种各样的概念构成。而任何一个概念，作为个体 对总体‘思想’来说 都是很重要的。我在本书中 首先列举了世俗中的 同时对知识人也很重要的‘功名’而与之相反的概念 则是“超脱”。

这即是说 生活在中国社会里 有‘功名’与‘超脱’两条路可供选择。人无论走哪一条路，都意味着在相互对立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中选择其一。

而当人们像下面这样来理解‘超脱’概念时 则又与‘时间’

观念，产生了联系。

穿着白色宽袍的阿拉伯老人，用长烟管吸着烟草。无论是在饭馆还是在个理发馆 都不难在那里的画报或杂志上 偶然发现这样的照片。我想起来 中国人或朝鲜人这样吸烟的照片 以前也是经常看到的。

当看见他们全都是老人 而且竟‘整天什么也不干地只是吸烟’（阿拉伯人的照片上并没有这样说）时 我心里不免涌出惊讶、羡慕、敬畏和轻蔑等种种复杂的念头。这可能是因为在 我心里，“人应该是勤奋”的想法根深蒂固。于是，一看见与这种先验观念完全不同的人，就会产生出种种复杂的反应。

在看见阿拉伯人的照片那一瞬间，它使我既想起了很久以前看到的同样情景，也唤起了自己那遥远的情感。当时我仿佛觉得 老人的身边有声音在响动 那是指“时间的流动”。这与其说是指中国，不如说是指整个亚洲更确切些。在那种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 没有工作、即使有报酬也很少的社会里 吃饭也只能达到半饱。这就是那里的生活水准。

我并不想从经济结构或社会史中，去寻找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那里的人们觉得，“整天什么也不干地只是吸烟”是很自然的，也情愿那么做。对他们来说，“8小时工作制”是无关紧要的。“什么也不干”意味着“时间”并不能以金钱为计算 所以便不必考虑它们。而这样一来 就会发现“时间是永存的”也会产生“享受时间”的生活情感。其实 这并非是他们一时的想法 而是其终生的观念。所谓生活情感 就存在于那从生到死 即换不来金钱的 连续 50年或 60年的‘余暇’中。

我在《中国的思想》里写道 对革命家而言 这样的‘时间’观念 是应该动的东西。那些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 不会陷入这种传统的 即堕性的‘时间’观念之中。他们的工作 是专心

的。

另外 中国传统的阴阳和循环观念 也是‘时间’中的内容。阴阳 并非只是讲阴或者是阳 它们的根本形态和功能 意味着相互转换与循环。正是这种变化 才是所谓的‘时间’。

我视‘时间’为‘中国的思想’的基础。首先注意作为‘知识人的思想’的‘功名’认为它支撑着政治 - 道德 - 文学 这样三位一体的社会结构。而其反面 则是‘超脱 - 隐逸的思想’。

正如已经讲过的 我也不能不说到‘循环的思想’。以之为核心 中国全部生活凸现出来的特色 是所谓‘生活的思想’。这种思想 使民众有着浓厚的‘面子’意识。它是与知识人足以自豪的‘功名’观念相联系的。其次 在中国知识人看来 文学无法与政治、道德割裂开来 其基本观念是重视事实 因此所写也必须与事实相符合 而很少使用‘文学’这一用语。为此 书中列了“文章的思想”一节。除此之外 作为‘中国的思想’的特证 还有“天的思想”、“革命的思想”。

另外 作为序言 我‘提纲挈领’地设置了“其背景”和“实在与超脱”两节。该书作为 NHK 丛书之一发行。

后来 我接受委托 每年夏天都去一个地方 谈关于中国问题入门的话题 每次讲 5 讲 要连续讲 3 年。而今年 在打算讲的 5 讲里，作为导言，我在前两部分讲了本书里的《中国是什么》和《日本人心目里的中国形象》。

在前一篇文章里，我讲了日本人为了追求自己所理想的中国（例如作为佛教国的中国）以及与中国自身历史进程之间的矛盾。而在后一文中 谈的则是日本人对中国的印象的轨迹 即这些印象的变迁及其特点。

这里所谓的‘思想’当然只是我个人的理解。而所谓的‘个人’也是生存于特定的‘时间’里。任何一个人 都只能生存在

一般和生活之中。但书中所说，却并未在普通的生活上浅尝辄止而是谈个人对普通生活的独特理解。不可否认的是 其中也有些是针对不同意见的。

我原来意在通过列举在现代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揭示出某些对我们具有普遍意义的教益。然而通过这种追索，我最终竟达到了，如同借中国来严肃校正自己（即倾倒于东洋趣味）的夏目漱石〔1〕和永井荷风〔2〕那样对“现代日本”进行批判的目的。

例如永井荷风在《冷笑》一文中曾经揭露过终于摆脱掉“‘落后可不得了’之类不安’的‘后进国’日本的现代主义弊病。而我从那总在吸烟的阿拉伯老人背后也曾感受到‘时间流逝’似的声音。我大约已经证明了在这二者之间其实并非是毫无联系的。

程麻译自《东书高校通讯》第 71 号，1969 年 10 月 1 日

〔1〕夏目漱石（1867—1916）日本近代著名作家。本名金之助。1893 年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英文科毕业。后任东京专门学校讲师。1900 至 1903 去英国留学。回国后任第一高等学校和帝国大学讲师。著有《我是猫》、《三四郎》、《梦十夜》等。——译注

〔2〕永井荷风（1879—1959），日本作家。本名壮吉。东京外国语学校中国语科中退。1903 至 1908 年去美、法等国留学。1910 年任庆应义塾大学文科教授。著有《地狱之花》、《梦之女》、《冷笑》等。——译注

梦 之 语

——《现代中国文学 进程与逻辑》书后

当初写《现代中国文学 进程与逻辑》〔1〕时是怎样的心情，现在已经记不太清了。好像是从 1971 年春开始 我有了“文债”压人的感觉。只要答应了写文章（我明白那就是有了不可推卸的责任），便苦如背上了债务。当时，我屡屡真正感受到了“文债”到底是什么样的滋味。

当还在大学领取薪水的时候〔2〕为了讲课 我准备过一些笔记，后来它们成了这本书的一部分。每再有其他大学要求搞专题讲座，我就把它们整理一遍。根据讲课的次数，核实一下题目和内容，将笔记做一些修改。现在回忆起来，这些讲义以后先后在东京大学、名古屋大学、京都大学和东北大学讲过。自然，那些讲义并非是都原封不动地收进了这本书里。从“五·四”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到解放前夕这一段，我讲得比较简略。而随

〔1〕 竹内实著《现代中国文学进程与逻辑》，研究社出版，1972年2月29日。——译注

〔2〕 作者自1957年4月至1970年3月，曾在东京都立大学法经学部 and 文学部任教。——译注

时发生的新事态，又要求不断地加以补充。我现在将这些片断的文字重新整理出来，则主要是因为自己对以前这些讲义已经有了一些质疑，甚至是不同的看法。

至今我还记得，当初在讲解此书中《短篇的进展》一节时，曾经有意反驳了那种认为中国正在走向和平主义的看法。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发生，我觉得此后不久出现的事态，证明我的分析并没有错。而对此表示反对的，有的人态度还相当激烈，如今也仍在大学里教书。以后我同那人见过几次面，可当我提起当时的那些争论时，他竟已不记得了。

另外我还认为，很难说社会主义文学就比资本主义文学更优越。不过我在这样说的时侯，没有什么逻辑的依据，因此好象有点自以为是似的。记得当时是看到了与此不同的观点，觉得应该进行反驳，而那反驳也有当时的环境。因此，我的反驳并不是专门针对着某一个人的。

其后，又遇到了为《经济评论》号外写文章的机会。我那篇《索尔仁尼琴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与后来此书的序言和视角完全一样。这次成书时，由于与全书不太契合，而只好将之割爱了。但对我来说，那毕竟是自己的文章，而且也不该漠视学生或非学生的听众们提出的问题，因此自己想借此机会，再表示一下回顾之意。

也许在当时听讲的人们里，有谁会从这本书中，发现与讲课当时所听到的似曾相识的片断。若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很有愧于各位。不过，我在这里愿意提醒一下，书中的《后记》忘记说明了，当初讲课用的笔记，有些部分已经做了些修改。另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教室也称得上是密室。我把在密室里说过的话印成书，自己应该负有观点上的责任。

也正是出于这种想法，我在本文的开头，说到了开始编写

见研究社的浜松先生 将原稿交给他时 我克制着自己 并没有说自己做的那个梦。

自己为什么会梦见中国作家呢？好象我在哪里已经说过了 那还是两、三年以前的事 我曾经请 A 君到离都立大学车站不远的一座庙里去赏月。大约夜已很深了 那里只有 A 君、B 姑娘和我三个人。为什么是那样一种组合 以及是否赏到了月 已经记不太清了。由于和 B 姑娘喝酒而迟到的 A 君 曾向我家挂过电话 可那时我已经出了门。他们喝了酒 是步履蹒跚着走进寺庙的。于是 我们在一棵有纪念意义的银杏树旁的长椅上 坐了下来。

我跟他们说，自从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中国各大学以后，那里文化界的情况在变化。而 A 君听了 补充说还有人在新疆看见过吴晗，像是很自在地旅行。A 君所讲 也许只是道听途说而已。可我在那映照着庙里沙石的近于圆月的月光下听着这些话 不由得想起了 实在应该设法了解一下 那些尚未被外人所知的中国内幕。

其实，我在梦里见到的那些中国作家，也并非是在照片看到 或是自己认识的 有点像是受中国作家协会委派 陪我们一起游历过万里长城的那些人。他们对我说那样的话时，似乎我（在梦中）正当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际 在中国边境旅行。又像是避开动乱 在执笔写作。早晨起床之后 我自己寻思 大概是那天 A 君的话，还残留在自己脑子里，所以才做了那样的梦。再后来 我则想起了孔子“吾不复梦见周公”^{〔1〕}的感慨 觉得所谓的“梦见”可能就是指这样的事。我突然意识到 似乎自己也快要到了如孔子所说的那种无法“梦见”的年龄了。

〔1〕 见《论语·述而》。——译注

当时我这样寻思也并无什么根据。仔细想来大概倒是写作中始终怀有的一种急切的心理，使我变相做了那种梦。读者们当中是不会有这种事的。而在我的论著里就像某些书评或是通信之类的读后感所说的那样，自己经常力求对对象的理解，要比对个人的认识更深刻一些。可能是自己不甘于心于对中国的隔膜怕文章有偏差而过于全神贯注了，于是竟做出了那样的梦。

所谓隔膜这里并不是指责当初提问的那个人而是指在文章前面提到的第一个问题。我在《现代中国文学进程与逻辑》一书里作为判断和评价的那些材料不想个人独享。读者看这本书也许能在其中发现反驳我的东西。然而要这样做首先不要像前面所说那样即尚未读到充分的材料便以先人之见来立论。

至于前面说到的第二个问题其逻辑依据在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社会主义包括苏联和中国。据说他们所以有缺点是因为那不过才开始实验。中国描写社会主义“光明”的文学，要比描写资本主义黑暗的文学好。

不知道我是不是有些简单化或公式化在我想来这样来归纳这一问题大体上也不能算是错误。不过我认为在判断或评价任何对象的时候如果不管是谁都容易看出那是错的其判断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但在这种情况下却偏偏要去赞扬它们那则显然是故意无视现实。至于所谓“实验”的说法我想讲的则是：谁都不会同意政治以人作为实验的对象。

我觉得持“实验”说的人们的信念以及情感并不值得敬惜。也许他们过于爱好中国文学或苏联文学了所以即使是读到水平低劣的作品也仍然加以赞赏。其实这种态度所根据的选用论据的方法是很有问题的。按理说在肯定对象的时候也应该

同时思考到对象会向何处发展。这样的思考方法，以及认同形成这种思考的意识形态，才能反映出对对象的热爱。对那些吹捧低劣的文学，例如资本主义尤其是日本文学作品的做法，我一直不喜欢。因为对一部作品、一位作家加以评论 尽管很必要 但即使认为在日本的资本主义体制下 其文学题材会有所谓‘反面’的内容，也未必就能肯定其作品一定低劣。而我反驳“社会主义文学比资本主义文学好”这一先人之见的主要立足点，同样像前面说到的那样，也应该思考对象会向何处发展”。

与当初写作《现代中国文学进程与逻辑》时的预料相比，印出的书出人意外的漂亮。为研究社的杂志写这样的东西，其实并不像奉承所说的是什么锦上添花，也许倒是沾污了杂志。当我看见初版的美丽校样，感到很惊叹。

现在，日本印刷用的汉字字模在逐渐减少。初校自不必说，二校、三校中的汉字，空得更是越来越多。等到书成后，还发现印入了错字。实际上，每个汉字都有自己的含义，印错了会让人觉得很古怪。而人名的张冠李戴，更是莫名奇妙。承蒙编辑和出版社的好意 本书作为“研究社丛书”还要加进去许多插图。对此，我与未来的读者一样高兴。[追记：不过在终于拿到样本时，我和读者都吃惊地发现，其中插图照片上的两处人名印错了 即“茹志娟”应为茹志娟；“谢泳心”应为谢冰心。]

但愿我的这本小书 会使今后关心现代中国——广而言之是中国——并想读中国文学的读者，能够增加一些认识她的勇气。

现在想来，我在梦里感受到的那种疚愧，确实像是自己的心声。至于我对中国的那些担忧，也许该称之为僭越。我真诚地关心中国，希望自己那点微不足道的批评，能成为多余的话。那样，今后的中国一定会开创出全新的局面。不过，我也衷心地希望，中国不要再走那重尝痛苦经验的老路子。

我已经写完了《后记》然而写完了未必就真有把握。不过，在交出稿子与拿到校样这一期间，我又不量力地越来越觉得自己毕竟对得起书中的那些论述。这也许有点过于自夸了，但也可以说是庶几不差。不管这样的念头是否应该，我确实是那么想的。而现在已有兆头表明今后中国的文坛和学术界大约会逐渐地活跃进来。在日本，也将出现更多类似论述中国的著作。自己心里明白，到那时也许再像我这样对书中的评论对象说三道四会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

尽管有以上想法，自己对这本书依旧是有点恋恋不舍。因为我毕竟在《现代中国文学进程与逻辑》里写进了自己想写的东西。不过过后看来其中似乎还应该再增加《传统戏剧的改革》一节。虽然从书名上着眼欠缺了这一部分也未必算得了什么，可关于“近代文学的起步”以及与其相反的传统价值问题，总是应该触及的。^{〔1〕}而按我这样的写法，其大概可从十年间剧场里观众的反应，着手写起。

我原想多解剖一些作家和作品，也计划谈谈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但因为篇幅和时间的限制都未能实现，只好有待来日了。这反映出自己对这些问题还不够熟悉，不该再继续对它们掉以轻心了。

从1971年初夏开始的那几个月，现在想来真是如同梦境一样。究竟是什么冲动驱使着我写起了这本书，至今也说不太清楚。而且在完笔之后，竟做了那样一个梦。呜呼！

程麻译自《书商》第78号，1972年4月1日

〔1〕日本人的“近代”概念，大体上包括中国学术界所说的“近代”与“现代”，其内涵是与传统相对而言的。关于“近代”与“传统”的文化价值关系，是日本文化界一直在讨论，但至今仍未有定论的问题。——译注

“批林批孔”与传统思想

自去年 1973 年 开始的“批林批孔”如今已有点像是要收尾的样子。其实 我在今年 8 月 20 日的《朝日新闻》“学艺”栏里 已经对当时的“批林批孔”做过了总结〔1〕。当时与拙文一起发表的 还有从 7 月下旬到 8 月初一直在北京观察的菊地昌典氏〔2〕的 见闻与感想。尽管这只是偶然的巧合，可自己觉得很有趣 因为我那完全属于书桌上的研究结论 竟与亲自到现场观察的菊地氏，分别指出了同一事物两个不同的侧面。

我还没听到读者对如此两种不同的看法究竟有什么样的反应 繁忙的读者也许只能留下了淡薄的记忆 那也不错，而我 觉得耐人寻味的是，从中可以看出，是立足点于书桌还是现实， 这对写文章的人来说确实会有很大的差异。

我们的文章反映出，菊地氏确实是亲自对活生生的现实的 观察 其报告的也是如实的 而自己所得出的结论 则完全是靠 书桌上的工夫 二者是明显不同的。在菊地眼里，“批林批孔”是

〔1〕 竹内实《批林批孔的新阶段》，《朝日新闻》，1974 年 8 月 20 日。——译注

〔2〕 菊地昌典 1930—) 东京大学毕业。东京大学教授。主要研究苏联政治史。著有《社会主义向哪里去？》、《社会主义与现代世界》等。——译注

实在 在当时 的群众运动 我的看法却有着浓厚的学术色彩。

我认为 尽管这二者有些不太一样 但它们都是真实的。显然，应该肯定菊地氏实地见闻的准确性。根据以往我观察中国的经验，似乎报纸所反映的动态，总会比中国的真实情况早一些 即快一步或是半步。但不知道在菊地氏之后 是否还听说再有到中国现场去的人。

在‘文革’当中的一段时间 我曾经去伊豆半岛〔1〕南部一个很难称得上村落的地方 读书并写作与‘文革’没有什么关系的文稿〔2〕。在‘文革’期间 自己所写的东西不能说很少 可是若与某些人所写的有关著作比较起来，则不能称得上多。总的看来 在那些著作中 称赞‘文革’的占绝大多数。而那些众多写称赞‘文革’的著作的人们 的共同特点 便是以莫名其妙的眼光来看那些并不称赞‘文革’的人 并且公然加以指责。也就是觉得，所谓‘不革命’便是‘反革命’（在他们中间 菊地氏的看法有些不同 是少数对我有所袒护的人之一。）

与当时那样的气氛比较起来 尽管这一次在日本 也接二连三出现过所谓‘第二次文革’的说法 但似乎并没再有高声赞扬“批林批孔”的人。虽然也有肯定的意见 可都有若干的保留。

如果从日本目前这样的反响入手 回顾从“文革”开始到“批林批孔”的历程 仿佛可以在其中觉察出某种“摆脱文革”或者是“反对文革”的动向来（大约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动向 才认为有必要搞“批林批孔”。不过 若是说“文革”的动向与“摆脱文革”

〔1〕 伊豆半岛，位于东京南部的日本静冈县，当地有很多旅馆，东京人去那里旅游比较方便。——译注

〔2〕 即竹内实的《中国的思想——传统与现代》一书 由日本广播出版协会于1967年4月20日出版。——译注

的倾向有明显的不同，那前者是以发动红卫兵或工人造反派的非常状态搞起来的，即呈现出了所谓‘天下大乱’的状态，而后者则完全是按正常秩序进行的，其可以说还是‘天下大治’的样子。在‘文革’期间，曾传说有自杀的人，然而在‘摆脱文革’的过程中，就没有这样的事情。不妨说，日本人这种对前者积极肯定、对后者却褒贬参半的不同态度，与中国民众的情况并无太大的区别，实际上鲜明地反映出了自身的变化。

如今来回顾日本这种从最初称赞，到后来被迫暧昧的态度变化，不能不让人有一种心灰意冷的感觉。不必管当初是谁说的，以及其真意是什么，这种变化仿佛使人看到了日本文化无法依赖的一面。

借助于日本与中国政治气候的如此变化，来远眺那里‘摆脱文革’的趋势，似乎并不难理解，因为中国的气氛毕竟也在改变着。

最近我在想，中国如此变化的政治气候，是否正在产生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的某种副产物。这便是指原来红卫兵的思想状况。他们已大都到农村去了。我曾经写过：“然而很难说，他们头脑中对运动的记忆，就会轻易地消失。在农村，每天黎明的太阳，也许会吸引着那些曾受到红卫兵运动的洗礼，思想已变得灵活的人们，去思考新的思想潮流。”（《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公论社，1972年4月25日）

当然，在现在所谓“新的思想潮流”还不是轻易能够出现的。在靠电视或广播来接受外界知识的同时，如果没有至少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变成文字而加以传播的出版自由（即印刷厂拿到文稿便可以将之变为铅字的社会制度），那所谓思想的自由，只能是画饼充饥。也就是说，执政者能够给予多大程度的出版自由，也就保证多大程度上的思想自由。而能够在多大程度上

以社会制度来保证印刷，也可以有多少出版的自由。

在这其中 也许可以把某些懒汉或是嬉皮士倾向 视为原来红卫兵的一种思想潮流。在北京曾受到毛泽东检阅的红卫兵，据说有 1千万人。如果其中有 5%从农村倒流，分别回到了比较大的 10个城市 它们公布在各处 中 那将意味着每处会有 5万人没有职业、没有粮食 而游手好闲。

这样的青年人 好像是被称作‘社会青年’。

因此，一方面在搞‘批林批孔’ 另一方面又存在着‘社会青年’的群体。那么 从总体上看 中国到底会是怎样一种状况呢？

所谓‘批林批孔’是指将批判孔子与批判林彪给合在一起。而批判孔子的极端 竟导致了称赞秦始皇 这暗示着儒家与法家在思想上的对立。法家当然是主张法治主义的，可从性善论与性恶论的角度来加以区分的话，那法治主义显然是属于性恶论。我最近读毛泽东尚未正式发表的论文与讲话，其中多次出现“地、富、反、坏、右”的说法 即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和坏分子。最近这些关于“坏人”的规定 在我 1960年去中国访问时 还没有听说 似乎它们是在‘文革’前不久才开始使用的。这也许意味着，中国除了主要在思想领域讲阶级斗争之外，目前又展开了一场只能靠法律制裁来对付坏人的运动。这是社会性的问题。

其实，无论是坏人还是社会问题，都不妨对它们搞阶级分析 或者从阶级的角度加以解决。不过 在强调必须进行这种分析或解决时所用的‘坏人’一词 却是自古早就有的。

这是不妨设想一个完全是游戏性（可能说游戏有点不严肃，也可以说是从逻辑上考虑）的问题，即万一将来林彪恢复了名誉 那现在这些‘批林批孔’的论文 还能够留得住么 如果能够留下来 既然‘批林’已经不行了 那‘批孔’也应该有些学术价

值才对。要是‘批孔’也留不下来的话，那可能它原来就很不严肃。

在实行科举制度的时候，也许曾有过几万或 10 万份答卷。尽管未必有谁去读过它们，但科举仍旧继续存在着。关于这一现实对‘中国文明’的价值，无论是否定还是无视，恐怕都是行不通的。而‘批林批孔’的论文（虽然不好说都是与‘八股文’一样的东西）不也同样如此么？我们确实应该追究一下，包括诸如这种种现象在内的现代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当我们目前面对着这些‘批林批孔’的论文时，它可以呈现出与其本意不同的意义。那是指它们与中国传统思想的联系。而说到这些传统，与法家相比，也许儒家更是不可缺少的东西。

程麻译自《春秋》第 160 号，1974 年 12 月 1 日

给中文版读者

——《鲁迅远景》序

绍兴，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

在那里，首先可以举出中国现代史上的蔡元培和周树人。蔡元培是中华民国最早的教育总长，而周树人则是众所周知的鲁迅——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者，并在晚年指导了左翼文学运动。

强烈的复仇观念，是鲁迅作品的特色之一。

在绍兴城的东北方向，有一座会稽山，那是从前吴王夫差击败越王勾践的地方。勾践耻于失败，发誓报仇，“雪会稽之耻”的典故便出于此。

绍兴位于古之越国。越国自古出名剑，远近驰名。剑与复仇，一向结为一体。鲁迅的小说《铸剑》原名《眉间尺》。所谓眉间尺，是这个复仇故事的主人公的名字。他为了复仇，砍掉了自己的头。

鲁迅为了报仇，也经常手握短刀（匕首），可以把《眉间尺》，看作是一篇描写作者自己的故事的小说。主人公眉间尺，就是周树人的另一面。他也曾憎恨亲戚里面的某个人。

关于吴越相争之事，中国古书《吴越春秋》里，有详细的记载。那是一个复仇的故事。而孔子教诲他的弟子，并没有“复仇”两字。可见越文化和中原文化，是有很大差异的。我非常盼望

能够亲自到绍兴去看一看。

然而，在我执笔写本书的日文版时，中国大陆的政治局势，正处于紧张的状态，不可能亲访绍兴。因此，自己只能通过书本来想象绍兴城的样子，思索绍兴城内周家宅邸的模样，并根据想象来尝试描绘周家的宅邸图。

后来这个假想图成了本书的插图。不过我想，如果有人亲自去过绍兴一趟，大概会发现我的假想图里有些错误。当然，也许人们会难以理解，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心思去描绘这个假想图。

果然不出所料，本书日文版印出两、三年后，有人写信给我，指出周家宅邸图的错误之处。我只能苦笑。

1966年，中国大陆掀起“文革”风暴以后，想访问大陆单纯从事学术研究，是不太可能被允许的。就算被允许到了那里，要进行调查研究，也会有种种限制。这种状况进入七十年代以后，也没有什么大变化。

这样，我有将近二十年时间，没有踏进中国。当时谁都无法预测未来，我也觉得亲访绍兴，近乎痴人说梦。

在日本九州，有一个名叫柳州的小镇，也有许多流水。因为与绍兴很相似，我便特地前往观察。为的是想尽最大的可能，把握绍兴的模样。

本书日文版从第二章开始，曾用了30页篇幅，叙述我想象中的绍兴城，和绍兴城内的周家，并插入了周家宅邸的假想图。而在中文版里，这一部分被删去了。因为现在已经是谁都可以前往绍兴，亲访周家了，再也没有必要画那种与实际不符的想象与错误的假想图。

不过，由于我曾在内心拼命追索绍兴的原貌，想象周家的模样，竟得出了以下两个结论。其一，鲁迅初期的文学作品，属于

绍兴的乡土文学。其二，阿 Q 和闰土，都是从绍兴特有的风土和人情中产生的文学形象。

本书中文版内容的立足点总的说来是想把鲁迅的文学作品作为纯文学来鉴赏品味。不过由于中国三十年代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所以在涉及到现代历史波澜的地方也一并加以考察。

总之，本书或许能够证明，一位对绍兴有着无限憧憬，却无缘亲访那里的研究者，也可以从事鲁迅研究。他可能与阿 Q 一样悲哀却并不具有阿 Q 那样的时代意义。

我想，本书至少作为鲁迅研究的入门著作，是有帮助的。同时，它也能对了解中国现代史，提供一些线索。

在撰写本书日文版时，我曾不时地觉得，仿佛鲁迅就站在自己的背后，我的后颈上常常会隐约感受到他的呼吸气息。鲁迅先生是一位很严肃的人，可他待人却又和气文雅。用中国话说，他是个不会摆架子的人。

我企盼读者在读过本书之后，能够进一步拜读鲁迅先生的著作及其文学作品。

本书中文版，曾有多位先生参与翻译和校阅。稍早以前，自立报系文化出版部也出版过我的著作《毛泽东》中文版。荣幸的是，据说在台湾颇获好评。本书的出版与前书一样，都是经黄英哲君接洽自立报系文化出版部热心应允并仔细排版、印刷、出版。谨向诸位表示谢意。

最后，谨向台湾的读者衷心问候。

1992 年 6 月 28 日竹内实

莽永彬译 水急、卢洁校译 录自《鲁迅远景》，
自立晚报文化出版部，1992 年 10 月

痛悼前辈们辞世

在日中两国间架桥的人

今年 武田泰淳〔1〕、竹内好〔2〕和增田涉〔3〕等研究中国或促进日中关系的前辈们相继辞世了。他们仿佛就像约好似地结伴而去。

以前 每当把老前辈的年龄与个人比较时 也曾担心他们会有意外的事情发生。不过，自己从他们身上，主要还是懂得了“生命”的意义。我总认为 自己显然望尘莫及 对他们的业绩一直怀抱着敬畏之情，并企盼着自己也能尽快成长起来。

说起日本与中国 对我来说 那称得上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和

〔1〕 武田泰淳(1912-1976) 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科肄业。日本作家。著有《司马迁——史记的世界》、《毛泽东 其诗与人生》(与竹内实合著)《武田泰淳中国小说集》等。——译注

〔2〕 竹内好(1910-1977) 中国文学研究家、评论家。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科毕业。著有《中国革命的思想》、《国民文学论》、《鲁迅》和《现代中国论》等。——译注

〔3〕 增田涉(1903-1977) 中国文学研究家、关西大学教授。与鲁迅有过交往 曾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译为日语。——译注

事情。我觉得，在它们二者之间架起桥梁（或努力架桥）的人们的去世，其实象征着一个时代。

自去年到现在，中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说到个人的生死就我们知道的人而言如周恩来、朱德还有毛泽东也都先后逝世了。

后来华国锋逮捕了“四人帮”。展望其后的情况再反过头来回顾以往，让人感到这些人的逝世，很像是区分两个时代的象征。而现在，不能不让人又一次发出深深的慨叹。

我想，自己未必是就快要死去的人。不管是谁逝世，都不该轻率地议论他们那个时代。这是一件相当严肃的事情。

但是，还活着的人，毕竟无法停留在前人最后的脚印上。他们必须考虑自己如何继续生存下去的问题，并将要在其中生活下去的未来也同样作为一个“时代”来看待。

不知下面这样的说法是否会引起误解（这说法未必恰当，但有助于我们理解），我觉得前面提到的三位中国人的去世，是大人物之死；而这三位日本人的去世，则是小人物之死。不过，若回顾以前他们所在的“时代”将会发现，他们的死同样让人感到相当沉痛。

我以上所说，无论是把他们看作时代的代表，还是作为划分时代的象征，其意思都是指一个时代的终结。

无论是周恩来还是朱德、毛泽东通过他们的种种经历我们可以理解中国的革命；而不管是武田泰淳，还是竹内好、增田涉，他们也都曾为我们理解中国架起过桥梁。借助于这些桥梁，我们曾经获取过精神上的营养。

说起通过桥梁来获取营养，由于还有别的架桥者仍旧健在，也许会让人觉得似乎活着的人并不怎么重要。但我想强调的是，被理解的对象是需要（必有）理解者的。由被理解的对象和

理解者之间巧妙构成的那个时代 当当事者各自离去以后 其时代便意味着结束了。

有一件小事 我踌躇了很久 觉得还是应该提一下。那就是中国新华社的电讯曾经报道过增田涉先生逝世的消息。这对日本人来说，感到很幸慰。因为对在日本研究与翻译中国文学的人去世 新华社并非是全部报道的。也许在中国国内，一定级别以上的报纸，报道这种消息的并不少。但就日本人所能读到的中国报纸而言 却只有这一种（大约还有别的我却没有看到）

不能指望幸运

当然，此事与其他前辈去世时我所感觉到的悲痛同样沉重，与我由此而引发的一些想法，也并不特别矛盾。那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 中国大人物与日本小人物的死 使人感受到的沉痛是一样的（至少我的感觉是这样）

要说我对此还有什么想法 或者有些踌躇的话 那则是指自己有点所谓“担心”。我担忧的是 今后日本与中国的关系 大体上已不会再有像我说过的那种“被理解的对象和理解者的巧妙构成”了。

作为对象的中国 今后还会继续存在 因此理解它的工作不可缺少。在日本 无论是怀有这种想法 还是在确实工作的 现在都不乏其人。然而，至于说到前面提到的先生们那种与中国之间如艺术品一样的完美默契 非常理想 的关系 那么如果我们 对过去的时代做些回顾，便很难说今后还能有像以前那样凭借艺术性的默契而形成的那种效果。

我们对中国感到亲近，然而在不同的时代也各有其色彩。不用护照、不必签证便可去中国旅行 如此无视历史条件的所谓

“亲近感”当然已经不现实了。如果没有国家的尊严阻隔着 中国的风光可尽收眼底 还能亲自体验其人情世故 那也许是应当尽情玩味的好事。可我们现在的时代，也有以前未曾有过的为难之处。

当然 如果我们真能够创造条件 困难对我们来说算不了什么。一个时代结束了，那个已经结束的时代，也有其自己的难处。我觉得 我们曾经生活在那个时代 在那个时代里成长 还是幸运的，但是，这决不应该成为我们逃避新时代的困难的资本。虽然我们曾生活在幸运之中 但并不能指望幸运。人 就是在面对着困难中成长起来的。

程麻译自《每日新闻》(晚刊),1977年4月17日

理解与友好

从“触及灵魂”的文化大革命说起

在我看来，一国或者民族、区域与另一国之间与相互友好’的难处相比，还是彼此‘理解’更困难一些。

说得极端点，可以说友好容易，理解难。

我所以这样说，固然是基于自己对日本和中国的关系的思考。另外显而易见，也因为两国已经将‘友好’的字样写进了相互缔结的条约之中。

我当然并不是反对‘友好’而是觉得如果缺少了‘理解’其危险犹如在沙滩上建立起楼阁。在缔结条约过程中发生的中国渔船在尖阁群岛〔1〕附近出现的事例，便是证明。对于这个事件，像我这样的人当然不能不有所推测，但推测与理解毕竟还不是一回事。而对于‘文革’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样是如此。

“文革”发生已经有十多年。我们当然不妨以各种观念去认

〔1〕指中国的钓鱼岛。——译注

识“文革”。而读了陈若曦〔1〕的小说，则又不能不对其深刻的内容感到惊异。这并不是觉得它出人意外，而是说其足以引发人们的想象。小说里的生活细节，会不由得将读者拉进作品所写的那个世界中去。

陈若曦的小说《耿尔在北京》描写了一个曾在美国留学的知识分子，回国十年还没有找到结婚的对象。她的生活，在普通中国民众看来，可以说有点特殊，其实却是很平凡。然而这些平凡的生活，同样浸透着政治。工厂的领导对她的婚姻给予帮助，实际上不过是干涉。而且他们相信，这种干涉是正常的行为，毫不怀疑自己的善意。

短篇小说《家庭调查》（拙译载今年《文艺》8月号），也写了这样一个愿意干涉别人的邻居，那是政策鼓励与要求的结果。那里的政治正在转化为道德、习惯和制度。

陈若曦在中国大陆生活了7年之后，到香港开始写短篇小说《尹县长》。其主人公尹县长原是一个国民党军人，在国共内战时投诚。他忠实执行共产党的政策，可最后却成为红卫兵揭发的对象而被处死了。还有短篇小说《任秀兰》中的主人公，是16岁就参加了游击队的女党员，也竟被说成是林彪的同伙。她被名为“学习班”的私设监狱收容，在监督下还被要求自我批判。一天，她打坏了厕所的窗户逃了出去。后来搜山，到处拼命寻找，她也没有发现。一周之后，在厕所后面的粪坑里找到了她腐烂、发胀了的尸体。

另外，在短篇小说《晶晶的生日》中，还写了一个通过幼儿园

〔1〕 陈若曦，1938年生于台湾。1961年从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去美国留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66年经欧洲到中国大陆居住，先在北京，后到南京教书。1973年离开大陆，经香港到加拿大。著有小说集《尹县长》等。——译注

的孩子的嘴 来搜集其父母‘反动言行’的证据的干部。为了证实这些证据 他打开了录音机 来审问孩子。当逼出毫无意义的荒唐话 听到孩子说出‘毛主席坏蛋’时 父母那种害怕和不安，让人觉得非常无聊。

经历过如这些作品所描写的那次‘文革’的人们 即使在江青等‘四人帮’被捕以后 也未必会像流水那样 忘记掉对于‘文革’的记忆。所谓‘触及灵魂的大革命’本是中共中央在‘文革’开始时的说法。这次革命确实‘触及灵魂’了 不过那是在与中共中央的意愿完全相反的意义上。它在人们的灵魂中，留下了不堪回首的伤痕。

不必说 这些作品是对‘文革’的直接体验。即使把陈若曦的作品视为‘创作’或者是一种特例 那也是积极表达对‘文革’的认识的一种尝试，起码不能够完全无视这样的作品。

据说《任秀兰》中的主人公 连名字都是真的 可见作者在创作技巧方面并没有太多的加工。我读后感觉到，通过陈若曦这些作品所反映出来的无数人物、事件、风闻、传说、景色、制度、心理等等，都是鲜活而富于冲击力的。

这都是事实

陈若曦所写的‘文革’体验者即牺牲者 是无名的民众 无告之民。对这些人，我们还无法直接接触。

就我所接触的中国文艺界来说，也多少知道一些在“文革”中遭受迫害而成为牺牲者的人。若数一数，怕不止 10 人之多（以下带※号的人名 在 1978 年 7 月 15 日发行的《文艺报》复刊第 1 号中发表的该刊记者的报道里 曾被提及）

作家老舍 ※赵树理 ※杨朔诗人郭小川 ※文艺评论家侯金镜法国文学研究家傅雷作曲家马可话剧导演并引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孙维世电影导演郑君里 ※剧作家张海默京剧演员周信芳 ※盖叫天 ※地方剧演员严凤英 ※沪剧女演员筱爱琴蒙古族画家纳·赛音朝克图 ※张德成 ※

关于老舍 传说是在‘文革’初期被红卫兵殴打致死 我觉得那大体上是真实的。但据说在“文革”后期文艺界有点宽松时（后来搞‘批林批孔’）还有人自杀。而根据老舍的未亡人胡絮青最近在官方会议上的讲话，让人怀疑老舍确实并非是自杀。

在‘文革’初期 不仅是老舍 在北京还发生过多起文艺工作者被残酷殴打的暴力事件。一天午后，老舍也挨了打。听说用来打老舍的是演京剧用的道具 如鞭、枪、刀和旗杆之类。他多处受伤，尽管头上流着血，还愤怒地抗议，不承认对自己的侮辱与非难。后来当场被戴上了写有“现行反革命犯”字样的三角帽子 直打到深夜。据说 是人交替着不停地打 他还曾受到侮辱。当与夫人好不容易见面时 他说：“我心里没有什么 毛主席、周总理理解我 人民相信我。”第二天在太平湖里发现时 全身是血，还有伤痕。旁边的湖面上，漂着他装订的毛泽东诗集（老舍夫人发言 见前说之《文艺报》）

传说在亚非作家会议上很活跃的杨朔，也自杀了，但真相还不太清楚。傅雷（及夫人）据说也是自杀的，也有可能是被杀而

装扮成了自杀。〔1〕张德成的身分不太清楚，大约是一位编辑。〔2〕

有的人虽然没有死 却被监禁、投狱而失去了自由。如《风雷》的作者陈登科有 5 年、《上海的早晨》的作者周而复 7 年、剧作家于伶 9 年、越剧女演员袁雪芬 6 年、诗人张志民 4 年、维吾尔族舞蹈家巴尔汗 4 年。有如此遭遇的，还有不少人。

以上是比较知名的人士。在文化部及其直属部门，据说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被强迫劳动 被开除的党、团员，被免职并在私设的监狱或法庭里受到拷问致死的，达 1000 多人。

大约搞“革命样板戏”的江青对中国京剧院这一最高京剧团体很是反感 其中有五分之一的人 由于“反革命分子”反对“革命样板戏”的“反革命小集团”之类罪名 而受到吊打、抄家和拷问 还有的被送进了监狱。中国舞剧团有 79 人受到非法审讯或吊打 全团有 179 人遭到过迫害。而在文化部，长期不能工作 被送进“学习班”即前面说过的关押任秀兰的那种私设监狱的 达 300 多人。

令人发指的是 在拷问时 殴打歌手的鼻子、舞蹈家的脚和演奏者的手等。在前面的死者名单中提到的剧作家张海默，据说是被五花大绑，在强烈灯光照射下死去的。还有像作家方纪那样 被迫害得一无所有的人。

而像巴金 虽没有受到过拷打和进“学习班”但精神上同样遭到了很大打击的例子。

〔1〕 傅雷夫妇确是服毒自杀的。——译注

〔2〕 此处作者的猜测不对。张德成（1866—1967）是中国著名的川剧演员 曾任四川省川剧院院长。——译注

巴金说 我们作为‘牛鬼蛇神’、‘反动权威’而受到侮辱 被关进了‘牛棚’(大概是关进小屋 强迫其干活)始终受人监视、被批斗。虽然没有被逮捕、被隔离(即没有被收进‘学习班’)肉体上没有受到打击,但由于长期停笔而造成的精神伤害,以及受到的人格侮辱,使人无法安睡。总是在恶梦里梦见被恶鬼包围着,甚至吓得挥动胳膊打坏了家里枕头边的台灯。在“五七”干校夜里,也曾大叫着从床上掉下来。要是“四人帮”的阴谋完全得逞,就是不死也得进精神病院。

退一步说,即使没有像巴金那样成为被侮辱的对象,无数的人面对眼前看到的精神打击和肉体摧残,也同样会感到心惊肉跳。

很多人像巴金一样 都曾被‘做梦也没想到的境遇’困搅着。所有这些,都是事实。

“文革”是不是这样 对‘文革’的报道是否真实 已不成其为问题了。我们还是应该联系解放后中国所发生的事情来做一些分析。

为何文学对此竟无反映？

令人深思的是,如果解放后的中国确曾有过类似的事情,那么在文坛上为什么一直没有出现像陈若曦那样的作品?在陈若曦的作品里,那种关注所处生活现实的深刻眼光固然令人惊异,但另一方面,也难免会让人有些迷惑不解,即那些经历了中国的政治运动的时间比陈若曦更长的中国作家们,为什么没有把那些经历写进文学作品中去?

已死去的人不必说 那些还活着的人们 也曾控诉‘四人帮’的罪行,但那仅是限于在官方的座谈会或会议上。而发表的文

章，也大都是在座谈会与会议上的发言或记录。包括少数像巴金那样偶而写文章的人在内，其文章只不过是谈自己的亲身经历。

从那些文章中，可以看出发言者、写作者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其事实也具有相当的说服力。由于它们是出自发言人和写作人的血肉 所以不愧为宝贵的资料。然而 那些个人经历的事情 其实并非仅仅属于个人。令人奇怪的是 为什么至今并未在复刊的文学杂志如《人民文学》 或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 看见关于这方面的文艺专栏？

巴金复出之后 最先发表的《杨林同志》(拙译载《经济学家》今年 4 月 4 日号)是关于在朝鲜战争中壮烈牺牲的少年士兵的故事。其中的警策之语 确实可以看作是对极左的“四人帮”和 红卫兵的否定 以及对普通民众的肯定。而且不只是巴金 复出后的许多作家的小说和散文，都或多或少反映了他们的“文革”观与人生观。不过 也总让人觉得 其作品像是套在看不见的框子里。它们的作者并真正没有写出这 10 年来的经历。其实这 10 年 应该是在新中国成立 20 年基础上的 10 年 同时也与新中国成立前的岁月相联系。

对人们来说 这种由前面所说的“触及灵魂的大革命”留下的伤痕 可能不久便会被时间冲淡。但实际上 这个“不久”也许意味着是某个人的一生。在我前边所介绍的胡絮青和巴金曾经发言的那次会议上 很多作家联名指出 掌握着北京文化工作的领导 仍然有限制讲明事实的倾向。前面提到的方纪 因为没能发言，便以书面批评了天津市当局压制言论的问题。还有好多出席者 同样揭示了某些事实或事件的真相 这里所说的会议 指恢复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联合会 简称文联 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 自本年 5 月末至 6 月初在北京举行)

从这些批评以及‘文革’中对外国记者采访的限制不难明白，在现今中国仍在实行着严格的检查制度，并要求文学艺术界遵守相应的政策。而在制度之外，大约也存在着与制度无关的自律或者担心。这种自律与担心，其中就包括有不可轻易乱讲那样的意思。

并不介意这种框框的人，其实一定会有的。这也与年龄和境遇有关系。例如对江青或姚文元等人来说，这种框子并非是用来对付自己，而是对付别人的。另外，像拥有权利和天真烂漫的青年，也不会介意这种框子。因此，谁受这种框子的限制，其中也含有心甘情愿的因素。因为框子与受这种框子束缚所形成的民众麻木和无力状态，本是互为表里的。

这就是说，在有如此框框的地方，人们感到对此无能为力。他们包括父亲、母亲、祖父母、兄弟姐妹、朋友、同事、商店售货员、来往的捎信人、求婚者、结婚者，或者是食堂服务员、厨师，还有互相监视的邻居，以及迎面而过连瞥一眼都会脸红的什么人。更包括‘勇敢战斗’的工人造反派和红卫兵。

他们都属于这样的框子，或者说他们就是代表框子的人。那么，为什么不将他们也写进文学里去？文学没有不写他们的理由。

有人为何仍能健在？

像前面所说的这些情况，其中自然有制度方面的问题。不过我想，‘文革’已经持续了 10 多年，作为一种惯性或者惰性，思考自己属于哪一种人际关系或集团的意识，似乎已经根深蒂固了。

例如，在文化部便有这样的阻力。

“文革”中执文化部牛耳的是于会泳。他本是上海音乐学院的中国民族音乐教师。据说，他曾经用老盲艺人民间乐器演奏的曲子来作曲，以自己创作的名义出版。江青提倡京剧现代戏（1964年）时，他投其所好，立即发表赞扬江青的文章。因此被江青和张春桥注意，当上了上海文化局党委书记，后又升任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文化部部长，进而成为中共中央委员。

如果我的记忆不错，他在1973年来过日本。那是日中恢复邦交后来访的第一个大型中国代表团，团长为廖承志。当时国务院文化部尚未恢复，他代行文化组长之职，称得上是一位有实力的人。部分代表团成员到京都后，来我工作的研究所访问。他一人神采飞扬地坐在接待室的椅子上，谈笑的声音很是古怪。

据说，他一味地推崇江青，在评论“革命样板戏”时一定要赞颂江青的功劳。在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期间，为参加大会的代表演出《智取威虎山》。开幕前他在舞台上演讲，为了创作“革命样板戏”，江青如何同修正主义路线做斗争。在观众中的江青则宣布：“不要那样讲，请大家看戏。”他还迫害过一位演奏员，只因为这位演奏员说，剧场的音响效果不该以坐在第7排的江青为中心来安排，要考虑到最后边的观众。

前边所说的文化部里对文化界人士的那些迫害，有相当部分便是由他直接指挥的。

要是果真如此，那么当今世态转变了，本该是追究其责任的，然而事实上还没有。

在逮捕“四人帮”的第二年，即1977年3月召开的批判于会泳的大会上，好不容易才召集了7000人，最后并没有喊出“打倒于会泳”的口号。当时文化部的领导人，对发言提出了严格的限制。据说，同年12月文化部党组成立以后，情况才有所改观。

不难猜想，于会泳在文化部的势力相当大。听说在1976年

10月9日即江青等“四人帮”被逮捕3天之后召开千人大会会上竟仍有人喊出“向江青致敬”的口号。中国京剧院内的“四人帮”派在10月12日还举行会议对逮捕表示不满。

大概正是这些人，迫害了前面所说的那些牺牲者。如果文化部中没有以于会泳为首的那批人，就不可能实施那样强烈的迫害。而这样的人际关系和帮派并没有与“四人帮”一起被清除干净。对那些虽然与“四人帮”并无直接联系但曾作为迫害者实施过暴力或者写文章搜集情况的人来说自然明白“四人帮”的垮台与自己的下场有关系。靠着“文革”提高了社会地位的人对关于“文革”的评价不会不敏感。因为当初他们爬得上去靠的就是这种人际与集团关系。由此我觉得在中国社会表的下面，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或强或弱的隐性关系结构。

在某个中国代表团来京都的时候其中有个人是在当时“批林批孔”运动中红得发紫、笔名为“梁效”的写作组的成员。听说他曾经策划过论文的写作。在“四人帮”被逮捕后有人看到他仍然健在。这大约是因为他与不为我们所知的内部情况或集团有一些关系。

另外在天津市的中共领导人里有个人叫解学恭在“四人帮”被逮捕后仍很活跃。当一个日中友好代表团访问天津时他还特意接见过对被请吃过饭的日本代表团来说这是给了好大的“面子”。而最近他被解职了。他可能就是前面提到的方纪所批评的那个人。

赞颂与善变

我讲这些事情并非是说为了“友好”必须全部了解中国的内部情况、集团和人际关系。而是认为应该把友好关系建立在

其超越自身的基础上。这样一来 就会使人感到 保持‘友好’是容易的 可要是越过这一步 去寻求对对方的‘理解’却会有困难出现。然而 如果不如此努力 不摆脱装模做样的‘友好’那是没有真正‘友好’可言的。

那么，不了解内情，或者说即使知道内情也并不介意的“友好”又怎么样呢 毫无疑问 那样的‘友好’不过只是朝着向对方表示客气、花工夫建立关系迈出的第一步，但还不能说就是成功的‘友好’。

在前面举过的那个例子里 我曾向代表团中的那个‘梁效’，问及“批林批孔”与周恩来有什么关系。不过我并没有直接质疑 只是问署名‘梁效’或是署名‘北京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语调不些不一样，其成员时常更换么？那个人回答说，是这样的。接着 他又告诉我 所谓‘梁效’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的谐音。我曾在报纸的专栏中写过这件事，因为它使我明白了文化人的作用。这样的交流自然也不坏，但由此我开始意识到，必须注意真实的情况才行。

那种对在敏感时期到来的敏感代表团中敏感的人，必须回避敏感问题的所谓学术交流，应该称作什么呢？又究竟什么叫“友好交流”呢 当然 最好不要回避问题 但是那样无法保证不使被提问者处于尴尬的境地，也难免误解提问者的原意，或是不引起某种意外。于是 我说了一句：“哎呀 我还以为梁效是姚文元的笔名呢！”对方听我这么讲 浮现出难堪的苦笑 只好到摆在宴会厅中的巨大餐桌上去取炸鸡块了。这当然是意在逃避，不过他那种苦笑却是无声胜有声的，只是当时无法明说罢了。要是彼此都不挑明，那这种所谓的“友好关系”也许仍可以发展下去。

不过 这种对当事人不摸底细的‘友好’现在确也有难办的

地方。日中友好运动中那些肯定逮捕‘四人帮’的领导人，有的当初也曾一起或单人受到过姚文元的接见（照片登在《人民日报》上），他们对一贯以称赞‘文革’或‘批林批孔’成果而自命不凡的姚文元，是否还会继续随声附和呢？如果未曾附合或者是不再附和，当然也可以继续‘友好’下去。

然而所谓‘理解’就不能是这样。

所谓‘理解’是会不断变化的，但是必须坚持追求‘理解’的立场，而且（自己）一贯坚持这样的看法。“理解”当然可以有各种各样，比如昨天称赞刘少奇，而到他被批判了，又立即跟着批判。这也是一种‘理解’。这当然也并非不可，因为中国已经大转弯了，只好再来称赞他。这样改变腔调也并非不行。可是就常识而言，毕竟其很难被称之为‘理解’。

所谓“理解”就某种意义来说，便是要反对言不由衷的‘友好’。不过这样一来，它也许会令有些人们感到汗颜。

在飞速发展的友好面前

至于说到现实的政治，恐怕是很难判断的。中国的政治情况大局已定。在中国那种文化与政治无法割裂开来的环境中，前面提到的许多作家对北京文化当局领导人的批判，并不是文艺政策批判，而是政治批判。这与最近中国宣传部门会见日本共同通讯社记者，说中国民众仍热爱毛泽东，不过同时“他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也犯了一些错误”的说法（边见特派员 6 月 22 日发自北京）是有联系的。

那则报道还提到，7 月 30 日《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栏中发表了署名‘扬西岩’的文章，其中指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刊登了追究北京市领导责任的信件，却只有《北京日报》

拒绝刊登这样的文章。还提出了“捂盖子的是谁”的问题，并赞成5月21日发表的‘揭露政治骗子’的意见。

所谓‘揭露政治骗子’指的是快要开始‘批林批孔’时在突然掀起的“反潮流”中出现的黄帅对教师的批判。其实那事情是黄帅的父亲搞起来的，当时发表的日记，也并非与原文一样。

《北京日报》则极度推崇黄帅的出现（见本刊今年4月号上的拙文《孔子为什么被批判》后收入拙著“中公新书”《对中国的视角》）

那篇文章还质疑，《北京日报》不发表读者来信乃是有意为之。并问是谁在收到文章到‘四人帮’被逮捕的20多个月中，仍阻碍着揭露事实真相？向“四人帮”献媚并宣传黄帅事件的领导人，至今还在压制对事实真相的查明。追究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的要求也正在强烈起来。不过，这样的要求还仅限于北京。

有消息说，1976年4月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里有很多问题。这指的是决定撤消邓小平的职务、任命华国锋为党的第一副主席和总理。既然邓小平被撤职是在其恢复职务以后，那所剩的问题便是华国锋必须就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和总理。这样说来，问题也并非很多，只是有一个，那就是现在华国锋的地位是否合法。这关系到华国锋的命运。吴德和华国锋都曾被认为处理“天安门事件”有功，可现在又说吴德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错误讲话，与华国锋无关。北京一部分市民认为，党中央里有汪东兴副主席在庇护吴德。还听说中国民众有笑谈，讲吴德、汪东兴还有说叶剑英、华国锋等是新‘四人帮’的。〔1〕

6月份在北京石油学院贴出的大字报上，有人认为，党的领

〔1〕 现在看来，当时的这些传闻有误。——译注

导应该分为第一线和第二线。据说可以断定，这是刘少奇曾说过的话。这无疑是在主张邓小平应该在第一线，华国锋应退居第二线。若是果真如此，邓小平就会在国务院以及党务、军队中配置自己觉得可靠的人。当日中友好条约进一步交涉时，也许邓小平不会在场。即使华国锋在签字那天露一下脸，未必就能出席与其职位相称的重大仪式。具体的主管官员都将忽视华国锋，其作用也会逐渐退后。我推测，当10月邓小平来日本时，其发言和举止可能给人留下颇有意味的印象。^{〔1〕}

我在很久以前就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首先要有“关系”，其次则应该加深“理解”，才能“友好”发展，即所谓“关系—理解—友好”。当时，由于日本无视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我是赞成两国首先恢复邦交，建立关系的。但是从前几年开始，我觉得这种关系似乎被颠倒了。滥竽充数以求加深“友好”或与徒具形式的代表团接触之类，这些并无意义的举动和结果表明，按“友好—理解—关系”这种颠倒的顺序，并想加强“关系”上，是难以奏效的。

日中邦交恢复后友好关系突飞猛进的发展，对双方当然都是有利的。但是，决不应该放松了对“理解”这一中间环节的努力。

这，便是我的“理解”。

程麻译自《中央公论》，93卷10号，1978年10月1日

〔1〕见竹内实著《邓小平访日语录研究》，《中央公论》，57卷1号，1979年1月1日。——译注

中野重治与中国

当读了编辑部的信，知道要我写一篇题为《中野重治〔1〕与中国》的文章时自己当然是愿意承担的，丝毫也没有犹豫。

因为即使我不来做这事，这个题目也是应该有人来写的。写这样的文章，必定会从中野先生身上引发出一些相当有意思的感想和事情。不过，以前经常是与活着的中野先生对面交谈。记得每当我写了文章，中野先生读过后，开口总会说：“竹之内君，这里……”（在新日本文学会〔2〕的会议上，中野先生称呼我的姓氏时，喜欢在其中加上一个“之”字。现在我已经记不得他在招呼竹内好〔3〕时，是否也在他的姓氏中间同样加上一个“之”字。如果不是那样，为什么偏要在称呼我时带上一个“之”字呢？

〔1〕 中野重治（1902-1979）东京大学德文科毕业。日本文艺评论家和作家，曾为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盟员。1926年组织马克思主义艺术研究会。著有《小林多喜二和官本百合子》、《中野重治诗集》、《日本共产党批判》等。——译注

〔2〕 新日本文学会，是由秋田雨雀、藏原惟人、中野重治和宫本百合子等人于1945年12月30日发起的日本文学团体。其纲领是“创作与普及民主主义文学”。曾发行《新日本文学》等报刊。——译注

〔3〕 竹内好（1910-1977）中国文学研究家、评论家。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科毕业。著有《中国革命的思想》、《国民文学论》、《鲁迅》和《现代中国论》等。——译注

当然 说起这事来 我从来没有觉得不愉快。然而 现在中野先生不会再那样指正我，或者说什么话了。自己即使想对中野先生说道歉之类的话，也已不可能。^{〔1〕}其实说起中野先生与中国的关系 也谈不上有多么特殊。忘记了是在什么时候 有一次中岛健藏^{〔2〕}去中国访问之后 与两三人在一起谈起过 他在北京曾被中国文艺界的要人们请去密谈。那次是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中国宅邸，穿过几重房子和庭院，好容易进到了最里面的房间。要人们已在那里等待着，而谈话特别融洽……。他没谈当时都谈了些什么 我们也没有问。但大家都觉得 那肯定是一种彼此可以称为同志的气氛。我的记忆已经有些模糊，不记得当时是否在喝日本酒、威士忌 还是别的什么饮料。总之 留下的印象很是支离破碎。至于中野先生，他显然并没有像中岛健藏那样与中国的特别关系。

不过我想 中野先生对于中国或中国文学 毕竟应该有很多感受，尽管他从来也没有坦白地吐露过。（当我写到这句话时，仿佛觉得中野先生又会说出像“竹之内君……”之类的解释或插话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中野先生已再不能这样说了 只好任凭我来胡乱猜测。）

当收到编辑部的来信后 我还接到过他们的电话。我想 还是参考一下中野先生的《中国之旅》（筑摩书房，1960年）再写回信比较好一些。

今天，我溜进了书架间的空隙里去寻找。在靠墙的书架上

〔1〕 作此文时 中野重治已经逝世。——译注

〔2〕 中岛健藏(1903-1979)，东京大学法文科毕业。日本评论家和法国文学研究者。曾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著有《现代文学论》、《后卫的思想——法国文学与中国》等。——译注

举手才能够得着的地方，看到中野先生的那本书。它夹在龟井胜一郎〔1〕的《中国之旅》（讲谈社，1962年）与小林胜〔2〕的《高丽人》（三省堂，1970年）之间。从小林的书再往里，光线便暗得看不清楚了。而在龟井著作的这一边，则是儿玉誉士夫的《恶政·枪声·乱世》（弘文堂，1961年），再往这边，还有鹿地亘的《沙漠的圣人》（弘文堂，1961年），那是写路易·艾黎〔3〕的传记。这些书都好久未看了。

前些天，我曾随意地去被称为“仓库”的地方寻觅，然而在那里竟连一本中野先生的著作都没有。后来，又打开了堆在研究室书架上的箱子。那里本该存放有中野先生的书，都是他送给我的。但其中却没看到《中国之旅》，箱子里只剩有《与书的交往方法》（筑摩书房，1975年）和另外两、三本书。除了《与书的交往方法》，还有我久想找到为讲解鲁迅所编《苏联版画集》而写的讲义。我想，如果找不到《中国之旅》，就不妨写写其他的书。不过，我还是不相信那本书真地丢了。就像在前面说过的，正当这次我如同迷路似地将身子挤进在屋子角落里的书架中间时，终于想了起来，并在那里看见了它那深黑色底子上凸印着白字的书脊。

找见了书，种种断片的记忆便浮上了心头。我还忽然想起来，当自己打着伞，冒着今年第20号台风前的大雨，到那“仓

〔1〕 龟井胜一郎（1907—1966）日本作家。东京大学中退。著有《日本精神史研究》、《中国之旅》、《龟井胜一郎全集》等。——译注

〔2〕 小林胜（1929—1971）日本小说家、剧作家。著有《日本狂人日记》、《小林胜作品集》。——译注

〔3〕 路易·艾黎（1897—1987）新西兰人。1927年到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去陕北创办中国工业合作协会。1942年创立培黎工艺学校。著有《工业合作社》、《中国内地》、《在中国的六个美国人》等。——译注

库’里寻找的时候 曾在中野先生的小说《甲乙丙丁》里 看到过一些夹在书中的记录卡片。找到书后安了心，我拉开桌上的抽屉 从那些乱七八糟的纸片中 最后翻出了一页。其中写着：

《前卫》P.250“ 去年 12 月号 ”高田实《美帝国主义路线的新阶段和文化、思想工作》P.245——“ 修正主义者渗入事务局和计划小组带来的软弱与民主主义分子的孤立 ”
←——论文引用 P.250 关于《红岩》翻译座谈会“ 香港的新闻报道如何…… ”P.244 “ 出了名……”P.244

我记得 这卡片上所记的页数 是单行本《甲乙丙丁》(讲谈社 ,1969 年)里的页码。那是在多次读过《中国之旅》后 翻看同样存在箱子里的《甲乙丙丁》时 脑中涌现出当时的记忆 而随手记下的。简单说来 那卡片记的是日本共产党所办《前卫》杂志上登载的论文，以及与此有关的报道，还有不带评论的记事和《甲乙丙丁》中提到的香港报纸刊登的事情。

透过台风前的雨水 我向窗外眺望着 脑中回忆起了那些事情。那些卡片正是我收到中野先生所送的书后，边读边记下来的。现在已经忘记了 当时 一定是 看到了有关的文章 觉得应该复印下来再读，而后来竟没再能那样做。

至于日本共产党 当时为什么要对那么一个小机构 亚非作家会议日本协议会事务局〔1〕发表如同大刀阔斧似的文章呢？

〔1〕 亚非作家会议日本协议会，是日本文学界与 60 年代的亚非作家会议联络的机构。1956 年，由印度作家发起，在新德里召开了亚洲作家会议。1958 年 又在塔什干举行第一次亚非作家会议。1961 年 3 月 28 日 该会议召开了东京大会 共有非洲 8 国 12 名、亚洲 12 国 72 名作家参加。会议中心议题是“ 为亚非作家民族独立和平而奋斗 ”当时 竹内实曾在亚非作家会议日本事务局里工作。——译注

中野先生在小说《甲乙丙丁》中写了其中的人物“伏木”在代代木〔1〕对日本共产党总部的一次质问。而在这之后，有关于他回到了亚非作家会议日本协议会事务局一个小房间汇报的描写。对话是这样的：

问过“修正主义者渗入”了事务局或别的地方么？

是啊，也问过了。可说到事务局，就只有我一个人哪！当然还有你金谷君，可你只是个帮忙的。要真是那样，你不也成了修正主义者么？说是渗入了，其实结果谁也没有来过！因此，那不过是吹毛求疵让你关门罢了。除了与事务局有关，也是因为要表示不能就这么放过去……

这下子出名了……

出了 出了……

呀 也好 反正是要关门的……

小说里问话的人叫“田村”。说是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亚非作家会议事务局不满，恐怕只是中野先生自己的猜测。此外，其中还写到香港报纸的报道：

香港报纸的报道怎么样？

也报道了。可是，不知道外国的报纸都写了些什么。不必对外国报纸的报道那么认真，其实也无非是多管闲事

对当时这一事件的前后经过，有些东西我没想去追究。读

〔1〕 东京地名。——译注

了小说《甲乙丙丁》后来又看过香港《大公报》的报道 才知道是有一个经常写一些，并散发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情况的小册子的人 其中有的透露出了红卫兵的资料。而《大公报》在两、三年后 曾指责这个人是“特务”。人们觉得 那是香港《大公报》代表北京向海外公布消息。

可在实际上 当时透露那些资料的 是《人民日报》。因此，原来的怀疑很成问题。

既然发表了报道（或评论）当然是有人写了它。那么 这位作者对“文革”的总结又如何呢？现在该怎样认识它呢？

对这件事，我很有种想立此存照的想法。（当然是仅限于“立此存照”。因为我觉得 也只能如此而已。）

有一种人 只要将事情贴上“标签”便心满意足了。他们总想让其内容来服从所贴的“标签”。也就是说，以为只要贴上了坏的“标签”便好象可以断定 其实质本就是那样。……

我这样讲，只是想说明有这样的人，而并非意味着，自己指责在日本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里 都曾有人提倡和实行贴“标签”。在附于《中野重治全集》第 8 卷（筑摩书房，1977 年）后边的《月报》第 5 号里 我已记述过这件事〔1〕。但是此事过后，曾经有一位从中国来的某位先生，因为与我有过接触，当听到我批评贴“标签”的事 据说感到非常后悔和狼狈 那次本是让朋友拉了去到饭店的，而且关于政治的话一句也没有谈。那位先生对我们也始终很和蔼。所谓的后悔和狼狈，大约是因为事务局在他的代表团访日期间曾经帮过忙）。后来这件事传开去，听说还有人追究过 其中所谓的贴“标签”究竟谁是主谁是从的问题。不过

〔1〕 竹内实《微弱的勇气》见《中野重治全集》第 8 卷附录《月报》5。——译注

我想 即使此事的内幕已经清楚了 我还是想“立此存照”(大约中野先生也会同意我这种“立此存照”的态度。)

在多次零星翻阅小说《甲乙丙丁》之前,我已经把《中国之旅》卷头的照片(它们确实拍得很好 匆匆瞟了一眼 并一口气读完了那本书。令我吃惊的是,它写得竟有点刻板。作者的旅行是在 22 年前。22 年对我来说,当然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在 22 年前的 1957 年所写的旅行记显得刻板 自己觉得也并不怎么奇怪。实际上尽管如此,这书里还是很有些意思的。

在我的想象中,中野先生是穿得一本正经去中国的。而现在去中国旅游,气氛已不再是那样了。我多少明白一点其中的情形,觉得当时中野先生穿着西服去,显然会让人觉得有些过于郑重其事。

其实,那时到中国去,并非都那么容易。首先是日本政府发护照不痛快。其次,若没有中国方面的“接待”,也去不了。当时,大都是由中国方面指定日本代表团的人数,被选人的人,可以说是由代表团全权负责。其中,中国方面的方针和意图很关键。而既然是选拔,便会有华丽的场面,还常带有点特权的味道,并非像现在有的旅行社那样,以漂亮的小册子引诱人们到中国去旅行。那时,对能入选访华的人,都是满眼羡慕。连听听回国后的报告会 也很难 还不像现在这样有电视)

我自己也曾是那样,所以对当时的气氛有非常实在的感受。我曾在 1953、55、58、60 年,4 次访问过中国。不过,前 3 次是被雇用的(做翻译)给钱的不是中国 而是轮船公司或当时的访华代表团。而且 1960 年托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福,让我参加了以野间宏为团长的日本文学代表团。当时,龟井先生也是同伴。前面所说龟井的《中国之旅》,也是当时的产物。后来我看那书的《后记》里说:“受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的邀

请我作为日本文学代表团的一员从1960年5月31日开始访问中国。野间宏(团长)、松冈洋子、开高健、大江健三郎、白土吾夫、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长和我共7人。到7月5日为止共停留了36天。不知为什么其中落了我的名字。计算人数时并没有把我包括在内。这书是龟井先生赠送给我的，在书前的空白页上，他还用毛笔题了字。

记得在1960年，我也是穿着西服去中国的。当时那种难为情的感觉，至今还历历在目。

中野先生《中国之旅》的《前言》是这样开头的：

1957年秋，我们到中国去短期旅行。所谓我们，指的是山本健吉、井上靖、十返肇、崛田善卫、多田裕计、本多秋五和我共7个人。到北京之后，中岛健藏也参加进来。我们是作为访问中国的第二个日本文学代表团出发的。旅行的具体事务，则由日本文艺家协会的小畑真一，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木村菊男帮忙。这次旅行，是我有生以来首次到国外去，连飞机我也是第一次乘坐。另外，我的年龄最大，也难免给各位添麻烦。我很感谢大家。

这种写法，很是古雅。它出自中野先生的笔下，代表着中野先生的文风。我觉得，这种文体与其中所蕴含的格调，是由其内容，即去中国旅行的形式决定的。而那种去中国旅行的形式，已经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已没有以“代表团”形式旅行的，但当时的气氛相当不同）。对以这种形式去中国旅行恋恋不舍，让人觉得已是昔日黄花。

中野先生说：“我的年龄最大。”算一下其实是54岁，也谈不上有多么年长。这样谈年龄，让人觉得有点夸张。近20年

来，对年龄的理解已有了很大变化。毕竟时代确实不同了。

书中的第一部分里，有一篇如同是全书背景的文章。其中有‘去年没有去成’的话。

那是指 1956 年 中野重治曾与本多秋五、臼井吉见、宫本显治一起 接到过中国的邀请 但日本没发给宫本和中野护照。为了领取那护照 据说他曾麻烦过大野幸一、松本七郎、志贺义雄和北村德太郎等人。列出这些名字后 中野先生写道：“尽管去年的护照到今年也未拿到（中略）但还是想向这些人致谢。”

看到这篇文章，觉得那似乎是写于中苏关系还很密切的时候。开始时 虽然未必像日本《赤旗报》所说的那样 但如中野先生所强调的，中苏关系确实曾经很紧密。但到了 1957 年 这种关系就停止了。而到本书出版的 1960 年 7 月 苏联已经撤回了向中国派遣的所有技术人员。

中野先生这样说道：

在重庆、成都一带的感受 是中苏合作甚至延伸到了深山的村寨里。中苏之间有点疏远的迹象即使有，我们也没发现。在重庆第 41 中学，曾看到贴有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40 周年的墙报，那是带有插图的文艺专刊。其中有诗，有文章。上面写着：

海可枯
石可烂
中苏友谊
永不断！

我相信，那确实是中学三年级学生写的。

那意思是说，连山村里的三年级学生，都是这样理解的！然

而 故且不说当时 即使是现在我也怀疑 山村中学的三年级学生对他们写的 究竟能够理解多少 然而 中野先生却写道：“我相信 那确实是中学三年级学生写的。”既没有说明此前中苏之间的事态已经变化，也没有指出那不过只是一种说教。

前面已经说过，中野先生和我都曾穿着西服到中国去过。但不管是中野先生还是我，都没有特意觉得，那西装有多么讲究。如果硬说那西装很讲究，也未尝不可以。不过 中野先生肯定比我漂亮得多 因为他比我有资格。但尽管如此 我仍然敢在这里写这样的文章，可见我有多么不知天高地厚和自以为是。

中野先生在北京大学，做过关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讲演。当时的讲演是他和山本健吉两个人做的，山本健吉谈的是日本古典文学。

在中国看来 无产阶级文学当然是主流。我想 中野先生对此的感觉是很满足的。然而 虽然满足 虽然是在谈主流 但在表面上 中野先生却是一副并不知道在谈主流似的‘谦虚’样子。这是我在读过书中 153 至 154 页上在北京大学的讲演稿后的感受。另外 当然也有些惊讶。这指的是 如果请北京大学的教授做翻译 是应该尽早交去原稿的。但实际上他并没那样做 却仍然可以讲演那样主流 并非贬低其他支流 只是说有人认为那是主流 的内容。

在那种时候 自然不会再像前边说的‘中学三年级学生’那样 脱离中国的现实。其实“；中学三年级学生’脱离实际 也并非是中野先生的责任。不过 包括在北京大学讲演在内 如果中野先生一般是穿西装的话，那对方则会穿中山服来迎接。而中野先生的西装，与对方的中山装相映衬，显然会形成鲜明的对比。

就这一点来说，我读了中野先生回国后对山本健吉关于中

国作家的感受的声明〔1〕印象就更加深刻。

包括前面提到的中苏友谊，还有像中野先生那样穿着西服奔波的一些做法，现在已经不流行了。我觉得，中野先生对中国的感受从《中国之旅》到《甲乙丙丁》毕竟是有些变化（并非指《甲乙丙丁》里的故事而是说写作时局势对作者的影响）只是我无法在这里一一指出这种变化的内容罢了。

在小说《甲乙丙丁》里写那“田村”在星期天到共产党总部去查问，当走过接待室时，看到那里的书架上摆着毛泽东的石膏像。在查问中，一边被录音一边在观望的“田村”发现同窗上的玻璃一样，石膏像上也积了一层灰尘。那灰尘，并不像是因懒得打扫而堆积的，竟觉得那是“被风轻柔地吹到了上面”“，很是美丽”。

这种描写毛泽东石膏像的文笔，也许恰好可以反映出我未必真正能够说得清楚的中野先生眼里的中国形象。在他的感受中，似乎隐含着一种对中国的本质与非本质理解的微妙结合。

程麻译自《新日本文学》第 34 卷 12 号，1979 年 12 月 1 日

〔1〕当时山本健吉曾发表文章批评中国作家，而中野重治则站在共产党人的立场上，在一定程度上反驳他的一些说法。——译注

哭吉川幸次郎先生

那还是在六、七年以前，有几位先生想了解吉川〔1〕先生在北京留学时代的情况，要给某个杂志写文章。不知道为什么，刚迁居到京都的我，也被吉川先生指名成了写作者之一。为此，大家集会了两次。基本上结束此事的那一次集会，是在祇园〔2〕的一家小店里。

那时，先生几乎不摸酒杯，只是热心地向女店主询问，大山定一先生，京都大学教授、德国文学专业，在去世前，曾是怎么喝酒的。大体上听完了之后，还是不太满足，好像想多听点似地，又一再表示谢意。其实，那些话与其说是在感谢，还不如说是在较真儿。

当先生辞世以后，我仿佛觉得先生是将自己镶在了镜框里。死亡，或许也就是将生命框起来罢。

然而，以前先生的音容笑貌，仍然浮现在我眼前。他时常着

〔1〕吉川幸次郎（1904—1980）生于神户，京都大学中国文学科毕业。曾任东方文化研究所所员和京都大学文学系教授。获1969年度日本文化功劳奖。日本艺术学院会员。著有《我说杜甫》、《宋诗概说》等。——译注

〔2〕京都的闹市区之一。——译注

便装，在午休时去诗仙堂〔1〕一带转悠，或是到位于别当町汽车站前的川胜义雄先生（京都大学教授、中国史专业）家以及到我家里来站站。先生的行动如同寄信一样神速。当他作为政府派遣的文化界代表团团长，刚刚从中国访问归来以后，便向我们讲述了旅行中的种种印象。那神态，就像大家都是坐在汽车上伙伴似的。当时，我不仅想起而且想禁不住脱口说道：以前忝为青年学生，从先生受到严厉的教诲，丝毫没记得曾经轻松过。当时体验到的春天般的温暖，以及师生之间的幸福感，至今难忘。

作为中国文学研究家的先生，曾经主张中国文学的主流是诗。但我觉得，在更广泛的立场上，先生则一直在努力使中国贴近日本人。有时冷不丁会听他说：你们可以从任何立场上来批判我。

偶而，先生也会显示出一种癖好，即将想说的话像连珠炮地倾吐出来。你可能并不服气，但若不像竹筒倒豆子似地从头加以回味，便无法辩论或者是反驳他。此时的先生，其形象和语言，像是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先生很讨厌对中国的冷淡态度，或者是评价。我觉得，在先生看来，研究中国的人想抬高或是抬高了中国的态度与评价，是天经地义的。先生还记得，除了自己的家，最常进的是狩野直喜先生（原东方文化研究所首任所长、支那学专业）的家门。他又写道：每隔 10 天，他必去拜访青木正儿先生（文化功劳奖获得者），而我却没有像先生访问他的老师那样，去经常拜访先生。这除了时代不太一样，根本上还是因为自己不肯于学习。

当然，我也偶而给先生写过明信片 and 便笺。如果不自量力

〔1〕京都著名的园林式建筑。——译注

地夸口，那也可算作是引以自豪的事。有一次，我和桑原武夫〔1〕先生谈论四川作家李劫人时，知道吉川先生还没读我译的李劫人的小说，便诚惶诚恐地送给他一本。几天之后，先生对我谈起读后感时说：呀，中国也有这样反道德的作家啊！显得非常满足。

另外我从同学相浦泉（大阪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语专业）和赤尾俊郎（兜子）〔2〕两人那里多次听说先生有“起居注”那样的东西。每日新闻社从先生那里要到了“起居注”，但原稿后来竟丢失了。于是，由刚入该社不久的赤尾君（他对丢稿子的事并无责任）和一名部门负责人，就此事前去道歉。据说先生虽没有骂人，但对这件事很是生气。在怒不可遏的先生面前，去道歉的人吓得如临深渊。记得说者与听者的我，对此事的印象都非常深刻。

我还在相浦泉的家里，知道了清水茂（京都大学教授、中国文学专业）和尾崎雄二郎（同前）君接受先生遗嘱的事情。也曾多次走过人生曲折道路的我，当时好像是在听另一世界的故事。后来，每当我听到类似的消息，总不免联想起个人的处境与状况，遗憾自己不能与此事有缘份。

现在要是再能和先生说一说话，那该有多好！

程麻译自《每日新闻》（晚刊），1980年4月11日

〔1〕桑原武夫（1904-1988），京都大学法文科毕业。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著有《文学入门》、《苏联中国研究》、《桑原武夫全集》。——译注

〔2〕赤尾俊郎（1925-）京都大学中国文学科毕业。日本著名俳句作家。著有《战后俳句的出发点》、《新人论——新俳坛》等。——译注

武田泰淳的中国体验

武田泰淳〔1〕是作为侵华战争中的士兵，首次踏上中国土地的。退伍后，他在日本短暂就职，又去上海的文化团体工作〔2〕，一直到日本战败。而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他没有能够再去那里。当相隔了16年再次访华以后，又在“文革”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多次与中国发生联系，也曾有一段时期，中断了访华。

说到武田泰淳的中国体验，首先应该分析的，当然是前面提到的他在中国的实地体验。因为这种体验，无疑是相当深刻的，通过它们有助于了解中国。老人和前辈们曾谈到中国，他们也通过创作诗文，在心里描写过中国。另外，也不妨借助报道所发生事件的报纸和杂志，来认识中国。在地图上，更是容易找到中国。不过，现实的、活生生的中国，却能够破坏以上种种对中国的描述。

〔1〕 武田泰淳(1912-1976) 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科肄业。日本作家、评论家。与竹内实合著《毛泽东 其诗与人生》另著有《司马迁——史记的世界》、《武田泰淳中国小说集》、《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学》等。——译注

〔2〕 武田泰淳于1944年6月到上海的中日文化协会就职，在其出版机构东方编译馆从事将日语著译为中文的工作。日本战败后，于1946年4月回到日本。——译注

而武田泰淳在中国注意的，是所谓“当地人的脸”这样一种现象。

我们曾见过不少尽管表情特别痛苦，但心志并不怎么动摇的农民。他们不管是哭泣还是高兴，眼里都能看到某种不寻常的东西。当地人晒得油黑的脸看起来很朴素，而他们的心则如深潭一样难测。即使是孩子，也潜藏着智慧的机敏。与我们士兵打交道的，大都是如此心态的当地贫苦人。

这样的当地人，也许并不识字。不过，正是他们，构成了中国。

这些居民可能是未曾被大部分研究中国者、去中国旅行者关注的一群人。然而组成亚洲和东方文化源流之一的中国的，正是他们，而并非是那些日本的汉学者，以及能就发现古书而絮叨着高等北京话的二、三学者。

像这样注意中国民众的脸的，还有夏目漱石〔1〕。他曾描述过一位拉着车，一动不动地坐在路上的老人：

更引人注意的是，扶在地面上的手向后伸着，脸上满是伤痕的老人，什么表情也没有。可以说没觉得痛苦，也没表现出痛苦，更不是故作冷静。只有他的眼睛，让人不忘。老人暗淡地盯着地面。

〔1〕 夏目漱石（1867-1916），本名金之助。东京大学英文科毕业。日本近代著名作家。著有《我是猫》、《伦敦塔》、《三四郎》、《明暗》等。——译注

这两种描写 稍微有些不同。武田泰淳的文章 表达了一个 20 岁的青年，在战场上奔波所感受到的那种昂扬气质；而夏目漱石 则 显然 不是那样。“暗淡地盯着地面”的眼睛 原是当地人所有 却无法从中窥探到那“如深潭一样难测”的心。眼望着几度王朝兴衰、权力更替的无数中国下层老百姓 其表情如漱石看到的那样 表面上已经麻木了。然而 漱石却把这些裸露着上身劳动的人，与在中国古典小说和历史中读到的英雄豪杰联系了起来。他确实是慧眼独具，不肯只看外在的表象。

中国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人，即那些普通的人。他们有着为那些极端无知者无法理解的智慧，。其脸上不常见痛苦或怨恨的表情 其实也不是故作冷静。虽然显得有些神秘莫测 但是你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武田泰淳在中国接触过这样的人，因此他有了解读司马迁《史记》的钥匙。他到北京去 并没有与高级学者们交谈 而是全力以赴想以自己手里的钥匙 去打开“中国”这把锁。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在上述文章里 武田泰淳曾使用过“支那”这个词。在中国文学研究会和《中国文学月报》之类反对歧视态度的学会和杂志里 竟然出现这样的称呼 似乎有些非同寻常。

毫无疑问 在日本与中国 尤其是日本对中国的关系 以及在两国的实际交往中，“支那”这个称呼 确实曾带有贬意。有很多中国人 都在去中国大陆的日本人嘴里 听到过这个词。在日本留学的中国人里，有如此经验的，也不算少。在这个词的背后 实际上隐含着对中国的侵略意识。郭沫若在文章中 就曾具体描述过 日本人使用这个词 特别是说“支那人”时的表情。当中国人逐渐觉察出 由于落后于现代化和军阀混战等原因 国势颓败 面对着无法逃避的消极现实 若再听到如此蔑视的称呼 时 自然会感到不愉快。

然而 武田泰淳在这里委婉使用这个词 却有联系遥远的古代 以审视中国的意味。当这样使用时“支那”确实比“中国”一词更使人觉得亲切。因为一说起“中国”会让人联想起国、国家和政府之类的概念，它们有可能束缚人们对中国的丰富印象。

正如武田泰淳和夏目漱石所说，中国人的表情确实深沉。按武田泰淳的认识，若不追溯中国文明的源流，便无法理解他们。这也许是曾经充满着复杂人际关系的历史的结果，或者竟是其历史的标志。请想一想，随意说笑本是我们的日常习惯。它们也许来自于我们独特的历史与环境。而那种从表情上难以区分出喜怒哀乐 只暗淡地盯着地面的人 确实是值得人们注意的。而且不可否认，世上也确实有那样的人。

在如今 中国的风土 则是对日本人的另一大吸引力。

近来，我曾到中国的南方去旅行。由于是有人陪同的观光旅行，又不必与要人会见和参加座谈会，可以尽情地观赏风景，所以 觉得非常愉快。

在旅行中，我盼望着也许能够看到如武田泰淳在《芦洲风景》一文中所描写的那种水边风光。可是在实际旅行中 并不太可能偶然遇上作品里所描写的那个样子。回国以后，再拜读武田先生的文章（行前并没有特意地读它）也没有从作品里找到，曾在旅行中留下的那种如画的印象。

所谓芦州 就是现在的合肥。不过我那次旅行 并不包括合肥在内。如果当真去了合肥 也有可能在那里意外发现 自己心目中那美如画似的风光。可我那次是去南京、扬州、镇江和苏州这些江南之地踏青的。合肥与扬州，其实都位于扬子江的北岸 而整个江南地区 毕竟是太美了。因此不妨说 我在那里 已经看到了自己心目中像图画一样的景色。

然而 当我回国后重新阅读《芦洲风景》一文时 自己心中竟

意外涌现出了如同想象中的朦胧景象。我印证着文中的描写，仿佛又回到了旅行的现实中，恰如就是那光、那影、那风，甚至是那温度。它们从桌子上铺列的铅字里，活生生地浮现出种种的风光，如城墙、池塘、院中石景、草地、木椅、白色墙壁，以及用扁担挑着地里的作物到城镇去的农民……。它们都微妙地感动着我的心。我对此感到很是惊奇。同时也觉得，所谓整个作品，整个作品气氛，像一幅画。尽管这并非是说，必须把像照片一样的风景，硬去镶嵌在作品的某一个地方。

武田泰淳作为士兵参军，当然不能有捧着速写册精心写生，那样从容的心境。我实地看到的风景，在水边必有杨柳。其上那带有嫩叶的柔软芽条，就像女人想洗长发似地，伸探到了水中。而在武田泰淳作品里的芦州，并没有杨柳。其中的“杨”字，只不过是一个在日本军队医院工作的中国女子的姓。武田泰淳在那文章里，只写过洋槐树。

芦州大约是没有杨柳的。我去旅行，是在春天，而武田泰淳的合肥则是秋天。不过，从充满在作品里的伤感可以明显看出，中国的风土，确实打动了武田泰淳。

竹添进一郎，井井再版的《栈云峡雨日记》，肯定曾引发过日本读者对中国风土的憧憬。因为其中的游记，本是为了满足人们对那种风光的憧憬而写的。作者去那里旅行，是在1876（明治9）年3年以后出版了那本书。自此以后，关于中国游记的作品，便绵绵不断。如此的风土，同样也吸引了武田泰淳，自然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如前所说，武田泰淳是作为一个士兵（即一个侵略者）到中国去的。因此，他有着“自然之美与人事之丑”的不均衡或是矛盾，即只能把风光作为风光来看待的尴尬心理。实际上，那并不奇怪。

我去年(1979)1月冬天游西湖的时候,也曾经被那美景所陶醉。可回国后稍微冷静下来,当回想到在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人也曾穿着土黄色的军服,从船上远眺湖畔,仿佛就像是我们所乘的那种游览船。于是,就再也不想再去游第二次了。也许是因为今年,我已去过了南京,今后,恐怕我依然会面对这样的矛盾。而要无所谓地思考或是行动,那恐怕就不得不使自己麻木起来。而武田泰淳,虽然也写了“自然之与人事之丑”之类的话,但他仍旧在短篇小说《美丽的西湖边》里,交叉写出了西湖与穴道湖〔1〕之美(在作品中)。

对武田泰淳来说,来自于中国现实的心理创伤,还不止于此。因为后来他还在上海生活过,有过与中国的实际交往。如果当初他不在军队,后来,作为旅行者回了国的话,那在中国所受的心理创伤,有些也许可以痊愈,记忆也会渐渐淡薄一些。另外,后来他在那里生活,其经历相当曲折复杂。这两次在中国的体验,促使他写出了一些短篇小说。其中《上海之萤》(还有同样书名的作品集)便是这些经验的结晶。

当然,也不应该忽视,武田泰淳在战后写作的那些以当时的历史背景为题材的作品。其战后的作品里所反映的中国,与战后的日本相对照,更带有想象的色彩。这可以长篇小说《风媒花》和短篇小说《审判》为例。

在谈及前一部作品的文章中,武田泰淳这样写道:

中国问题,20年来始终萦绕在我脑海里。这一问题,起初源于我对中国自然与艺术的朦胧向往。在中日战争开始以后,它却与恶梦缠绕一体,难以摆脱。日本学者或政治

〔1〕 穴道湖 位于日本岛根县 风光优美。——译注

家面对着这一问题，都觉得非常苦恼。作为一名曾参加过大陆的战争，且思虑浮浅的我，同样也不能不感觉到，这个问题并非是外在的、暂时的现象，而是与自己的内在精神密切相关，并且根深蒂固的。

这样的责任感，不断推动着武田泰淳的行动和作品。前面所说他多次访问中国，也与此有些关系。

然而，自某个时期以来，他却没能再去中国。

“江青在中国 不再去了。”

他曾嘟囔着这样说过。记不得那是不是在 1973 年 即我们为了印改订版而一起修改合著的《毛泽东 其诗与人生》一书 同时也是向移居京都的我表示问候的时候，总之，江青还活着的。记得当时是我先问了一个问题，他没有回答，却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话。其实，我并没就这件事来向他提问。

说到中国，那自然包括在日本的中国政治问题（即战后日中关系、日中恢复邦交问题）里。不过对日本人来说，中国并不意味着只是中国的政治。除此而外，日本人对中国的印象，显然还来自那里的人情与风土。

而在我看来，所谓中国，并非只是指地图上画出来的那么一块地方。以我的观念（所谓“有中国人的地方才有中国”）衡量，像武田泰淳那样，穿着军服踏上了那片土地，其实也就是其体验中国的开始。

像武田泰淳的短篇小说《谢冰莹事件》里所描写的那样，在中国女作家谢冰莹来日本的那一时期，他曾向她学习过中国语。由于在此前不久，武田泰淳有作为共产党的支持者而被警察逮捕的经历。后来与谢冰莹交往，竟又导致他抓进了拘留所。

我觉得，被警察拘留的事另当别论，也不必评说谢冰莹其人

的性格或水平。此一时期的武田泰淳 只不过想通过谢冰莹 来了解一般的中国女性。或者说，他并非是想接触一位中国女性的特别个性，而是意在理解中国女性的概貌，也就是认识中国。

在那个短篇中 他没有写自己通过个性去了解概貌 而只是写了主人公的个性与侧面。但读完作品，那个人所代表的中国女性的概貌，确实浮现在了人们面前。

先前我曾经怀疑过，在中国语里，似乎没有与日语中的“女人气”或者“像女人”之类词汇严格对应的词。可是如果注意到这个短篇里中国女性概貌的各个侧面 就会使人感到 中国真有的 竟是不像女人的女人 或是没有女人味的女人（如此论断 并非是针对谢冰莹而言。）

我不是想对这种女性类型加以褒贬 而是想思考 作为一个普通日本词汇，其所具有的特殊性。我觉得，借助于这个词汇（概念）可以看到日本妇女所受的束缚。在谈到日本与中国的某些区别时 当然应该看到中国女性身上温柔的一面。但是“女性”作为一个语词 在日本语上下文里所表达的那种意思 却很难在中国语里找得到。而反过来也意味着，不太可能将这个日语词汇原样不动搬地到中国语里面去。

如果说“女人气”、“像女人”这一类词 仅就有这个词而言，并不考虑其具体的内涵），代表着日本妇女所受到的社会教育，那么，适用于这一个词的日本女性，其实也反映了日本的文化（或文明），而与之相对比 无法使用这个词来加以修饰的中国女性 则是中国文化、中国文明的产物。

了解到了这一点 当然还不能说 已经从总体上把握了一种文化和文明。不过，《上海之萤》里的中国业余艺术家或是知识妇女 可以看作是与《谢冰莹事件》里的女性脉相承的。

当武田泰淳建立起这种不像女人或没有女人味的女性观念

时，应该说他对中国的那些把握，便开始贴切了起来。他将这些与日本加以比较，曾这样说道：

与之相比 中国对于灭亡 似乎已经有过全部深刻的体验。不妨说，中国就像是一个经受过多次离婚和多次奸淫而发育成熟了复杂情欲的女性肉体。中华民族看似柔弱的反抗，其根源概出自如此成熟的女人身体里，那种胜于男子的自信。

难道我们不可以把这些话，视为中国的本质吗？日本自然并非与中国完全无关 也必须与之打交道。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显然可以借助武田泰淳的这一比喻 来进行思考 究竟应该怎么样与中国打交道？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自问而且自答。而所谓的回答 只能靠我们自己 或我们的后代。若进一步思考 上面这个比喻 应该说 正是由于回答只能靠自己 我们目前对中国的理解 就必须力求再深入一些。

然而 这实在并非是易事.....

比如，比我们早一代人的那些经验，对我们的下一代来说，到底还能有多少意义？我们对此，显然没有太大的把握。

至于说到中国的意义 对我们而言 当然也未必意味着 就一定是积极和正面的。而如果说到消极方面的意义，那对比我们稍后一辈的人来说，武田泰淳的经历（以及我对它们的理解）也许就是夏天柏油路上的蒸气一样 会转瞬即逝的。

然而 即使是蒸气 也不见得就一点味道也没有 人们同样应该加以关注。因为它对那些经历有限的后辈人来说，毕竟还是值得借鉴的。

不过我想 武田泰淳所讲述的事情 也决不会是转瞬即逝的

蒸气，它们有着真正的实质性内容。当然，即使真有实质性的内涵，有时也会被搞得索然无味。例如，在如今的日本，有人面对中国这样的真实存在，觉得并不值得重视。要是当真有人持这样一种态度，那我们实在无可奈何，因为我们生活的地方，毕竟还是日本。

但我相信，不管如此追究这种意义能否行得通，总还是会有人来思考这个问题的。

越读武田泰淳的作品就越会使人感觉到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完全无意义的(事情)，这同样也是我个人的想法。那么武田泰淳的这些想法，是否都真与中国有关系呢？我觉得，大约是因为武田泰淳曾经是生活于寺庙中的和尚〔1〕从小接近自然的缘故这种信念支撑着他而使他后来的目光转向了中国。

可惜的是，与武田泰淳的这种关心不同，一般的日本人认为，中国并无什么意义。甚至觉得中国现代文学之类，也不值得去研究。

而我正相反，恰恰是把武田泰淳的这种信念，作为支撑自己的精神力量。当然自己也知道，坚持这一观念，有时对人来说，也许意味着有些严酷，甚至是残酷。

[附记]这里论述的部分内容或引用的部分文章见拙著《日本人心目里的中国形象》(春秋社,1966年)一书中的某些论文。

程麻译自《日本文学解释与教材研究》，
第25卷6号，1980年6月20日

〔1〕武田泰淳自1931年2月，在日本净土宗寺庙增上寺改俗姓大岛觉为现名，曾为僧侣。后在1946至1952年间，又任西光寺兼潮江院住职。——译注

在莫斯科思考北京

情投意合

说到我为什么去莫斯科 回想起此事来 连自己也觉得有点奇妙。到了莫斯科机场才开始知道，还有另外几位研究者与我一样，也都是受日本学术振兴会的资助来这里的。更令人惊喜的是 以前在东京 曾与我参加过同一个研究小组的 K 君 竟也在其中。我已记不得他了，但 K 君却似乎还认得我。据说，他觉得我很像是一个研究中国的学者。

我这次到莫斯科，是直接受去京都访问过的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普里马科夫的邀请。而在此以前，自己虽然也曾在东京和京都会见过该研究所中国部长杰柳辛、文学部远东室长艾德林 以及情报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丘扎加诸位 可还不具备来这里做研究的资格。并且 在苏联和中国的关系冷淡之时 去自己所研究的国度的对手苏联访问，也会被人们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即便不至于这样 谁都会尽量免受不必要的误解 或是躲避那种有可能蒙冤的事情。

然而 毕竟苏联与中国的因缘不浅。况且我觉得 也有必要

实地补充个人知识之不足，借以提高自己，于是便决定应聘了。另外也是因为自己对俄罗斯民族那近于憧憬的热心远超过对苏联的关注。因此当在飞机座位上坐下来便开始读起放在长书架上的米川正夫的日译本《安娜·卡列尼娜》。虽然觉得有点装腔作势，其中多少还掺杂着在去中国旅行时所没有过的“不安”心情。不过想起经过 10 个小时的飞行，便将到达一个未知的国度，又不能不使人觉得有些好奇，尽管也伴随着一些忐忑。

可是等到目的地后才知道这种种不安实在没有必要。因为我在莫斯科或列宁格勒见到的研究中国的人，虽然除前面说的几位以外都属于初次相会但都能像老朋友那样交谈。我在那里只说中国话有的时候竟精神恍惚弄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在苏联还是在日本或是中国。大家在天棚上画有彩图像曾是贵族公馆的房间里如在梦中似地谈着话两三个钟头不知不觉便过去了。那种交谈好象是毫无目的，如情投意合的亲友在一起似的。当然我也觉得，在苏联的那两个月里并非是一片空白，丝毫印象都没有留下。

理论洁癖与国家政策

在莫斯科我首先感受到的 是中苏对立的严峻程度。

到莫斯科之后不久我想起来要吃炒饭或炒面便去了马雅可夫斯基广场上的北京饭店。但那里并没有这些东西，除榨菜是真货以外其他都不能说是中国饭菜。不过也不应该忘了给莫斯科的北京饭店美言一句。几天以后，当我和远东研究所各位先生去那里一起吃饭时，觉得那饭菜的味道好起来了。另外，为欢送我回国该研究所各位在那儿再次设宴时的饭菜那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美味。

不过，最初的感受却并不怎么好。在这座在中苏友好时建立的饭店的餐厅里，连一位中国厨师都没有。即使是像做炒饭或炒面的原料之类，也不能从中国进口。从这件事上不难明白，两个国家之间的对立 特别是在社会主义范围内 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还听到过 指责毛泽东思想是“兵营共产主义”。说这话的研究者 其姓简称为 F。F 的风貌，与我在京都某研究会上见到的某位俄国先生 很是相像。在来莫斯科前不久 我刚刚聆听过那位先生高雅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次 又听到 F 先生更加情绪激昂的言论，倒觉得与那位先生有些重复了。这引得我思索 还有一位冷静的某先生 为什么同样是那样出人意外地憎恶毛泽东。

F 先生的雄辩发言 越来越激动。他说 毛名为革命家 但革命家有各种各样。毛不懂列宁主义 他的社会理想 并非是社会主义 而是军国主义、霸权主义和资本主义。也可以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 但那要以苏联为首 并要有其他社会主义的援助。大国主义、大汉族主义 那才是毛思想的本质。无论是思想还是运动 现在中国共产党内对立的两派 都是毛主义者。中国的指向 并非是马克思主义。邓小平、赵紫阳和胡耀邦 都没有搞好理论工作……

在 F 先生报告中仅有的空隙里 我插话说 不能用教条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 去套中国的农村。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确实是革命。我们回顾当时在分配土地中划分阶级的标准，那并非不符合中国的现实。

于是，F 先生回答说，马克思主义在基本原理之外，也有个别的具体理论。但重要的是具体理论不能违反基本原理。如果违反了 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中国在土地革命时期 并没有

实行马克思主义。1950年《土地改革法》的成功和实际情况则另当别论。

我进一步说，自己也并非没有发现中国是立足于民族主义的立场，但与其说那是“军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不如讲更是“收复失地的民族主义”。而 F 先生对此却回答道，两者都差不多。

F 先生实在是非常彻底。当再质问按照共产党的观念，即使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也能入党，那么苏联和中国还能否成为朋友时，他则摇了摇头。

按我的理解，F 先生的意思是，由于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对某国表示亲近，所以苏联就得站在全面否定中国行动的立场上。

看样子原来觉着很亲切的，可一议论起来却得全力批驳。于是我和 F 先生仅谈了一小时，便觉得相当疲劳。自己曾决心在莫斯科要离酒远一些，或者只喝点葡萄酒，但不知不觉也饮上了沃得加，便是在这以后的事情。

不怎么喜好纯粹理论的我，觉得 F 先生的议论固然有益，可要真正坚持那种主张的话，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将会如何呢？我希望 F 先生那纯粹理论的阴影，最好不要影响到其国家的政策。

虽然如此，其实 F 先生的中国话是很流畅的。据说他在 50 年代曾在北京大学留过学，所翻译的某位中国作家的作品，也出过单行本，而现在已经绝版了。因为那位被他翻译的作家的作品自己也很喜欢，我便说：若还有那本书的话，请什么时候送我一册。只见他在胡须下，洋溢出了温和的微笑。

原来，这个人也是挺喜欢中国的。我恍然大悟，忙告诉 F，那位被他翻译作品的作家现在在美国。他讲演说，自己是受了美

国文学的影响开始创作的，而以前却说是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可见作为文艺界的领导人，有时候也是言不由衷。而他像要打断我的话似地说：不对，辩护那是一个正直的作家。

展望中苏关系

并非限于 F 先生 苏联研究者的汉语大都不错。他们现在 50 多岁，在留学时不过 20 岁上下。他们至今仍想念着自己的中国指导教师。有的研究者还对我说，他的导师曾在海外某地，向别人问起过自己的情况。而现在已很有名的学者艾德林，与中国的交际更相当广泛。费德林的《新中国的艺术家》（木村浩译 朝日新闻社）一书 影响曾很大。

我在莫斯科，恰逢中苏关系又进入了新一轮“蜜月期”。我原来觉得 由于有‘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这样的观念 他们彼此间的默契，远远超过了目前日本与中国的关系。而现在看来，以前自己这样的理解仍嫌浮浅。尽管不可否认，在日本也有人像苏联研究者那样，与中国交往非常深厚。

不过 给我的感觉是 所谓‘中苏关系’现在却并非如此。对苏联的研究者来说，那样一种亲密的关系，已是属于过去的事了。

在过去一年中，我不难举出一些从中国到京都来的客人，尽管与他们交往的程度，也不过是与他们在座谈会交谈上两、三个小时而已。但即使是如此，我仍然可以感受到，那种彼此深切依恋的情感。

也正是因为如此，自己便不免发出疑问，即至今仍只把日本与中国的关系视为交战国，而且一直无所作为，这种情况究竟是否还能继续下去？除了质疑之外，我对此似乎还有理由感到义

愤。

而在实际上，中苏关系的恢复，已经不会为期太远了。

在曾有机会表达这一见解时，我谈到过下面这些依据：

(1)1979年9月在哈尔滨举行了现代苏联文学讨论会。会上得出了固且不谈苏联的外交政策 就其国内政治看来 还是社会主义的结论。

(2)去年6月，《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6篇社论 主张要“量力而行”。认为所谓自己的“力”应该包括以前借助苏联的帮助而具备的设备、技术和人材等。

(3)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组建了苏联研究所。而该院还没有日本研究所和美国研究所。^{〔1〕}这决非是外交措施 而是从中国国内看，认为已经可以开始冷静分析与研究苏联了。尽管这不过是我个人的推测。

当然 以上这些也并非意味着 苏联和中国的关系 能够恢复到50年代那样的状况。

我做这样的推测，是因为大多数苏联学者也都持有这种看法。对此 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以上我谈的看法，其实也与展望日中关系有些联系。比如我曾指出，中国方面将签定中日友好条约的期限定为10年 而到这10年刚刚过半的1983年 中国便提出 应以此条约会带来有利与不利之处为前提，来检讨与日本的关系。这与当时中国的现代化政策虽然开始显露效果 可由于人口问题等原因 见效并未很快的情况有些关系。而作为与中国有关的日本方面，同样也难以摆脱与这种不成功局面有干系的风险。像他们对位于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来又组建了日本研究所和苏联东欧研究所。——译

上海郊外的宝山钢铁公司的严厉态度〔1〕即是一例。

实际上，日中之间的外交关系也是有可能转化的。这是因为：

像当初为反对苏联而接近美国和日本一样，现在中国又在为反对美国和日本而与苏联接近。所谓外交对手本就是像时钟一样不断变化的。

我在这里提到苏联，苏联学者肯定会对这些话感到不太高兴。其实中国现在已疏远了华国锋提出的现代化政策，改为调整、调整再调整的政策。这也可视为是由“苏联型”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经济转变为“台湾型”的轻工业优先。而在这时还出现了质疑和反对的言论，怀疑“台湾型”是否就真能够成功。

也确实有预见到中苏关系将会恢复的学者，进一步肯定了这种看法。我称其为 G 先生。在 G 看来，中国反对苏联的战略目标并没有改变，但在战术上确实有所变化。曾经有参加与中国进行确认国境谈判的经验的 G 对这一问题的见解既明快又具体，给我以很爽朗的印象。

若真是这样，那前面介绍的 F 先生的看法，还可能成立么？与 F 在同一研究所而属于不同科室的 K 的意见，便与之相反。K 这样认为，苏联政府内部确实有“硬”的态度，而自己则不太同意那种态度，即使是经过外交部朋友的忠告，也难以接受。可见，在马背上出生的前一辈人，有反对中国的成见，那当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但中国也是社会主义，他们对中国这里错那里对的批判，本是相当复杂的。

另外，也有人这样告诉我，与中国不和只是暂时的，期待着

〔1〕 当时中国曾有人，批评在与日本合作建设宝山钢铁公司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译注

双方友好关系的恢复。

我觉得自己的看法，大体上与以上苏联的结论相同。这是一个基本的立场。既是基本立场，当然期待着更具体的进展，而不希望看见相反的情况。不过，在一天傍晚，一位兼作新闻记者的研究人员，与我在研究所门外分手时，说要去参加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招待会。当时他高高兴兴去了，可第二天，他又抑制不住愤懑地向我述说了，那晚上中国大使馆接待的作风。据说中国方面的新华社记者也来了，并轮番与他交锋。几个人都以同样的资料，来非难苏联方面的态度。他说，因为是集中围攻，自己愤怒地喊道：你们的态度是不友好的。

这里所说的同样资料，好像是米高扬不久前谈到和公布的那些东西。主要意思是，与中国隔绝关系的政策，并没有变。中国的记者们，A、B、C地就同一件事轮番围攻的样子，想起来确是有些奇怪。但我想，那也许是试探一下苏联方面的反应。不过，当时在场的那位记者兼研究人员，确实像是生气了。他又向我透露，最近从北京来了一个经济代表团，苏联当局的接待很冷淡。可毕竟是被批准入境的客人，并没有怎么为难他们。在我的印象里，他还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那晚在中国大使馆遇见的情况，对他来说，确实感到很是意外。

人与人的心，是难以沟通的。^{〔1〕}

鲁迅的这句话，对现在的中苏关系来说，大概仍旧适用。而那些虽然共鸣于拙著《友好容易理解难》^{〔2〕}，却对书名感到意外的研究中国的人，如果思考得能够再深入一些，我相信彼此会成

〔1〕 鲁迅《而已集·小杂感》。——译注

〔2〕 竹内实著《友好容易理解难——对 80 年中国的透视》共时出版会，1980 年 7 月。——译注

为真正共鸣者的。

如何看权力斗争？

在 10 月中旬的一次恳谈会上 曾有人质疑 怎样看待华国锋与邓小平的关系。自月初到了莫斯科后，中国报纸一点也看不到。而日本报纸也是直到回国前一周，才从日本航空公司要来读的 其他时候 不过是偶而只看见一两回 因此我手边的资料很缺乏。不过 沉静地思考一下 也可以做一点预测。

就中国共产党第 12 次代表大会延期举行这一点来看 邓小平和华国锋之间的矛盾 似乎还没有解决。通过新党章 对华国锋的党中央主席权力进行制约，邓小平觉得没有大意思。按中央主席任期 5 年、可以连任两届来推算 那么华国锋离任将是在 1986 年 距今还有 6 年。而 10 年以后 即使是胡耀邦担任主席，那时华国锋的年龄与现在的邓小平相仿，还可以参与政治活动。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并非是没有这种可能性。而对邓小平和胡耀邦来说 这显然是一种阻力。

去年 6 月开始的纠正大寨和石油部门纠正大庆，与其说是针对毛泽东 毋宁更是针对华国锋的。这两次批判 对华国锋有很大的压力。但是，他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除年龄优势外，这是他的另一个政治资本。我还看不准，他会怎样从主席的位子上下来。

此外 华国锋没有亲近的下属 缺乏人际关系。这使他能够灵活地摆脱对自己的批判。不过，他也没有参谋集团。就此而言，还是邓小平有优势。而且，不能只看邓小平与华国锋的关系，也应注意胡耀邦和华国锋之间的矛盾。

前面提到的那位 G 先生 嘴上说是向我质疑 其实他也认

为，北京的权力矛盾，还将继续下去。当我说出了上述看法之后，他补充道，也有可能不再设主席，而改为由多人共任主席，轮番负责，这样一种南斯拉夫型的方法。并说，最近在北京，有要人谈到了南斯拉夫。他猜想，那似乎是在寻找话题。

我觉得，这样理解也未尝没有道理。因为在苏联看来，要鉴别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形态，并不难。中国正在议论党政分工，在日本有人称之为“捷克型”政体。对何谓“捷克型”，自己还不太明白。但我怀疑，在中国，党政是否能够真正分得开。

至于说到权力斗争，我还认为，中国的权力形态，与日本毕竟有区别。在日本，权力如同一根站立的旗竿，抓着旗竿的便是有权者。而在中国，权力则像大运动场上散乱的许多足球，谁抓住一个，谁就有一份权力，抓住两个的有两份权力。何况中国的土地那么广阔，权力斗争又屡屡与政治运动相联系。若没有政治运动，政党、政府和各种机关便无法更替。为使人的更替规范化，也要形成政治运动。G先生对我的这一看法表示赞同。而另一位G先生的关心，却是觉得这样的权力斗争不怎么好，而应该采取比较文明的方式进行。

对中国的现状喜欢与非难，那另当别论，与我交谈的各位，都想尽力进行冷静的分析。即使有人表示出好恶，在那态度的深处，也无不出自于对中国的热切关心。

在一次由画家举办的晚餐席上，有一位研究中国的专家D先生开玩笑说，中苏争论就像是夫妻吵架，与其赞成其中一方的意见，还不如站在远处看热闹，等待男女双方吵完静下来。当他把这意思用俄语告诉主人时，那画家说，要是把这话转告给勃列日涅夫，他一定会高兴的，并带头为勃列日涅夫干杯。

在莫斯科读“个性解放理论”

正如我所料 关于苏联和中国的关系 莫斯科图书馆里确实有一些在日本看不到的资料(中文资料)其中有 10 多本 1925 年前后国民革命军印的小册子,以及一些 1945 年前后在重庆、上海出版的杂志。

特别是后者 我惊奇地发现了胡风编辑、发行的《希望》杂志。原来所称的第几卷第几期,实际上应为第几集第几期。其中的第 2 集共有(?)的 3 册 从签名和藏书印可知 为费德林⁽¹⁾先生旧藏。可惜欠缺第 1 集第 1 期,即创刊号。记得在那创刊号上 应刊有舒芜的《论主观》一文 我在十几年前已经读过了。找到了《希望》杂志而竟没有创刊号 这使我有一种渔夫来到水边 鱼却溜掉了的感觉。

我所以关注胡风办的这本杂志 是因为中国的诗人、评论家胡风曾经被批判过 至今也没有恢复名誉。

对胡风的批判 是 1955 年的事。自此以后,由于认定那种个人的文学理论 对社会主义有害 不但对之批判 还给它戴上了“反党”“反革命”的标签 其证据则是被公开的胡风与文学同事之间的书信。当时,我也曾相信胡风有罪。可在细心分析过那些私人信件之后 我又确认 依照中国所说的那些情况 胡风大体是“无罪”的。在这方面 我已经写过文章《胡风与路翎》,《群象》,1966 年 1 月号 后收入《中国同时代的知识人》一书 合同出版,1967 年。《现代中国的文学进程与逻辑》,研究社 1972 年。《中国文学的波与声》,《亚洲季刊》,1980 年 6 月号 亚细亚

(1) 费德林,是俄罗斯著名的中国学家。——译注

调查会)

批判胡风并非只是在文艺界谈论文艺问题 其实是从政治界借用了政治标签,大多数作家与艺术家都参与了批判。到 11 年后的文化大革命,这些人则又丧失了自己赖以立足的逻辑支点。

在我写这篇文章时 据来自北京的报道说 北京正在讨论名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文件。其中认为,1957 年的“反右派”斗争以及更早对胡风进行的批判,其责任在毛泽东。(《朝日新闻》,1980 年 12 月 21 日)

由于尚未看到真实文件,不太好讲。但胡风的冤案得以昭雪 总是好事。不过我想 也不该忘记了前面所说的多数作家和艺术家都参加了批判这一事实。

当我在莫斯科整理《希望》杂志的时候 还没有胡风可以恢复名誉的迹象。随手整理胡风资料的我,慢慢系统地读着那些东西 开始思考胡风的文艺理论。而在全文读过“胡风集团”的主要人物舒芜的《论主观》以前 对他们的看法并没有把握。北京出版的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集等 收录的只是选节 并非全文。

虽然没有创刊号 但在第 2 期上刊登着同一作者的另一长篇评论《论中庸》。原想读《论主观》的我 通过文章标题以及归拢零星的印象 无意中觉察到 作者基本是以中国传统观念 来从事现代文艺批评的。于是 我请管理员把书“插进书架”以便再到图书馆去时 能够从管理员身后的书架上抽下杂志 在自己的阅览桌前连续阅读。

有一天 我想自己也许未必会再到这里来 无论如何也应该读完在莫斯科发现的东西 就边做记录 边读了起来。

此文的立论大体是这样 中庸主义的特点是“折中”。这种

观念并不反对“革命”但反对革命的“过分”。这一“过分论”是中庸主义者维护古老的东西，压制新生事物的武器。它难以创造新事物，由于担心失败而宁愿维护既成的东西，因为那样不会出现意外。人们对古老的事物持中性的态度，而认为创造新事物并非完全无误。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人们缺少强大的主观能动性……。

舒芜在如上论述之后 将 20 年代后半期开始流行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 称为“新社会科学”和“新哲学”认为信奉它们的人欠缺主观能动性，批判他们陷入了中庸主义。

舒芜说，新哲学中的中庸主义缺陷，可从他们对新哲学的根本法则 即“矛盾统一”的理解上看出来。中庸主义以这种观念，压抑那些对具体现实表现出的激进态度。并认为，大后方的知识分子，应该在政治立场和生活态度上，将矛盾统一。这其实，无异于医生根据书本来给病人开药方。

作者还认为，矛盾的侧面，不管哪一方面，都应该统一。为了制约事物的矛盾，自己也必须参与矛盾，成为矛盾的一个方面。但不能因为突出某一方面或环节，就只强调这一个方面。

……

在此基础上，作者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质量与数量转换”、“否定之否定”等规律进行批评 非难其信仰者在一定意义上是动辄口称“体系”或“社会基础”的说教人 强烈地主张 必须解放人的个性。

文章说 当今最重要的是彻底个性解放 通过集体而表现出来的、战斗的个性解放。“破坏”和“建设”并没有区别。“破坏”也是积极的，“个性解放”便是道德。真正的个性解放，一定也可以实现社会变革。因此 固有的社会是束缚“个性”的枷锁，若不加以变革 便不能保持“个性”并发展“个性”。应该通过个

性解放 扫荡封建生活中的所有规范。在那里 有涌动的生命之流。这种生命的流动，终归要会合到一定的方向。而在这一过程中 依靠新的领导 它们将汇合成宽广的河流 引导着它们顺利前进。如果开始的流动 不能很快纳入正轨 说不定也会泛滥成灾。

不过 如果对这种流动加以压抑 不疏通被压抑的泥沙或土石，并在其两旁筑起堤坝，如同以往那些必要的程序来修理河道 这种流动也将被窒息。……

将要回国的我 已经意识到时间有限 但还是把共约 34 页的论文 做了摘录。

中国革命的源流

当时的重庆，称得上是抗日战争中的中国首都。生活在那里的人们 在通货膨胀和反动统治之下 非常痛苦。如果信仰马克思主义或是跑到延安去，也许会与痛苦远离一些。而不那样做 自己就会被思想和生活所束缚 陷入痛苦的境地 至死都不过是在幻想。这种幻想，很容易被贴上小资产阶级的标签。可是认真地品味一下 就会觉得那种轻易被贴上去的标签 不过只是空洞的教条而已。我完全能够理解，当时在重庆出版以及想买发表这样论文的杂志的读者们。

在战后 我曾经读过在延安出版的“人民文艺丛书”深为以前自己不了解的中国内情所感动。不过，如果自己也能同时读到这些杂志，那么我在解放后阅读当时的革命文艺作品的感受，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

令人深思的是 胡风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为什么竟遭到那样的憎恶？

其实 写这样的论文 或是刊登如此论文的杂志 也许不至于被认为是“特务”什么的。当时的投稿者和读者 在拿到在重庆印刷的、洋溢墨香的杂志时 其印象无论如何也不会与反对共产党或反革命这类罪名 联系在一起。

另外，要是人们能够稍微把胡风写的那些具有艺术与个性色彩的小说或论文，与这些杂志加以对照，也不至于真会相信，胡风是有罪的。

中国学图书馆，位于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第 12 层楼。在那里读着舒芜的论文 我看见窗外的太阳 在飘着雪花的黄昏中 慢慢下落。我想到 在天空的那一边 就是北京。

我情不自禁地联想起舒芜在生活中的样子。引发我对他做这种联想，是因为他在写如此意气风发的论文时，不过只是 30 岁上下。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始批判胡风文艺理论（从文艺理论着手 耐 很快表示与胡风划清了界限。

不仅如此 他还把胡风给自己的 30 封私人书信 拿了出来（但不知道是送给了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接着 又把胡风给其他文学朋友的书信 第二次公布在《人民日报》上。众所周知 这第二次公布书信时的匿名序言与评语 是毛泽东所写。公开这些私人书信，标志着批判胡风进入了决定性的阶段。

舒芜以上这些作法，也许算不上是对朋友的背叛。

我读了这篇《论中庸》 能够想象得出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作者所形成的那种心理负担。没有退路的舒芜，大约只能从这篇论文 以及《论主观》下手 对自己进行反批判。

自己也能够理解他与胡风分手，甚至公开胡风给个人的私人书信时的那种惶恐心绪。只是不知道是谁与舒芜接触，并安排他进行这种自己批判和揭发的。

从莫斯科回来，一进个人研究室，我看到桌子上放着报道

《胡风在哪里》的剪报。据说这是我不在时自己所负责的共同研究班对此有兴趣，便复印和散发了这则剪报。传说香港左派报纸《新晚报》1980年1月3日报道胡风眼下正住在北京某家病院精神科，朋友来看时能够分辨对方的脸，但讲话不得要领，并讨厌地烧掉了关于给他恢复名誉的通知，还说他很快就会被解放，等等。报道还附有他与萧军和聂绀弩的合影，看起来，萧军等人的表情很明朗，胡风也显得挺平静，似乎是不久前才拍照的。

毕竟从莫斯科到北京的路是遥远的。至今我还记得中文图书馆窗外，那白晃晃狂舞而落的雪花。自己到莫斯科来读在重庆出版的杂志（本没有这个目的）这种行为，与当初在重庆热衷于文学的那群青年人相比，也并不显得有多么愚蠢。回想一下读后的感受，觉得事实上花费的气力，还是很值得。

舒芜的这篇论文，至今尚未丧失其生命力。要是把它在当今北京的“民主墙”上贴出来，恐怕青年们是会竞相传抄的。不过这是不可能的。我之所以做这样的猜测，是觉得中国革命的源流，其实并非仅来自于延安，今后或许也应该到重庆去寻觅。

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

以上轮番谈到了胡风、舒芜、莫斯科、北京和延安，以及苏联研究中国的学者们。现在我还想就那些目前不在眼前的人，再少讲几句。

以《希望》这一杂志为中心的人们，以其后半生或生命的代价，所换得的教训是什么呢？其中之一应该是，执政的社会主义政党，如果有所谓的文艺政策，其政策还是不干涉文艺为好。

现在的中国，表示要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但是，不管怎样

改善，领导终归还是领导，文艺仍然也是御用文学、御用艺术。如果一个政党相信，它信奉的思想即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那它也应该相信，其思想一定会被人们信服。因此，也就没有必要，亲自组织文学团体和艺术团体，或是要求他们登记并参与学习。

以我有限和短期的见闻来看，在苏联的有心人，也讨厌由组织或政治体制来强行对文学艺术做出评价，强迫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在我的印象中，人们希望这类事，最好能与政治体制脱离，改由健全的社会机制，来加以管理。

至于中国，有时情况会不太一样。我这些片言只语的建议，不过是以自己的设想来试图尽力解决这一问题。总地来看，尽管苏联人也抱怨物质不太丰富，但并没有达到暴动与抢劫东西那样的程度。料想今后随着物质变得丰富一些，人们对文艺政策的反感，也会强烈起来的。

我认为在物质当中，其实也应该包括作为精神营养的文学艺术创作。

胡风所以会获罪和被监禁，原因在于，他曾在那个长篇意见书里，批评将文学约束在单一的组织 and 单一的杂志上，建议可以由具有风格与个性的作家，分别组织同人杂志。

实际上，新中国即使不得不要苏联保障其军事安全，也不必在文艺组织方面效仿苏联。可前几年，那些曾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后来又恢复了名誉的中国文艺界领导人，其实在“文革”以前，就已经热衷于类似于苏联的文学组织方法。现在所恢复的，也只是如同形象思维、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之类的“理论”。目前还没有人质疑，中国文艺界以前那种组织单一、理论单一、杂志单一、运动单一以及更主要的领导单一之类的做法，反而重又弹起了昔日的老调。

这次我在苏联觉察到，那里的知识分子，倒是比较自由的。

所谓自由 在我看来 首先意味着个人的生活 与所从事的专业工作无关。

这些人 首先自认为是知识分子。其中研究中国的人 其实也并非总是与中国拴在一起。

有一个研究所里一位管理文化的朋友，把他们的一本评论新中国文化动态的文集 送给我。并且说 自己这些年来对中国的议论 至今也没有过时。记得以前美国的学者 也曾经向我们提到过这本书。

正是俄罗斯这种知识分子传统，造就了如赫尔岑、谢德林、普希金和契诃夫等不胜枚举的人物。而在中国，也同样有这样的文化先驱。

我在去苏联之前 也曾读过几本关于批判其社会体制 和描写那里生活细节的书。这些著作很有益处。我认为，确实必须从社会传统的角度 去把握苏联。像这样的名著 肯定还有我不知道的。让我感到渐愧的是 虽然自己也希望能够这样做 却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好这件事。

程麻译自《中央公论》第 96 卷 2 号 ,1981 年 2 月 1 日

评石川忠雄教授花甲纪念论文集 ——《现代中国与世界》

当知道本书〔1〕是为纪念和庆祝石川忠雄教授花甲而出版的，自己毫不犹豫应承了为其写评介的委托。

这篇书评委托我来做，也许是由于作为专门中共党史研究圈子以外的人 会显得稍微公正一些 而自己也愿意借此机会向事主略表敬贺之意。这尽管不过是一个人的一点心意，但也与石川忠雄〔2〕教授的学术成果有些关系。

在很久以前，我曾经很急切地想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正是那时 石川先生等所著的《中国共产党史研究》（庆应通讯出版社，1959 - 1961 年 第 2 版）一书 使自己了解了与此有关的种种知识（以下简称其为《研究》）。

我所以有如此迫切的愿望，是因为当时要给毛泽东的诗词写注释。那些诗词 是毛在江西苏维埃时代所写 无疑应该知道

〔1〕 石川忠雄教授花甲纪念论文集《现代中国与世界 其政治进程》庆应通讯出版社，1982年6月出版。——译注

〔2〕 石川忠雄（1922- ）中国研究家。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系毕业。曾任庆应义塾大学校长。——译注

当时的状况。而《研究》里指出 当时有在俄国留过学的中国共产党人 这显然对我会有些帮助。

为了在写诗词注释时补充对历史状况的认识，我曾多次翻阅过汇集亲身参与当时革命斗争的人们的回忆录，即《星火燎原》丛书。自己真希望能与那些老革命者见面 把从他们那里听到的东西写出来 然而却不可能。令人难忘的是 至今我还时常想起当时觉得很重要的那些情况。比如在回忆录中，那些回忆者的叙述时，似乎有不太想介入党内各对立势力的想法。而这本《研究》则帮助我系统了解到比那些片断的回忆更全面的情况。另外，石川先生与小田英郎合译的舒尔茨^{〔1〕}著《中国共产党史》（庆应通讯出版社，1964年），也曾有些参考作用。应该说，自己是曾经受惠于先生的。

说到石川忠雄先生 我还有过一次机会 曾与其共同出席一个座谈会。可惜当时并没有深入交谈（原因在我）这也是应该记录在案 如果夸张点 也可以称之为“宣布”的。

当然 只说这些事 还是不够的。我所以这样讲 是因为在前面谈到的急切想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实情之前，其实也并非没有读过先生的《研究》一书。我早就买了它，并且独自读过了。至于读后的感想，是觉得由于没有能从思想上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 感到不怎么满足。当时曾有过把读后感写出来 在一个朋友办的同人杂志上发表的念头。

当时 在那篇文章里还想提及与《研究》一样属于中国共产党研究的一个单行本 但记不清楚是否就是舒尔茨的那本书 也

〔1〕 舒尔茨（1923—）美国的 中国研究家。1947年毕业于华盛顿大学。美国亚里桑那大学教授。著有《中国的片断》、《民国时期中国人物传记辞典》等。——译注

许是岩村三千夫〔1〕的什么著作。

我还记得，当时提这两本书，其意图并非是要一褒一贬。尽管对先生的《研究》一书有写得比较草率的印象，似乎还没有写出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形象。至于对其中谈到的其他情况，感觉却并非如此。

即使是过了三、四年之后，当自己觉得需要有关的知识时，《研究》一书仍给过我不少的帮助。我读着它，内心经常既惭愧又歉疚。因为即使需要与作者见面（假定还没有出版这本书），自己也未必能前去请教。或者真去请教，也不一定那么虚心。看来书这种东西，还是很有用的。

在这次我所评论的书的前面，有一篇《序言》。其中评价了《研究》一书出类拔萃的价值说它“将中国共产党研究推进到了客观学术性的境界，是我国较早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研究成果”，并认为“至今仍未失去其学术价值”。对如此评价我很赞成。

不过我并不太同意上面引用的《序言》里那种关于“客观的学术性”即把“客观”与“学术性”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提法。因为我早就认为“客观”作为一个概念其实也是在人的主观中形成的。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最好不要把与个人有关的事情标榜为“客观”。归根到底，应该把“客观”界定为与其相对的主观所把握的对象。“客观”是使“主观”得以形成的条件，但毕竟它也是一种被“主观”认识的对象。

不过，作为社会上通用的一般用语，我并不想否定“客观的学术性”这种说法，也不是怀疑对《研究》一书做出较高评价的用

〔1〕 岩村三千夫（1908—1977）中国研究家、日中友好活动家。早稻田大学毕业。1937年任读卖新闻社驻上海特派员。1946年参与创建中国研究所。1949年参与创建日中友好协会。著有《中国现代史》。——译注

意或者是标准。

至今自己还有印象 当在认真拜读《研究》一书时 主要是为自己曾得到“雪中送炭”式的帮助而庆幸。但同时也觉得 如果要求其应该始终着眼于思想方面的分析的话，那它便显得有些不足。换句话说 所谓的“客观性”也许确是它的一种长处。

虽然自己曾希望石川忠雄先生的著作，今后在学术风格上会有一些变化 不过 内心对其的感受 主要还是满怀谢意。在这里 显得好像我有某种偏爱。其实自己也并非不知道 作为一篇书评 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写法 但我还是愿意记述《研究》与自己之间的这些私人（完全是我一个人）关系。自己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为此书写评介的委托 大半也是为此（部分是有意 部分也可能是无意识地这样做了）

基于以上这样的想法来写评介，对那些会看到这篇书评并且曾经参与写作这本论文集的作者们来说，或许有点不恭敬。即使知道他们中的不少人本是石川教授的弟子，这样做也难免有些失敬。关于这一点 我心里很清楚。不过在实际上 自己与那些曾受惠于石川先生的成果 并为本书撰写论文的各位 在心意上又是一样的，即无非都是想向石川教授表示庆祝的意思。

当然 这篇书评的主要对象 还是《现代中国与世界》一书。应该言归正传，赶快谈谈自己的评价了。

首先，说到现代中国，也许有些人日本人觉得不太得要领。其实在以前 现代中国也并非不是人们研究的一个对象 只是大都是从各自不同的侧面入手。像我，主要是从文学的视角加以关注。然而这样做了几年之后，“文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生了。自己发现 仅仅从文学上字眼 是很难理解中国的，于是，我便不得不从总体上来认识现代中国。

这么说并非意味着 只从文学的角度来理解中国 就全无意

义。我曾经在一个座谈会上讲过 在“文革”中那些被视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现象 要是从文学作品的角度看 似乎根本算不上是什么资本主义。因此 以“错误地将阶级斗争扩大化”之类理论用语，来分析那些并非资本主义的东西，实际上是不合适的。

至于本书 尽管其中也有些概念含混的地方 但正如书名所标示的那样 现代中国无疑可以成为研究的一个对象 或者是一个研究领域。对于这一点 我完全赞成。而本书 也确实属于这方面的内容。

不过 当真要来写书评 自己却感到有点困难。首先必须承认的是 这里所汇集的各篇论文 曾给我以不少教益和启示 而且虽然自己很是勉强 也未必连一点接受各位的启发 并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与把握其中所论问题的能力都没有。但也要坦白地说 我对本书里区分的“现代中国”与“地域研究与政治学”这两部分的后者，确实还是个地道的门外汉。以前，由于高松基之〔1〕君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多次热心做过报告，其有条不紊的研究态度及其成果，使我意识到自己对这一领域完全是无知的。而本书收录的后来各位在该领域具有新的开拓精神并卓有建树的多篇论文 究竟对现实有怎样的意义 自己确实还难以把握。

即使是研究性的论文 对一无所知的门外汉来说 也可能有引人入胜的作用。不过对我而言，后一部分中的文章是否真能够有那样的效果，仍很难讲。因为目前自己还不可能有时间充分研读它们。

实际上 就是对第一部分中的文章 我也未必确实有精力仔

〔1〕高松基之 1946-)国际政治学者。立命馆大学文学系毕业。东洋英和女学院大学教授。著有《现代日本国际关系》等。——译注

细推敲。然而正如已经说过的，无论那些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自己是否真正熟悉 作为一种研究对象与领域 总是可以用自己的语言 说出点什么来的。

与我以上的理解是否一致另当别论，我觉得本论文集的第一篇文章 即德田教之〔1〕的《共产主义政治中的‘领袖’批判——关于批判毛泽东和斯大林》便是立足于现代中国并其可以成为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与研究领域这样一种学术的立场。

如题目所示，这篇论文是对批判毛泽东同批判斯大林之间进行比较分析。该文基于“过去四分之一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人们共同经历的对象征着新体制创建者（system-builder）的人物偶像进行过两次激烈的否定的经验”试图分析“代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两次大动荡的斯大林批判与毛泽东批判，对今后社会主义体制政治变革的意义。因为这一问题对将来的比较政治研究者来说 会越来越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引文出自该论文 需要指出的是 把主要由政治学者们对斯大林进行批判这一苏联的模式，与中国对毛泽东进行的批判的过程及论点相对照 其实二者既有相似之处 也有不相同的地方。因为中国对毛泽东的批评 主要是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廖盖隆〔2〕的《历史的经验和我们的发展道路》〔3〕。此外，《人民日报》的社论和邓小平的讲话 也涉及到了这一问题。

我想 像这样的题目的论文 以前在日本似乎还没有人研究

〔1〕 德田教之（1931-）中国研究家。筑波大学教授。——译注

〔2〕 廖盖隆（1918-）中共党史学家。1938年参加共产党。曾在延安马列学院、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和新华社从事政治理论研究工作。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著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简史》。——译注

〔3〕 此为廖盖隆1980年10月25日在全国党校系统中党史讨论会上所做的报告。——译注

过。可见 即使是在本书《序言》所限定的‘客观的学术性’领域，也能够写出优秀的论文来。它们所涉及的文献，相当广泛。这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我原来对使用‘客观的学术性’一词怀有的某些疑虑（这使我猜测，也许就是本文的作者，写了这本文集的《序言》。要想证明现代中国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举这篇论文恐怕就很有说明力。

这自然并非意味着 其他应该提及的专著或论文 其作者们就不够扎实。这里想指出的是，即使是本书第一部分里的各篇论文 所涉及的问题也相当宽泛。它们对使本书名副其实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支撑起了全书的基本框架。另外如：

“与苏联相比 中国新的优秀分子 似乎是从相当艰难的基础上重新起步的。”

“我们对中国正在转变的社会情况的理解 还刚刚开始。非经过‘漫长的过程’ 是难以接近其真相的。”

对书中以上这样一些的看法 我也有同感。而且 这也是全书的基本姿态。我觉得，要从制度的角度来把握当今的现代中国 确实必须这样去做。

不过，毕竟我又并非是与书中的作者们那样实际去写作这些论文的 所以着眼点可能会有些差异。在这里 我也想谈谈在同样面对中国这个研究对象时，自己对这些论文的观点的一些感受。遗憾的是，也许我对中国的理解，与他们会有些不太一样。

如，德田先生的论文是较早写成的。当包括其在内的这本论文集摆到我的书桌上时 在当今中国 共产党已经提出了新的

党章〔1〕还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文件都反映出了改革的意象。但如果将这些文件与前边提到的廖盖隆报告，即所谓的“庚申改革案”〔3〕加以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德田论文对廖文的理解还是较为肤浅的。

当然，这决不是说，由于中共新党章和中国新宪法的出台，此文的论点便站不住脚了，反而倒更证实了其所得出的结论。

记得在日本的普通点心铺里，曾经有过所谓“抽奖”的把戏。要是抽中了，便能够得到稍微高级一些的点心作为奖励。于是，孩子们可以拿着奖品或好些的点心回家了。然而如果不是下次再去点心铺，孩子们是不会关心这种“抽奖”的。由此我联想到，我们的现代中国研究，决不应该是这样的“抽奖”。既然我们设定了“客观的学术性”的目标，就必须努力接近它。而我的担心，便是在现代中国研究里，是否也有那种“抽奖”式的成分。该论文在最后总结说：“不可忘记的是，对这里重点讨论的《历史决议》的未来命运，还必须继续观察。故且不论新党章和新宪法会有什么样的生命力，但我们不能不关注它们的前途，以及包括《历史决议》在内的中国所有未来的逻辑可能性。”

〔1〕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新的党章。——译注

〔2〕 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举行的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新的宪法。——译注

〔3〕 1980年为农历庚申年。这年二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八月，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其间邓小平提出废止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并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职务，提名胡耀邦为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在这一背景下，海外把廖盖隆所做的《历史的经验和我们的发展道路》称为“庚申改革案”。——译注

在我的书桌上 还放有一本池岛信平编的《闲话历史·东洋篇》(文艺春秋社文库本)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 也曾以座谈会的形式谈到毛泽东。其中说道,要想知道当时还健在的毛泽东未来的命运 可以用唐太宗曾经谈论过的‘创业’与‘守成’两条准则来推测。不妨说 毛泽东缺乏“守成”的能力(见贝塚茂树〔1〕的发言)

所谓研究 应该汇聚众多资料 并进行公正的分析 这些无疑都是很重要的工作。然而在中国或现代中国研究领域,也不能忽视必须学习必要的东方历史知识,并应该能够以简明的标准来判断这些材料。否则,我们便只会徒劳而无功。正像本书第一篇论文的末尾指出的那样,这要我们永远地执着这一研究对象,并且要有总不释手的信念才行。以上列举了本书所收论文对自己的启发。这里还想再提一下以前曾与我有过联系的作者们的著作,以及我读后的感受。例如,我觉得山田辰雄〔2〕的《中国国民党在战后和平与民主主义时期的政权构想》一文 由于其在现代中国研究领域填补了一项空白,稍后应该再仔细做些推敲。还有平松茂雄〔3〕的《中国军事科学院的创立——对其与政治的关系的考察》也同样特别值得注意。

另外 记得在‘文革’前不久,《哲学研究》杂志上曾发表过结

〔1〕 贝塚茂树(1904-1987),中国研究家。京都帝国大学毕业。京都大学教授。著有《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贝塚茂树著作集》。——译注

〔2〕 山田辰雄(1938-)中国研究家。庆应义塾大学法学系毕业。庆应义塾大学教授。著有《中国国民党左派研究》等。——译注

〔3〕 平松茂雄(1936-),中国研究家。庆应义塾大学法学研究科毕业。杏林大学教授。著有《中国国防与现代化》、《邓小平的军事政策》等。——译注

合毛泽东思想来评价郭兴福〔1〕创造的军事训练方法的论文。近日收到了《中国事情研究周刊》（1982年12月20日出版）上刊登的《李德生〔2〕的经历》一文，其中也说到了郭兴福的事。自己所以曾对郭兴福感兴趣，是因为想知道对要求人的动作固定不变的军事训练来说，毛泽东思想究竟是怎样赋予其活力的。而郭兴福的意义在于其把思想与固定动作结合了起来，也有可能郭兴福是完全改变了原有的动作，以与毛泽东思想相结合。

在国防或军事研究领域，当然应该强调爱国主义士气和精神力量。但实际上，无视这一切，似乎并无精神内涵的物质力量（如武器、工业等）在战争之前已经大体决定了胜负，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现代中国的意义，以前并未像哲学战线上的争论与政治纠纷那样，引起我们的真正注意。

本书里山田和平松两人的论文，并不是把研究对象与研究领域过分拘泥在中国。对此应该如何评价，自己还说不太明白。也许这意味着，对尚含有‘暧昧’因素的现代中国来说，应该尽量从多角度去加以理解。

与以上两相比，小岛朋之〔3〕的《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五八年制定政策的过程——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运动’政

〔1〕郭兴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南京军区某部队的军事训练干部。他在1963创造的军事训练教学法，经叶剑英支持在全军推广。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根据这一教学法，曾发起“大比武运动”。后来在“文革”中，郭兴福因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杀人犯”。1979年，南京军区为郭兴福恢复名誉。——译注

〔2〕李德生（1916—）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1930年参加红军。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在文化大革命中，历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等。——译注

〔3〕小岛朋之（1943—）中国研究家。庆应义塾大学法学系毕业。庆应义塾大学教授。著有《中国的政治社会》、《中国共产党的选择》。——译注

策协调成功的机制》一文，在资料方面遇到的困难肯定相当大。在小岛的论文所论述的这一时期，我曾去中国访问过。当时在武汉郊区看到了所谓的“密植高产田”。至今自己仍有些怀疑，觉得那也许是临时为我们准备的。不过，那时在各地所接触到的热烈情绪确实是以前或后来未再见到过的。这一“运动”的政策当然是错误的。小岛的论文尽管遇到了困难，但也并非没有可能触及到足以从深层次来解释这一失误的非正式资料与素材。

为避免误解，还应在此补充的是，自己虽然曾收到过以上作者们的来信，但其中并没有风花雪月似的内容，大都是公文信函或是类似于信函的东西。本书中还有其他一些论文也是应该提到的，其中尚未触及的作者，只好简单罗列姓名如下：他们是藤井升三、宇野重昭、冈部达味、中岛岭雄、姬田光义、内山正熊、松本三郎、池井优、林嘉言、秋吉祐子、中川昌郎、小山三郎、国分良成、嵯峨隆（以上第一部分）；神谷不二、太田俊太郎、堀江湛、小田英郎、根岸毅、松井弘明、小此木政夫、田中俊郎、富田广士（以上第二部分）。

程麻译自《亚细亚研究》，30卷1号，1983年4月20日

悼念贝塚茂树先生

贝塚茂树〔1〕先生去世了。以前，我经常看到先生在白川通路上〔2〕上散步的样子。偶而在路上相见，我们也会站着大声聊天 谈论中国的局势之类。我觉得他确实是朝气蓬勃 好奇心十分强烈。

先生在追悼毛泽东逝世的文章里 明确指出了他的“功”与“过”颇有《史记》作者司马迁的史笔之风。作为历史学家 无疑是应该具备这样的态度。这使人想起了书上所说的，中国古代历史记录人即“史官”虽然屡屡被有权者迫害 却不肯在事实与评价上暧昧的故事。

我在先生身上感悟到的，那种受研究对象即中国历史文明内涵的影响 而浅移默化形成的“长者”人格 至今令人怀念。当自己在京都大学读书时，就曾聆听过先生讲授的古代史。他认为殷王朝是城市国家，这固然并不比西洋史中的古代城市国家

〔1〕 贝塚茂树（1904—1987）京都大学史学科毕业。日本著名中国史专家、京都大学教授。著有《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孔子》、《毛泽东传》、《中国的传统与现代化》等。——译注

〔2〕 竹内实在京都的住所附近的一条街道。——译注

希罕。然而 当先生联系中国历史 并且多次以甲骨文为例来说明这一点时 使人觉得很新鲜和生动。

在日本战败前后进入大学的我 由于缺乏营养 精神常处于饥饿的状态。除了直接的指导教师如青木正儿、仓石武四郎和吉川幸次郎诸位先生以外，我也贪婪地聆听着邻近学科如贝塚先生、教授德国文学的大山定一先生 以及讲语言学的泉井久之助先生等人的课程。说是贪婪，其实并非像是可以吃到在附近食品街上买到的美味那样，也许只是想得到如同在远出旅行时必备的‘饭团’之类。

当时 除了中国历史 在其他研究领域里 也不断有新的东西出现。如同孔子所说的‘后生可畏’一样 现在想起各位先生在那个时代颇有光辉的许多讲课，让人觉得与新的著作和学说相比 那些过去的东西 也并非完全是索然无味的。

在中国大陆出现新的国家不久，《世界》杂志曾出版了一本有关的特集。贝塚先生在其中说，应该站在既是研究中国历史的研究者，又是全新的不断进取者的立场上，其态度相当积极。

时代已有了天翻地复的变化。如今面对中国政局的变动，日本学术界已经并不感到惊讶了。而贝塚先生始终关注着中国的动向 这使人觉得 在他身上有着被称为京都学派的学者们共通的现代精神。而并非由于是老人，就显得陈旧。

不知从什么时候，先生开始写起了评论中国美术的文章。其收藏品在公开展览时 我也去参观过。先生这方面的文章 内容自然免不了要鉴别真伪 不过其风格 确实与罗列概念和史实有所不同 至今仍很耐人玩味 我非常喜欢。要是收集多了 说不准他也会成为美术史家的。

去年暮春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胡绳先生一行到京都 来我的研究所讲演时 应胡先生的要求 也请了贝塚茂树和井上清两先

生出席。在之后的欢迎宴会上，有很多青年学者参加。贝塚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希望两国进一步开展学术交流。当时的情景令人难忘。对于先生去世，不只是我，连中国的学者也感到由衷的悲痛。回想起来，先生为后辈人留下的遗产，无疑十分丰厚。

程麻译自《读卖新闻》(晚刊),1987年10月2日

舞台和观众席

—— 中国研究的视角

日本列岛，位于丝绸之路最东面的终点。它一直具有着汇总并展示中国文明，乃至西方文明的博物馆的作用。进而也可以说，它还是一个欣赏在中国大陆上演的戏剧的绝好观众座席。

不妨打开地图试看一下。中国大陆的地势是西边高，东面低。东边部分大都是广袤的平原，地势向大海倾斜着。而隔着大海，日本列岛大体排列成了一条弧线，面对着中国的大陆。

要是将中国比作面向东方展示的舞台，那么日本列岛可以被视为观众席。而位于这二者之间的海洋，像是贵宾席和乐池。

坐在这观众席位上的观众，一直远望着在中国舞台上上演的戏剧。那剧目就叫作“历史”。

这历史对同时代的人而言，其实就是当代史。也便是在陆续不断上演的戏剧。

由于中国历史即意味着是世界的历史，演员当然并不缺少可以演出的内容，所以戏剧是多彩的。大约情节模式有一些循环往复，可能使人觉得有些单调。不过，在观众席上的人们眼里，剧情的发展常常会出人意料之外，所以，它们总是显得那么令人兴趣盎然。

在观众席上的观众 有时候甚至不甘心只当个看客 还想参与到剧情里去。比如 有从旁边附设的花道〔1〕走上舞台去的，也有不经过乐池的，而竟直接爬上了舞台。他们虽然让人觉得有些脸生 却硬要在舞台的一角树起旗号 或以敌对者 或以感化者的身分来亮相。

在这种演出中 可能是过于热衷所表演的情节了 有时竟会忘记了从地势的角度 去区分舞台与观众席。不过 对在舞台上饰演角色的人们来说，若将观众席作为舞台，那绝对是不应该的。因为毕竟舞台是舞台，观众席只是观众席。只有坚持这样的看法 才是对二者关系的正确理解。

在那舞台上演出的戏剧，使观众们懂得了历史。面对着舞台 注视了两千多年的观众们 其中有的人变成了戏剧鉴赏的行家。但是 也并非没有误读了故事 而竟无自知之明者。特别是随着时光的流逝 到了被称为日本“大正”的年代 那舞台上的戏剧 似乎真地被误解了。

如前所说 本该是舞台归舞台 观众席归观众席的。可“大正”原本只是观众席上的年号 跟那舞台上 并没有什么瓜葛。然而“大正”时期的观众所看到的舞台上的情景 是所谓“天下大乱”即延续 276 年的清王朝垮了台，出现了名为“中华民国”的共和国。而且 自秦始皇以来在王朝更替中反复出现，始终名正言顺的“皇帝”经过了 1911 年 也消失了。

舞台上演出的这一情景 被称为“革命”。可在观众席上 人们并不认为“天皇”和“皇帝”完全是一码事。尽管在舞台上出现的剧情 以及对那剧情的理解 也确实曾给观众席带来过巨大

〔1〕花道 是日本传统“歌舞伎”的舞台与幕帘之间铺设的通道 供演员上下场使用。——译注

的心理冲击。

中华民国建国那一年 叫“中华民国元年”后来在计算年代时 简称为“民国”。“民国”和“大正”都是从 1912 年开始的。现在的政权 即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西历 称为“公历”)而在台湾 仍沿用“中华民国”的名字，“民国”的年号 依旧在那里使用。在观众席这一边 后来“大正”不久便变成了“昭和”。

“昭和”的结束 与清朝倒台并非是一回事。虽然与乃木大将夫妇殉死^[1]的象征相类似，这一年号的终结，也曾经给观众席上的人以强烈的震撼。这种震动和由舞台上的剧情带来的冲击 混合在一起 使“大正”时代的观众 在心理深处的感受相当复杂。

自“昭和”开始 舞台上的戏剧自然还在不断地展开。即使是以后 也还会继续发展的。观众们发现 那戏剧并未因为有了“革命”便天下太平。

所谓舞台和观众席这种从地势上的比喻，当然只是一种联想而已。这两者的关系 也许以后仍会使它们之间 产生所谓的“矛盾”。

程麻译自《京大史记》京都大学创立九十周年
纪念协力出版委员会，1988年8月10日

[1] 1912年日本陆军大将乃木希典和妻子静子在明治天上下葬之日 自杀殉死。——译注

伊藤虎丸、祖父江昭二、丸山升编 《近代文学中的中国与日本》

正如本书〔1〕的书名所标示的，总体上贯穿于本书的基本概念，是所谓‘近代’、‘中国’和‘日本’。但仅有这几个概念未必就十分明确，因此还加有副题，即将着眼点放在‘文学交流史’上。在本书中，已有对‘近代文学’中所谓‘近代’〔2〕这一时代背景的解释。全书宗旨，即在于追溯日本近代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交流的历史，并通过这种追溯，借以分析日本与中国的‘近代’之间的区别。

说到如此着眼于‘近代’的原因，那无疑是因为日本的知识分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文化人）曾一直执着于这个概念。而本书编者与作者中相当部分的人，也继承了这种观点。或者说，所以坚持这样一种文化观念，本是基于以往的文化传统。

在战前日本（不必回溯到本世纪较早的大正时期）曾多次

〔1〕 伊藤虎丸、祖父江昭二、丸山升编《近代文学中的中国与日本——合作研究·日中文学交流史》汲古书院，1986年10月20日。——译注

〔2〕 日本学术界对‘近代’一词内涵的理解，与中国人的认识并不完全一样。日本学者把明治维新以后统称为‘近代’，其时间跨度包括中国学术界所说的‘近代’与‘现代’。——译注

有过关于“超越近代”的提法。可实际上那不过是为准备战争所做的鼓吹。我觉得，这与当时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流行不无关系。因为日本要拚命追赶欧洲先进文明，并且念念不忘要誓死赶上它，于是便有人提出应该放弃那种追赶欧洲文明的错误作法，而代之以力求超越所要追赶的对象的思维方式。其实所谓的欧洲先进文明正在走进“死胡同”。欧洲文明已经向社会昭示，想要追赶这种文明的人们，并不会有什么好前程。

当初“超越近代”的观念是为战争做准备的。而在日本战败以后并非意味着“近代”的概念从此就销声匿迹了。后来亲眼目睹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则又流行起了另一种说法，即认为也有可能出现“以不必经过近代的方式而超越近代”的情况。

如上情况使我担心，要是不在这里做上面这样一些解释，有可能眼下的学生们，已经对贯穿本书的基本观念难以理解了。

不过，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其前景曾一度变得暗淡起来。因此不妨说，在那里并未真正“超越近代”，而且还出现了不少“近代”以前的观念。于是，“近代”的概念在那里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另一种要求也起死回生了，那就是指人们试图重新检讨以前错误理解的“近代”概念的现象。即使是在本书中，也内含有同样的愿望。在实际上，过去那些历史事实未必就代表着曾被“炒”得沸沸扬扬的“近代”概念，它们不过只是“近代历史”罢了。而对本书来说，所面对的便是属于近代史一部分的文学历史。文学，其实是人的精神的反映。当对本真的近代文学历史进行正确解释时，人们心目中的“近代”观念，势必要再一次浮现出来。伊藤虎丸^[1]在本书中指出，在面

[1] 伊藤虎丸(1926-)中国文学研究家。东京大学研究生院中国文学系研究生毕业。东京女子大学教授。著有《鲁迅与末世论》等。——译注

对西方近代文化时 曾有接受 如何接受、接受时的主体意识问题)民族自主 重视本民族传统 与东西文化相对论 东方同样有独立的文明) 三种认识模式。这自然并非就是创造了“近代”的西方先进文明本身而言，而是指面对着这种文明的日本和中国等等。作者进而在这种视角的基础上 提出了“文化(即人)”的观念。作者所以特别强调这样的思路，是因为上述三种认识的模式 无一不是受“先进-落后”这样一种观念的支配。试图借助这种思维态度来理解中国的日本人，不管是蔑视中国为落后的国家 还是认为其先进而对之崇拜 都会误入歧途。任何一方面 都会受到伤害。因此 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必须另辟蹊径。

提出这样一种思路 是因为作者“立足于亚洲的近代化 即日、中两国都曾受到近代，也就是同样的西方冲击这样一种现实，想从中总结出它们所面临的共同课题，及其各自不同的个性”而最强调的 便是其“理解的视角”(本书 25 页)

基于这样的愿望 众多作者们从 1970 到 1980 年间 进行了十年的合作研究。本书便是其成果之一。当然 在开始时 关于这样的“视角”以及“对这种视角的把握”应该说作者们并非都是那么清楚，而是逐渐才明确起来的。因为在 1970 年开始研究时，中国尚未否定文化大革命。所以把中国革命看作“超越近代”的榜样的见解 在本书中还留有痕迹。不可否认的是，“文革”所反映出来的都是些“前近代”性的观念。而 1976 年“四人帮”被抓的事实 确实迫使人们重新探讨那种无条件推崇中国革命的立场。

如果不使用“近代”或“近代文学”的概念 那也许在近代文学史中还有另一种与年代相关的称呼 如“大正文学”之类。而采用了这种概念的伊藤虎丸《郁达夫与大正文学》一文 由已经发表过的三篇论文及其补充文字构成。据作者在补充文字里

说那是‘对自己的‘战后民主主义’的纪念（本书 302 页）

作者的论述是在当时的环境中展开的，当然会触及到现实。而近些年来，自己也很关注郁达夫，可惜的是没能像作者一样，尽早注意这些问题。

郁达夫怀有的‘近代精神’带有‘世纪末’的色彩。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不可忽视的是郁达夫的‘世纪末’型观念，归根到底，对他来说，只不过是借用了别人的东西（本书 242 页）。这一个特点特别反映在伊藤虎丸所列举的《银灰色的死》和《沉沦》中。正像作者指出的，郁达夫的‘颓废’可以归纳为‘孤独——忧郁、反抗——堕落——自杀’这样一个公式（本书 236 页）

在郁达夫与‘大正文学’的关系中，日本自然主义的‘基本观念’也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令人瞩目的是，郁达夫同样主张‘作品应该是作家的自传’（主要见本书法 268 页）与这篇论文相类似，本书中作者按不同的论述对象，逐步由浅入深地进行分析。若依作者和所论对象来排列，内容主要如下：佐藤保→黄遵宪、北冈正子→鲁迅《摩罗诗力说》、木山英雄→正冈子规·鲁迅·周作人、伊豆利彦→夏目漱石《满韩各地》·《草枕》·《哥儿》·《阿 Q 正传》、小谷一郎→创造性社·田汉、高杉一郎→世界语者、丸山升→鲁迅（在日本）、祖父江昭二→横光利一《上海》、釜屋修→鲁迅·莫拉伊斯〔1〕、正宗白鸟·野口光次郎、新村彻→亚洲儿童文学、佐治俊彦→藤枝丈夫·大高岩，最后还有祖父江〔2〕、伊藤、

〔1〕莫拉伊斯（1854—1929），葡萄牙作家。曾任葡萄牙驻神户、大阪领事，后永住日本。著有《德岛的孟兰盆舞》。——译注

〔2〕祖父江昭二（1927—）日本文学研究家。1957年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和光大学教授。著有《探索日本探索近代文学》。——译注

高杉、小野忍〔1〕、丸山升〔2〕、佐藤、尾山兼英、泽谷昭次、佐治等人参加的关于‘佐藤春夫与中国问题’的座谈会纪要。而有关共同研究的情况 佐治俊彦已在《后记》中做了介绍。

这本书对于关心日本的近、现代文学 或关心中国近、现代文学 以及对双方都很关注的人来说 应该作为重要的资料来收藏。

我应约为这本书写评介 是因为编者之一的祖父江昭二 曾经非常积极地推荐过自己的论文（《昭和文学里的中国形象》，《中国资料月报》，106号，1957年1月10日）。

祖父江昭二的论文 已在 1962年7月发行的《莲花》杂志第4号上发表过。现在重新再来拜读，自然并非只是因为作者推荐过个人的文章。难得的是 作为本书的发起人之一 在他们的共同研究开始时 便购买了二、三十本收录前面提到的自己那篇文章的《日本人心目里的中国形象》一书 使出版社增加了利润，从而也给作者的我带来了好处。因为就在那以前不久，自己刚刚辞去了在大学的教职〔3〕。当在夜里接到告知这一消息的电话时 自己曾发出过相当于‘！’号的感慨。在当时那种黯淡的心情中 其中还禁不住夹有类似于‘？’号的成份 因为毕竟那是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事情。

上边提及的横光利一的《上海》一文 我在讲课与别的地方也多次说起过。还记得曾想就其最初在杂志上发表时的问题，做一点比较性的研究。读了本书，才知道自己已没有必要这样

〔1〕 小野忍（1906-1987），中国文学研究家。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科毕业。和光大学教授。著有《中国文学杂考》、《现代的中国文学》等。——译注

〔2〕 丸山升（1931-）中国文学研究家。1961年东京大学研究生院博士毕业。东京大学教授。著有《鲁迅的革命与文学》等。——译注

〔3〕 竹内实在 1970年3月辞去了在东京都立大学的工作。——译注

做了 也算放下了一件心事。

另外 我还在本书里看到丸山升在其论文的注释中说：“自己对先生 指竹内实——引用者注 的分析尽管不无异议 但那另当别论。”（本书 457 页 看到这里 让我我不禁想到 使我足以应允写这篇书评而接续那曾经中断了的因缘，其实也并非只是由于前前提到的某一个人。

由于想写这篇书评，我觉得应该看一点参考材料。在装满杂志的瓦楞纸书箱里 我看到了一本昭和 14(1939)年 12月号的《新潮》。看那目录 里面有一篇矢野峰人〔1〕写的《道森〔2〕之恋》。而本书里伊藤虎丸文中提到的矢野关于亚当·西蒙兹〔3〕的道森论 主要就出自这篇文章。不过 矢野在接受西蒙兹的委托写了那篇论文之后 要是能够再读到道森自己公开的书信 也许应该做一些更正才是。其实，道森出入的那家饭馆并非是意大利人经营的。朋友之间经常把那女主人称为“波兰”估计大约是波兰人。若根据她所说“回德国”的话 也有可能是德国人。道森与那女店主的女儿，在 1892年 5月时，关系已经相当密切。而那女儿在前一年的 2月才刚刚满 12岁。道森觉察出对她的恋情 像是在当年的 3月。后来，有机会与她的母亲单独喝茶，讲清了此事 但并不顺利。当 1893年春天，道森割断与她的恋情时 她只是回答说：“我还不过是一个孩子。”

〔1〕 矢野峰人（1893 - 1988），日本诗人、英国文学研究家。京都帝国大学毕业。曾任东京都立大学、东洋大学校长。著有《近代英国文学史》等。——译注

〔2〕 道森（1867 - 1900）英国诗人。为所谓“世纪末文学”的代表性人物。其恋爱史中有流传很广的浪漫故事。——译注

〔3〕 西蒙兹（1865 - 1945）英国诗人、批评家。是“世纪末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曾热衷于介绍法国象征主义诗歌。著有《象征主义文学运动》此书对日本现代文学产生过影响。——译注

听说后来她母亲准许她结了婚。她于 1897 年嫁给了一个男佣人。“尽管身体不断衰弱下去 爱情也乏味 但道森仍然从巴黎换住着便宜的旅馆，辗转到了布列塔尼。他依靠写诗和小说 并且尝试着翻译 勉强糊口。他在 1896 年献给阿丁莱德的《诗集》也是身在如此困境中编成的。”那次未能圆满的恋爱，对道森来说 消耗了全身心的精力。可也正是它 使诗人写出了许多充满真正优美的爱情诗篇。（矢野峰人文）

如果伊藤虎丸提到的‘有名的道森传说’（本书 217 页）确实如此有声有色 那郁达夫不仅可能借以进行文学构思 大约还会对其产生强烈的共鸣。而实际上，当时矢野知道的这些材料，郁达夫未必会看到。不过我觉得，即使只是稍微听说过所谓的“道森传说”而并不怎么了解道森本人 那郁达夫从道森身上得到的启发 恐怕也会远远超过“道森传说”本身。

这本研究论文集，也是献给已去世的小野忍先生。当本书在写作的过程中 我曾与丸山升、尾上兼英、竹田晃 偶尔和小野忍先生拍过一张照片，而且自己也麻烦过小野先生。但尽管有这些因缘 本人过了一年多 才应约写出这篇书评。编辑部也为曾此多次催稿，而且那语气已经有点挖苦了。小野先生生前指出过本书中的不准确之处 也试图指正。自己在先生去世前 想再次去请教。然而现在只好暗中铭记此事以怀念先生，说起来确实愧疚得很。

程麻译自《日本文学》第 37 卷 9 号，1988 年 9 月 1 日

《毛泽东》后记

写了又改 改了又写 不知撕碎了多少张稿纸 才终于有了结果 足以集成这册书。这时 北京上空的云彩 也变得诡谲起来了。

胡耀邦之死。天安门广场的示威游行与绝食。戒严令。六月四日。种种事端令人骚然，却无法停笔。

想要写的内容，并没有完全都誊写在稿纸上。

大致写了有一册书的分量之后，朋友借给了我一盘天安门事件的录相带。我才觉察到，自己当时连电视都没有看。

后来，我收到了一位研究中国文学的留学生的来信。他在说完主要内容之后 在信的末尾说 他不同意我在电视上发表的意见。其实，在那录相带中，并没有完整录下我发表的所有意见。但既然友人已经帮我录了下来，我也可以重新揣摩自己的意见。我想，我大致明白了那留学生的意思。

在八九年之前 我去过一趟香港。在那里遇到过一位年轻人。他从台湾逃到日本之后 想到大陆去 但因没有护照 不能入境。他说 他在日本阅读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著作 而其中最憎恶的 就是拙著《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中公新书”中央公论社 1972年）。那么这一本书，又将会遇到多么聪明的读者

呢？

在‘岩波新书’里已经有过同样书名的一本著作《毛泽东传》作者是贝塚茂树〔1〕，1956年出版。这本书，很久以来都很畅销。

那本书出版的时候，毛泽东还很健康，曾在长江大桥旁畅游过一番。还请日本前陆军军人访华团，转达他对天皇的问候。当年他62岁。后来，又一直活跃了20年之久。

中央公论社编辑部想征求适当的人选，撰写一本续集，内容着眼于毛泽东62岁以后的动态。

自己的书与贝塚先生的书名完全相同，而且又都是为‘中公新书’执笔，自己难免有僭越之感。我一直想中断写作的念头，可一想起贝塚先生生前的音容，会不禁涌起一股念恋之情。我想，贝塚先生大概会原谅我的。冲动使我敢于毛遂自荐。

贝塚先生的书，开头是描述他从空中眺望韶山的风光。而我也曾从降低高度的飞机机窗里，看到过那座山的风光。尽管空中小姐指给我看时，还没等我看清楚，那片风光已一掠而过了（1960年）

至于贝塚先生，是否已经将那风光尽收眼底了呢？我想，下一次若有机会，我会更仔细地看看韶山那特异的风姿。她很像是富士山，但比富士山更优美，柔和地张开裙摆，形成了辽阔的原野。我访问毛的故居，也是打算从这里写起。后来，我前往韶山，从地面仰视了她。

毛泽东获得的是权力。不仅获得了一般的权力，而且还获

〔1〕 贝塚茂树（1904-1987）京都大学史学科毕业。日本著名中国史专家、京都大学教授。著有《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孔子》、《毛泽东传》、《中国的传统与现代化》等。——译注

得了‘皇帝型’权力〔1〕。

秦始皇称自己是皇帝之始，企望以后可传到二世、三世。那是远在公元前 221 年的事了。

1954 年，在颁布‘宪法’的同时，毛泽东正式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一职。如果他是一世的话，那么邓小平就是二世。中间虽然出了个华国锋，但他在刚把‘皇帝型’权力收为自己的笼中之物后不久，便下台了。

那么，三世会是谁呢？

后来，以逢先知为团长的中共党史研究者代表团来京都访问，成了我再一次去中国的一个契机。在北京与过去已经结识的各位先生重逢，以及受到他们有益的赐教等等，都是我写出此书的动力的源泉。

不可能列举所有人的姓名，谨在此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逢先知、袭育之、金冲及、高勇、汪裕尧、冯惠、杨增和、石仲泉、顾龙生、王玉璞、卢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沙健孙、廖盖隆、王淇、张惠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孙柏林、鲍世修、刘先廷、张杰、邓湘田、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王兴国，以及韶山管理局周文辉抗、李德伟等各位先生，致以衷心的谢意。

在北京，还曾承蒙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汪向荣、杨正光、颜锡雄等各位先生的关照。另外，我所属的‘访问原地’旅行团同行诸君，也曾给予友情和赐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本应一一

〔1〕作者曾对‘皇帝型权力’做过如下解释：“中华世界十分广大，根本不可能设想只有一种权力存在。恰如散落在小学校园内的篮球，权力分散各处。拾起一个篮球并紧紧抱住，就等于得到一种权力。尽管只拾起了一个球，但只要他拥有那个球，他就是权力者。因此，一个球的权力虽然比五个球的权力弱小，但前者毫无必要对后者卑恭屈膝。拾起来的球的份量，如果相当于整个中华的份量，那么这种权力就是‘皇帝型权力’。”——译注

记下他们的姓名以表寸意，但由于篇幅所限，敬请见谅。拙编《中国现代史三棱镜 考访原地》（苍苍社，1988年）一书中，有他们的健笔秀文。

当然，关于本书的内容，由我个人承担全部责任。

如将负责企划此书的林建朗君周到的安排，与此书的份量加以权衡，不知道后者是否对得起前者。好在作为本书的对象毛泽东及其周围的人物，可能是永远也说不清、道不明的。

黄英哲、杨宏民译，《毛泽东》，
自立晚报文化出版部，1991年6月

京都学派与毛泽东

长期以来 已很少有人提及所谓“京都学派”了。但在我们入大学的时候 这个学派的影响是相当普遍的。当“战后”已过去很久 开始有人说“已不再是战后”的时候 我却突然想起了京都学派和现代中国研究之间的联系。而按照我的理解，根据文献来说话 离不开文献 便是“京都学派”。

从京都大学毕业以后 我到了东京。那时人们还不说“现代中国”而称为“新中国”。东京的新中国研究很活跃 我被那气氛裹挟着。当《毛泽东选集》第一、二卷出版时 我也将其买到了手。由恩师仓石武四郎〔1〕先生安排 我进了东京大学文学部的研究生院 领取育英会〔2〕的奖学金。那书就是用奖学金买来

〔1〕 仓石武四郎(1897-1975)，日本中国语学家和中国研究家。1921年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科毕业。后接受京都大学研究生院狩野直喜的指导。1927年任京都大学副教授。1928至1930年去中国留学。1931年兼任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研究员。1939年任京都大学教授。自1940年兼任东京大学教授，1949至1958年任东京大学教授。为日本的京都支那研究学派著名代表人物。重视现代中国语的教学与研究。著有《支那语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汉字的命运》、《中国文学讲话》、《中国语五十年》、《仓石武四郎著作集》等。——译注

〔2〕 育英会是日本历史较久的教育基金会之一，主要资助学生读书时的费用。——译注

的。

我翻着字典，按照发音反复阅读里边那些文章。其中有些段落称得上是“名文”，我竟禁不住读出了声音。

我还担任着仓石先生主持的中国语讲习会的教师，需要编写讲义。那是一个誊写印刷的时代，得在锉板上铺着的蜡纸（涂着蜡的透明纸）上，一笔一笔地刻字。

虽说是研究新中国，然而资料仅止于《人民日报》。此外还有一些单行本。我们不外乎是从小说等作品中，去推测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因为当时日中之间的来往，还不能像现在这样简单。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它不只是震撼了中国，也震动了全世界。在追踪其动向的过程中，我觉得其现实与外界的评说似乎并不一致。于是，想调查一下过去的主要文献，即毛泽东的文章在最初发表时，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第一手文献是过去的杂志，以及小册子之类。它们是在国共内战时期，由国民党军队押送到台北的，后又转卖到了美国，再由东京的东洋文库买来了微缩胶卷收藏着。它们可以任意阅览。S. 施拉姆他和杰罗姆·陈^[1]写过调查这些第一手资料的论文。我们以此为线索，在微缩胶卷中寻找那些杂志和小册子，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这些工作都是由东京都立大学的学生们主动去做的。

不过，誊写版印刷的杂志和小册子字迹模糊，很难看得清楚。辨别的工作主要由我来承担。我记得，有时候在脑海里会浮现出已抄过或印刷过的文章，一看到那黑色的文字，便会读出句子来。这是我以前朗读毛泽东论文的体验起了作用。他的

[1] 分别是美国与加拿大的中国研究者。——译注

文章有一种格调，形成了独特的文体。虽说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可他的文风与日本的讲座派〔1〕工农派〔2〕诸先生不同，与苏联学者也不太一样。当然，其中也有错乱不清的地方。

通过调查，我发现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文章，经过了不止一次修改和订补。注意那些修改与订补的地方，可以看到他原来的思想。于是，在重新刊行时，我们在那些修改、订补的地方都加了标注。

感到失礼的是，重新刊行毛泽东的这些文章，并没能征求原作者的意见。不过我们觉得，他的著作已属于公共财产。不必说政治言论，连文学作品也难讲只归作者自己个人私有。此外，我们也并非想编得像选集一样，而是试图通过自己的搜寻和解读，编出另外一套书来。况且，按最初的动机，编这套书只是为了提供给搞研究的学者们。

等这套书出版后，产生了意外的反响。尤其是国内的定数多于国外，真是超出预料。这使人觉得，中国语似乎已成了国际性的语言。后来又经过修订，工作才告一阶段。开始由北望社（已解散）再由苍苍社出版。书名为《毛泽东集》共有 20 册。

其实，这套出版物是犯忌的。此事在当时中国，属于禁区。我（我们）显然迈入了禁止涉足的领域。那时还健在的周恩来总理，曾经提到某位学者的评论以及出版《毛泽东集》的事，将它们看作在日本不好倾向的例子。在周总理接见的代表团中有认识我的人，他回国后立即来找我，劝告我停止出版。这劝告当然是

〔1〕 日本马克思主义流派之一。以学者野吕荣太郎在 1932 年前后发表的《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讲座》为标志。与“工农派”的观点不同，他们强调日本社会还有封建主义残余。——译注

〔2〕 日本马克思主义流派之一。由围绕着在 1927 年创刊的《工农》杂志的社会活动家、学者和作家等组成，他们认为日本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译注

出于好意 但我反复思考 并没有停下来。这是在快要发行第一册时候的事。

后来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先后去世,《毛泽东集》也没能够再版。我的书全都赠给了福冈市综合图书馆,手边已经没有了。记得好象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书库里还有一套。

可能因为自己曾在京都大学学习 耳濡目染而成了“京都学派”于是决心以其作为自己的研究方法。后来 我进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又在京都生活了不短的时间。在此期间 我组织了共同研究班即现代中国研究会〔1〕,直到目前它仍在活动。参加的人是日本各大学里的正式教员,有的研究者还是中国留学生。另外也有人觉得东京缺乏这样的学术气氛,从那里跑来参加的。这种有特色的活动,大概确是京都才会有。

我在人文科学研究所时,曾作为京都大学校长西岛〔2〕先生的翻译,陪同过来访的中国代表团。这使我有机会接触到先生的思想和人品 并得以自我反省。另外 我也先后得到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桑〔3〕、林屋〔4〕先生的薰陶。我认为,先辈理应帮助后辈 因为“京都学派”并非是学阀 学派中人都有共同的追求。而这种追求 将会永存。

程麻译自《京都大学百年》,
紫翠会出版,1997年6月18日

〔1〕 竹内实 1975年4月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成立现代中国共同研究班,1987年3月改为现代中国研究会。——译注

〔2〕 指西岛安则。——译注

〔3〕 原指桑原武夫。——译注

〔4〕 指林屋辰三郎。——译注

《新版中国的思想——传统与现代》 后 记

NHK^{〔1〕}在开办学习中国语讲座时，决定发行教材《中国语入门》。当时熊谷健二先生要我把本书的内容作为教材写成普及读物的样子，能够连载，并且想将其收入“NHK丛书”中。

当时自己觉得这事如同背上了沉重的包袱，那沿着下坡路向东横线^{〔2〕}都立大学车站走去时的感觉，至今仍然历历在目。连载结束以后，因为想把原稿做些整理，也添写一点东西，便决定到一座孤零零建在田野里，紧靠着桥边的温泉旅馆去住。当时是从伊豆的下田^{〔3〕}乘公共汽车去的。在汽车上，我打开指示旅馆所在地的信来看，向四周张望着。这时，邻座的一位旅客与我搭上了话。原来他就是旅馆的主人。

大约在那里住了两天，其间从东京来了电话，要求我再加写文章，谈谈对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批判一事的看法。自己虽然有点零乱，但还是有些想法的，于是便写了一节“关于革命的

〔1〕 日本基本反映政府倾向的广播、电视系统。——译注

〔2〕 从东京到横浜的铁路。——译注

〔3〕 下田是位于东京南部的静冈县伊豆半岛南端的一个城镇。——译注

思想”。那时，文化大革命正在进行中。

书终于出版了。当我偶尔到神田〔1〕在面对着十字路口的书店二楼不怎么显眼的地方，看到挂出本书广告时，自己的脸上禁不住有点发烧。

这些都已是 32 年前的事了〔2〕。在这 32 年间，我并未完全放弃订正的念头，有几处在再版时也做过修改。自己手边的书里，就有以红笔润色的地方。

前不久，我曾谈过自己由于关注莱布尼兹〔3〕的二进位法，去搜寻易经 64 卦木版图的经过。在中国的出版物里，也有论及易与电脑二进位法的关系的。本书最初提笔时，作者便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后来，自己整理资料，尝试着写过一篇小论文。这次，终于有机会对本书做了补充。

关于易的部分又加写了并收入了 64 卦图。此外，由于“循环的思想”一节过于膨胀，另辟了“时间的思想”作为独立的一节。

我曾有几次讲演的机会，谈到过“中华思想”。在亚洲大学亚洲研究所的公开连续讲演，便是其中之一（1998 年 7 月）。在明年 4 月，与其他讲演人一样，根据速记修改稿，会出版一本小册子〔4〕。本书中也收有讨论同一问题的一节，即“中华思想”。只是当时讲演时，比较注意与当时中国的动态相联系，并且与其他先生的议论一样，讲得比较通俗。读者也许看到过亚洲研究所的那个版本。本书与之重复的地方，想必读者能够看得出来。

〔1〕 东京的书店街。——译注

〔2〕 竹内实《中国的思想——传统与现代》日本广播出版协会，1967 年 4 月 20 日。——译注

〔3〕 莱布尼兹（1646—1716）德国数学家、哲学家。——译注

〔4〕 竹内实《亚洲人的价值观》，亚洲大学亚洲研究所，1999 年 3 月 15 日。——译注

我将‘中华思想’作为第 11 节 放在最后 是想如同大口袋收口一样，以其结束全书。也正因为如此，我把修改后的封面上 加上了‘新版’的字样。

由于做了新的增补，不能不为防止比其他“NHK 丛书”过厚，而进行一些删节。我想，这样会更便于阅读。

在本书初版的《后记》里 当时我曾写道：“‘中国的思想’是什么，其实说到底，自己也不明白。我在这样反复自问自答的过程中 写完了最后一节。’后来在本书印第 11 版时 我按照熊谷先生的指示 删去《后记》里的这句话 而改写为：“在本书多次改版的过程中 日中两国邦交实现了正常化 在逐渐接近‘理想的关系’。自己希望读者能从关于‘中国’的读物里 得到更多的启发。”

在写这篇新版《后记》时 大文字山〔1〕上微明的天空阳光灿烂。昨天夜里，小渊惠三首相和江泽民主席会谈，发表了《共同宣言》。当我去位于银阁寺〔2〕街道上的自动售报机购买当天的早报时，一边走一边想到 如果‘中国’可以写成书的话 那么“日中关系”同样也算得上是一本书。而翻开这后一本书的，不仅有中国人的手，其中也有我们的手。它们不是靠着这种共同的力量么？正是这样的合力，才使日中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

戊寅平成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于京都白川河畔空竹居竹内实

程麻译自《新版中国的思想——传统与现代》，
日本广播出版协会，1999年 1月 25 日

〔1〕 竹内实在京都的寓所东边的如意岳，因每年 8 月 16 日的盂兰盆节夜晚，在其上燃放‘大’字形焰火 又被称作‘大文字山’。——译注

〔2〕 银阁寺是位于京都东北部的一座庭园里的著名寺庙，距离竹内实的寓所不远。——译注